东方论坛

双月刊　一九八八年创刊

二〇一八年第三期　总第一百五十一期

《东方论坛》学术委员会

委员：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安乐哲（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叶维廉（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蔡仁厚（台湾东海大学荣誉教授）
崔根德（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
陈荣照（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陈启生（马来西亚孔教会秘书长）
李瑞智（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官）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伯海（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执行委员：

蔡德贵　董京泉　冯国荣　刘忠世

主　编　　钱国旗

副主编　　刘喜华　冯济平（常务）

二〇一八年第三期
（总第一五一期）

目　录

□政治学研究

·社会治理与理论创新专题·

新时代绩效管理机制持续改进的流程创新
——以税务系统绩效管理版本为研究样本　冯志峰·1·

我国基层治理中的管区问题探析　王兆刚　种道台·9·

美英日社区治理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与经验启示　高　红　杨秀勇·15·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环境外交新变化及其影响　丁金光　赵嘉欣·22·

□经济研究

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性研究
赵领娣　邵双玉　隋杭珂·29·

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阮红伟　姚海棠·35·

□文学研究

印度文化特征成因探析　穆宏燕·44·

印度《拉贾摩汉的妻子》中的英国小说元素　张　玮·52·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中的异国形象　张　婧·57·

出 版 日 期
二〇一八年六月

和刻本《事林广记》整理札记　闫　艳　齐佳垚·63·

《楚辞章句补注》引《尔雅》考论　窦秀艳　张　雨·68·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编辑出版类型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之别集　徐鹏绪·76·

阿英对新文学史料构建的开创之功

——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的编撰

赵连昌　李　广·87·

左翼乡土小说的鲁迅基因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内在关联　田　丰·95·

□历史研究

台湾士人与清代台湾地方志之修撰　杨齐福　吴敏霞·101·

国际联盟失败原因新探

——基于威尔逊个人性格因素的视角　王　青　季乃礼·106·

论1894—1897年张之洞的外交观　孙　昉　刘　平·112·

□哲学研究

头部移植的伦理反思

——从儒家的视角看　刘　涛·120·

论墨学的圣俗二重性　黄庆丽·124·

THE EASTERN FORUM

The Contents of the 3rd Issue for 2018

The Process Innovation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Taxation Syste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FENG Zhi-feng（1）

Analysis of the Basic District in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 WANG Zhao-gang　CHONG Dao-tai（9）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olicies across the US, the UK and Japan ..... GAO Hong　YANG Xiu-yong（15）

New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in the Obama Era ..... DIN Jin-guang　ZHAO Jia-xin（22）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Marin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Shandong …… ZHAO Ling-di　SHAO Shuang-yu　SUI Hang-ke（29）

The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BRICS Countries ..... RUAN Hong-wei　YAO Hai-tang（35）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 of Indi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 MU Hong-yan（44）

The Elements of British Fiction in *Rajmohan's Wife* ..... ZHANG Wei（52）

Xuan Zang and the Exotic Images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 ZHANG Jing（57）

Notes on Collating *Shi Lin Guang Ji* of the Japan Block-printed Edition ..... YAN Yan　QI Jia-yao（63）

Quotations of *Erya* in *Added Notes on the Annotated Songs of the Chu State* ..... DOU Xiu-yan　ZHANG Yu（68）

Research on Types of Documentary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dividual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XU Peng-xu（76）

Ah Ying'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to the Collection of New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ilation of *Index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New Chinese Literature* (1917-1927) ..... ZHAO Lian-chang　LI Guang（87）

The Lu Xun Gene in the Left-wing Native Novels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y 4th Native Novels ..... TIAN Feng（95）

Taiwan Scholar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 YANG Qi-fu　WU Min-xia（101）

Interpreting Wilson's Failure in the Issues of League of Nation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 WANG Qing　JI Nai-li（106）

Changes in Zhang Zhidong's View about Diplomacy from 1894 to 1897 ..... SUN Fang　LIU Ping（112）

Ethical Reflections on Head Transpl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 LIU Tao（120）

On the Dualism of Sacredness and Secularity of Mohism ..... HUANG Qing-li（124）

英文翻译：岳玉庆

新时代绩效管理机制持续改进的流程创新

——以税务系统绩效管理版本为研究样本

冯 志 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3）

摘 要：作为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载体，科学的绩效管理机制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抓手。国家税务总局一以贯之地将持续改进作为绩效管理的核心要义，不断改进绩效管理方式，积累了可资借鉴与复制推广的丰富的绩效管理实践经验。为有效提升绩效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正确处理好绩效管理目标、过程、结果、方式和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推动形成“自我约束、持续改进、改革创新”的绩效管理内生机制。为此，持续推进绩效管理工作，必须立足新时代实际需要，创新绩效管理流程，以实施战略绩效管理为导向，以规范指标设置和完善运行机制为重点，以加强信息技术支撑为依托，努力形成相对成熟定性的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可视化”绩效考核工作，积极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关键词：绩效管理；绩效考核机制；运行模式；持续改进；流程创新

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01-08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组织体系中，无论其组织管理体系设计的如何尽善尽美，随着时代发展，都将存在着“运行如常的行为模式会出现瑕疵或从富有效率、理性的、守法的行为滑向衰落的倾向”。[1]（P7）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这些在组织管理体系中主要表现为“为官不敢为、为官不愿为、为官不能为、为官不善为”的不良取向，必然会“扭曲”党和政府的组织管理流程，使其进入低效率运行状态，从而贻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契机。为此，如何积极有效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破解干部“为官不为”“能上不能下”等不良倾向，成为当前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亟需解决的疑难问题。国家税务总局绩效管理持续改进的考核机制证明，科学的绩效管理机制既可以成为新时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载体，也是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内在动力，积极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一、我国绩效管理机制的演变模式检视

作为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组织管理模式，现代绩效考核管理机制首见于英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后来逐渐发展为世界各国沿用的“论功行赏、晋级加薪”的“功绩制”。[2]（P5）实际上，绩效主要是一个组织的历史使命、奋斗愿景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出一个组织的凝聚力、执行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与组织的生命力息息相关。通常而言，一个组织绩效管理的关键是将既定的绩效目标予以相应分解，使组织系统内各机构和成员做到权责一致，充分运用“考评与管理并重、结果与过程并重、沟通与运用并重”等绩效管理方式，进而能够从“确立考核理念、设计指标体系、建立考核机制、深化结果应用”[3]（P7）等方面，积极探索提升组织管理效能的有效途径。

收稿日期：2018-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14BDJ048）；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强化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体制机制研究”（17ZZD005）；江西省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江西实践研究”（17XGZD001）

作者简介：冯志峰（1976-），男，江西东乡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一）绩效管理工作机制的发展演变

改革开放伊始，为提高经济效率和服务意识，我国在党政机关逐渐推行了绩效管理方式，最初形式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的“目标责任制”。随后，监察部于1991—1999年间在全国26个省级地方试点推行了“效能监察”绩效管理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2007年，国务院推行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改革试点，并总结地方绩效管理实践经验，着力“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随后，绩效管理问责制度主要由中央纪委监察部负责实施督查，在全国范围推广绩效管理与评估试点工作，提升了各地各部门绩效管理水平，使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工作精神状态大为改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中央非常重视绩效管理工作，出台了多份文件，要求各地积极推进绩效管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与领导水平，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此后，党中央与国务院基于理顺职能、提高党政机关权力运行效能的需要，决定将党政机关绩效管理与评估职能由中纪委监察部转交给中央编办，以便真正将绩效管理贯穿融入党政机关日常管理工作之中，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帽子”“钱袋子”和“脑瓜子”，不断提高各地党政机关执政效能。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为优化绩效管理机制提出了战略目标。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作为推进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将绩效管理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以优化绩效考评机制来创新政府职能体制机制，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重点工作就是推进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为新时代推进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于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推进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度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特别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才能科学推进绩效管理工作。为此，各地要积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和创造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带领人民群众同心戮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国家税务总局绩效管理模式的探索

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精神，结合税务工作实际，对如何完善绩效管理机制、提高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实践探索。自2013年12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实施绩效管理的意见》以来，全国税务系统绩效管理历经初创、调整、改进、完善等不同阶段，绩效管理模式持续升级，“实现了税务绩效考核从被动考核到主动考核的转变，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形成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可以复制、易于推广的科学绩效管理考核模式”。[4]（P19）

1. 税务系统“1.0版初创型”绩效管理体系。为更好地推动绩效考核管理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在2014年1月推出了税务系统“1.0版初创型绩效管理体系”，对国家税务总局在局机关自身和9个省（市）税务机关试点探索绩效管理，在全国率先创新了绩效管理考核模式，取得了较大成效。

2. 税务系统“2.0版考核型”绩效管理体系。2014年7月1日起，税务总局根据优化考核工作机制的需要，推出了“2.0试行版考核型绩效管理体系”，编制了各级税务机关和系统考评的指标体系，推出了考核机制工作各项配套措施，全国税务系统全面推开2.0版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基本形成了自总局到县局、从上而下、国税地税一体、机关系统同步的逐级联动、五级覆盖的整体运行格局。

3. 税务系统“3.0版管理型”绩效管理体系。与传统考评或单纯目标考核不同，国家税务总局在2015年正式实施“3.0版税务系统绩效管理体系”，更加注重绩效管理控制过程，特别重视绩效管理过程中的节点管理、日常监控和督查督办等工作，改变了“年初签订责任状、年底考核发奖状”的老套做法，更能够反映绩效考核工作实际情况。国家税务总局专

门成立了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要求各省税务局参照总局模式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既要注重整体设计，又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进，用创新的思维去认识问题，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工具来分析工作，用管理手段紧抓落实，使绩效管理工作从考评一个环节拓展为贯穿各个环节的全过程绩效管理。

4. 税务系统“4.0 版治理型”绩效管理体系。税务部门自身具有的“业务同质化、管理垂直化、手段信息化”工作特点，为实施绩效管理提供了非常便利的运行基础。2016 年起，国家税务总局将税务系统绩效管理体系平稳升级为 4.0 版，引入了多元主体参与到绩效管理过程中来。在治理型绩效管理体系中，省、市、县三级税务局分别结合实际，根据上级的绩效指标制订考核下级及机关部门的绩效指标。通过多元主体的引入，税务系统“4.0 版治理型”绩效管理体系将税收现代化战略目标路线图、时间表及责任书清晰地呈现在各级税务机关及税务工作人员面前，有利于引领我国税务系统凝心聚力、抓好落实。

5. 税务系统“5.0 版协同型”绩效管理体系。国家税务总局绩效管理办公室通过对绩效管理指标的合理调整，对党中央、国务院重大的决策部署以及税务总局的重点工作任务实现了全面覆盖。通过制作指标模板，实现了对指标体系的动态调整，有利于将 2017 年度中间重要涉税事项及时纳入考评。与此同时，优化了加分减分项目，强化了分档指标的考核，可以更好地发挥绩效考核机制的激励鞭策作用，实现各级各部门的自我管理、自我评估，达到自我改进、自我优化、自我提高的良好效果。

在推进绩效管理过程中，国家税务总局始终坚持目标导向，立足问题意识，针对垂直管理“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将全面绩效管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抓手。税务系统绩效管理体系，通过推行组织绩效与个人绩效“双轮驱动”、过程控制与结果运用“动真碰硬”的管理方式，基本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任务到岗、责任到人”的绩效管理格局，具有高位推进、上下联动、闭环运行、自我更新的特点，目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有效解决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怎么抓、怎么考、怎么评、怎么用”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内生动力，是绩效管理机制创新的成功典范。

二、税务系统绩效管理的主要做法

2013 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在全国税务系统全面推行绩效管理，不断改进绩效管理方式，优化绩效管理机制，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已经从绩效管理 1.0 版本上升到 5.0 版本，在抓党建促业务发展增效能转作风过程中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持续改进的绩效管理方式，鲜明地体现了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能够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即时发出“警示”信号，及时发现问题、处置问题、解决问题，业已形成合乎实际、管理科学、行之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

（一）明确领导责任，解决好怎么抓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将税务系统各地各级“一把手”绩效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由“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直接部署重要工作，直接过问重大问题，直接协调重要环节，直接解决突出矛盾，直接跟踪落实情况。这种绩效管理方式，全面推行领导重点督办、单位全面督办、部门跟踪督办的工作机制，积极推行重大项目跟踪督办、疑点问题及时督办、难点工作专项督办、目标计划定期督办的工作方法，督促“一把手”既关心组织绩效又关心个人绩效，以“关键少数”带动“广大多数”，确保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完善管理制度，解决好怎么考的问题

为依法依规平稳推进绩效管理，国家税务总局严格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绩效管理的意见》《税务系统组织绩效管理办法》《税务系统个人绩效管理办法》及其相关细则，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制度体系。按照岗位职责，将指标体系分解到各地各职能部门，具化到岗、督办到事、考核到人。根据税收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要求，将党的建设与绩效管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明确了绩效管理的组织领导、指标设置、日常管理和考评流程，实现了组织绩效、个人绩效、社会绩效考核的有机统一，为科学开展绩效考核管理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健全指标体系，解决好怎么评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按照“问题意识、抓住关键、突出导向、务实管用”的绩效管理原则，在绩效管理指标设计上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业务工作、绩效管理”三者深度融合这条主线，从税收现代化建设六大体系即“高效清廉的组织体系、完备规范的税法体系、优质便捷的服务体系、成熟定型的税制体系、科学严密的征管体系”方面着手，设置绩效管理一级指引性指标。再按照一级指引性指标的核心构成要素，相应地设置二级定位性指标。进而，“具化”绩效管理的三级操作性指标，使之成为科学系统、结构合理、操作简便的指标体系。通过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步步

深化的绩效管理考核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税务工作战略目标与年度重点任务的紧密结合，实现绩效考评与中心工作的有序衔接。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突出中心任务关键性指标的考核，从税务工作完成的时间进度、运行效率、征管质量、征收数量、执行成本等方面同时发力，注重统筹整体工作考评与重点专项考评、统筹当年考评与前后年度考评、统筹税务系统考评与地方政府考评、统筹前任基础工作与现任改革创新的绩效考评，在安排上配套推进、在措施上彼此呼应、在流程上紧密衔接、在考评上相互贯通，有效提升了考评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四）兑现考核结果，解决好怎么用的问题

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加强，绩效管理的核心要义也是持续改进。为一以贯之地推行绩效管理要求，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个人绩效管理考评评议小组，通过多维度全自动信息网络监控自动抓取指标数据，生成绩效管理日常考核报告。在日常考核过程中，绩效管理办公室将考核结果即时发布，让广大干部能够及时得知考核信息，并对有异议的考核结果在有效期间内进行申诉，说明相关情况，避免考评错误或纰漏的发生。在年度考核过程中，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达标、未达标”三个等次，即时在税务系统局域网内公布，让绩效管理考核结果切实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同时，税务系统各级组织充分运用好绩效考评结果，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干部的管理任用结合起来。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奖优汰劣”，以“有为就有位、有位更有为”的管理理念，形成了正向激励与约束问责有机统一的绩效考评科学机制。

三、税务系统绩效管理的问题检视

作为加强管理的激励机制及推动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税务绩效管理机制在督促干部完成任务、提高工作效率、推动组织及干部个人的成长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可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税务系统绩效考核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弊端，制约着绩效管理考核机制的效能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一）在管理思想上，缺乏敢管敢严的“勇气”

诚然，绩效管理在税务系统管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杜绝浪费，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在实绩考评工作中，由于缺乏较真碰硬、敢抓敢管的推进绩效管理的决心，这就使绩效管理的考核者在执行考核工作中，常常存在着“想抓又怕抓”的心理，绩效管理不敢动真格，存在着流于形式的问题，导致“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5]（P11）为此，我们要在思想上绷紧“绩效管理”这根弦，形成“敢管敢严 真管真严 长管长严”的绩效管理氛围，才能将绩效管理不断推向深入。

（二）在考核依据上，缺乏法律文本的“底气”

绩效管理实践表明，绩效评估管理工作仍缺乏“法律依据”，使绩效管理工作未能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有些人即使认识到绩效管理的可行性、有效性和长期性，但仍以没有法律文本为由，[6]（P96）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能够仅仅因为上级机关的文件就予以执行，导致绩效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机制“空转”。由于缺乏国家法律的规范，各地绩效管理考评工作要么简单地以 GDP 为绝对导向，要么就推行“换汤不换药”的“花瓶式创新”。这种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的“想创新又怕创新”的矛盾心理，就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推进不切实际的改革，使得绩效管理评估工作失去了科学性、权威性和持续性。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部分基层税务机关在绩效指标设定时只是机械沿用上级税务机关的考核指标，缺乏结合实际自主设计绩效指标的意识，使得绩效目标、绩效计划与实际工作存在一些偏差，导致绩效考核优势不能发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绩效考评机制的功能。

（三）在考核方法上，缺乏真诚沟通的“灵气”

在绩效考核管理过程中，存在着“想要分又怕分高”的患得患失心理。因为，现行税务系统绩效管理考评工作“软指标”设计过多，使得考核绩效分数值常常拉不开差距，就有可能使绩效管理考评工作流于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大锅饭”窠臼之中。因为流于绩效管理的表面工作，就有可能挤压了业务人员从事中心工作的时间，背离了绩效考评的本意。由于在基层绩效考评过程中缺乏有效沟通，使得考评部门、被考评部门、绩效办三者之间没有做到有机衔接，还使一些科室负责人在绩效管理过程中过于注重结果，而弱化了对过程的监控及对税务人员个人绩效状况的关注，导致为完成工作目标“不择手段”，出现“寅吃卯粮”“放水养鱼”等虚于应付的情形，影响了业务工作质量。

（四）在考核运用上，缺乏较真碰硬的“锐气”

有些地方或部门将绩效考核等同于绩效管理，认为只要绩效考核达标就万事大吉。由于抱着这种“只要达标不想争先”的错误心理，绩效考核管理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想兑现又怕兑现”、怕激发矛盾的心理，也就不敢推动改革。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绩效目标通常由上一级党委机关或政府机构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决定，忽视了地方的具体情况，导致绩效目标常常自相矛盾。为此，绩效管理推行“惩罚并用”的激励政策，就有可能迫使地方政府官员迎合上级党

委政府和领导人的利益，[7](P69)而忽视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党中央提升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成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负面行为”。

（五）在考核技术上，缺乏统筹管理的“才气”

在绩效管理考核过程中，“想严格又怕严格”导致工作人员怠工或干脆不为的疑虑，导致“公众参与绩效管理面临信息不对称、动力不足、渠道单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削弱了公众评价的有效性。”[8](P1)当前，组织绩效考核内容越来越细，而个人绩效指标细化程度仍显不够，岗位职责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这就有可能使绩效管理工作由于参与性不足，常常会出现推诿扯皮、坐等靠要的不良现象，无法达到“以绩效考核提升工作效能”的目标。在实际绩效考核操作过程中，就会出现过分注重技术理性的管理而忽略了价值理性关怀的“技术取向”。这种“绝对量化的技术取向”考核方式，未能科学地将税务系统考核指标与地方党委绩效考核指标有机地衔接起来，致使绩效考核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各自为政、信息孤岛”的现象，也使得税务系统的绩效考核出现“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这种怕影响部门利益的“想公正又怕公开”心理，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取向。这些不良表现的症结在于“为官不为”。而“解决‘为官不为’的有效举措是推进绩效管理法治化”，[9](P7)持续改进绩效管理方式。

四、持续改进绩效管理的基本原则

绩效管理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流程再造的系统过程，其主要特色在于持续改进和不断创新，具体表现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筹、规划连续发展与制度持续创新相结合、培养管理干部与提升工作水平相促进、注重考核结果与控制考核过程相统一。这就要求绩效考核必须把握好如下几个原则。

（一）从绩效管理目标来看，必须正确处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

推进绩效管理考评工作，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体现出绩效管理的政治建设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理性层面的行为取向，是绩效评估体系和绩效评估行为的深层结构，外在地表现为效率与公平、效率与民主、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价值的取舍和平衡，指导着绩效管理的制度与方法，如绩效评估对象、评估主体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的平衡，评估活动安排，评估结果利用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决定了绩效管理必须以人民为中心，选择那些能准确反映人民诉求的指标，并将其融入到绩效管理过程之中。因此，对于各地各单位执政绩效，除了数量上的计算，还应该重视测量执政成本。如，税务征管部门或征管人员的“失范”行为对党委政府形象所造成的损害，等等。这些成本虽然无法精确计算，但可以选用类似指标来予以相应地反映，凸显绩效管理的问题导向，避免沉溺于对技术的精细化追求而忽略价值理性的指引作用。

（二）从绩效管理过程来看，必须正确处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关系

在绩效管理进程中，积极发挥绩效考评的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双方的主体性，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去构建税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注重顶层设计，从全局角度自上而下对绩效管理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发挥绩效管理的战略性、指导性和长远性作用，以集中有效资源按时优质高效地实现预期目标。积极鼓励基层自主创新，并自下而上地总结提炼基层在绩效管理方面出现的新经验好做法。在此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征求群众意见、汲取群众智慧，使人民群众能够对绩效目标有相应的认知度，才能在扩大民主中提高绩效管理的质量。

（三）从绩效管理结果来看，必须正确处理前任基础与现任业绩之间的关系

任何绩效都是指向特定时期被评估主体行为的效果，即目标的达成度。从这个角度观察，就需要维持指标体系的相对稳定。但从较长时期来看，如在一个任期内或某个单位任期内，考核测评工作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在选取反映执政能力指标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历史数据、现实数据和未来指标，力求考评工作更加科学全面。这就要求辩证地看待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前任基础与现任业绩、发展成果与管理成本之间的内在关系，注重考核发展思路、发展规划的连续性，考核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既注重考核显绩，更注重考核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进行全面的评价，避免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陷入技术理性主导下发展视角的“短视陷阱”。

（四）从绩效管理方式来看，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税务系统绩效管理实践证明，要形成科学简便、务实有效的绩效管理机制，就必须立足于原有实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现有绩效管理机制的优缺点，汲取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成熟的经验做法，加以创造性提炼或升级，使之能够与时俱进。绩效管理机制的持续改进，必须与现有体制机制相互衔接、相互融合，最大限度地激发绩效管理体系的有利因素，改革绩效

考评的不利因素，优化绩效考评机制，对绩效考评工作发挥正确的牵引作用。

（五）从绩效管理技术来看，必须正确处理科学规范与简便有效之间的关系

绩效管理指标既要反映绩效管理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标准，又要科学规范和简便易行。这就必须注意到可计量性、可操作性和可获取性，使绩效考核评价具有可行性。可计量性主要体现在选取的指标是否可以进行定量描述，并最终对评价指标形成“量化”数据，是考核结果具有一定的“刚性”。可操作性，主要体现在选取指标时要考虑到该指标是否能够较为简便地进行测量，规范有序地推动考评工作，使考核对象具有可比性。可获取性，主要指选取指标是否可以通过各类“税收报表、统计年鉴、政府报告”较为方便地获取，不会给测评工作带来较大困难。实际上，绩效管理的文本规定会与实践运行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在考核标准方面“预留”相应的“执行”空间，使绩效管理具有一定的“弹性”，统筹绩效管理工作的“刚性”与“弹性”，充分发挥绩效管理过程中考核主体与考核客体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健全“自我约束、持续改进、全力创新”的绩效管理内生机制，不断提升绩效管理考核工作科学化水平。

五、绩效管理持续改进的有效途径

进入新时代，要持续改进绩效管理机制，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好税收增长、税收结构和税收成本之间的关系，立足于保持现行制度体系相对稳定，以实施战略绩效管理为导向，以规范指标设置和完善运行机制为重点，以加强信息技术支撑为依托，努力形成相对成熟定性的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可视化”绩效考核工作，将各项绩效管理工作考核考准考实考好。

（一）完善管理规则，优化指标设计

科学完备的绩效管理制度是保障绩效管理有序运行与科学推进的基础。绩效管理制度能否持续的关键在于其运行机制是否成熟，或是否与现存的地方党委政府运行体系相适应。这就要求绩效管理必须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持续改进、不断创新，逐步形成由一个条例、若干办法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成为国家或地方党委政府推行绩效管理的先行者。要做好绩效考评工作，必须加大调研力度，开展实地调查，听取基层反馈意见，不断完善绩效管理考评机制，使绩效指标更具生命力、解释力、执行力。

绩效考核目标的制定可以采用“角色—任务模型法”，即以明确的组织任务及岗位职责为基础，遵循“在其岗，谋其政”的基本原则，制定本部门及个人的考核指标，在确定岗位和工作质量时应充分考虑工作难易程度和临时性工作，尝试设置加分项目，实现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同时，可实行“派单”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将承接的工作具体化、目标化，以“派单”的方式分配给科室成员，建立日常绩效考核台账机制，如实反映个人工作业绩。通过创新绩效考评规则，明确考评环节各有关部门的职能权限，可以有效解决考核指标考不到的盲点。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推动形成绩效考评完整的责任链条，不断完善以纳税人满意为核心价值追求的绩效管理模式，在创新中创造绩效，促进绩效管理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在深化精细管理的过程中提高服务水平。

（二）抓住核心要素，优化改进指标

绩效管理指标体系是做好绩效管理的关键要素。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突出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点工作，又要把工作中的短板和难点纳入其中，以便形成科学合理的指标框架。为此，必须注重从成本、效率、效益三个角度来设计绩效管理系统，对绩效管理考评指标的考评标准、考评周期、计分方法等多项要素提出明确要求，从源头提高指标质量。通过改进绩效内容相互交叉之处，使关键指标更加凸显，使目标引领更加明确。着力改进有关考评规则欠妥之处，使组织领导更加有力，使激励约束更加有效，使运行机制更加顺畅。

在设定考核指标时，要尽量全面、简化，切实服从、服务于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特别是要与目前的征管工作要求紧密结合，克服指标设定的“空”“虚”问题；合理分配分值，对一些特别重要、完成难度较大的工作，应加大分值，凸显其重要性，做到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结果指标与过程指标、一般性指标与特殊性指标相结合。要抓住核心要素，重点关注如下指标的考核，如对经济增长率、税收增长率、税收流失率、税收执行成本费用率、税收负担率等指标进行精准核算，“将细分维度的指标设定与组织的整体目标相融合，通过搭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细分指标、考核维度战略地图，将组织的考评体系与宏观战略相互融合，”[10](P7)最大限度地从宏观上掌握整体税收成本费用，提高税务经费的使用效益。“本立而道生”。要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寻找现行税收征管中的不足与缺陷，尽可能降低纳税人的奉行成本，减轻纳税人的隐性负担，为提高税务绩效创造条件。“通过简政放权的不断推进，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与企业创造力。”[11](P3)

建议向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将税收考核指标

纳入到地方党委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当中，充分发挥税收“指挥棒”的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因此，绩效考核评价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动态性、可比性原则，突出单位的核心职能，明确主要工作目标，体现科学发展要求，通过横向或纵向比较，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可比性考核评价，达到绩效考评的预期目标。

（三）严格考评纪律，确保客观公正

推进绩效管理，必须树立大局意识，跳出部门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窠臼，凡事想全局，遇事谋全局。加强对绩效管理考核的统筹整合，简化考核程序，切实解决多头考核、重复考核、繁琐考核等问题，提高考核效率。应将绩效管理考核周期分为定期考核和平时考核，重视平时考核，将绩效管理意识融入在平时、贯彻在平时、落实在平时。

这就要求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强化规则意识，各层级考评部门要强化规则意识，严守纪律、恪守原则，综合运用他评和自评的手段，引入社会评估主体，不断完善融合官方评估、专家评估、群众评估为一体的多重评估机制，从多个方面对绩效考评主体进行考评，并及时反馈考评结果，将外部评判压力转化为内部改进动力。为了保证绩效评估结果客观地反映真实的政府绩效，负责进行评估设计和指标筛选的评估实施者应该独立于被评估者。这就必须完善相应的申诉渠道，提高绩效管理的程序公平性，赢取人民群众的内心认同、行为认可。

通过深化责任意识，仔细复核并逐条确认每条绩效指标考评结果，将绩效考评结果与个人职务晋升、评先评优等挂钩，凸显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效应。同时，对在绩效考评过程中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等行为严格进行责任追究，达到“以用好促考实、以考实保用好”的绩效管理效果。

（四）增强预警能力，畅通绩效运转

信息畅通共享是绩效管理的基石。积极应用大数据绩效管理方式，不断健全“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用数据考核”的绩效管理机制，注重绩效管理数据整理、数据库建设与数据交换共享，实现信息系统对绩效管理和自动化评估的有力支撑，实现绩效管理信息系统与业务应用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各类数据库的数据对接、数据交换。

地方各级国税、地税的税源管理信息共享程度不强，影响税源管理的实施，要在建立网络信息共享渠道上创新和突破，以提高税务行政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杜绝地方仍存在着的“买税”行为。坚持运用信息网络技术，精简绩效运转流程，做好为纳税人服务工作，“促进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12]（P39）要全面梳理绩效工作开展各环节所需要报送的资料情况，推进考核工作动态化，实现绩效管理结果的即时公布，有效地增强税务工作预警能力。

强化以纳税人为导向的税务在线服务，促进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积极推进服务机制创新与绩效管理运用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绩效管理运行方法，用“价值认同＋责任担当＋创新运用”的创新方法来推进绩效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压缩绩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自由裁量权”，遏制“徇私”空间，确保制度执行的连续性、严肃性、严密性，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五）用好考核结果，依法严肃问责

绩效管理的核心要义是持续改进，做好绩效管理工作更要持续改进。在持续改进中抓好绩效管理，关键在于抓好落实、在改进中落实，在落实中改进，从而做到持续推进、持续改进、持续前进，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绩效管理考评工作是由人来进行的，沟通是绩效管理的灵魂和主线。这就内在地要求，必须将作为绩效管理的“润滑剂”即绩效沟通，贯穿于绩效管理工作始终、渗透于绩效管理各环节，着力搭建开放式的沟通平台，不断完善有效的绩效考评结果沟通反馈制度，积极促进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推动形成“绩效考核—绩效反馈—绩效改进”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绩效管理人员必须强化对现有绩效管理人员的培训，使之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形成绩效管理的“问责意识”并将这种“问责意识”融入绩效考评工作全过程。在此基础上，不断健全绩效管理主体责任链条，完善督办协调、督察落实、考核激励、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通过定期通报表扬、即时预警提醒及领导及时约谈等行之有效的方式，切实将组织绩效与个人绩效、督促与监察、检查与考评、考评与用人有机结合起来，以“预防式问责”代替“过失追责”，不断提高绩效考评管理成效。

通过科学有效持续创新的绩效管理，可以对绩效管理流程中的责任单位明确其实现每个指标绩效值所应担负的责任，让每个工作人员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负其责，进而让绩效管理理念入脑入耳入心，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推行绩效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努力形成最大程度价值认同

和绩效自觉，营造出人人讲绩效、事事求绩效的良好氛围”。[13](P26)通过促进绩效管理实现从“固化于制”到“内化于心”的有效转化，就能够有效地使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逐级“转”起来，“争做绩效管理的播火者”。[14](P8)在绩效管理过程中，通过对每个绩效管理指标呈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深挖问题出现的责任根源，积极推动严肃问责向常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使绩效考评对象由“关键少数领导”向“广大干部群众”拓展、从“集中性考核”向“经常性考核”延伸，切实做到“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渎职照单严责”，形成“事事有人抓、人人有事干、层层有压力”的绩效考核导向，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协调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艾伯特·O.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M］.卢昌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公司,2015.

[2] 高小平,杜洪涛.我国税务系统绩效管理体系:发展、成效和特色［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

[3] 曹锦阳.论完善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岗位绩效管理若干问题——兼论税务系统绩效管理及运行机理［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

[4] 王军.深化税制改革 服务发展大局［J］.求是,2013,（24）.

[5] 徐明朗,朱艳明,宋 玉.基层税务机关绩效管理问题探析[J].税收管理,2016,（7）.

[6] 尚虎平.政府绩效评估中“结果导向”的操作性偏误与矫治［J］.政治学研究,2015,（3）.

[7] Zhao S.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of Township Government［J］.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2007,39（2）.

[8] 代凯.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困境与出路[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6）.

[9] 吴江.为官不为与绩效管理法治化[J].中国行政管理,2016,（1）.

[10] 王冰,肖恺乐.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税务系统绩效管理[J].税收管理,2016,（7）.

[11] 张为杰,李少林.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现实与政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6,（4）.

[12]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2）.

[13]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税务绩效管理4.0版操作指南[M].中国税务出版社,2016.

[14] 郭瑞轩. 集成创新聚改革合力 全面推进税收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务部门推进税收改革发展综述[J]. 中国税务, 2017,（10）.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Process Innovation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Taxation Syste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ENG Zhi-feng

(Jiangxi Party School of CPC, Nanchang 330002, China)

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improv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a scientif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Party's ruling abilit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regard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s the core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accumulates experience by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methods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e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als, process, result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refore, we should keep the current system stable, innovate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ocess, implement strategic guidance, focus on the specification index and perfect oper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m a relatively mature qualitativ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actively promote "visualization"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work,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society.

Key word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operative mod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cess innovation

我国基层治理中的管区问题探析

王兆刚 种道台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管区是我国基层治理中一种不尽合法但合理的存在，它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国内部分地区仍然发挥作用，并且成为沟通基层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管区一方面分担了基层政府的管理压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善基层乡村社会的干群关系，但管区的存在也造成了基层治理的复杂化。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管区制度面临着撤销、延续或变革的挑战。

关键词：基层治理；管区；关系；趋向

中图分类号：D03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09-06

管区[①]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中在部分地区设置的一类比较独特的管理层级，是基层政权为便于开展工作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管区主要在农村地区设置，部分城市辖区也有此类设置。目前国家和地方并未从法律上明确承认管区的合法性，可以说管区是我国基层治理中一种不尽合法但合理的制度。管区的存在体现了我国基层治理中的复杂关系和实际状况，对认识基层治理的现实和问题有重要价值。目前学界对于管区的研究较少，主要的成果来自学者基于实地调查进行的研究，如王荣武和王思斌以管区和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认为非制度化人情关系的运用是管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手段[1]，陈文琼则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角度分析了管区设置的合理性。[2]本文主要基于对鲁南地区部分管区的实地调查，分析管区的机构设置、职能定位、运行机制与运行实况，探讨管区如何处理与基层政府、村、村民之间的关系，并就管区的未来走向提出一些思考。

一、管区的历史演进

管区最初的设置与建国后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管区的具体产生时间已不可考，最早是在1958后在部分地区的人民公社之下设置，主要目的是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农业生产任务，加强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联系，强化对村落的控制与管理。这一时期的管区居于公社与村之间，与生产大队地位相同。也有部分地区的片或管区是自发产生的，因为一些自然村距离公社驻地较远，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无法与公社及时取得联系，导致相关生产、安全等问题不能及时上报，上级指示也无法及时有效地下达各生产队，因此自发形成了一些联络点并逐步得到上级认可，这些联络点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名称，有的称为管区，有的地方称之为管片或片。[②]

收稿日期：2018-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政权建设法律制度问题研究”（14BFX025）

作者简介：王兆刚（1974-），男，山东曹县人，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种道台，男，山东济宁人，青岛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研究生。

①管区在不同地区类似的设置有不同的名称，又称为管理区、“点”“管片”“片”。

② 管区最初产生时，从建制上来说它是由公社直接管辖的区域机构，同时也是一级生产单位。管区一般设主任一名，副主任2名或以上，另有民兵队长、妇女主任、会计等，其人员设置和同时期的生产大队基本相同。此时的管区是作为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则由公社统一负责。管委会的组成人员皆为本生产大队的成员，不具备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工资收入与其他队员一样，都是按照“工分”来计算。管区主要担负的职能是在公社的领导下管理本区域内的生产和行政工作，它行使了部分公社的职能，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制度逐渐解体。1984年以后，人民公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建乡建村，一乡之内少则有十余个、多则有几十个行政村，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在此情况下分片、分区管理的工作方法再次被一些基层政府采用。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乡镇将辖区内的行政村按照地缘因素划分为数个管区或片，每个管区由乡镇的工作人员担任负责人，设有管区书记、主任，另设副书记或副主任若干名，其他组成人员数名，部分行政村的书记担任所属管区委员，并参与管区工作。乡镇党委政府通过设立管区分散了工作压力、减轻了工作负担。管区一方面作为乡镇党委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了基层政权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作为村组织与基层政权的连接纽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

二、管区的组织与功能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对政府服务能力的提高，城区内管区的实际定位朝着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方向发展，而农村区域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依然存在大量的基层问题需要解决，管区因此朝着更能够解决基层问题的方向发展。以山东省为例，在青岛城乡地区设置的管区是作为社区服务中心或者党群服务中心而存在；济宁、枣庄等地管区是作为联系和指导各村党支部的党组织而存在，是基层党委的派出机构。作为一级党组织存在的管区设有所在区域最大的党支部，管理所辖范围内的各村党支部与党员，负责管区范围内党员发展培训任务与其他党建工作。基层党委将党务工作下发、布置到村，管区监督各村党务工作的开展，但是管区并没有任免村支书的权力，对于村级党的事务也仅有指导权。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管区几乎承担了农村基层治理中所有的工作，大大超越了基层党委派出机构的定位，而成为承接上级党与政府指令对农村基层进行综合治理的机构，管区实际上扮演着基层党委政府双重派出机构的角色。

（一）管区的组织机构

管区的管辖区域和机构设置具有多种特点，下文以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和枣庄市薛城区所辖管区为例加以分析。微山县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沿湖平原地区，县域内的农村地区皆有管区设置，管区所辖行政村数量不一，一般5到15个不等，所辖区域皆为以农业、渔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工厂企业较少。管区的组成人员包括管区书记一名，副书记一名，委员两到三名，其中副书记和委员兼任所辖行政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管区书记同时也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属于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枣庄市薛城区与微山县接壤，城镇化水平较高，所限管区内的行政村数量较少，一般在10个以内。该地的部分管区（当地称为“点”）位于城乡结合部，辖区内的行政村大都属于城中村或近郊农村，村内的村民大多在薛城区工作，农业生产已经不属于主要的收入来源。薛城区内的管区设管区书记一名和管区主任一名，管区书记和主任同时也在镇政府或街道办任职。薛城区对管区的定位是作为基层党组织的联络“点”，当地也称管区的组成人员为点的书记和点长。管区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安全维稳、涉军安置、基层党建等基层工作。薛城区的很多管区所辖村庄因城市扩张由原来的纯农业村庄变为了城中村，管区目前工作的中心集中于拆迁安置。

比较两个管区，可以发现管区在基层治理中的话语权主要来自管区书记自身，管区书记一般具有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编制，并且在基层乡镇、街道政府有正式职务，在工作中能得到村干部、村民更多的重视和尊重，在各村开展工作时也能够得到更多的配合。有的管区书记能够为各村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或者能为各村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也能够获得各村的尊重。此外，管区过去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税征收过程中的奖励金，农业税取消以后乡镇政府、管区都基本没有了财源，主要依靠县区政府的财政拨款来支持。在人事财政方面，管区工作人员的任命主要是由乡镇或街道决定，财权由县区政府掌握，管区没有独立的财权与人事权。

（二）管区的功能

管区的存在不能替代基层党委政府，但是有利于基层党委政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通过管区的工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从而发挥政策弹性。基层一旦出现问题，基层党委政府可以通过管区及时发现和解决，尤其在面对一些基层矛盾冲突时，管区可以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因此管区是居于县乡与村之间代表县乡政权实施治理的中间环节，其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协助进行基层治理。“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基层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上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指令、大政方针大多都要由基层来具体落实。基层政权在把具体的工作安排到村的过程中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直接负责，这些工作人员要能够协调基层司法、财政、电力等机构，当

某一问题出现时，可以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整合力量解决问题。因此类似管区的这种组织机构的建立显得很有必要。

第二，缓冲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各类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与群众之间信息互动交流不畅，导致信息失实。而管区的工作范围较小，可以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关注村庄动向，从而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掌握基本情况，进而凭借熟识村民的优势，安抚群众情绪，迅速解决问题。一旦出现较为重大的事件，可以为上级政府作出相应的部署争取有效的时间，防止事件的扩大化，从而起到缓冲矛盾的作用。

第三，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在国家振兴乡村的大战略下，乡村治理的地位日益重要。单个的村落治理势单力薄，管区可以将所辖区域内各村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统筹带动，发挥规模优势，借助地方政府支持，兴修农业水利工程、抗洪抢险，修建道路。同时管区干部作为基层工作人员的身份优势可以为各村发展争取更多的政府支持。

三、管区的运作机制与运行状况

管区在实际运作中需要处理与乡镇、村以及村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运作逻辑与行为方式，下文以作者对鲁南地区 A 管区的调研为例对管区的运作加以阐述。

（一）A 管区的管辖区域与机构职能

A 管区位于山东省的微山县，管区内共有 10 个行政村，属于微山县域内人口最多的管区。该管区村民主要从事农作物种植业和渔业养殖。A 管区设管区书记一名，副书记一名，委员三名，除管区书记外其余皆兼任各村书记。管区书记李某同时担任微山县 S 街道办事处的民政办副主任和辖区内养老院的院长，并且由于其所管理的一个行政村在村党支部选举中没能选出村支部书记，所以他还兼任该村的村支书。A 管区的工作地点即为管区书记所在街道办内的民政办办公室，该办公室为多人共用。本着“基层不牢、地动山摇”的原则，A 管区被基层政府寄予了厚望，承担了许多基层工作，这些工作任务，一方面来自基层政府，另一方面也来自基层党委。

（二）A 管区的日常工作内容与工作程序

在每年不同的时间段 A 管区的主要工作内容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在高温多雨的夏季管区的主要工作是抗旱抗洪保产。在高强度的降雨之后，农田被浸泡在水里，一旦出现连续的高温晴天，农作物将出现大面积的死亡。鱼塘的水位也随着高强度的降水达到了一个警戒位置，存在着溃口的危险。管区书记必须在这些情况出现之前，采取措施，排水排涝，保证区域内近万亩农田和鱼塘的的收获。有时降雨伴随着大风，导致农田所在区域内电线杆倾倒，电路中断，给农区的排水排涝带来了极大困难，这时管区的独特作用就得以凸显。获知这种情况后，管区书记会在第一时间到达农田和鱼塘调查受灾的基本情况，了解线路问题，通过电话将相关问题与管区其他成员沟通，并向主管街道领导作简要汇报。到达各村后，管区书记首先对各村的村委会提出建议，抓紧时间组织村内人员采取人工、机器排水方式，开挖简易排水沟渠尽快排出农田内的积水。得知各村在现有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很难将积水尽快排出，管区书记随即联系本街道内的施工队，带来大型挖掘机械，开挖沟渠排出积水。鱼塘养殖区内的通电中断，使得无法大量投入排水机，排出鱼塘内的超警戒水位的积水。管区书记在联系了相关工程队以后，又来到供电公司供电所商讨相关修复线路的通电事宜。谈论过程中得知，通电事宜必须以政府名义与供电公司进行协商解决。管区书记又回到街道驻地将相关问题向主要领导加以汇报，取得了街道的公章证明和授权之后，管区书记来到供电公司协商恢复供电问题。排水供电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他又回到办公室处理民政以及养老院的相关问题。离开各村前，嘱咐各村干部有问题及时与他联系，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最多的就是在路上，奔波于各村。

（三）A 管区如何处理与县乡、村、民众的关系

A 管区在与街道办的关系处理上，更多的是以一个下级机构的角色与街道展开工作上的互动。A 管区所属的街道有专门的副主任负责处理管区事务，各管区的重大问题都由管区书记报告给副主任，经街道办党工委讨论决定。管区书记属于党组织系统的工作人员，所以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对其有领导权，另一方面他又是街道工作人员，也受街道办主任的领导。在双重领导之下，管区书记开展工作的行为逻辑更多的是基于街道办的意志。从工作机制来看，县乡政权一般不对管区直接下达工作任务，而是先下达给乡镇再由乡镇将具体事务分配给管区。如果县将工作直接下派到管区，就会有县党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参与，同时乡镇政府也会指派人员一起开展工作。县党

委政府承认A管区的存在,但是并不对A管区直接做相应的工作安排,管区也不能和县党委政府直接接触。在调研期间,微山县内一项五保家庭的安置工作由县里传达到街道,街道安排各管区负责具体接洽。县政府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在管区书记引导下,进入各村与村干部一起将这项工作具体落实。在此过程中,管区书记起到中转接待的作用,将县乡政府与基层乡村连接在一起,成为基层政府与基层的纽带。A管区所辖的10个行政村紧密相连,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宗族关系。A管区书记在与各村接触的过程中,不管是对上级指示的相关工作,还是村内各项事务的指导,都不是采取一种强制性命令的方式进行。管区书记与各村村干部保持着较佳的私人关系,私下里相互之间的称呼更多的是以年龄辈分来界定。这种私人关系的建立与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特征密切相关,也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便利。由于管区工作人员开展工作都是与村干部产生互动,一般不与村民直接接触,普通民众对于本管区的管区干部的了解,也仅限于村干部、村民的口头相传。村民并不知道,村内的许多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事件的解决,背后都离不开管区的作为。

可以看出,管区和村委会、村党组织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管区没有惩罚和奖励资源,管区领导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在实践中往往通过与村级干部搞好私人关系的方式,以感情的投入达到与村级负责人的良好互动。同时管区可以通过申请获得上级政府资源,解决村庄问题和满足群众需求,由此赢得各村的接纳,也获得行使管理权力的合法性和认同来源。农业税取消以后,村两委丧失了借助税收与乡镇政府争取利益的能力,因此更多的借助管区领导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管区书记与村委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面对一些政府检查和政府任务执行时,管区和村往往会共同应对。

四、管区运行中的困境

(一)定位的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行政区划为省、县、乡三级,管区本身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政府中没有正式的机构编制。管区的主要合法性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支持以及实际工作的需要。目前地方政府对管区的普遍定位是一级党组织,即作为基层村党支部的管理组织,是属于“党”的范畴,而现实中管区是以党的组织的身份承担了党组织和政府赋予的双重责任,是作为基层政府和党委的双重派出机构的性质存在的。从村和社区的角度看,管区在实际工作中又扮演着一级政权的角色,对村和社区拥有一定的管辖权力,承担着社区和村利益诉求的传达作用。从管区自身的角度来看,管区却只有一到两个有编制的工作人员,缺乏一级政权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所以,在管区的存在尚有一定现实需要的情况下,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定位,才能更好地进行管理与服务。

(二)权力与责任的配置失衡

管区承担了基层治理中的大量工作,如与税收、司法、文化、卫生、教育等部门的协调,各种行政任务的执行等,然而管区却基本没有任何的独立权力。管区的工作人员是由基层党委政府任免,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管区常规工作的开销也由政府承担。在处理问题时,管区所能给出的最大的承诺也仅是向乡镇政府协调或提出请求,其所谓的权限主要是凭借管区自身的影响力和策略来解决实际问题,即依靠权威而非权力。管区由于所处的中介角色往往成为各种基层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承担者和解决者,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的过程中,管区自身由于没有权限,仅仅“靠一张嘴皮子”,往往不能给出满意的承诺或者解决办法,只能作为一个转达中介的角色发挥作用,其治理能力是有限的。管区过重的责任在在一定程上造成基层乡镇政府的懒政、庸政的出现。由于管区的工作人员承担了基层政府大部分的具体工作,极大地减少了乡镇政府的工作量。基层政府的一些单位、部门出现人浮于事,只在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纸”之类的庸政、懒政现象。

(三)上下级关系的处理困境

管区处在基层乡镇、街道与村之间,从层级划分上来说,基层政府是管区的上级部门,村委会作为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与管区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管区与村委会是指导和协作的关系。管区处于派出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双重角色之下,在与基层政府交往过程中缺乏自主性和话语权,对基层政府的任务摊派和政策下达,管区没有反馈和意见表达的权利。管区在处理与村委会的关系时也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村委会会将村内的相关问题报于管区,村级工作的开展也是在管区指导之下进行,但管区本身不具有一级政权的权力,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不能很好的处理与各村的关系。有的管区会运用从基层政府获得的权力将各村村委会变为管区的下一级机构;有的管区则因不具有足够的权威,得不到各村的足够尊重,从而

在开展工作时带来很多的阻碍。

（四）监督管理问题

基层政府虽然是管区的派出机构，但是具体运行过程中很难对管区进行有效监控。首先，管区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大多没有建立相应的公示制度，工作也主要是三两工作人员完成，造成工作环境和过程的不透明。管区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基各村或由乡村改造而形成社区进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的政策都要由管区传达至各村，各村的问题也经由管区来反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相关的监管，容易引发政策的落实不利和各种资源被中饱私囊。其次，管区缺乏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目前各地对管区的管理主要是参照基层政府的规章条例进行。管区的主要工作人员一般同时在基层政府中任职，并且在基层政府的职务才是他们的正式职务，因此管区的职务不受重视。对管区工作人员的管理是由所在基层乡镇街道根据其相应职务进行管理的，造成对管区的工作考核往往脱离其工作实际。

（五）影响村民自治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在民间仍然拥有巨大影响力，而管区工作人员作为最接近村民的公职人员，在村民眼中代表的是基层政权，代表的就是“官”。另一方面，管区的工作直接接触村民，难免对村级事务的开展产生影响，村民在有管区介入时会产生唯上是从的思想，影响村民自治正常进行。官本位思想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管区工作人员，以致部分管区领导形成错误的权力观、群众观，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部分地区的管区工作人员，倚仗自己的工作职权在乡间处处捞取好处，俨然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的“胥吏”，严重败坏了政府形象。由于大多数管区机构没有办公经费，交通、伙食各种公务开支需要由所辖村庄分摊，这也无疑加重了村庄的经济压力，导致村民自治失去了自治空间，变得更加的行政化。

五、管区的未来走向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制度化，管区作为一个法律地位不明晰的乡村基层管理层级在基层治理中面临着诸多质疑。从管区的未来发展来看，如果从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的自主性和减少基层层级的角度考虑，管区面临被取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管区又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的乡镇治理与村级治理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管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治理体制中的某些不足。随着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不断完善，管区制度必然会随之变革调整。

（一）以新型社区替代管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目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山东省在各地进行了诸多试点，尝试以农村社区建设来推动基层治理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有潍坊的“多村社区”模式，临沂的“多村合并社区”模式，青岛的“一村一社区”模式。新型社区作为一个参与主体参与到基层治理过程中，极大调动了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热情，也推动了农村服务体系的完善，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民主政治的推广。因此，未来管区有可能被新型社区所取代。管区的取消，将会使基层党委政府失去一个派出机构，不过新型社区的建立能够弥补管区撤销后带来的基层治理体系的缺口。新型农村社区具有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功能定位、财政人事制度。更为完善的制度结构使农村社区能够更加高效地承接基层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实现与基层党委政府的良性互动与对话。

（二）完善村民自治以推进乡村治理

村民自治是我国村级治理的基本制度设计，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保障。管区制的存在与目前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有关，尤其是政府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乡村的自我治理能力不足，政府对村庄事务的干预控制在很多情况下比较强势，而管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政府对乡村治理的介入。随着今后村民自治制度的日益完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日趋合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管区的存在也会逐步失去现实合理性而退出历史舞台。通过提供更多的制度和资金支持，为村民自治搭建一个更为有效的平台，进一步明确基层党委政府与村民自治的各自作用空间，有效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从而能够保证基层政府的管理和村民自治的有效。但在村民自治的发展完善过程中，管区制度作为乡镇联系村庄的制度设计还有其一定的必要性。

（三）管区自身的完善

如前文所述，在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管区的存在在一定时期内仍有一定的必要性。今后管区的存在发展需要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完善，以更适应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首先，应该加强管区的相关法规制

度的建立，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人事制度、财政制度，明确定位管区的性质，给予相应权能，使管区能够做到权责一致，健全管区的机构设置，保证管区在存续期间内能够在基层治理中切实起到相应的作用。其次，提高管区人员待遇和工作能力，为管区工作人员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加强对管区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业务能力的培训教育，提高管区工作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和个体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可以适当强化管区的基层党组织定位，目前的基层党建需要加强以适应农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的需要，管区可以推动党在基层的治理现代化，形成完善的基层政党治理机制。

管区的存在与发展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尚不健全的一种反映，管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在我国实现乡村振兴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管区的存废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重要的是能够透过管区的设置透视其背后所隐含的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从而根本上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为我国的乡村振兴确立稳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荣武, 王思斌. 管理区干部和村干部的互动过程与行为——豫西南花乡的实地研究[J]. 社会学研究,1996,（3）.

[2] 陈文琼. 管区设置与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强化机制——基于L镇管区设置的经验阐释[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责任编辑：侯德彤

Analysis of the Basic District in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WANG Zhao-gang　CHONG Dao-ta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district is not a completely legal but reasonable existence in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s a product of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it still plays a role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It has become a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the countryside. On the one hand, the basic district shares the pressure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help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ss-roots rural communities and cadres.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the management area has also caused the complex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basic district system faces the challenge of revocation, continuation or change.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ic district; relationship; tendency

美英日社区治理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与经验启示

高 红 杨秀勇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19世纪末英美开启了世界性的社区建设运动，但二战后发达国家社区才真正兴起与勃兴，目前它们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区治理模式。考察以美英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社区治理政策历史变迁的过程，旨在揭示其社区治理政策演变的历史逻辑与规律性。研究显示，美英日社区治理政策演变的规律特点表现为：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战略性平台；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越来越明显，社区治理向着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格局发展；社区治理以公民自主治理的价值为依归，越来越重视发挥公众的志愿参与作用。这些经验为我国社区治理带来了有益的启发与借鉴价值。

关键词： 社区治理；非营利组织；政府；美国；英国；日本

中图分类号： D03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8）03-0015-07

英国早在1884年开展社区互助的社区睦邻运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世界性的社区建设运动，但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社区的真正兴起与繁荣是在二战后。美英日作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代表，其社区治理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至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中国社区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历经三十年的发展，目前进入了社区治理的转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要求”。通过考察世界发达国家政府社区治理的历史过程，借鉴他山之石，以期对中国当前正在深入探索的社区治理带来有益的启发，更好地推进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

一、美国社区治理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

（一）美国社区治理的发端

美国的社区发展实践始于19世纪末的进步时代。1889年，为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的社会工作者效仿英国社区睦邻中心的做法，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社区发展中心——“赫尔馆”。与英国主要是反贫困的任务相比，美国早期的社区睦邻中心主要承担着帮助新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社会的任务。同时，社区帮助运动以美国为影响最大，表现为“在美国的发展更为迅速和普遍，不仅对所在社区的贫民及整个社区的福利提高有很大贡献，对一般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改革运动的推进也有很大影响。”[1]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并为政府政策干预社区发展建立了制度基础。

（二）二战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实施了“反贫困战争”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公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示范城市项目”，同时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简称HUD），从而给予弱势社区的居民在有关社区事务决策中更大的发言权。HUD是美国政府在联邦政府层面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的机构，

收稿日期： 2018-02-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城市社区合作共治的公共性困境与社区营造研究”（15BSH108）

作者简介： 高红（1969-），女，山东博兴人，博士，青岛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教授；杨秀勇（1991-），男，山东莒县人，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负责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帮助社区提高自身发展和能力，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等财政援助项目计划。纽约与亚特兰大市当时的城市治理面临诸多项目，在这个项目推动下，它们成为美国最早开始有意识系统进行城市社区治理的城市。从 1974 年开始，HUD 开始了社区发展联邦补助金计划，为社区提供廉价住房与内部公共服务的供应提供财政支持；并以此为经济杠杆，鼓励并支持公民的社区参与。同时，联邦政府还从制度层面确定社区管理的政策基础，“1977 年联邦政府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商业银行和储蓄协会向其社区内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小农场提供贷款，以促进中低收入社区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2]

80 年代，美国进入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联邦政府认为依靠国家政策实现社区复兴是“不明智的”，从而削减了对社区发展的支持。此后，代表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与老布什总统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执政时期，开始倡导与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一场在政府财政危机背景下开展的运动，联邦政府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展时期进一步削减了对贫困社区的援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老布什总统对与社区治理紧密联系的志愿服务的倡导与推动，1990 年老布什总统签署了《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倡导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引导志愿服务深入基层社区，客观上对于解决社区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90 年代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的全面推进

90 年代克林顿上台后，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将社区摆在了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在克林顿看来，“美国人结合为团体，共同工作，寻求共同基础，并找到共同的方法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3] 并且其认为“社区是民主的聚集地，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让每位公民都真正的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4] 1992 年克林顿政府提出“授权区和事业社区计划”，并在 1993 年 5 月获国会通过。“授权区计划”与“事业社区计划”是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两项重要的社区发展政策，主要是联邦政府利用税收优惠及灵活援助拨款等战略，向单个和成群的贫困社区提供帮助，使贫困群体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增值的能力，以解决他们自身的各种问题。“1993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国家和社区服务信托法案》，并建立了全国社区服务协会，发动不同年龄的志愿者投身社区服务，标志着把国内所有的社区服务项目都纳入到了统一的管理网络。”[5] 1997 年又通过了《美国社区振兴法》，计划建立 100 个“社区振兴区”，推动社区福利发展。

2001 年共和党人布什当选总统后，小布什政府在社区发展方面的宏观政策策略是其实施的“信任为本的社区自主策略”。该政策主张与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提供地方性和个性化的服务，以减少联邦政府层面的疏远且缺乏人情味的宏大计划，提高社区自主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能力，推进美国的社区自治。为推行该政策，白宫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在五个内阁部门设立了相应机构，自上而下协同推进项目的开展；同时，布什政府还大力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要求“全力地争取、装备、扶助、授权和拓展各种社区组织”。[6]

总之，“从进步时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社区发展经由社会活动家扩展了社区干预，并使其成为制度化的国家政策。”[1] 而从 60 年代约翰逊政府以来，美国政府则把社区治理置于战略性的地位，社区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的社会实践和制度性活动，并形成了全国性的社区发展系统。同时，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联邦政府的政策推动及民众争取社会参与、社区自治的地方社会运动推动下，60 年代以来美国大城市持续开展旨在复兴社区、强化社区控制的社区发展运动，“发展了各类社区邻里组织，包括如社区发展社团、社区理事会、邻里政府、私人邻里组织、各种居住区协会”等，[7] 形成了社区自治的治理模式，进入了博克斯所谓的公民治理时代。其中，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社区的管理，而是通过提供资金、法律与政策支持间接参与社区的治理，另外“还有一些私营企业、社区外组织通过提供服务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构建起了以普通市民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为目标的参与式治理机制”，[8] 由此形成了美国社区多中心的治理格局。

二、英国社区治理政策的发展进程

英美两国社区治理政策的历史演化具有共同点，就是都开始于 19 世纪末的社区睦邻运动，六十年代在政府的“反贫困”政策背景下，社区服务得到一定的发展。进入八十年代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政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社区发展的资助与支持。九十年代后社区被重新发现，并被置于社会发展的战略平台上，形成了政府宏观指导、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善治格局。

（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民间自发的社区运动

英国的社区治理实践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1884年，东伦敦教区的牧师巴涅特在伦敦东区建立了一个大学社区睦邻服务中心，命名“汤恩比服务所”，倡导居民的自助与互助精神，旨在降低社会贫困，减轻社会弊病，成为英国社区睦邻运动的开端。社区睦邻运动短期内迅速传遍欧洲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它成了一场社区改造运动。由于社区睦邻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1922年在伦敦举行了首次国际社会服务工作会议，1926年成立了国际服务所及邻里服务中心联合会。英国社区睦邻运动由此奠定了英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基础与慈善和志愿的传统。

（二）二战后英国社区治理的缓慢发展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社区的真正兴起与繁荣是在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以“反贫困”为主要目标，英国内政部实施了“社区发展工程”。“通过这项工程的不断推进和实施，以社区为基础、以反贫困和社会排斥为目标的各类组织和社区行动得以激活，社区服务的领域也随之扩展至教育、医疗健康、居住、公共安全及弱势群体的照顾等社区的方方面面。”[9]（P118-121）

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对英国公共服务进行改革。这一时期，英国实行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英国政府在社区发展上的资助萎缩，放弃大规模的社区发展项目，社区发展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但“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区发展的理念在英国社会被广泛接受。”[10]不仅地方政府实施的反贫困项目承继了社区发展的理念与方法，其他一些民间基金会、社区企业、志愿者组织等也广泛地使用了社区发展的基本运作方法。同时，80年代，英国保守党认为政府、市场作为单独的福利提供者都有其缺陷，提出了福利多元化的政策思想，主张社会福利与服务应该由国家、市场、家庭与志愿组织共同提供。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治理逐渐走向多元化，提出社区服务的主体除政府外，志愿部门、非营利组织、邻里社区与家庭等也应成为社区服务主体。

（三）90年代后英国政府社区治理的战略推进

1997年，工党获胜，布莱尔政府上台伊始，推出了所谓“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混合经济模式，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伙伴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以及推进社区建设以及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来实现包容性社会。在此，社区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社区重新进入英国政府的政策决策视野，并被提升到了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在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新工党政府的社会经济路线中，社区是推行各项社会政策的有效工具，社区能力建设议题如社区健康、社区扶贫及社区复兴等，被纳入许多公共政策计划中，正式进入主流政策议程。“社区复兴运动”就是由布莱尔政府和反社会排斥委员会发起的，旨在通过能力建设来解决社会排斥和社区贫困的一项社区发展项目。其政策导向是：把公共和私营部门、自愿组织与社区联合起来，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及就业等领域实现相互合作、资源共享。除社区复兴计划外，社区赋权是当时英国工党执政期间城市复兴的另一个重要政策，“它主要是指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中赋予本地社区以更大的参与权和影响力，其政策导向在于强调自治组织与社区部门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的角色，促进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11]为此，英国政府还与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及居民建立了本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简称LSP），并商定了严密的思路与政策。在英国政府看来，“LSP应该是公立部门、私营部门、自愿组织和社区机构共同组成的政策联盟。在角色分工上，政府通过社区复兴基金、社区赋权基金等提供财政支持及项目审查等，并通过与其他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委托其他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直接承担项目计划。”[12]总之，在“新工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社区与参与、社会资本、责任几个核心概念一同构成‘新工党’意识形态的支柱性基石。”[13]

二十一世纪，英国社区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迎来了“再次扩展”的发展机遇。几乎在所有复兴、包容和健康改善项目中，社区参与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社区赋权项目——社区新政计划（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Programme，NDC），为了最大程度鼓励社区参与，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度，仅在1999—2000和2007—2008年间，即投入了近2.5亿英镑。”[14]此外，“全英赋能合作”项目在全国各地得到开展，政府、志愿者组织、社区，以及各类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受到高度重视。2010年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合作并由卡梅伦筹组成立了新政府，卡梅伦政府批评工党式大政府规模过大，造成社会原子化的难题与社会活力的削弱，提出政府的责任在于创建一个更强、更有责任感的社会。在此施政思想指导下，卡梅伦宣布启动“大社会”计划，“‘大社会’计划提倡和支持一种新的责任文

化，鼓励人们在社会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经验与金钱，提倡在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公民和企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15] “大社会”有四方面的理念内涵：“（1）进一步扩大社区自治权力；（2）进一步放权给地方政府；（3）支持慈善机构、社会企业等非营利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4）建设高效透明政府。”[16] “大社会”计划的核心议程主要有三项：社区增能、社会行动与公共服务公开，旨在帮助慈善组织、志愿组织和社会企业等非营利组织成为建设“大社会”的核心力量。同时，这三项议程的内容都与社区相关：社区增能“目的是希望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即居民有充足的自由和权力去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服务，而不总是依赖政府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17] 为此，政府把权力与资金大规模转移到地方与社区，使之自主发展。在“社会行动”方案中，政府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以鼓励人们参与志愿行动与慈善事业，如设立全国性的“大社会日”，鼓励公务员定期参与社区活动；推行“公民服务计划”，鼓励青少年参与夏季社会服务。而对支持“大社会”计划社区的热心民众，政府对其进行专门培训，帮助他们成为社区的组织者。在公共服务改革方面，卡梅伦政府将公共服务范围划分为个人服务、邻里服务（社区服务）与委托服务三种类型，在“分权与选择”的理念引导下，将公共服务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社区与公众。卡梅伦政府在2012年通过了《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把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行为法律规范化。“法案要求社会组织在履行购买公共服务的合同时，要考虑改善社区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同时评估目标机构的服务为服务对象社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与环境价值。”[17] 由此，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运用通过分权，把权力下放到基层政府、社区，注重社会力量来解决自身存在的社会问题，体现了英国政府面对民主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自我修复。

从总体来看，英国政府社区治理的基本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对社区高度重视，并长期把社区作为具有战略价值的治理平台。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困难，英国政府都是把社区建设作为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的抓手。第二，政府主张采取多元化的社区服务和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形成政府、市场、社区与志愿部门合作治理的模式；第三，在英国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中，城市社区志愿组织、营利组织、邻里关系等社区资源，与政府的社区服务体系对接，促进了社区的良性发展。其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政策制定者、社区发展规划者、社区服务倡导者、法律环境规划中的指导者、资本主要赞助者和购买服务者等。”[18]

三、日本政府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变迁的历史演进

町内会（自治会）是当代日本最重要的基层社区组织，日本社区的主要功能由町内会（自治会）承担，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主要体现为町内会（自治会）的组织定位及功能的转变。按照日本町内会（自治会）功能的演化，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可以分为“社区统治、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三个阶段。”[19]

（一）日本社区统治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社区是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町内会（自治会）的基本角色是辅助性的行政末端组织，社区没有自治权。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明治维新带来了日本第一次城市化浪潮，町内会作为城市地域居民组织应运而生。“1889年，日本明治政府出于加强国家统治的目的，实施了‘市制、町村制法’，奠定了近代日本地方管理制度的基础。”[20] 可以说，“地方自治制度”和“市区町村”体系形成是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历史成果。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在全国城市普遍建立了町内会。1943年日本内务省对“市制、町村制法”进行了修订，使其进一步规范化和法制化，使町内会的存在具备了法律根据。这一时期日本町内会的主要功能是协助中央与地方政府履行各项基层行政职能，上情下达，日本社区治理呈现出政府主导型与官办化的特点。

（二）日本社区治理过渡阶段

二战后联合国占领军接管了战败后的日本，从1947年至1952年是日本社区治理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占领军下令取消町内会的合法地位和名称，但实际上，日本町内会改头换面继续以其他非正式的组织形态存在。不过，“这一时期的町内会主要作用是配合和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已脱离了过去行政末端组织的角色与统治的成分，被禁时期的日本社区从统治阶段走向了管理阶段。”[20]

二十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工业化的发展，日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日本政府适时调整城市基层

管理机制，改变了把町内会（自治会）仅作为行政管理工具的旧思维，“提倡居民作为主体参与社区建设，力图赋予町内会（自治会）更多的自主权和自治功能。”[19] 同时，日本政府为了营造能够满足居民所期望的邻里生活的基层社会，于 1971—1973 年制定了“示范社区”政策对认定的“示范社区”进行软硬件条件的完善，并发挥其示范作用。这一时期町内会（自治会）既发挥着协助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功能，又起着居民自治的功能。但是町内会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日本社区治理可以说处于从管理阶段走向治理的过渡时期。

（三）日本社区治理成熟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区政策，1983—1985 年制定了“社区推进地区政策”作为对七十年代初“示范社区”政策的补充，通过对示范社区之外的社区提供财政与信息支持等促进社区的软硬件条件完善。1990—1992 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社区活动活跃地区认定政策”，通过举办传统文化活动及运动项目提升社区居民的认同感。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下，日本的市民团体与志愿者活动发展迅速；同时，面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给日本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日本政府也适时对町内会（自治会）的角色与功能进行重新界定，推进权力下放与地方自治，1991 年日本国会修改了《地方自治法》，将町内会（自治会）作为“地缘群体”写进了该法的附则中，正式确立了町内会（自治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2000 年日本开始实施地方分权法，促使町内会（自治会）真正变成代表居民自身愿望与诉求的自治组织。

日本社区治理走向成熟不仅体现在町内会（自治会）自治角色的确立，还表现为基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格局的形成。而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兴起的“新公共性”理念，以及日本政府采取的“协动政策”密切相关。新公共性立足于公众基础上的多元参与，“协动”则强调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协动是日本新公共性的最主要特点与“新公共”构建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2012 年日本中央政府还实施了八项“新公共”政策，日本地方政府则相应地实施了“协动”政策，“协动”政策不仅促使 NPO、地方自治体以及作为受益者的市民等政策利益主体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协动”政策还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推动了日本以“市民主权型自治体”为导向的地方自治制度构建。[21] 这一时期，日本社区中基层政府、町内会（自治会）与社区内各种市民社团相互合作，基层政府主要起规划、指导与监督的作用，町内会（自治会）代表并领导社区居民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内由居民组成的社区内组织如儿童会、妇人会、老人会、家长会等则发挥协助、支援町内会（自治会）的作用。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日本社区治理逐渐形成了基层政府、町内会（自治会）、社区内外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居民合作共治的格局，标志着日本社区从管理走向了治理新阶段。

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社区治理模式经历了统治阶段、管理阶段和治理阶段（如表 1 所示），在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社区治理理念、社区治理主体、权力运行逻辑和治理结构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使日本社区治理日臻成熟。

表 1 :日本社区治理范式变迁对比图

治理模式	社区统治	社区管理	社区治理
治理理念	行政管制理念	管制理念为主	以人为本，服务理念
治理主体	政府单一主体	政府为主，町内会为辅	政府、町内会（自治会）、非营利组织、市场组织与居民多元治理主体
权力逻辑	单一单向权力运行逻辑，行政权力的下沉与扩张	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逻辑，町内会自治色彩增强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各治理主体相互协调、多维平行
治理结构	纵向垂直科层结构	纵向为主、横向为辅	横向合作网络结构

四、美英日社区治理政策变迁对中国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美英日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在社区治理方面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模式。本文梳理与回顾了三个国家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基本的共性，这些共性或规律对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高度支持。在这些国家社区建设的历史上，尽管期间有个别历史时期，如美国在七八十年代、英国在八十年代，政府对社区的资助减少，社区一定程度上被

置于边缘化的境地，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美国20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九十年代时克林顿政府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到小布什、奥巴马执政，都非常重视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作用；英国政府亦是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困难，英国政府都是把社区建设作为主要的抓手，特别是布莱尔政府的“社区复兴运动”与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计划尤其体现了政府对社区战略价值的重视。

（二）社区治理应充分重视与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构建多元合作治理的格局。无论是美英的社区自治模式还是日本的混合模式，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都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力量，致使这些国家社区治理的格局上，越来越显现出政府、非营利组织与市场化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这种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局面的形成，与这些国家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视与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积极创造条件从法律、政策及经济上支持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美国1973年颁布的《国内志愿服务法案》及1990年签署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推进了美国社区的志愿参与及其组织化，根据2001年美国全国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全体公民中大约有2/3的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或组织。至于在城市里建立的社区协会（community associations）数量更是达到28万个。”[22]奥巴马政府创立的“社会创新基金”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而1998年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合作协议的国家，即所谓“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简称Compact协议），使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制度化；日本1998年则制定了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性法律，即《特定非营利组织促进法》，为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持。事实上，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律的制定促进了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勃兴，并将日本社区治理带入到了官民共治的社区治理新阶段。

（三）社区治理应以公民自主治理为价值依归，充分动员公民志愿参与。通过对美英日社区治理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美国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国家和社区服务信托法案》，还是英国“大社会”计划中的“社会行动”方案与“公民服务计划”，或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公共性”，其共同的价值旨归都是充分动员居民参与，向公民自主治理的方向发展。正如博克斯所言：“公民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更是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直接参与者，是社区的‘治理者’。”[23]（P4）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英日在近一百年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社区治理历史发展中，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治理模式。当前中国社区治理正处于深水期与关键期，为此，我们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高度重视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政策上积极引导与支持社区治理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且充分重视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从法律、资金与政策上给予非营利组织全方位支持，促进社区治理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政策积极引导社区居民的志愿参与，使社区治理向公民自主治理的价值回归。当然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具体做法，而应根据我国的具体现实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治理政策。

参考文献：

[1] 李东泉.美国的社区发展历程及经验[J].城市问题,2013,（2）.

[2] Shane A.Johnson,Salil K.Sarkar.The valuation effects of the 1977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its enforcement[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996）:783–813.

[3] 马西恒.理念与经验:中国与北美社区建设之比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1）.

[4] C.Lasch.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J]. W.W.Norton,1996,171.

[5] 韩央迪.英美社区服务的发展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与改革,2010,（3）.

[6] George W.Bush（2001）. Executive Order : Establishment of White House Office of Faith –Based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s[J]. Washington,D.C.

[7] 陶希东.邻里政府: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科学,2014,（4）.

[8] ohanna Speer.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Reform: A Good Strategy for Increasing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J].World Development12（2012）:2379 – 2398.

[9] 张康之、石国亮.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

[10] 张宝锋.英国新工党的社区发展政策[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5）.
[11] 周晨虹.英国城市复兴中社区赋权的“政策悖论”及其借鉴[J]城市发展研究2014,（10）.
[12] 徐延辉、黄云凌.社区能力建设与反贫困实践—以英国“社区复兴运动”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13,（4）.
[13] 王红艳.社区治理的英国经验及其启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
[14] Paul Lawless, Christina Beatty. Exploring change in local regeneration areas: Evidence from 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programme in England[J].Urban Studies（50）2013:942—958.
[15] Geoff Nichols,Peter Taylor,David Barrett, Ruth Jeanes. Youth sport volunteers in England: A paradox between reducing the state and promoting a Big Society[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17（2014）:337–346.
[16] 宋雄伟.话语构建与路径依赖:英国大社会公共服务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6,（3）.
[17] 李小虎.卡梅伦的“大社会”思想述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5）.
[18] 阎耀军、李佳佳.英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19] 宋雪峰.日本社区治理及其启示[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3）.
[20] 卢学晖.日本社区治理的模式、理念与结构—以混合型模式为中心的分析[J].日本研究,2015,（2）.
[21] 俞祖成.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协动”政策[J].公益慈善周刊,2012,（52）.
[22] 王旭.论美国的民主与当代美国地方自治[J].社会科学战线,2011,（2）.
[23] [美]查理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孙柏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olicies across the US, the UK and Japan

GAO Hong　YANG Xiu-y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d a worldwid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ovement. But it wa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at the community rose and boom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Nowadays, a more mature model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take shap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olicie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It aims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law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policies behind the current model. It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ining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with community autonomy.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olicies among the US, the UK and Japan are: first,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even as a strategic platform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second, the main func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Community governance evolves towards the pattern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ird, the value returns to the citizens' self-governance, and as the constant clarity of the goal-oriented community residents' public interests. These experiences have brought useful enlightenment value for China's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NPO; Government; US; UK; Japan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环境外交新变化及其影响

丁金光 赵嘉欣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环境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中美环境外交硕果累累，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新亮点。中美两国的积极合作，促使《巴黎协定》顺利生效。奥巴马政府的环境外交有利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有利于美国经济振兴和环境保护，有利于改变美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形象。

关键词：美国；奥巴马政府；环境外交；中美环境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22-07

奥巴马执政时期（2009.1—2017.1）美国环境外交较之其前任小布什政府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实行能源战略，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采取合作的态度，促成《巴黎协定》生效，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的进展。尽管其继任者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奥巴马政府环保举措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奥巴马政府开展环境外交的背景

奥巴马政府的环境外交是在美国面临金融危机、经济发展不景气、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际形象不佳的背景下开展的。

第一，振兴美国经济。奥巴马上台之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当时美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就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因此，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解决失业问题成为奥巴马上台后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此外，美国经济发展结构也具有不合理性，其主要特征是高消费、低储蓄，重消费、轻投资，重金融服务业、轻制造业，这样的经济结构导致国内出现高负债、高贸易逆差和高失业率等问题。[1] 经济危机的到来暴露了美国经济的弊端，使美国人民充分认识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而美国的能源结构也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19世纪后半期美国逐渐形成了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消耗结构，这种结构在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给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拖慢了国内经济发展步伐。开展环境外交有利于带动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转变美国的能源结构，减轻经济发展负担，从长远看，可以大大提升国内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

第二，保障国内环境政策实施。奥巴马上台后首先在国内环境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环境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能源战略；二是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在第一任期（2009.1—2013.1），为了把发展国内经济与解决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奥巴马提出了新能源战略，具体包括三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摆脱对外能源依赖，实现能源独立。在第二任期（2013.1—2017.1），奥巴马更加直接地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推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和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3年6月25日，奥巴马政府推出《总统气候行动计划》（President's Climate Action Plan），针对美国的火力发电厂制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计划到

收稿日期：2018-03-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美环境外交的现状、特点及趋势研究”（13YJAGJW001）

作者简介：丁金光（1960-），男，山西河津人，法学博士，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嘉欣（1992-），女，山西晋中人，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0年，美国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2015年8月3日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进一步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减排目标，声明到2030年美国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32%。[3]这些政策要想得到进一步推行和落实，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外交政策相互配合。

第三，重塑美国国际形象。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曾经是多边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多个国际环境机制的构建和环境协议的达成与生效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却一度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消极参与者甚至阻碍者。2001年3月，小布什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小布什此举在国际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美国一度成为国际社会批评和指责的对象，连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巴厘岛气候大会上也公开指责美国是“阻碍谈判的罪魁祸首”。[4]美国要想重回国际环境治理领域，就必须转变在国际社会上不负责任的形象，以赢得各国的信任。奥巴马承诺将在气候议题上开启新篇章，并在环境领域积极行动，目的就是要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高调回归全球环境治理舞台。

二、奥巴马政府环境外交的新变化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的双边和多边环境外交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一）双边环境外交

1. 中美环境外交

中国和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年排放量总和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以上。两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言行对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影响巨大。中美之间的气候与清洁能源合作卓有成效，既丰富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实践，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亮点。

第一，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能源和气候变化是中美开展环境外交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针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文件。2009年7月，中美达成《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决定以此为基础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对话与合作机制。2011年1月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2013年4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中国期间，双方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推进相关合作。[5]2014年11月12日，中美再次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两国宣布了各自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并且均决定要在未来进一步提高减排力度。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6]双方还确定了未来两国在环境领域的行动计划和重点合作领域，包括扩大清洁能源联合研发，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加强氢氟碳氧化物的合作，启动智慧型/低碳城市倡议，推进绿色产品贸易，实地示范清洁能源等。该声明在全球树立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典范，对于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达成谅解、消除隔阂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指出，两国在气候问题上有共识，也有争执，但双方都在迈步向前。“联合声明证明了双方有能力、有意愿开展建设性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7]2015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又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申了2014年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内容，同时对巴黎气候大会进行了展望，表明“支持巴黎成果中包含有强化的透明度体系，以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信心”。[8]两国决定在未来要进一步落实国内的减排计划，并就下一步的合作目标和合作途径进行了交流。该声明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此举有助于今年在巴黎达成一个普遍的、有意义的协议，进一步显示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向低碳未来转型时共同的认识和郑重。”[9]欧盟委员会气候专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针对中美气候声明指出，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尽管距离一个雄心勃勃的协议之路还很遥远，但增加了达成协议的机会。[10]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此次中美合作将使质疑气候变化的美国共和党人更难以利用中国作为挡箭牌指责奥巴马的环境政策。这是因为中国此次直接将其行动时间化和数字化，这将直接削弱共和党人的批判。[11]2016年3月31日中美两国再一次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目的是促进各国积极签署《巴黎协定》。[12]

其次，中美在能源和气候领域的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健全。2008年6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能源与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正式建立。奥巴马执政时期，十年框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更加成熟和定型。在该框架下，中美

确定了七个重点领域：清洁的大气、清洁的水、清洁和高效的交通、清洁高效和有保障的电力、能效、湿地保护以及保护地 / 自然保护区，并且围绕这七个领域分别制定了七个行动计划，其中绿色伙伴计划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中美两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学术团体以及其他机构之间自愿结成绿色合作伙伴关系，依托有特色、创新型的具体项目开展技术合作、经验交流及能力建设等形式的合作活动。截至 2016 年 5 月，中美双方共结成 42 对绿色合作伙伴。[13] 在该计划的推动下，中美在促进能源环保产业绿色创新发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论坛交流、技术研讨和示范项目推广活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在 2013 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美决定要设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涉及 9 个具体的行动倡议：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电力系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建筑和工业能效，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气候变化和森林，气候智慧型 / 低碳城市，工业锅炉效率和燃料转换，绿色港口和船舶。自成立以来，工作组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划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目前，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已经成为两国增进理解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框架，在推动两国气候合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9 年 11 月，根据中美在《关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合作议定书》所达成的共识，两国决定共同成立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该中心由中国科学技术部、国家能源局和美国能源署共同领导，包括清洁煤产学研联盟、建筑能效产学研联盟和清洁能源汽车产学研联盟三个联盟，旨在加强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上的合作交流。经过几年的合作，该中心已经在清洁煤技术、建筑节能技术和清洁汽车技术的研发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推动中美清洁能源的开发与新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是两国在能源和气候领域所建立的重要的对话与合作交流机制。2009 年 7 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召开，能源气候合作议题成为对话的重要内容。此后，对话每年举行一次，在推动中美开展气候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的地方合作进一步加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气候智慧型 / 低碳城市倡议。气候智慧型 / 低碳城市项目（CSLCC）由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ISC）执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为中方战略合作伙伴。项目为期 18 个月，计划选取四个试点城市，提供城市所需的技术、工具和支持，通过能力建设方式同城市一起推动气候智慧型 / 低碳城市的建设，为城市带来持久的减排效果。[14] 2015 年 9 月，首届中美气候智慧型 / 低碳城市峰会在洛杉矶举行，中美 29 个省州市县签署了第一份气候领导宣言，提出了城市的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016 年 6 月，第二届气候智慧型 / 低碳城市峰会在北京举行，中美各省、市、州、企业、民间团体就城市低碳发展问题签署了多个谅解备忘录、合作协议和合作安排。气候智慧型 / 低碳城市项目直接与城市合作，项目组通过组织中美城市低碳实践交流、考察以及为城市量身打造的研讨和培训、邀请技术专家等方式，协助城市开发、执行务实、可操作的低碳规划和实施方案。

此外，中美生态城市合作项目、中美省州长论坛、中美友城大会等也是两国在地方层面开展气候与能源合作的重要平台。2013 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美国能源部牵头共同启动并确定河北省廊坊市，山东省潍坊市、日照市，河南省鹤壁市、济源市，安徽省合肥市 6 座城市为首批中美低碳生态试点城市。[15] 项目通过在全国开展低碳生态规划、生态景观、资源环境、能源利用、交通运输、产业发展、城乡统筹、新能源、水环境治理、绿色建筑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信息分析、规划咨询等业务，为各级政府提供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在推动中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合作。随着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中美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推出了清洁大气行动计划，制定了未来十年中美在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行动目标。在该行动计划下，两国加强了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的信息共享，双方还在江苏省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试点项目，并且定期举行成果研讨会。在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还计划召开第十届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研讨会，加强区域空气污染及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政策、法规、许可证及技术能力方面的合作，深化机动车、港口和船舶污染减排合作，推进污染排放监测，提升实验室及非道路机动车检测能力和数据评价水平，并继续促进改善污染控制技术。[16]

第三，在水污染防治领域的合作。在水污染治理领域，中美推出了水质量行动计划。为了交流各自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经验，两国定期举行高层政策研讨会和中美水环境政策交流会。在会议上，中美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在对地表水的保护及修复的专业技

能、水安全绿色投资、水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同时，两国还探讨了水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实现水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反思。为了改善地下水水质，中美推出了改善地下水水质的试点项目，并且在中国的湖北省和美国明尼苏达州开展了姊妹湖结对项目，以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近年来，中美在水环境管理、污染控制战略和创新技术以及地下水的开采和利用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在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除上述领域外，中美在化学品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及污染场地管理、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发展合作、国家公园管理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环境外交已经成为中美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合作内容上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合作模式上更加机制化、成熟化，成为两国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支柱。

2. 与其他国家的双边环境合作

在与中国开展一系列环境外交活动的同时，奥巴马还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环境外交。2009 年 4 月 16 日，奥巴马与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签订了《美墨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双边框架协议》，以加强两国在清洁能源、绿色产业、森林健康经营、土地利用、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等方面的双边合作。2009 年 9 月 16 日，美国与加拿大推出“美加清洁能源对话行动计划”，决定要在未来加强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以推动两国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为了共同治理环境污染，美国和加拿大建立了美加空气质量委员会，并推出了空气质量协议项目，以统一两国车辆、发动机及燃油标准，并且制定了 2016 年后轻型车辆的排放标准。2009 年 11 月 24 日，奥巴马与印度总理辛格签署了《清洁能源、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两国宣布要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促进绿色能源安全、气候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绿色伙伴关系。美印还决定共同投资 1.25 亿美元建立美印清洁能源研究发展中心，以加强双边清洁能源联合研发。2010 年，美国与欧盟先后签署了《旨在使亚速尔群岛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和《美国 – 欧盟区域和地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1 年 10 月 12 日，美欧签署了《七大汽车制造商联合开发电动车充电系统的解决方案》，以推进双方在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方面的合作。2013 年 4 月 14 日，美国和日本发表了《美日气候合作联合声明》，旨在推动一个全新的、可行的、全球性的“后 2020 国际协议”，以推动低碳发展、促进低碳增长、保护资源环境、造福子孙后代。2015 年 6 月，美国与巴西发布了《美国——巴西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声称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两国领导人决定建立美国——巴西气候变化工作组，以加强两国在土地利用、清洁能源、气候适应以及国内、国际气候问题上的政策对话，并且就气候变化问题推出一项联合行动计划。

（二）多边环境外交

1. 积极构建并参与多边环境合作机制

为了推进各国在能源气候领域的多边合作，奥巴马上台后首先在国际上发起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旨在推进当今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展开对话，以具体探讨未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举措。2009 年 4 月，“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预备会议，之后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了峰会。希拉里在开幕式发言中阐明了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外交方面的核心立场：美国希望各国在气候外交方面展现出创造性，消除全世界对以碳为基础燃料的依赖局面，协调开发能够减少污染并提高可持续性的“改变格局的技术”。2009 年 4 月，在第五次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奥巴马提出了“美洲国家能源与气候合作计划”，该计划目前包括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国以及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国家组织等成员，已成为美洲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2009 年 8 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领导人在第五届北美领导人峰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和清洁能源问题达成了《北美国家领导人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宣言》，制定了三国未来温室气体减排的中长期目标，提出要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机制，加强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力图发展“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技术，以推动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2011 年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奥巴马与各国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消除环境生产和服务方面的非关税壁垒，逐步淘汰低效化石燃料补贴，旨在到 2035 年 APEC 经济体的能源强度降低 45%，这一承诺有助于各国清洁能源技术的传播与推广。2012 年 2 月，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减缓大气污染状况，美国与孟加拉国、加拿大、加纳、墨西哥、瑞典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了气候变化与清洁空气联盟。2014 年 1 月 24 日，美国提出了一项绿色商品贸易倡议，旨在消除太阳能热水器、风力涡轮机等环保产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关税。

除开展上述活动外，奥巴马还在多边外交场合

积极探讨气候变化问题。例如,2014 年,奥巴马将气候变化问题列入 G20 议程,并且号召各国就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2015 年,在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北极问题国际会议上,奥巴马强调了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呼吁各国共同采取行动应对气候问题。同时美国还积极参加全球甲烷行动倡议(Global Methane Initiative)、碳封存领导人论坛(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Leadership Forum)、地球观测组织(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等多种国际环保组织,以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持积极态度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每年都举行一次气候变化大会,对气候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以求达成一个对各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气候减排协议。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态度成为气候谈判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呈现出了积极和主动的姿态。2009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奥巴马在会上表示美国会履行减排承诺,即到 2020 年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05 年基础上削减 17%,并且到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削减超过 80%。[17] 2010 年在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同意加大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力度。2011 年 12 月在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积极启动绿色援助基金,决定要在未来三年内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 1000 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他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 2013 年的华沙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表明要用公共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同时还与挪威、英国共同投资 2.8 亿美元来支持华沙大会确立的“华沙 REDD+ 框架”,以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毁林和森林退化而造成温室气体排放问题。2015 年 12 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各缔约方经过艰苦的磋商和谈判,最终达成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巴黎协定》。该协定提出了要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 2℃以内并向 1.5℃努力的目标,同时将原来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转变为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减排新模式,为广泛调动各国参与减排提供了新路径,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阶段,因此被认为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全球最重要的气候治理文件。美国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会上,奥巴马呼吁各国代表能达成一项有实际意义的条约。他说,“我们的下一代正在看着我们……气候变迁可能会在本世纪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环境的最大挑战”,“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美国不仅认同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将为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行动起来”。[18] 2016 年 4 月 22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带着孙女签署了《巴黎协定》,11 月 4 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

三、奥巴马政府环境外交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环境政策虽然招致某些传统能源行业利益集团的不满,一些共和党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也成为美国环境外交推行的障碍,各国之间在环境治理领域依然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与矛盾,但是奥巴马政府的环境外交新变化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环境外交政策以及开展的环境外交实践,在客观上对于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开展的气候外交对于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美两国是全球减排计划中的重要力量。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 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 2/5 以上。[19] 因此,仅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合作就能对全球减排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中美在双边气候合作中积累的经验在推动巴黎气候大会的顺利召开以及《巴黎协定》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美之间的环境合作是全球气候治理取得顺利开展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19] 再次,中美的气候合作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达成政治共识,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之间带头采取减排行动,其他国家也会更加愿意在全球层面开展气候合作。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源消费国以及碳排放国像(今天)这样走在一起,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理由不作为。”[20]

第二,有利于美国经济振兴和环境保护。环境问题的恶化,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2009 年 6 月 16 日,美国政府发布《全球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影响》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 30 年里,冬季的气温上升要比任何其他季节都快,美国中西部和北部平原的冬季平均气温上升了约 4℃。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增加侵蚀、风暴潮及水灾的风险,尤其是在美国东南部和阿拉斯加部分地区。积雪的减少和过早融雪将改变水供应的时间和数量,加剧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短缺。[21] 气候变化现已影响到美国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与动物的健康、水资源的供应、农业等,极端天气将会成为新常态。因此,美国必须通

过开展国际环境合作以增强其环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缓解环境恶化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风险。

奥巴马在任内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节能减排的经济社会效应显现。清洁能源计划及采取的具体措施，都对经济复苏、增长以及失业率的下降起到了刺激作用。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能源统计数据，美国 2012 年碳排放为 57.86×10^8t，比 2005 年的 64.95×10^8t 减少 7.09×10^8t，减少 11%，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由 2001 年的 24% 下降到 2013 年的 17%。与此同时，根据 EIA（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数据，美国 2001 年以来的单位 GDP 能耗持续下降，从 7.58kBtu/ 美元下降到 6.11kBtu/ 美元，下降幅度接近 20%。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从 6.67kBtu/ 美元下降到 6.11kBtu/ 美元，下降幅度超过 8%。另外，新能源混合动力汽车的推进，大大提高了机动车辆的能源利用效率，每加仑燃料的行驶距离从 2005 年 17.1mile 提升到 2013 年的 17.6mile。[22]

2017 年 1 月 9 日，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总统在《科学》杂志发表题为《不可逆转的清洁能源势头》的长文，指出“大量科学记录”表明气候变化是“真实的、不可忽视”，如果放任不管，温室气体排放继续增加将导致全球气温在本世纪末上升 4 摄氏度以上，全球经济每年将损失约 4%，其中美国每年损失 3400 亿至 6900 亿美元。他指出，2008 年至 2015 年间，美国经济增幅超过 10%，而来自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则下降 9.5%，这一结果“应该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即与气候变化做斗争需要接受经济增速减缓与生活标准降低。”美国企业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增加，美国风力和太阳能电力成本显著下降，正经历从以煤为主到以天然气为主的生产转型，全球出现了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的竞赛势头。他相信，美国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23]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双边环境合作中，美国也采取了诸多损害双边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中国采取的能源保护主义政策。为了遏制中国低碳技术和新兴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奥巴马政府推动了边界碳关税协调，对来自中国的新能源产品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2010 年 10 月 15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出的申请，启动《美国贸易法》第 301 条款，针对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新能源政策展开调查，其中涉及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新能源汽车、先进电池等产业。2012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因此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 18.32% 至 249.96% 的高额反倾销税，[24] 使得中国国内光伏企业的出口贸易及自身的长期发展受到严重影响。2014 年 2 月 12 日，美国声称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对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冲击，因此决定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中美在环境领域的双边合作。

第三，有利于改变美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形象。积极的环境外交政策是奥巴马“巧实力”外交的具体体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巧实力”外交政策进行了具体的表述：“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25]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传统安全的威胁降低，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纷纷涌现。面对新的挑战，美国需要重新确定其外交领域的优先议程和支柱。希拉里国务卿将防卫、外交、发展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中，发展被置于优先地位。环境问题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各个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因此，必须要加以重视。美国希望通过开展国际环境合作、提供国际融资项目、推进国际气候谈判等方式塑造其全球治理大国的形象，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以进一步稳固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2017 年 6 月 1 日，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称《巴黎协定》给美国带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8 月 4 日，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美国打算根据《巴黎协定》规定的条件退出该协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这一行为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26]《巴黎协定》已得到全球 194 个国家签署、147 个缔约方批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 82% 以上。其他发达国家如欧盟和日本等都已重申承诺，将继续坚守协定，表达了继续履行《巴黎协定》的意愿。一些国际组织也发表声明，继续维护《巴黎协定》。在美国国内，众多州、市地方政府和企业也表示将继续节能减排。加州州长杰瑞·布朗、纽约州长安德鲁·库墨、华盛顿州长杰伊·英斯利 6 月 1 日共同发表声明，称他们已经结成名为“美国气候联盟”的组织，三人担任共同主席，并号召其他各州参与进来，致力于维持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更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此外，美国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等 61 座城市的

市长共同发表声明，将维护并执行《巴黎协定》，对抗特朗普的决定。因此，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不会影响协定的继续执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将成为一大政治遗产。

参考文献：

[1] 富育红.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与新能源保护主义[C].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15）:216.

[2] 仲平.美国奥巴马总统“气候行动计划”解读[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4,（3）.

[3] 周琪,付随鑫.美国《清洁电力计划》及其对美国能源行业的影响[J].国际石油经济,2015,（23）.

[4] 杨理堃.浅析奥巴马政府能源环境政策[J].和平与发展,2009,（6）.

[5]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3-04-14（003）.

[6]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4-11-13（002）.

[7] 解振华.中美气候合作“非常成功”[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23/c_1115692317.htm.

[8]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5-09-26（003）.

[9] 潘基文赞赏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7/c1002-27638749.html

[10]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将为南南合作出31亿美元[EB/OL].http://business.sohu.com/20150926/n422167969.shtml.

[11] 刘元玲.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J].国际展望,2016,（2）:49.

[12]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6-04-02（002）.

[13] 张玮,余来冬.绿色合作伙伴计划:中美能源和环境合作的亮点[J].世界知识,2016,（20）:60.

[14] 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EB/OL].http://www.iscchina.org/Article/detail/id/411.html.

[15] 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网[EB/OL].http://www.chinaecocityacademy.com/index.php?c=article&id=111.

[16]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N].人民日报,2016-06-08（017）.

[17] 李海东.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J].外交评论,2009,（6）.

[18] 奥巴马.巴黎气候大会有望成为限制气温升高的转折点[EB/OL].http://sd.people.com.cn/n/2015/1201/c172839-27216997.html.

[19] 王联合.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识、影响与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2015,（1）.

[20] 赵川.全球各国冲刺巴黎协定,中美气候合作成为亮点[N].21世纪经济报道,2015-09-29（012）.

[21] 冯卫东.美发布《全球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影响》评估报告[N].科技日报,2009-06-18（002）.

[22] 侯敏,李刚,袁省之.奥巴马政府能源战略实施路径、成效及启示[J].石油科技论坛,2016,（1）.

[23] 奥巴马《科学》发文:清洁能源发展“不可逆转”[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1/10/c_1120279821.htm.

[24] 美对华光伏终裁,中国光伏产业困境空前[EB/OL].http://www.chinanews.com/ny/2012/10-12/4243919.shtml.

[25] 唐彦林.奥巴马“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J].当代亚太,2010,（1）.

[26] 联合国秘书长重申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令人失望[EB/OL].http://world.xinhua08.com/a/20170806/1719619.shtml.

责任编辑：侯德彤

New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in the Obama Era

DIN Jin-guang　ZHAO Jia-x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re were some new change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Sino-U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is fruitful and has become a new bright spot in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a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the Paris Agreement comes into effect smoothly. The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ces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age impr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Barack Obama administration;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性研究

赵领娣[1,2] 邵双玉[1] 隋杭珂[3]

（1.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3.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在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交互作用规律的基础上，选取2006—2014年山东省相关的统计数据，通过熵值法构造海洋产业集聚和海洋生态资源环境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个系统间的耦合程度。结果表明，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都逐年提高；虽然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比较高，但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却并不高，表明两个系统虽然比较协调，但协同发展水平并不高。

关键词：海洋产业集聚；海洋生态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29-06

我国海洋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升温，从总量来看，我国海洋产业生产总值从2000年5000亿元，到2008年的2.96万亿元，再到2016年7.05万亿元，仅仅十几年就翻了14番多。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打造了“一带一路”双向开放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使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能够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开展海洋经济的合作和交流，为推动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海洋产业作为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

然而我国海洋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结构的不断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资源型传统海洋产业规模的扩张来实现的，海洋产业集聚的发展会对日益枯竭的资源及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资源和环境也会制约着我国海洋产业集聚的发展。“十九大”把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作为海洋开发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倡导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理念，发展和推广绿色技术，大力推广海洋循环经济模式，着力构建海洋生态产业体系。因此处理好海洋生态资源环境与海洋产业集聚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环渤海经济圈和沿黄河经济协作带的核心区域。大陆海岸线长3121 km，占全国的1/6，位居全国第三位；海域面积约15万km^2，其中，滩涂面积3223 km^2，居国内第二位；近海渔场总面积为17万km2，比其陆地总面积还要大。海岛326个，岛屿面积约136 km^2，岛屿岸线737 km，沿海及岛屿附近自然资源种类繁多，生物、油气等储藏量众多[1]。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山东海洋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海洋生态资源环境条件。

一、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耦合发展机理分析

耦合作为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协同的现象，是在各个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2]。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作为两个独立的系统，系统之间以及

收稿日期：2018-02-18

作者简介：赵领娣（1963-），女，河南武陟人，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教授；邵双玉（1992-），山东潍坊人，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隋杭珂，女，山东青岛人，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影响。海洋产业集聚的结构优化既依赖于海洋资源的储备量和空间环境的优劣，又影响着资源与环境为人类其他活动进行服务的能力。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既推动着海洋产业集聚的发展，它的日益枯竭又制约着海洋产业集聚的发展空间[3]。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之间表现为压力－承载－反馈之间的交互作用，耦合效应表现为良性交互效应、制约交互效应[4]。

丰富的海洋资源与人力资源、知识技术以及山东省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给发展海洋产业集聚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而快速发展的海洋产业集聚也提高了个人、企业和社会保护和治理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的意识，从而有目的的推陈出新：在寻求产业升级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集聚区内的污染集中治理还能有效降低治污成本，提高企业收益。改善的海洋生态资源环境又进一步提高海洋产业集聚的发展[5]。这表现为良性的交互作用。

另一方面，海洋产业集聚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张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有限的海洋资源被加速占用，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日益增多，超出了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使生态环境加速恶化。反过来，恶化的生态环境又制约着产业的发展，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表现为制约交互作用。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模型

（一）指标选取

本文在借鉴黄瑞芬[6]与尹玉蓉[7]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指标体系的设计，结合山东省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整体对应、比例适当、重点突出、总量指标与均值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如下的指标体系。海洋产业集聚指标体系选取了海洋生产总值、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海洋生产总值、海洋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海洋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涉海就业人员数8个指标；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指标体系选取了海水养殖面积、盐田面积、海洋科研人员、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海洋原油产量、海洋天然气产量、水资源总量、R&D经费支出额、工业粉尘去除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电力消费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15个指标（见表1）。

表1 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	指标	单位
海洋产业集聚系统	海洋生产总值	亿元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人均海洋生产总值	元
	海洋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
	海洋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
	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涉海就业人员数	万人
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系统	海水养殖面积	公顷
	盐田面积	公顷
	海洋科研人员	人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万元
	海洋原油产量	万吨
	海洋天然气产量	万立方米
	水资源总量	亿立方米
	R&D经费支出额	万元
	工业粉尘去除量	吨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电力消费量	亿千瓦时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万吨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万吨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亿标立方米

（二）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指标体系设计的需要，选取2006—2014年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时间序列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海洋局网站、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统计公报，部分比较难得到的数据由笔者计算得出。

（三）评价模型

1.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选择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据熵的特性，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权重）越大，其熵值越小。具体步骤如下[8]：

（1）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不同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因此需要先对样本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 min-max 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处理，以消去单位及数量级对评级结果的影响。具体处理公式如下：

$$\text{正指标：}\quad x_{ij}' = \frac{x_{ij} - x_{ij\min}}{x_{ij\max} - x_{ij\min}} \qquad (1)$$

$$\text{负指标：}\quad x_{ij}' = \frac{x_{ij\max} - x_{ij}}{x_{ij\max} - x_{ij\min}} \qquad (2)$$

其中，i 表示年份，j 表示指标序号，x_{ij} 表示原始数据，x_{ijmin} 和 x_{ijmax} 分别表示原始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计算第 j 项指标 x_j 在第 i 个年份的观测值 x_{ij} 的比重，记为 p_{ij}：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quad i = 1,2,...,n,\ j = 1,2,...,m \qquad (3)$$

（3）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_j = -k\sum_{i=1}^{n} p_{ij}\ln(p_{ij}) \qquad (4)$$

其中，$k=1/\ln(n)>0$，且 $e_j \geq 0$；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_j = 1 - e_j \qquad (5)$$

（5）计算各项指标的权值：

$$w_j = \frac{d_j}{\sum_{j=1}^{m} d_j},\qquad j = 1,2,...,m \qquad (6)$$

（6）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s_i = \sum_{j=1}^{m} w_j \cdot x_{ij}',\qquad i = 1,2,...n \qquad (7)$$

通过以上步骤，得到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各指标的权重，见表 2。

表 2　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	指标	权重
海洋产业集聚系统	海洋生产总值	0.133179341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0.118424469
	人均海洋生产总值	0.130594352
	海洋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0.099609846
	海洋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0.066523039
	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244554707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0.125030741
	涉海就业人员数	0.082083505
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系统	海水养殖面积	0.069623469
	盐田面积	0.032850273
	海洋科研人员	0.065431136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0.086522852
	海洋原油产量	0.065370815
	海洋天然气产量	0.100852234
	水资源总量	0.038585535
	R&D 经费支出额	0.067977718
	工业粉尘去除量	0.150684591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0.059450413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0.055092162
	电力消费量	0.058659832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0.033076752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0.05339498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0.062427238

2. 耦合度模型

根据物理学中耦合度的概念，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来表示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的耦合度。耦合度公式为：

$$C = \left\{ \frac{F \times G}{\left(\frac{F+G}{2}\right)^2} \right\}^k \qquad (8)$$

F 和 G 分别表示海洋产业集聚系统和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k 为调节系数，文中 k 值取 2；C 为协调系数，$C \in [0,1]$。当 $C=0$ 时，耦合度极小，系统之间处于无关状态且向无序发展；当 $C=1$ 时，耦合度最大，系统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能够很好地衡量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但难以反映出两系统的整体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了产业集聚和资源环境的耦合状况以及两者所处的发展层次，反映了产业集聚和资源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具有比耦合度模型更广泛地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为：

$$D=\sqrt{C \times (\alpha F + \beta G)} \quad (9)$$

α、β 分别为调和系数，表示两个系统的权重，满足 $\alpha+\beta=1$，因为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同样重要，因此取 $\alpha=\beta=0.5$；$\alpha F+\beta G$ 为调和指数；D 为海洋产业集聚系统和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度系数，$C \in [0,1]$，D 越大，则协调水平越佳。

本文根据王艳明[3]等学者的研究，将耦合协调程度分为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初等协调、中等协调、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 7 个不同的层次，并在每一个层次内部，分别计算 $F(x)$ 与 $G(x)$ 的比值 Z，从而进一步确定区域内系统耦合发展的类型（表 3）。

表 3 海洋产业集聚—环境资源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及类型划分

	取值范围	类别
耦合度 C	$0 < C \leqslant 0.3$	低水平耦合阶段
	$0.3 < C \leqslant 0.5$	颉颃阶段
	$0.5 < C \leqslant 0.8$	磨合阶段
	$0.8 < C \leqslant 1$	高水平耦合阶段
协调度 D	$0 < D \leqslant 0.3$	低度协调耦合
	$0.3 < D \leqslant 0.5$	中度协调耦合
	$0.5 < D \leqslant 0.8$	高度协调耦合
	$0.8 < D \leqslant 1$	极度协调耦合
$Z=F(x)/G(x)$	$Z > 1.2$	海洋产业主导型
	$0.8 \leqslant Z \leqslant 1.2$	同步发展型
	$Z < 0.8$	资源环境主导型

三、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 MATLAB 2016 软件根据公式（1）—（9）计算出山东省 2006—2014 年海洋产业集聚系统和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度 C、耦合协调度 D、$F(x)$ 与 $G(x)$ 的比值 Z，并根据表 3 划分耦合发展阶段 – 耦合发展类型，具体结果见表 4，发展曲线见图 1。

表 4 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与生态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发展水平结果分析

年份	海洋产业集聚综合发展水平 $F(x)$	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水平 $G(x)$	耦合度 C	耦合协调度 D	Z	耦合发展阶段 – 耦合发展类型
2006	0.270671891	0.064472411	0.386213	0.058051	4.198259	低度协调耦合 – 海洋产业主导型
2007	0.359875701	0.220180077	0.887364	0.399588	1.634461	中度协调耦合 – 海洋产业主导型
2008	0.313024651	0.315929147	0.999957	0.222362	0.990806	低度协调耦合 – 同步发展型
2009	0.32197487	0.335620617	0.999139	0.40106	0.959342	中度协调耦合 – 同步发展型
2010	0.406054397	0.394292535	0.999568	0.282874	1.02983	低度协调耦合 – 同步发展型
2011	0.427683198	0.610153774	0.939132	0.448135	0.700943	中度协调耦合 – 资源环境主导型
2012	0.484814127	0.64891015	0.958539	0.388302	0.747121	中度协调耦合 – 资源环境主导型
2013	0.546227994	0.73608627	0.956638	0.511147	0.742071	高度协调耦合 – 资源环境主导型
2014	0.741237621	0.837386463	0.992595	0.555025	0.88518	高度协调耦合 – 同步发展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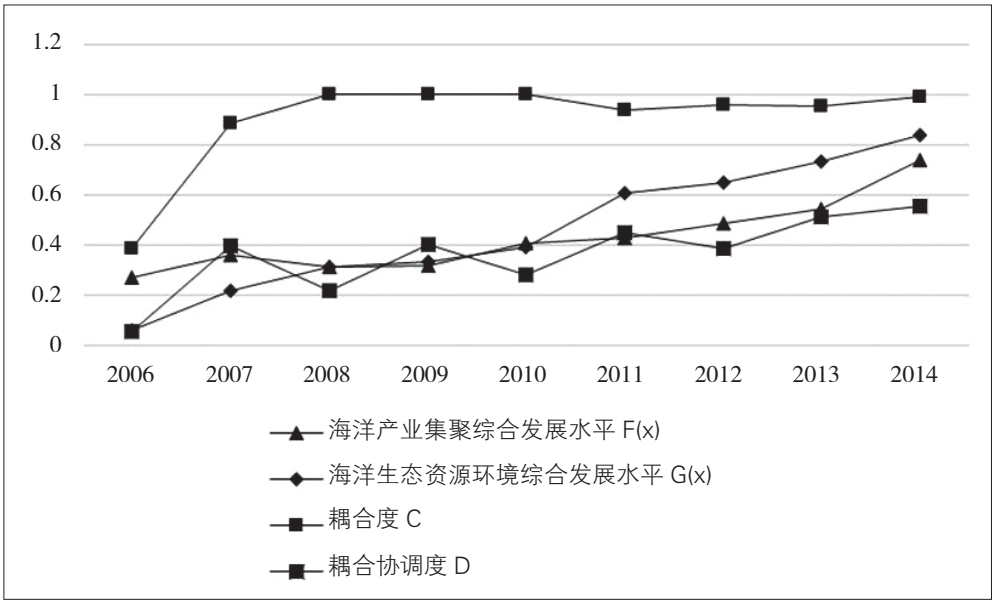


图 1 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与生态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发展水平曲线

（一）海洋产业集聚综合发展水平 *F(x)*

从图 1 中可见山东省 2006—2014 年海洋产业集聚综合发展水平在 2006—2013 年期间以极小的增长速度增加，可见在前 8 年，海洋产业集聚发展一直很稳定，这与海洋生产总值、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海洋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海洋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的实际观测值变化不大相符。但是在 2014 年，海洋产业集聚综合发展水平上升幅度较大，根据相关 8 个指标的具体观测值来看，这与人均海洋生产总值、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涉海就业人员数这 3 个指标的大幅增加相关。随着《山东省海洋事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的实施，山东省加快了海洋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大对涉海就业人员的人力投资，最终使得 2014 年海洋产业集聚综合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二）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水平 *G(x)*

相比于海洋产业集聚综合水平，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国家海洋局和山东省海洋局在 2006—2014 年间，发布了《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加大了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打击滥用海洋生态资源行为的力度，使得这期间的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大幅度上升。

（三）*F(x)* 与 *G(x)* 的比值 Z

从 *Z* 的数值来看，2006 年、2007 年 *F(x)* 与 *G(x)* 的比值超过 1，甚至 2006 年的数值为 4.2，可见这两年海洋产业集聚的发展幅度大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的发展幅度。这与山东省早些时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彼时重经济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使得生态资源环境方面发展滞后，甚至衰退。2008—2014 年间，*F(x)* 与 *G(x)* 的比值基本处于平稳下降的状态，随着政府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治理，更加严格的海洋资源使用政策的出台，山东省海洋生态资源环境有所改善，其综合评价水平超过海洋产业集聚系统。

（四）耦合度 *C* 和耦合协调度 *D*

从耦合度 *C* 的发展曲线来看，除了 2006 年数值较低外，基本维持在 0.9 左右。耦合度原理中，当 $C = 1$ 时，耦合度最大，系统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即 *C* 的取值越大越佳。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的耦合度 *C* 处在较低水平，说明两个系统的协调程度比较好，但从耦合协调度 *D* 的结果来看，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很高。海洋产业集聚和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并不理想。从表 4 中可以看出，2006—2014 年，耦合发展类型的发展历程为海洋产业主导型 – 同步发展型 – 资源环境主导型 – 同步发展型，表明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两者协同发展的水平并不高。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在不降低耦合度 *C* 的前提下，尽力提高耦合协调度 *D* 的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山东省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之间处于一种长期的稳定的良性共振耦合状态，但两系统之间的共同发展水平也就是协同效应并不高。海洋产业集聚与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发展类型并不稳定。

政府应加强规划管理。一方面，应通过制订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海洋产业发展和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的使用行为，依法治海、依法用海，认真贯彻落实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等制度；另一方面，应制定有利于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协同发展的战略，定时计算 2 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从而及时的调整对海洋产业集聚系统和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发展战略。

加快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变。加快绿色发展，既是“十九大”中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是提高海洋产业集聚系统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必经之路。具体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应增大对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积极推动技术进步、扶持新兴产业，提高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占比，减少对高污染能耗产业的投入；另一方面，增加清洁设备等方面的投资，从生产过程中减少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推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山东省近几年来涉海就业人员数逐年增加，应合理利用人力资本优势，培养海洋生物等方面的人才，发展一批具有创新发展意识的现代海洋经济人才。同时鼓励海洋科研成果产业化，建立海洋产业经济人才与临海企业的对接渠道，加强与全球信息的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谋求更深层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苟露峰, 王海龙, 汪艳涛. 山东省海洋产业结构演变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5,（4）.

[2] 张樨樨, 张鹏飞, 徐子轶. 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协同发展研究——基于耦合模型构建[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3] 赵领娣,郝亚如,李荣杰. 技术溢出视角下新能源开发的就业效应分析——以中国海洋能为例[J]. 资源科学,2013,（02）.

[4] 王艳明, 刘弈,王静. 海洋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基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J]. 经济统计学（季刊）,2014,（1）.

[5] 赵领娣,孙淑鹏. 海洋能源产业开发中的金融支持[J].中国渔业经济,2013,（1）.

[6] 黄瑞芬, 王佩. 海洋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系统耦合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1,（2）.

[7] 尹玉蓉, 朱洪兴. 长三角海洋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耦合关系研究[J]. 改革与开放,2016,（4）.

[8] 邢苗, 张建刚, 冯伟民. 我国金融与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发展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6）.

责任编辑：潘文竹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Marin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Shandong

ZHAO Ling-di[1,2]　SHAO Shuang-yu[1]　SUI Hang-ke[3]

(1.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 Marine Development Studies Institute of OUC,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Universiti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3. Qingdao No.2 Middle School, Qingdao 266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in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relevant statistics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4, constructs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marin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y the entropy method, and uses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analyze the degree of 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marin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ystems and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is rising year by year. Although the degree of 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is relatively high,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s not high, indicating that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is not good.

Key words: marine industrial cluster; marine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阮红伟 姚海棠

（青岛大学 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根据2008—2014年金砖国家有关创新能力指标的数据，通过变异系数法对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排名评价，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研究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经济实力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但并非最大影响因素；（2）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水平差异很大，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3）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能力各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各创新指标之间关联度差异较小；（4）在影响创新能力的众多因素中，创新基础和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关联度最高。针对分析结果，探寻提升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战略途径，提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策略。

关键词： 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 F11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8）03-0035-09

一、引言

在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因素各不相同，但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在世界科技创新版图上，金砖国家影响力与日俱增。数据显示，金砖国家拥有全球42%的人口，创造了全球18%的GDP，年研发投入约占全球的17%，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近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8%，科技期刊论文发表量达到59万篇，约占全球的27%。金砖国家对世界科技创新的贡献率逐渐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1]（P9-10）。金砖五国各自创新能力如何？反映创新能力的哪些因素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紧密？对金砖五国创新能力进行研究评价，分析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联系，对于提升金砖国家的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国家创新能力的研究起源于1990年Suarea—Villa率先提出的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2]，随后Hu MC和Mathews JA（2005）及Fai FM（2005）等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界定和研究[3-4]，Jan Faber和Anneloes Barbara Hesen（2004）建立了国家创新能力分析模型，探讨了影响国家创新竞争力的因素及其发挥的作用[5]。Porter和Stern（1999）曾经用单一的专利指标分析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创新能力[6]（P6-10）。国内学者李建平（2012）、林寿富（2012）、黄茂兴、张蕙（2014）等建立指标体系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和评价[7-9]。

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最早可以追述到1960年Rostow经济成长阶段论，国外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与认证[10]。S. Kuznets（1973）、H. B. Chenery（1986）通过几种不同的实证方式，研究验证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和分布以及变化规律。Darrat（2009）、Wahab（2010）主要研究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强调财政支出特别是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支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11]。Tilman Altenburg，Hubert Schmitz，Andreas Stamm

收稿日期： 2018-01-18

基金项目： 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PCA-DEA组合模型和Malmquist指数的山东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研究”（RW2018BZF049）；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东省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路径研究”（J17RA151）

作者简介： 阮红伟（1966-），女，山东威海人，青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姚海棠（1986-），女，山东菏泽人，青岛大学商学院讲师。

等人发现，中国通过整合创新体系，迅速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扩大海外市场，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12]。

国内学者近年来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成果颇丰。江小涓（1990）、刘志彪（2011）、李钢（2013）、张杰（2016）等研究了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和方向[13-16]。李子伦（2014）以产业体系的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为衡量标准，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涵义[17]。孙军（2008）研究了在需求约束条件下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演变路径[18]。李豫新，帅林遥等（2014）利用主成分回归和三轴图法对新疆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9]。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国家创新能力理论和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融合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当前研究也较少探讨国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新的指标评价体系，采用金砖国家的研究视角，通过变异系数法分析金砖国家关于创新能力水平的状况，利用灰色关联度方法研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联系，探寻经济新常态下提升金砖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途径，以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设计；第三部分为创新能力评价；第四部分为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灰色关联分析；最后是结论与主要启示。

二、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行研究。

1. 变异系数法

变异系数法根据各个指标在所有被评价对象上观测值的变异程度大小，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对其赋权。观测值变异程度大的指标，赋予较大的权数；反之，则赋予较小的权数。在评价指标对于评价目标来讲比较模糊的时候更适合采用。具体步骤：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后，每个指标的数值都在0和1之间，并且极性一致。通过无量纲化后的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计算变异系数，根据各变异系数占变异系数总和的比重，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获得各研究对象综合得分，进而排序。

2.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灰色系统理论着重研究模糊数学、概率统计所不能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问题。创新能力本身是个灰色系统，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加之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影响因素变化，而且金砖国家完整数据量较少，因此，采用灰色关联模型来研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能够解决上述提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具体步骤：首先需要设定研究对象的参考序列X0=（X0（1），X0（2），…，X0（n））和影响研究对象的比较序列Xi=（Xi（1），Xi（2），…，Xi（n））。进行无量纲化数据处理后，逐一计算每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对应元素的绝对差值，即$|x_0(k)-x_i(k)|$（max）。

根据公式 $\xi_{0i}=\frac{\Delta(\min)+\rho\Delta(\max)}{\Delta_{0i}(k)+\rho\Delta(\max)}$，

k=1，2……m，ρ为分辨系数，求灰色关联系数；根据公式

$$r_i=\frac{1}{N}\sum_{k=1}^{N}\xi_i(k)$$

求关联度。最后对灰色关联度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关联度数值越大，排序越靠前，对比因子与参考因子的关联程度越强，其对参考指标的影响越大，反之则影响较小。

（二）指标体系设计

1. 指标选取原则

国家创新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①全面性原则，创新能力是综合性概念，所涉领域宽范围广因素多，选取评价指标要比较全面反映研究对象整体情况；②代表性原则，即指标群要合理，最好能全面反映所研究对象的主要本质；③相关性原则，指标之间围绕共同研究目的，尽量避免选取那些不存在相关性或相关性很低的指标，从而使得最终的评价结果更有意义；④可比性原则，指标在涵义、统计口径和时空上要有可比性；⑤可操作性原则，即指标数据要能从公开的权威性渠道获得，且可信度要大。

2. 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上述原则，基于国内外文献对国家创新能力问题研究的梳理和回顾，本文以可获取的指

标为基础主要选取了 11 个指标，这 11 个指标是从不同方面对国家创新能力这个一级指标的评价，而且彼此之间还有内在联系。所选择的评价指标及在本文中的代码和数据来源具体如表 1：

表 1 金砖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国家创新能力	创新投入	X1. 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世界银行（WDI）
		X2. 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人）	世界银行（WDI）
	创新产出	X3.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	世界银行（WDI）
		X4. 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件）	世界银行（WDI）
	创新基础	X6.GDP（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WDI）
		X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世界银行（WDI）
		X8. 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	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
		X10. 高等院校入学率（占总人数 %）	世界银行（WDI）
	创新环境	X5. 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人 / 千人）	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
		X9.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十亿美元）	世界银行（WDI）
		X11. 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世界银行（WDI）

3.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和数据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就是国民经济社会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信息技术革命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出现了“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吴敬琏（2009）指出，在信息化的推动下，“经济服务化”的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20]。因此，我们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这可以反映出产业结构是否是朝着“服务化”的方向推进，观察产业结构是否在升级。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利用 2008—2014 年金砖五国的 11 个指标数据进行创新能力分析，在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过程中使用 2008—2014 年金砖五国的 11 个指标数据作为比较序列，使用 2008—2014 年金砖五国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参考序列进行研究。数据资源渠道为世界银行、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国际统计年鉴等，个别缺失值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替代处理。

二、金砖国家创新能力评价

采用变异系数法对金砖五国的创新水平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消除量纲影响，然后求得平均值、标准差及变异系数，从而获得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而打分排名。以 2014 年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指标为例，步骤如下：

利用极差法对指标的各项数据标准化，得表 3 数据：

表 2 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指标原始数据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中国	2.046	1113.072	25.372	801135	479	10.482	7683.502	4.2	268.097	39.39	24.08
印度	0.822	156.638	8.586	12040	214	2.035	1573.118	3.1	34.577	25.535	23.009
南非	0.732	404.686	5.854	802	31	0.351	6479.626	6.9	5.792	19.375	31.206
巴西	1.236	710.3	10.615	4659	544	2.456	12026.617	5.2	96.895	49.28	11.012
俄罗斯	1.187	3101.63	11.452	24072	705	2.064	14125.906	3.9	22.031	78.653	27.053

表 3 极差法标准化后数据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中国	1.0000	0.3248	1.0000	1.0000	0.6647	1.0000	0.4868	0.2895	1.0000	0.3376	0.6471
印度	0.0685	0.0000	0.1400	0.0140	0.2715	0.1662	0.0000	0.0000	0.1097	0.1039	0.5941
南非	0.0000	0.084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909	1.0000	0.0000	0.0000	1.0000
巴西	0.3836	0.1880	0.2439	0.0048	0.7611	0.2078	0.8328	0.5526	0.3473	0.5045	0.0000
俄罗斯	0.3463	1.0000	0.2868	0.0291	1.0000	0.1691	1.0000	0.2105	0.0619	1.0000	0.7943

利用 SPSS20.0 求平均值、标准差并计算平均值与标准差的比值，得到金砖五国创新能力的变异系数，从而获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如表 4。

表 4 各指标变异系数及权重

指标	平均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X1	.359680	.3952583	1.098917	0.0895
X2	.319400	.3993266	1.25024	0.1018
X3	.334140	.3882956	1.162075	0.0946
X4	.209580	.4419974	2.108967	0.1717
X5	.539460	.3999144	0.741324	0.0604
X6	.308620	.3947045	1.278934	0.1041
X7	.542100	.3917815	0.722711	0.0588
X8	.410520	.3843351	0.936215	0.0762
X9	.303780	.4108137	1.35234	0.1101
X10	.389200	.3943051	1.013117	0.0825
X11	.607100	.3740834	0.616181	0.0502

将权重与标准化后的原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后得出创新能力评价结果，并排序。

表 5 金砖国家 2014 年创新能力评价结果

	中国	印度	南非	巴西	俄罗斯
评分	0.7542	0.1060	0.1580	0.3159	0.4470
排名	1	5	4	3	2

重复上述方法，可以求出金砖五国 2008—2014 年各年创新能力得分及排名如表 6：

表 6 2008–2014 年金砖国家创新得分及排名

	中国	印度	南非	巴西	俄罗斯
2008	0.6762	0.0775	0.1747	0.3495	0.5288
2009	0.6846	0.0952	0.1714	0.3371	0.5369
2010	0.6944	0.0907	0.1693	0.358	0.5144
2011	0.7059	0.1008	0.1708	0.3432	0.4877
2012	0.7227	0.0933	0.1572	0.3174	0.4698
2013	0.7348	0.1011	0.1483	0.2947	0.4731
2014	0.7542	0.1060	0.1580	0.3159	0.4470
排名	1	5	4	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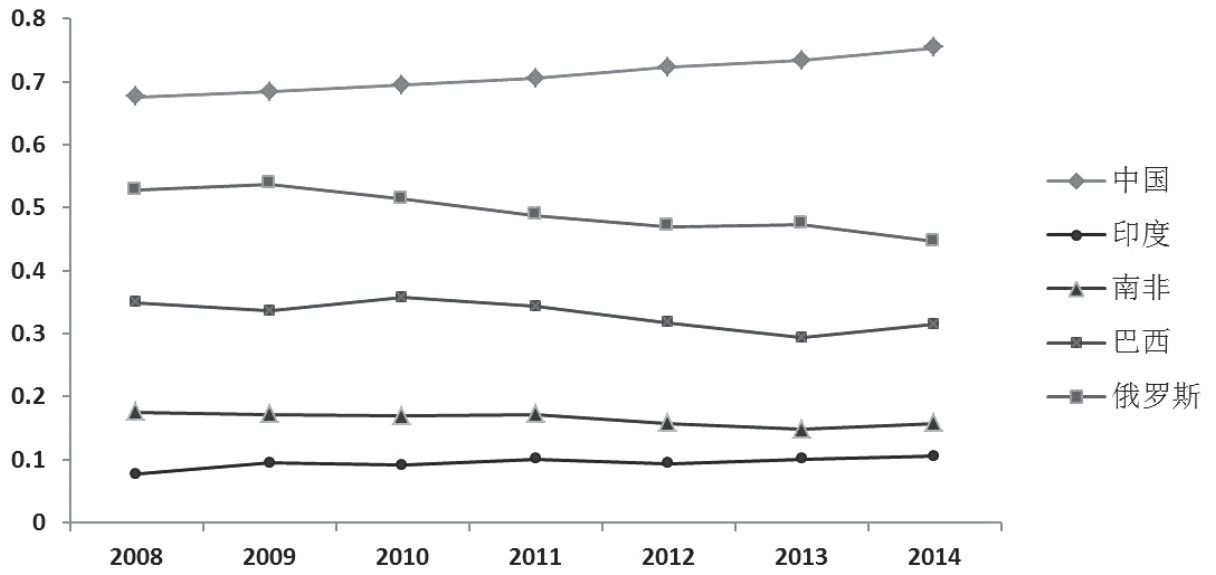


图 1 2008—2014 年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折线图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2008 年至 2014 年间金砖五国创新得分按照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排名位次不变。创新能力最强的是中国，且创新得分有明显上升趋势。这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相吻合，其次是俄罗斯和巴西，印度和南非创新能力比较小，这与多方面因素有关，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落后、创新投入和产出少等都是导致创新能力差的原因。

从表 3 可以看出影响中国创新能力比较大的指标是 X1 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X3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X4 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件）、X6 GDP（万亿美元）、X9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十亿美元）等，这些指标代表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基础和环境，这与我国大国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经济发达有足够的力量支撑研发力度，带动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

影响俄罗斯创新能力的指标分别有 X2 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人）、X5 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人 / 千人）、X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X10 高等院校入学率（占总人数 %），由此可见，决定俄罗斯创新能力的主要是创新基础和环境，这固然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超过 70% 的科学遗产有关，同时，俄罗斯在创新活动方面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俄罗斯除“科技领域小型创新企业发展促进基金会”，还有“风险创新基金会”和“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掌握着 150 亿卢布的资金，相当于 6.2 亿美元，对 IT 技术、通讯技术进行了很多支持 [21]。

巴西在反映创新基础和环境的指标 X5 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人 / 千人）、X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X8 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表现较好，但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件）及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金砖五国中明显处于劣势。

印度和南非主要是因为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水平落后、创新环境欠优等因素导致创新能力比较低，有待提高。

创新能力的提高能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积极带动产业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所以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灰色系统理论着重研究模糊数学、概率统计所不能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问题，适合研究金砖五国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所以本文采用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利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 X0 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构建参考序列，反映创新能力的 11 个指标构建比较序列。分别进行 X0 与 11 个指标在 7 年内的关联度分析和 X0 与 11 个指标在金砖五国的关联度分析。

三、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一）金砖国家产业结构

金砖国家由于各国经济特点不同，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展情况不一样，2008—2014 年金砖五国第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及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资料如下表所示。

表 7　2008—2014 年金砖国家产业结构数据（%）

		中国	印度	南非	巴西	俄罗斯
2008	第二产业	46.9	25.7	22.1	27.3	35.9
	第三产业	42.8	53.9	65.5	67.3	59.7
	比值	91.26	209.73	296.38	246.52	166.30
2009	第二产业	45.9	25.2	21.6	25.6	33.7
	第三产业	44.3	54.5	66.6	69.2	61.7
	比值	96.51	216.27	308.33	270.31	183.09
2010	第二产业	46.4	24.3	20.9	27.4	34.8
	第三产业	44.1	54.6	67.2	67.8	61.4
	比值	95.04	224.69	321.53	247.45	176.44

续表

		中国	印度	南非	巴西	俄罗斯
2011	第二产业	46.4	29.3	20.3	27.2	33.8
	第三产业	44.2	49	67.5	67.7	62.2
	比值	95.26	167.24	332.51	248.90	184.02
2012	第二产业	45.3	28.6	20.5	26.1	33.5
	第三产业	45.3	50	67.9	69	62.9
	比值	100	174.83	331.22	264.37	187.76
2013	第二产业	44	28	20.9	24.9	32.9
	第三产业	46.7	50.9	67.8	69.8	63.3
	比值	106.14	181.79	324.40	280.32	192.40
2014	第二产业	43.1	27.4	21	24	32.1
	第三产业	47.8	52.6	68.1	70.8	63.7
	比值	110.91	191.97	324.29	295	19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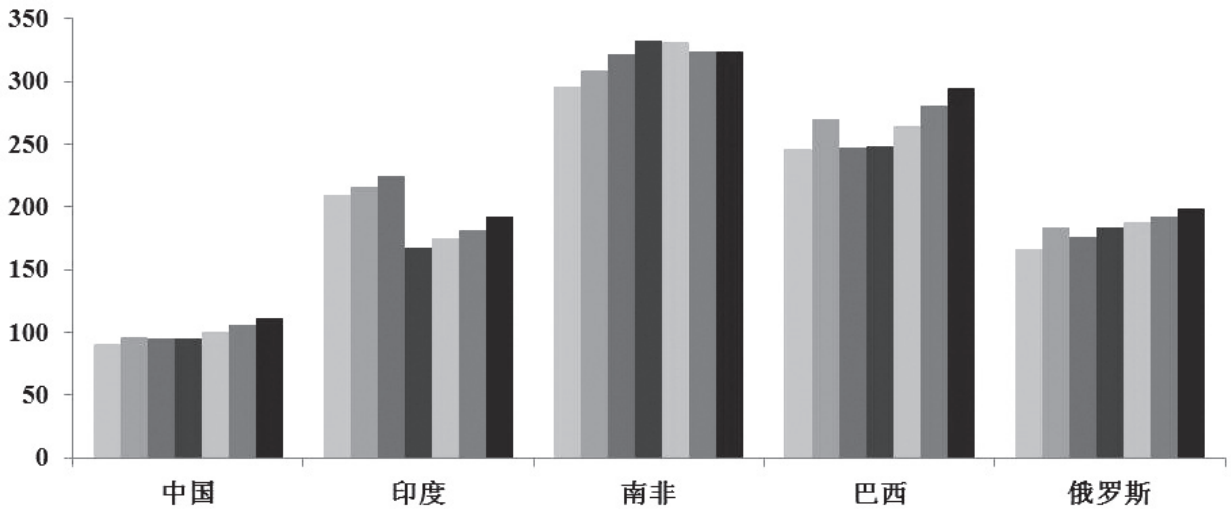


图 2 2008—2014 年金砖五国产业结构变化图

从 2008—2014 年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可以看出五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南非和巴西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较高，而中国比值最低，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尚有巨大空间。

从第三产业比重来说，印度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保持在 50% 以上，南非、巴西、俄罗斯均超 60% 甚至超过 70%，而中国在 2014 年 47.8%，2015 年首次突破 50% 达到 50.5%。因此，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潜力巨大。

从变化趋势上来说，2008—2014 年金砖国家总的趋势是第二产业比重逐步降低，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高。从金砖国家三次产业构成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他金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的是第三产业。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中国和其他金砖成员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合作的空间较大。

（二）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灰色关联分析

1. 金砖五国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

表 8 金砖五国的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中国	0.830	0.730	0.692	0.884	0.806	0.858	0.855	0.795	0.754	0.874	0.621
印度	0.634	0.564	0.686	0.533	0.528	0.521	0.525	0.620	0.715	0.504	0.599
南非	0.580	0.704	0.652	0.596	0.774	0.883	0.833	0.850	0.595	0.771	0.714
巴西	0.766	0.634	0.600	0.696	0.753	0.648	0.637	0.703	0.627	0.745	0.648
俄罗斯	0.719	0.647	0.848	0.666	0.838	0.747	0.740	0.593	0.705	0.832	0.640
平均	0.7058	0.6558	0.6956	0.675	0.7398	0.7314	0.718	0.7122	0.6792	0.7452	0.6444
排名	6	10	7	9	2	3	4	5	8	1	11

由表 8 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金砖五国的 11 个反映创新能力的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关联度都是大于 0.6，且指标的关联度之间差异较小，这就说明所有创新能力的指标对产业结构升级都能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也表明提高创新能力水平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能力各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按照关联度大小排列：X10>X5>X6>X7>X8>X1>X3>X9>X4>X2>X11。

可以发现，对金砖五国而言，创新基础和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创新投入和产出。也就是说，在短期内，金砖国家应该夯实创新基础，优化创新环境，增强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才能使得产业结构合理的优化升级。

2. 2008—2014 年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

表 9 2008—2014 年 7 年内金砖五国的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2008	0.6341	0.5562	0.6686	0.6258	0.5845	0.6325	0.6665	0.8028	0.6035	0.6153	0.6547
2009	0.5666	0.5597	0.6560	0.6258	0.5869	0.6571	0.6432	0.7325	0.6364	0.5970	0.6348
2010	0.6200	0.5711	0.6529	0.6360	0.5749	0.6733	0.6221	0.8117	0.6731	0.6270	0.6304
2011	0.6622	0.5910	0.6740	0.6707	0.6102	0.6883	0.6387	0.8211	0.6859	0.6721	0.6200
2012	0.6448	0.5988	0.6680	0.6652	0.6384	0.6841	0.6483	0.7815	0.6767	0.6567	0.6189
2013	0.6426	0.6680	0.6646	0.6586	0.6227	0.6765	0.6388	0.7735	0.6531	0.6307	0.6371
2014	0.6271	0.6654	0.6435	0.6572	0.6209	0.6710	0.6331	0.7575	0.6567	0.6058	0.6700
平均	0.6282	0.6015	0.6611	0.6485	0.6055	0.6690	0.6415	0.7829	0.6551	0.6292	0.6380
排名	9	11	3	5	10	2	6	1	4	8	7

根据表 9 可以看出，2008—2014 年 7 年内金砖五国的所有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关联系数平均值依然大于 0.6，再一次证明各创新能力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提高创新能力水平将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除 X8 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指标外，各关联度指标之间差距很小，这意味着，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每个金砖国家创新能力的各项指标均应得到全面协调发展，才能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按照关联度大小排列：X8>X6>X3>X9>X4>X7>X11>X10>X1>X5>X2。这表明从长期看，创新基础和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最高，特别是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紧密。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 2008—2014 年金砖国家有关创新能力指标的数据，通过变异系数法、灰色关联度方法对金砖国家创新能力及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经济实力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但并非最大影响因素。

经济实力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GDP 总量越大的国家，其国家创新能力得分越高，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可谓一枝独秀，其 GDP 总量和国家创新能力得分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然而，用变异系数法对金砖五国的创新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在影响国家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中权重较大的是居

民专利申请数量等反映创新产出的指标，反映经济实力的 GDP 指标并非最大影响因素。

第二，金砖五国内，各国创新能力水平差异很大，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金砖五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国家创新能力表现出巨大差异。但在一定时期内，创新能力排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即，创新能力最强的是中国，俄罗斯和巴西随后，南非位居第四，印度最后。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能力各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各创新指标之间关联度差异较小。

不论从动态还是静态角度看，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能力各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表明提高创新能力水平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各关联度指标之间差距很小，表明只有做到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基础和创新环境多指标协同综合作用，均有良好表现才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

第四，在影响创新能力的众多因素中，创新基础和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关联度最高。

尽管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能力各指标之间关联度差异较小，但还是可以进行排序，相比较而言，不论从时间角度长期观察还是从金砖五国角度看，反映创新基础和创新产出的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关联度稍高，表明金砖国家创新基础的夯实和创新产出的提高更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以上分析结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

首先，重视创新产出提升创新能力。创新产出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较大。金砖国家政府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搭建面向产学研结合的公共技术平台和中介服务机构，大力发展技术成果交易市场，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完善科技成果产出机制。同时，金砖国家政府应加大科技创新政策扶持力度，科技创新政策涉及财政、金融、税收、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各个国家可有不同侧重点，但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激励作用，促进创新产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22]

其次，寻求差异与互补谋求国家间的合作创新。金砖五国内创新能力水平差异很大，但创新能力排序在一定时期稳定。这有助于我们探求金砖成员国之间创新因素的共性及差异性，寻找互补性强领域或因素，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合作。2017 年 7 月 18 日通过的《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提供了明晰的科技创新合作方向，只有认识和把握金砖国家创新能力的特征规律，才能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和特殊国情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真正有效推动落实《行动计划》，提升金砖国家整体创新竞争力。

最后，瞄准产业结构特征协调驱动创新因素。金砖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各有不同。在产业结构方面，不论是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还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各成员国之间既存同又有异，但均存在脱节与不合理之处，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之升级优化。国际上人们习惯称中国为“世界工厂”，印度为“世界办公室”，南非是“非洲的资源库”，巴西是重要的“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则为“世界加油站”，这实际上是对金砖国家产业结构特征的简化形象表述。创新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构成创新能力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各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均有显著关联性且差异较小，这提示我们各创新因素都应该受到足够重视，综合作用，协调发展。

在各创新因素中，创新基础和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关联度较高。金砖国家要夯实创新基础平台，从硬件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软件说，创新政策扶持力度。不但要加大创新的物质资本投入，更需要加大人力资源和知识投入；不仅要加大科技经费尤其是研发经费的投入（许多创新型国家的共同做法）更需要注重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但要强调创新产出和投入，更要重视创新基础和环境建设。各创新因素只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谋求联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也正是金砖国家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合作伙伴精神。让金砖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更加闪亮，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参考文献：

[1] 赵新力，李闽榕，黄茂兴.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 SUAREA-VILLA. L. Invention,inventive learning and innovative capacity[J].behavioral science,1990,35（4）.

[3] MEI-CHIH HU, JOHN A. MATHEWS.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in East Asia[J].research policy,2005,（34）.

[4] FELICIA M.FAI. 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ta to analyze China’s grow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J].World Patent Information,2005,（27）.

[5] JAN FABER,ANNELOES BARBARA HESE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European Nations:Cross-national Analyses of Patents and Sales of Product Innova." research Policy,2004,（33）.

[6] MICHAEL E.PORTER,SCOTT STERN.The New Challenge to America'S Prosperity: Findings from the Innovation Index[M].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Washington,DC,1999.

[7] 李建平.国家创新竞争力:重塑G20集团经济增长的战略基石[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8] 林寿富.新兴经济体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比较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9] 黄茂兴,张蕙.金砖国家创新竞争力之评估与提升[J].探索与争鸣,2014,（11）.

[10] WALT WHITMAN 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3 edi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1] ALIF F.DARRAT. Are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Economic Growth Causally Related ?Another Look at the Evidenc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1 999, 13（3）.

[12] TILMAN ALTENBURG,HUBERT SCHMITZ,ANDREAS STAMM. Breakthrough ? China's and India's transition from production to innovation[J].World Development,2008,36（2）.

[13] 江小娟.我国产业结构及其政策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1999,（6）.

[14] 刘志彪.为什么我国发达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反而较低?—兼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思路[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3）.

[15] 李钢.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与路径—中国第二产业占GDP 的比例过高了吗? [J].中国工业经济,2013,（10）.

[16] 张杰.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障碍、困局与改革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5）.

[17] 李子伦. 产业结构升级含义及指数构建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国际比较[J].当代经济科学, 2014,（1）.

[18] 孙军. 需求因素、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演变[J].南开经济研究, 2008,（5）.

[19] 李豫新, 帅林遥, 王睿哲. 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14,（9）.

[20] 吴敬琏.宏观调控并不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J].人民论坛,2009,（7）.

[21] 宋兆杰.乌克兰与俄罗斯科技创新能力比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10）.

[22] 张永凯. 金砖国家研发创新能力及科技政策激励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6）.

责任编辑：胡燕京

The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BRICS Countries

RUAN Hong-wei　YAO Hai-tang

(School of Commerc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By collecting the data from 2008 to 2014 on the index of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of the BRICS countries, we evaluate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of BRICS countries through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and get the ranking. By using the Grey correlation method,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1) economic strength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bility, but it is not the biggest factor; (2) the levels of the innovative capability of the BRICS countries are very different and have strong stability in a certain period; (3)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index,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novation indicators is small; (4) among the man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nnovative capacity, the innovation base and innovation output have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iming at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 capability of the BRICS countries is explored and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BRICS country; innovative capac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印度文化特征成因探析

穆 宏 燕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亚非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印度文化注重冥想，在极度冥想中构建宇宙空间，由此架构人在宇宙空间中的序位，由此形成印度社会中的差别意识与分裂意识，进而形成印度极其多元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印度教构建的是人与宇宙空间的关系，用声音搭建起人与梵的关联，由此形成印度文化中的声音崇拜和口口相传，并导致婆罗门垄断话语权。而婆罗门垄断话语权导致以诗代史，导致印度缺乏大一统王朝。另一方面，婆罗门的话语权又把一个四分五裂、邦国林立、异见林立的“国家”形态以印度教统摄精神领域而维系数千年，形散而神不散。这也是现代印度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

关键词： 冥想；宇宙空间；声音崇拜；多元回归

中图分类号： G112；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8）03-0044-08

各种研究印度文化的著作文章，都谈到印度文化各种各样的特征，比如，注重冥想，缺少历史观，以诗代史，注重口口相传，差异分裂与多元包容并存，注重苦行修炼等等，这些特征概括得都很正确，让笔者受益良多。同时，笔者也总感觉这些特征之间缺少逻辑关联，从而使得这些特征呈现为彼此游离的状态，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复杂多重的特征，看起来或许彼此毫不相干，甚至彼此矛盾对立，但其中应存在某种隐秘的逻辑关联。本文即尝试探析印度文化各种特征成因之间的逻辑关联。

一、极度冥想导致构建宇宙空间

世界各大文化，各有其长。西方重逻辑、中国重伦理、印度重玄想。可以说，印度文化是世界上最精深思辨的一种宗教文化，其印度教与佛教哲学体系十分发达，且非常玄奥精深，让人类的思维能力极度延伸。印度人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极度沉思冥想的生命状态？

有学者认为气候炎热是印度产生苦行和沉思冥想的原因，也是印度森林文化形成的原因。因为气候炎热，人在城市里难以承受这种酷热。因此，印度人，尤其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婆罗门，他们多跑到森林里去避暑。一方面，少吃少动，甚至禁食打坐，降低身体的能量消耗，由此形成苦行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婆罗门作为知识的创造者，他们身体虽然静坐不动，但头脑却是在进行高度思维。婆罗门在森林中创造了高度的文化成就，解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大小往世书18部，以及《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是在森林中完成的。因此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印度文明的主流不在城市中，而在森林中，它是密林中寂静生活的文明。”①

这种为躲避气候炎热进入森林而形成沉思冥想的说法的确是具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这应该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南美洲亚马逊河流、东南亚群岛地区，还有非洲很多地区，都同样是气候炎热、森林密布，为什么这些地区没有产生森林中的苦行和沉思冥想文化？因此，气候炎热只是

收稿日期： 2018-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世纪东方区域文学年谱整理与研究2000-2020”（17ZDA280）

作者简介： 穆宏燕（1966-），女，四川永州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台北：淑馨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转引自郁龙余等著：《印度文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形成苦行和沉思冥想文化的外因，内因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内因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每个民族都具有的其自身最初的原始信仰。每个民族的初始信仰是该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对该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南亚次大陆达罗毗荼人土著文化的原始信仰是什么呢？是生殖崇拜。印度很多浮雕都表现生殖崇拜的内容，很多在别的民族看来几乎是色情的、甚至是淫秽的内容，在印度文化中却是非常坦然的呈现。生殖崇拜后来进入印度教文化，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印度河流域达罗毗荼人的古文化遗址摩亨觉达罗（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出土的一枚石头印章上就刻画有湿婆神，盘腿坐着，明显是一种瑜伽修行姿势，以瑜伽修炼展开冥想。湿婆是达罗毗荼人崇拜的神，后来进入印度教，受到极高的崇拜。在印度教神话中，湿婆正是男性生殖力的象征，林伽（男性生殖器）是湿婆神的代表性造型。出土石头印章上的湿婆像，说明达罗毗荼人将基于瑜伽修炼的冥想视为提高生殖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而瑜伽修炼本身也是一种苦行方式。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之后，将雅利安人的一元信仰与达罗毗荼人基于瑜伽修行的苦行冥想相结合。二者结合的结果，一是促使苦行冥想从提高生殖力这一目的转移到对宇宙本体“梵”的沉思冥想，在沉思冥想中达到对“梵”的觉悟和回归。二是将苦行冥想提高生殖力这种方式本身作为觉悟“梵”和向“梵”回归的修炼方法，这一点对密教和瑜伽修炼影响非常大。加之气候炎热，在森林中避暑，打坐冥想。人在远离尘嚣的寂静状态下沉思冥想，会让人的思维无限延伸，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人的思维在宇宙空间中遨游，在极度冥想中构建宇宙空间，由此产生十分玄奥而精深的印度宗教哲学。

印度教哲学的理论核心即是探讨人与宇宙本体“梵”的关系，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探讨人向宇宙本体“梵”的回归距离。因此，印度教所极力营造的是宇宙空间。

首先，印度教对宇宙空间的营造，凸出体现在印度教的曼陀罗观念上。印度教的修行仪式，格外重视曼陀罗的作用。曼陀罗是整个宇宙空间的象征，后来被佛教密宗、尤其是藏传佛教所吸纳。曼陀罗图像是画在墙上、纸上，或者是建筑在地面上的，具体的画法或建筑格局各个不同的教派各有不同，但其核心含义是一致的，即曼陀罗就是宇宙空间的浓缩形式，并且认为曼陀罗坛城本身具有无边的法力。

曼陀罗观念还将宇宙分为：外宇宙、内宇宙、密宇宙。外宇宙就是指外在的宇宙空间，内宇宙指我们的人体，人体本身就是外宇宙的一个缩影。曼陀罗坛城既关乎外宇宙，也关乎内宇宙，更关乎密宇宙即人的心灵。外宇宙广阔无垠，无边无际，然而人的心灵可以包容天地万物，可以容纳广阔无垠的外宇宙空间。因此，人的心灵才是真正意义上可以无边无际地延伸。人只有心静下来，进入沉思冥想中，才能觉悟到心灵的密宇宙有多么广阔，密宇宙中的绝对实在就是那个无形无象的“我”（阿特曼）。当人与“曼陀罗”坛城相处的时候，就是把人体这个内宇宙置于外宇宙中，通过极度的沉思冥想，或者是通过“真言”的声音，让心灵密宇宙中那个无形无象的“我”（阿特曼）与宇宙本体“梵”合一。曼陀罗把内外密三个宇宙紧密关联一起，因此被认为具有无边的法力。

其次，印度教对宇宙空间的营造还作用于印度的社会结构。这主要体现为达摩观念与梵化意识。印度教文化中的“达摩”（dharma，意即“法”）观念，尽管被普遍用于人类社会，然而在最根本上是指宇宙之根本大“法”，指宇宙的固有秩序。这种秩序是由万事万物在宇宙空间中的不同位置构成的，即万事万物在宇宙空间中的阶位（等级）序列构成宇宙本身的秩序。印度教的核心旨归探讨的是人与宇宙本体“梵”的关系，把不同的人放在宇宙秩序的不同阶位上。每个人或每个集团都处在宇宙空间的不同阶位上，他们距离“梵”的远近各不相同。印度教认为，“等级差别是宇宙最高设计者、统治者制定的自然法则。”[1]（P220）这种人在宇宙空间中的阶位即是人的固有序列，就是人的“法”，就是人的“达摩”。达摩观念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达摩是指每个人在宇宙空间中的阶位。实际上，也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印度教理论的基础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与宇宙空间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强调的是人在宇宙空间中的阶位，即每个人在宇宙空间中的序列位置。其二，达摩是指人要守住自己的达摩，要守住自己的位置序列，不要让自己失去自己的序列。失去序列，意味着你在宇宙空间中失去存在的位置点，也就是说在宇宙空间中没有你存在的位置了。能够想象一下，在宇宙空间中没有你存在的位置的感觉吗？对于人来

说，那是一种极度的恐怖，不敢去想，也无法想象的状态。其三，达摩是关于人如何守住自己在宇宙空间中的序列位置的一系列法规。印度教徒的达摩就是遵守这些规定，守住自己的序列，不让自己失去自己在宇宙空间中的位置。

种姓等级制度的实质即是界定人在宇宙空间中的阶位序列，即距离梵的远近距离。“奠基于前世因果报应远离的业报理论所衍伸出来的，不只是世界的种姓分化，甚至是相应于一切顺位的神与动物的存在序列”[2](P184)，它既是人的“法”即人的“达摩”，也是宇宙空间大“法”的组成部分。因此，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信仰的组成部分，印度人把这种信仰称为达摩。也正因为如此，印度人称自己的信仰为永恒的达摩、神圣的达摩。因此，对于印度教教徒来说，达摩就是宗教本身，达摩就是信仰，达摩就是通向“梵我同一”的法则。

达摩观念使得每个印度人对自己所处的空间阶位（实际上即社会地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宇宙秩序，并且从信仰的角度对之遵守和维护。在达摩观念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位置，不论是高种姓者，还是低种姓者，或者是不可接触者，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且在贾吉曼尼制度的维系下，其生活是有安全保障的。因此，对于印度人来说，阶位的高低不要紧，那是前世所做的“业”的结果，可以通过今生做好事，行善积德，实现来生转世提升阶位。对于印度人来说，最恐怖的是失去阶位，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自己的阶位，守住自己的达摩。

在印度文化中，达摩与梵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印度教的核心旨归是梵我同一，因此人皆思“梵”。在这回归“梵”的长长的宇宙阶梯中，每个类别的人都处在不同的阶位上。一方面，达摩观念让每一个印度人都安于自己的阶位，守住自己的序列（法、达摩）。守住自己的阶位即是一种修炼，是回归“梵”的前提。另一方面，对“梵我同一”的追求，又让每一个印度人不安于自己的阶位，在守住达摩的前提下，每位印度教徒都会努力提升自己的阶位，让自己处在一个距离“梵”更近的阶位上。因此，一个具有伟大理想的印度教徒，总是会在“法”许可的范畴内，想法采用洁净度高的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采用等级更高的崇拜仪轨，或者是其他的新的标志，来显示自己与同阶位的其他人的不同，拉开自己与同阶位人的距离，以使自己处在一个更高的阶位上。当这个人的新方式得到周围一部分人的响应和仿效，那么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亚种姓的诞生。这样的过程被称为“梵化”。理论上来说，每一位印度教徒都具有分裂倾向，都渴望占据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阶位，一个距离“梵”更近的阶位，“低种姓自不待言，就连处于最高地位的婆罗门，也总是力图获得比同种姓中其他亚种姓更高的地位而不断从现在所处的集团中分离出去。”[1](P216)印度社会就是这样，一直处在这种分裂和分化中。持续不断的梵化与亚种姓分裂使印度社会呈现为立体空间结构，每个集团都处在因内部小集团努力上升所带来的分裂中，在分裂中实现上升，上升，上升……

因此，达摩与梵化，尽管这二者实际作用于印度社会结构，但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宇宙空间观念，是印度教构建人与宇宙空间关系这一核心旨归的必然结果。

二、注重构建宇宙空间导致声音崇拜

印度教构建的是人与宇宙空间的关系，种姓制度界定了人在宇宙空间中的阶位，曼陀罗坛场更是把人与宇宙空间联系在一起。然而，人与宇宙空间之间需要具体的关联纽带才能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阶位和坛场，没有关联纽带，无法把人与宇宙空间联系在一起。那么，是什么东西能让人与空间产生关联呢？是声音，而不是文字。文字维系人类社会内部的联系，而声音维系人与空间的联系，因为声音是在空间中传播的。

任何声音都是在空间中传播，但是，不是任何杂乱无章的声音都可以起到人与“梵”沟通的作用。必须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才能架起人与“梵”之间沟通的桥梁。必须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发音方式发出的声音，才会具有穿透力。这种发音的方式和技巧必须经过向老师学习，并反复练习和进行相关修炼，才能掌握。这一套学习修炼的方式很复杂，最关键的是掌握吸气和吐气的方式，气沉丹田。然后，从丹田将声音发出来，声音才会具有穿透性。从丹田发出的声音，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力道十足的浑厚之音，低沉雄浑，具有强劲的力道，具有强有力的穿透性，可以极度延伸。

“雅利安人的崇拜方式是围绕一种精心制作的祭祀体系进行的，从素食果蔬到动物牺牲都非常讲究，其间语言的力量起着中心作用。”[3](P76)在印度教的祭祀仪式和修炼仪式上，用具有强有力的、穿透性的声音念诵的字句称为“真言”。真言分为：一是有具体意思的真言，二是没有具体意思的真言。具有具体的实际意思的真言，比如，念

诵某个具体的神的名字，或者是念诵赞美神的某个句子，或者是吠陀中的某个句子或段落。然而，只有声音、没有具体意思的真言更受看重。这种思想后来被佛教吸纳，形成佛教密宗的六字真言。佛教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后五个音实际上都是第一个音“唵”的衍化和延伸。在印度教中，“唵”这个音是一切真言的种子，由a、u、m三个音素组成，代表梵天、毗湿奴、湿婆三位大神，代表天界、地界和地下界三界。①因此，实际上，“唵”是整个宇宙空间的浓缩象征，是声音所构建的宇宙空间，是人与宇宙空间的关联。笔者还认为，对“唵”的崇拜或许与雅利安人的神牛崇拜文化相关，由a、u、m三个音素拼读成的“唵”很像牛叫的声音。在雅利安人的神话中，牛是神创造的第一个动物。或许正因为此，雅利安人把牛叫的声音视为一种神圣的声音，可以与神沟通。

总之，印度教注重构建人与宇宙空间的关系导致声音崇拜。印度教崇拜声音的作用，崇拜声音在宇宙空间的穿透与回响，认为念诵神的名字的声音、念诵吠陀的声音、尤其是念诵真言的声音，具有神圣的力量，是人与无形无象的“梵”之间沟通的桥梁，进而达到人内心密宇宙中那个无形无象的“我”与无形无象的宇宙本体“梵”的合一。

声音崇拜又进一步导致了印度文化口口相传的特征。印度文化具有以诗代史、注重口传的特征。印度至今没有一部像中国史籍那样的信史。当年，唐玄奘到天竺取经，发现根本就无文字的经书可取，所有的经书都在僧人们的口中；同样，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也发现印度人的知识都保存在记忆中，世代口口相传。印度人为什么如此注重口传？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外因，即是黄宝生先生在《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中谈到的，记录知识的物质载体的特殊性。印度主要是用棕榈树的叶片来书写，记录文献，称为贝叶经。贝叶容易腐烂，不容易保存，尤其是在印度那样潮湿炎热的气候中，尤其难以保存。因此，主要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知识。②印度文化注重口口相传，特殊的物质载体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因。

我们再从印度文化内部来探索其内因。如上文所述，印度文化重视声音的作用，崇拜声音，因为只有声音才能架构起人与宇宙本体“梵”之间的关联，文字抵达不了无形无象的“梵”。因此，印度文化从根本上轻视文字。倘若重视文字，即使贝叶容易腐烂、不容易保存，那也可以通过代代传抄来保存。中国儒家文化强调名垂青史，强调建构社会伦理，强调以史为鉴。因此，中国格外看重修史，几乎历朝历代都修史书。然而，印度教只关注个人与宇宙空间关联，不关注社会，似乎个人与社会毫无干系。然而，只有声音才能把人与神联系在一起。

在印度，吠陀被视为天启，是神的声音穿透宇宙空间，然后婆罗门凭借内心的高度悟性，捕捉到神的声音，然后用口将之表达出来并传递下去，正如《梨俱吠陀·原人赞歌》所言：婆罗门是原人之口变成的。因此，以口传诵神的声音是婆罗门的神圣职责。在古代印度，用文字记录吠陀内容被视为是对吠陀的亵渎，“婆罗门——连同其竞争者（佛教）也大抵如此——极为长期地坚守着这样一个原则：神圣的义理只能用口耳相传。”[2]（P210）所有的吠陀知识都存储在婆罗门老师的记忆中，世代口口相传。通过念诵吠陀，让声音架起人与宇宙空间关联的桥梁，才能实现与无形无象的“梵”的合一。因此，在古代印度，称知识为“闻识”，即知识是靠耳朵听老师讲授而获得的，不是靠眼睛看书可以自学的。佛经的一个常用语，“如是我闻”也是强调知识是听来的。印度古代的文献主要是靠记忆力和声音而得以保存，“这种传统一直保存到19世纪开始印刷这些古书时，还没有断绝。”[4]（P19）。

注重口口相传，并非意味着印度就没有文字。印度具有很古老的文字历史，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就已经有象形文字，后来随着雅利安人入主南亚次大陆而消亡。印度雅利安人使用的语言主要为梵语和俗语。梵语是宗教用语，俗语是日常口语。梵语专门用于宗教信仰领域，相传是大神梵天创造的，被视为神与人之间用于沟通的语言，是神圣的语言，最初只为婆罗门所掌握，长期没有文字，因为用文字记录吠陀被认为是一种亵渎。后来因实际需要，开始用文字来记录。记录梵语的文字是几经变化，到11世纪时才确立用天城体字母来记录梵语。

然而，文字对于梵语来说，只是起一个辅助作用，声音依然是识别文字的主要依据。“梵语中的

①参阅邱永辉：《印度教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

②参阅黄宝生：《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另载于黄宝生：《梵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语音连读规则是识别词义的重要手段”[5](P196)，也就是说，必须熟练掌握连读规则，要读出来（至少是要在心里默读），才能明白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的正确意思。若仅凭眼睛看，往往出错。因此，梵语必须跟着老师学，进行严格的语音训练，一字一音都不能有差错，且反复不断地训练，使学习到的知识牢牢地铭刻在记忆中，随时可以脱口而出。正是因为梵语被视为雅利安人的一种宗教语言而严格口口相传，“婆罗门祭司必须确保在宗教祭祀中吠陀颂诗的使用准确无误”[6](P261)，使梵语的语法和发音从古至今被丝毫不差地保存下来。19世纪时，梵语成为欧洲语言学家们研究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关键语种。

三、口口相传导致婆罗门垄断话语权

首先，口口相传导致婆罗门垄断知识传授。在古代印度，所谓知识，就是指吠陀。“吠陀”一词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和学问。吠陀是最高、最神圣的知识，在印度人心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婆罗门作为最初掌握吠陀宗教知识的祭司，同时掌握着整理和诠释吠陀文献的权利。也就是说，四部吠陀，被认为是天启，是神传授给婆罗门的，然后由婆罗门整理而成的；解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则完全是婆罗门自己对吠陀的阐释。因此，婆罗门不仅是知识的掌握者、传授者，而且更是知识的建构者。因此，婆罗门掌握着话语权，而口口相传的传统，使得学习知识必须要拜婆罗门为师。

婆罗门家族一般是父子相传，传授吠陀知识及其中的一些秘笈。尽管也招收其他种姓的学生学习吠陀知识，但知识的传授权利，即口口相传的权利为婆罗门家族所垄断。因此，对声音的崇拜导致口口相传，而口口相传又强化婆罗门作为知识传授者的地位。

其次，婆罗门通过掌握知识和知识传授而掌控话语权，进而利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建构起一套有利于自己的理论学说，不断强化和巩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在印度社会中形成“婆罗门至上”的观念。

《百道梵书》言：“确实有两种神：众神是天上的神，有学问的婆罗门是人间的神。祭品供给众神，祭祀酬金供给婆罗门。”[7](P34)这显然是婆罗门利用手中的话语权，神化自己，塑造民众的思想意识。《摩奴法论》更是通过“法”的规定性和强制性，树立婆罗门的至上地位：“婆罗门是法的不朽化身，因为他为法而生，而这样的出生必将导致与梵合一。”[8](P37)乃至，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成为印度教的三大纲领。婆罗门是人间的神，是神圣天启的接受者，是祭祀仪式的主持者。

须知，这样的一种“婆罗门至上”的思想是婆罗门自己建构的，然后灌输给印度民众的。因此，印度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的建构完全掌握在婆罗门手中，同时也使得印度人的思想观念的塑造完全掌握在婆罗门手中。

尽管印度教（婆罗门教）是一种部落民在长期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宗教，不是人创宗教，不是某个婆罗门创建的，但婆罗门通过垄断知识和知识传授，成为印度教的建构者，成为话语权的掌握者。婆罗门利用手中话语权，在建构自己在人间的至上地位的同时，注重建构的是宇宙空间，而不是人类社会。

印度教文化是婆罗门建构起来的文化。婆罗门不事生产劳作，只专注于对宇宙本体“梵”的极度沉思冥想，思维纵横驰骋，真的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对宇宙时空的觉悟力极度延伸。在如此极度沉思冥想状态下，人对时间的感受是宇宙时间而非尘世时间，由此形成印度人的极大时间观。葛维均《古代印度的时间观念妨碍了历史学的发展》①一文将印度文化中的大尺度时间观对历史学的解构论述得很透彻。

这里，笔者想要补充的一点是，印度教探讨的核心是人与宇宙本体“梵”的关系，而非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因此，婆罗门在极度冥想中构建出来的这种大尺度时间观，实质上是用来构建宇宙空间的，而不是构建社会历史，更不是用来描述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发展的。这与注重以史为鉴的中国文化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在印度人的极大时间观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发展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连一瞬间之一瞬间之瞬间……的时间长度都没有，没有值得研究的意义。因此，印度人缺乏历史观。印度的历史完全缺乏精确的断代，这与具有精确历史纪年的中国文化形成鲜明对照。

社会历史意义层面上的时间，对于印度人来说是没有计算意义的。因此，印度文化对人的意义的探讨，不是把人放在历史时间中，而是把人放在宇宙时间中，在宇宙时间中来探讨人和相应的事件，必然采用大尺度的宏大叙事，从而把人神

①参阅葛维均：《古代印度的时间观念妨碍了历史学的发展》，《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

化、把历史事件神话化，由此形成印度文化以诗代史的特征。比如，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内容十分繁杂，让人无法厘清哪些是神话，哪些是史实，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搞清楚。

以诗代史与婆罗门至上密切相关。一方面，婆罗门建构的大尺度时间观无法作用于社会历史，当然婆罗门的本意也不在于此。另一方面，诗是吟诵的，靠声音流传；史是记载的，靠文字流传。因此，诗可以捍卫口口相传，从而维护婆罗门的权威；而文字会解构婆罗门至上的观念。一个人一旦学会了文字，便可以自行阅读书籍，自行理解文字的意思，进而形成自己的思想；而口口相传，你学会了这一首，老师不讲下一首，你永远不知其内容，因此每一句诗歌、每一首诗歌、每一章诗歌，都必须跟随婆罗门老师学，听婆罗门老师的讲解。

因此，以诗代史可以让婆罗门牢牢掌握着话语权，牢牢掌握着民众的思想塑造；因此，婆罗门也无意于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史”；因此，古代印度没有史，只有诗。对于印度人来说，诗就是史。对于现代之前的印度人来说，《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所讲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历史。这既是婆罗门自己的思想认识，更是婆罗门灌输给印度民众的思想认识。

第三，婆罗门垄断话语权导致印度社会结构缺乏大一统。婆罗门建构的印度教文化，只抬头看天，不低头看地；只关注人与宇宙空间的关系，不关注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只关注提升自己在宇宙空间中的阶位，不关注社会的总体平衡稳定，因此形成印度社会中的梵化现象。梵化本身是一种上升，但上升的同时即意味着分裂。某个集团成为一个新的亚种姓上升即是一种分裂，从原属集团中分裂出去。因此，“渴望不断梵化”形成印度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分裂意识，由此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形态亦是处在不断分裂中的。

更为重要的是，话语权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在谁手中，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就掌握在谁手中。一般来说，国家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话语权的掌握者。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

然而，在印度，国家政权的掌握者与话语权的掌握者是分离的。婆罗门掌握话语权，统治精神领域，但不掌握国家的统治权，不统治世俗领域。刹帝利掌握国家统治权，统治世俗领域，却不掌握话语权，无法建构意识形态领域。并且，婆罗门的话语权不为刹帝利服务，不为国家权力服务，不为世俗领域服务，只为建构婆罗门自己的特权服务。

一个国家政权必须要有话语权的支撑，一个社会必须要有意识形态的支撑。然而，婆罗门的话语体系轻视尘世意义，婆罗门掌握的话语权只用来建构人与宇宙空间的关系和自己的神圣地位，并塑造印度教徒的思想意识。因此，以婆罗门话语体系建构起来的印度教意识形态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差别意识和等级观念，其建构出来的社会形态处在因梵化意识所致的不断分裂中。

社会结构形态是国家形态的基石。很难想象，一个处在不断分裂中的社会结构形态可以长久支撑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古代印度社会不是一个靠国家权力凝聚在一起的社会，而是一个靠宗教信仰捏合在一起的社会。而印度教意识形态本身缺少一种大一统观念。印度社会因梵化而导致亚种姓林立，各个亚种姓之间隔离森严；印度古代国家形态在绝大多数时期同样是一种四分五裂，邦国林立的状态。即使是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王朝这样的大王朝在其最极盛的时期也从未真正统一过印度全境，极盛时期一过，重归四分五裂。

印度历史上缺乏大一统的王朝，这其中原因多多，婆罗门话语权对刹帝利王权的制约、以及印度教梵化意识所致的分裂常态不能不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四、婆罗门话语权建构多元回归宇宙空间

印度教在本质上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一般来说，但凡宗教都是出世的，是人在世俗生活中的一种精神需求，起到调节世俗生活的作用。然而，印度教的出世精神贯穿印度教教徒的世俗生活。伊斯兰教也是贯穿伊斯兰教徒的世俗生活，但是伊斯兰教法是建构世俗生活的，而印度教学说则是解构人的世俗生活的。

首先，印度教的分裂意识不仅使人从社会集团中分离出去，而且还使人从社会和家庭中分离出去。印度教虽然不像佛教那样否定家庭生活，但是将人的尘世生活划分为四个行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后两个时期即是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并且是从社会中分离出去，让人完全成为宇宙空间中的个体存在，通过个人的修行努力而实现梵我同一的最高境界。因此，梵化意识为印度教徒的个人苦行修炼奠定基础，使印度成为世界苦行之乡。

其次，印度教的业报轮回说解构了赖以维系尘世社会的人伦关系。母亲的子宫只是一个寄宿

的对象，子女的人生际遇是其前世所种下的“业”的结果，与父母没有必然联系。《摩诃婆罗多·教诫篇》有个故事，说一个老妇人与世无争，与人为善，但却遭遇不幸，她心爱的儿子被大蟒蛇咬死了。英雄阿周那抓住蛇，要杀死蛇，蛇说自己是死神派来的，只是执行死神的命令而已。而死神说，是时间让他死亡的，因为这个孩子到了该死的时间，死神只是执行时间的命令而已。最后，时间解释说：杀死这个孩子的是这个孩子前生所做的“业”，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因此，每个个体的人主宰自己的生死轮回，与他人无关。这样的思想使得每个印度教徒可以轻易了结自己的社会关系，离开家庭，离开社会，进行苦行修炼，寻求解脱。《梨俱吠陀》认为：神是通过苦行而获得创造世界的能量的，人通过苦行也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量和智慧。甚至认为：苦行即梵。①因此，在印度随处可见脱离家庭、脱离社会的苦行者。

第三，追求“梵我同一”为人生最终目的的思想，形成了印度教一套十分精深的苦行修炼体系。五花八门的精神修炼与身体苦行令人眼花缭乱，而所有的苦行修炼都可以涵盖在瑜伽的概念中。在印度，修炼瑜伽是脱离家庭和社会、进入林栖期和遁世期的印度教徒尤其注重的修行方式，是获得解脱的重要手段。

往世书神话讲：维持世界的大神毗湿奴躺在阿南塔（“无限”之意）大蛇身上沉睡，在虚无缥缈的宇宙之海上漂浮，在一“劫”之始睁开眼睛。宇宙的能量蕴藏在蛇的身体里，为毗湿奴所掌握，用于维持世界。对该神话我们可以如此理解：阿南塔大蛇实际上就是潜伏在毗湿奴身体的脉轮中。同理，在人体这个内宇宙也蕴藏着这样一条无形无象且具有无限能量的蛇，瑜伽理论称之为“蛇力”。“蛇力”潜伏在人体的脉轮之中，人通过一系列的肢体瑜伽修炼，打通人体内的7个脉轮：底轮（尾椎）、生殖轮、脐轮、心轮、喉轮、眉心轮、顶轮，即能唤醒人体内的“蛇力”，从而获得无边的神力而解脱，实现梵我同一。

前文述及，曼陀罗观念将宇宙分为：外宇宙、内宇宙、密宇宙。倘若说，曼陀罗坛城是通过由外及内，贯通三者，那么，瑜伽修炼是通过人体的肢体训练来掌控人体这个内宇宙，从而将外宇宙、内宇宙、密宇宙三者贯通，实现梵我同一。因而，瑜伽修炼成为印度教徒苦行修炼的重要方式。

第四，婆罗门话语权导致多元回归宇宙空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婆罗门话语权导致印度社会崇尚梵化，注重差别，形成印度文化中的分裂意识，由此印度历史缺乏大一统，印度社会结构不断亚种姓化，宗教派别林立、政治派别林立。然而，印度教注重差别又形成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印度教徒来说，“等级差别是宇宙最高设计者、统治者制定的自然法则。”[1]（P220）这样的认识观从两方面使印度文化呈现出极其多元包容的特征。

首先，等级差别是神制定的自然法则，那么，不同的等级差别都有其不同的与神沟通之道，否则神不会规定这种等级差别的存在。因此，印度教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宗教。任何异见都可以纳入神制定的差别之中，除非威胁到印度教自身的话语权——譬如佛教，而佛教最终也被印度教视为印度教内部的一次宗教改革运动而已。《梨俱吠陀》1：164说：“实在唯一，圣人异名。”因此，对于印度教来说，宇宙本体“梵”是唯一的实在，只是不同的人对之称呼不同，采用的具体回归方式不同而已，其目的皆是指向那唯一的实在。正如《薄伽梵歌》所说：“人们无论以何种方式走向我，我都将接纳他；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道路上努力，这些道路终将引向我。”[3]（P190）

其次，等级差别是神制定的自然法则，因此印度教把差别视为一种宇宙秩序。印度文化将差别视为宇宙间的一种自然形态，视差别的存在乃是理所当然，不将差别视为异端而排斥，而是将之视为宇宙秩序差别中自然存在、且合理存在的一部分。

就拿亚种姓来说，不断有新的亚种姓从原有的母体中分裂出来，分裂的结果是新旧共存，不是新的取代旧的。这就使得印度教在对待外来文化，或其他异质文化的态度上，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将之视为一个合理的存在，在印度人看来，只不过是又多了一个亚种姓而已。这就使得外来文化或异质文化基本上可以不被同化，可以作为印度文化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而存在。这就使得印度文化极其多元共存，极其丰富多彩，被誉为世界文化博物馆。

印度文化的包容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化所不具有的，可谓真正的“和而不同”。极其多元包容的文化特征，铸就了印度文化一种特有的恢弘气度。倘若说，中国维持大一统国家形态2000多

①黄心川：《印度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09页。

年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那么,印度将一个四分五裂、邦国林立、异见林立的“国家”形态以印度教统摄精神领域而维系数千年,形散而神不散,同样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这也是现代印度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 邱永辉.印度教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5] 郁龙余等著.印度文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 黄宝生.梵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 季羡林.印度古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8] 摩奴法论[M].蒋忠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冯济平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 of Indi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MU Hong-yan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89, China)

Abstract: Indian culture pays attention to meditation and building space in the universe through deep meditation, thus framing the sequence of people in space, form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differences and splitting in Indian society, which leads to India's extremely diverse 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induism buil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space, sets up an association between man and Brahmā through sound. In this way, sound worship and word of mouth take shape in Indian culture, thus establishing the Brahman monopoly of discourse. This monopoly results in the substitution of poetry for history and the lack of a unified dynasty in India.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en dominating the spiritual world of a divided "country" of dissents and states by means of Hinduism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is also the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India as modern country.

Key words: meditation; space in the universe; voice worship; multiple regression

印度《拉贾摩汉的妻子》中的英国小说元素

张 玮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拉贾摩汉的妻子》是印度人创作的第一部英文小说，作品连载发表，借用哥特小说元素增加作品吸引力，采用现实主义风格表现新兴印度中产阶层及其生活。本文从章节式文本构成、印度化的哥特小说元素、现实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等角度，分析作品英国小说元素的应用和功能。文章认为，《拉贾摩汉的妻子》是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的影响下创作完成的，它通过借鉴、模仿西方的写作方法成功地将小说形式引入印度文学，对以后的印度英语小说创作都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拉贾摩汉的妻子》；印度英语小说；维多利亚时期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52-05

1864年，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 1838—1894）的小说《拉贾摩汉的妻子》（*Rajmohan's Wife*）发表在周刊《印度园地》（*Indian Field*）上，这是印度人用英语写作的第一部小说。

般吉姆是印度近代小说的奠基者，著名的孟加拉语作家，他的孟加拉语小说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般吉姆是第一位获得加尔各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人，他在读书期间就喜欢写诗，作品还获过奖。不过，他觉得自己写的诗歌没有新意，就放弃诗歌写作，潜心学习和研读英国当时出版的小说。《拉贾摩汉的妻子》，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英文小说，小说发表后，他就改用孟加拉文写作了。《印度园地》并没存活多久，《拉贾摩汉的妻子》很快也湮没了，般吉姆后来试图用孟加拉文重写这部小说，但只写了前七章就放弃了。1935年，巴那吉（Brajendra Nath Banefji）在翻阅一卷1864年的孟加拉英文报纸装订本时，在里面发现了刊登有《拉贾摩汉的妻子》部分内容（除前三章外）的《印度园地》周刊。巴那吉把遗失的前三章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和新发现的部分一起出版，使小说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现在读者看到的版本，第一章至第三章是以孟加拉文版为基础的英文翻译，第四章至结尾是1864年的原文。目前，这部小说有三个版本：1996年的拉维达雅拉出版社（Ravi Dayal Publisher）版，内容包括印度著名文学评论家穆克吉（Meenakshi Mukherjee）撰写的前言、后记和详细的注释。这个版本还收录了1935年版本中巴那吉写的前言，简单介绍小说被重新发现、出版的过程。2009年，拉普出版社（Rapu&Co.）、印度企鹅图书有限公司（Penguin Books Ltd）又分别出版该小说的另外两个版本。

《拉贾摩汉的妻子》是一部通俗小说，故事大意为，拉贾摩汉的妻子玛达吉妮（Matangini）获悉丈夫和地主马杜拉勾结，企图霸占妹夫马德乌的家产。她深夜报信，帮助马德乌阻止他们的阴谋。，玛达吉妮向马德乌吐露爱意，但两人还是守于礼法而分开。玛达吉妮避难误入马杜拉家被关进阁楼，马德乌救出了她。事后，马杜拉自杀，玛达吉妮回到父亲家不久也去世了。印度当代著名英语作家高希（Amitav Ghosh）认为《拉贾摩汉的妻子》具有“突出的文学特性”[1]（P87）。有学者认为这部

收稿日期：2018-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南亚英语流行小说类型研究”（15BWW025）

作者简介：张玮（1971-），女，安徽灵璧人，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小说不仅是印度的第一部英语小说，也是亚洲第一部英语小说，从语言、文化、民族性和殖民历史角度来看，它都富有魅力。[2](P99)《拉贾摩汉的妻子》作为第一部印度英语小说，在文本结构、故事内容和风格上明显地表现出模仿性、探索性和实践性。这部小说满足类型小说可读性强的要求，它所蕴含的现实主义内容也展现出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社会、文化转变。《拉贾摩汉的妻子》既有文学性解读的意义，又具有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下文从小说文本结构、印度化的哥特小说元素和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具体追踪作品中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元素的应用表现，并分析其叙事功效。

（一）章节式文本结构

印度是一个故事大国，丰富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为作家们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也培养了他们讲故事的能力。印度故事旨在寓教于乐，通过生动有趣的内容宣扬宗教思想、道德教化，没有对叙事策略、人物塑造方法的要求。维多利亚时期，读者们已经认可小说是虚构的叙事作品，一部好小说需要有好的故事，许多小说家更是把讲一个曲折有趣的故事作为创作的最基本要求。印度作家和英国作家在小说故事要有吸引力这一点上不谋而合。但对于般吉姆来说，从西方舶来的“小说”不同于印度史诗、诗歌等传统文学样式，和古代故事类作品《五卷书》也不一样。印度传统文学的故事结构以枝蔓式为主，拿《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来说，它们在讲述主线故事时，会以插话的形式不断衍生出很多支线故事，这样一来，一是文本篇幅长，二是故事节奏缓慢，这些都不适合现代小说的文本、阅读要求。般吉姆为了使《拉贾摩汉的妻子》更符合小说讲故事的要求，他借鉴英国小说的创作方式，首先在文本构成上进行变革，为叙事方法提供合适的表达方式。

般吉姆简化《拉贾摩汉的妻子》的文本构成，将小说分为23章，每一章篇幅都不长。般吉姆效仿当时英国小说的习惯，给每次连载的章节配上标题，以介绍本章节的主要内容。“每章开头的标题像是客栈大门口的招牌，告诉了读者，他能得到些什么消遣，他如果不喜欢，尽可以跳到下面一章去。”[3](P24)维多利亚时期最流行的小说出版形式是分期出版，一般是一月一期，后来还出现了一周一期的情况，般吉姆采用每周一期的方式连载《拉贾摩汉的妻子》。这种出版方式要求每一期刊登出来的小说内容要相对完整，还要有冲突、高潮，在连载的章节结束时，要有吸引读者继续关注、期待下一期的悬念。般吉姆为适应小说出版方式和满足小说内容具有吸引力的要求，需要适合的小说类型、叙事方法让小说情节曲折、悬念迭出具有情节剧的特征，以戏剧性抓住读者。

般吉姆使用一些叙事技巧造成张弛的阅读节奏，他采用叙述介入、书信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叙述时间等叙述方法等对故事进行节奏控制和内容取舍。般吉姆在小说中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他灵活地加入书信的形式以调节叙述节奏。在“书信”（A Letter）一节中，马德乌收到律师来信，小说一段写信的内容，接着一段就写马德乌读信的反应，第一、第三人称叙述交替进行，共同推进故事发展。此外，小说经常使用介入性评论，以“读者啊”等插入形式，打断叙事进程，增加叙事色彩。如，“正如我们的读者在之前的章节中所知晓的那样，马杜拉·高希在与两个妻子的婚姻中，是幸还是不幸，是主人呢还是奴隶或者两者都是。”[4](P79)读者们已经知道马杜拉有两位妻子，尽管这在当时的印度并不是新鲜事，般吉姆在此用介入性评论，增强小说幽默感以舒缓读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担心。再比如，般吉姆用“让我们把场景换一下”[4](P103)这样的表述，打断上文正在进行的故事，直接跳出来，像导游一样招呼读者进入另一场景。再有：“自从上一章故事以来，已经过去三天了。”这里不仅是种叙述介入，也将故事时间快进，使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产生间隔，让读者充分想象三天没有进食的玛塔吉妮的困难处境，让读者紧张、担忧。

般吉姆吸收了英国小说文本模式，使印度作家摆脱旧框架的束缚，为印度英语小说发展打下基础。

（二）印度化的哥特小说元素

般吉姆为配合小说分期出版、内容具有吸引力的要求，他借鉴英国哥特小说元素进一步加强作品的故事性。哥特小说是18世纪6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一种类型小说，它借助模式化的人物、场景设定、故事套路，通过情节发展制造悬念，给读者带来惊悚、恐怖、神秘等阅读体验。哥特小说作为类型小说具有固定的情节元素和故事模式，美妙的自然环境描写（让读者产生无尽的联想）配合着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引起读者的恐惧感），从而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被激起浓厚的阅读兴趣。哥特小说的故事模式大多表现为：在诸如荒野、城堡或修道院等固定场景中，与世隔绝的弱女子要面对强悍之徒的威胁柔弱、对抗强势恶棍，小

说中的反面人物若隐若现、模糊难测，让人心生恐怖。读者借助女主人公的经历和视角，和她一起遭遇凶杀、暴力、复仇等，体验紧张、恐惧、神秘等情感。哥特小说借助一些共性的模式描写出人性深处隐秘的恐惧和其他难以言说的、或真实或虚构的人性之恶。般吉姆充分利用《拉贾摩汉的妻子》短小、独立的章节结构，借鉴哥特小说的环境叙事元素和类型化故事模式并结合印度自然、文化因素，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古堡、荒野、修道院、密室、暗道等地方是哥特小说传统的环境叙事因素，作者将这些经过陌生化处理之后，“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延长审美感受，生发无穷的恐惧”[5](P19)，从而带来审美张力。般吉姆借用哥特小说的叙事元素，结合印度社会、自然环境，移花接木地将传统哥特模式中的古堡、井、修道院等场景，因地制宜地被置换为印度乡村的(黑)森林、河和(被锁的)房间，用印度乡村常见的场景达到同样的效果。小说中，玛塔吉妮连夜报信，般吉姆对沿途森林、小径等自然景物做了生动描写，读者害怕吉凶难测的环境，更会对夜幕下单身赶路的弱女子的安危生出牵挂和担忧。在玛塔吉妮躲入河中、放下头发遮蔽自己时，读者既担心她在水里是否安全，又担心万一她被强盗发现后更加危险，随着般吉姆的描写，读者们完全被小说故事情节所吸引，进入一种紧张氛围之中，感情随着女主人公的境遇变化此起彼伏。玛塔吉妮利用黑暗做掩护逃出丈夫的毒手后，却误入阁楼被马杜拉监禁起来，这时候，“阁楼”就像哥特小说中的深山城堡一样，营造出玛塔吉妮与强徒对峙的逼仄环境和紧张气氛。小说既有自然环境描写，也有主人公危险处境带给读者的恐惧和紧张感，般吉姆借助超常想象力和惊悚故事给读者造成强烈的感情冲击。

在故事模式方面，般吉姆用玛达吉妮为主人公，通过她同恶人(拉贾摩汉、马杜拉、强盗)的周旋、对抗、获救而展开故事，利用她的经历带给读者冒险体验。般吉姆为了贴合印度社会情况，将哥特小说中常见的“兄弟相残”主题设置为兄弟遗产(土地)之争，马杜拉勾结强盗企图用暴力从马德乌那里获取不属于自己的遗产，利用人性的恶、贪婪所造成的冲突、仇杀等情节制造出悬疑、恐惧等叙事效果。英国哥特小说讲究用复杂的情节造成悬念以吸引读者，同样，般吉姆利用小说章节安排、叙事策略造成故事悬疑性。如“深夜密谋”(Midnight Plotting)一节的结尾处，玛塔吉妮听到丈夫和强盗的密谋后，般吉姆写强盗们“各自出发去远处的树林，在另一黑暗处再次聚合。玛塔吉妮惊恐、愤怒地瘫坐在地上。”[4](P36)读到此处，读者们在担心马德乌安危的同时，也好奇玛塔吉妮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黑暗的树林”也暗示着危险的环境，让读者又增加了一份紧张感。在“情敌之间”(Between Rival Charmers)一章中，玛达吉妮虽然得到塔拉救助，暂时寄居在她家里，拉贾摩汉上门寻找妻子，塔拉只好让玛达吉妮回家，在章节结尾处，作者写道：“玛达吉妮被告知必须离开，她想到面临的命运时，她的血凝固了。”[4](P88)尽管读者们都知道玛达吉妮回家后可能的后果，仍然不免担心她的命运。但在随后的一章中，作者转而去写马德乌的情况，延迟解除读者的悬疑，以增加情节张力。

尽管拉什迪(Salman Rushdie)认为《拉贾摩汉的妻子》是“不完善的、低劣、夸张的东西”，但它仍是“一部节奏合理的惊悚小说”[6](P29)，是一部经过印度化加工的哥特式惊悚小说。时至今日，在印度，英语言情小说、哥特惊悚小说、侦探小说、史诗传奇等类型小说拥有大量读者，这些流行小说也像《拉贾摩汉的妻子》一样，成功地用国外类型小说的“旧瓶”装入当代印度社会、经济、文化新发展的“新酒”。印度英语琪客小说(Chick Fiction)《为比图拉而战》(*Battle for Bittora*)中，女主人公从加拿大留学回来后，被身为地方政党领袖外婆定为接班人参加竞选。小说描写了印度大选中各种常见的争夺选票的方法，不啻于一本印度大选教科书。

(三)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形象

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重点在于现实主义描写和塑造复杂的人物”[7](P39)，维多利亚时期现实主义作品成为小说主流，作家们有着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作为创作基础，他们笔下多为与常人较为接近的人物，表现他们在生活中的争斗算计，以新奇的故事带给读者更多快乐。另一方面，小说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叙述方法逐渐成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占主导地位，米勒将此手法称作“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标准常规”[3](P63)。在第三人称叙述基础上，叙述方法更加多样化，作家能充分、自由地对故事背景、细节等进行周密、全面的描写，以便能创作出深刻、复杂和全面的现实主义小说。

印度传统文学以两大史诗、神话传奇为主，讲述社会历史中帝王、神仙的故事，很少涉及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早期印度英语小说“采用18、19世

纪英国小说的模式，尤其是笛福、菲尔丁和司各特的小说”[8]（P107）。英国小说的描写对象开阔了印度英语作家的写作视野，也让他们转而开始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19世纪以来，印度史诗、诗歌、戏剧等传统文学形式在表现社会发展方面已有很大局限性，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适用于表现印度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通过作品中现实主义描写向广大印度民众暴露英国殖民统治的黑暗，起到教育、唤醒民众的作用。般吉姆敏锐地把握到英国小说的创作倾向，在《拉贾摩汉的妻子》中，通过描写新旧两种人物形象、人物关系突出了小说的现实意义，使读者得以了解英国殖民统治下人们新型的生活、生产和贸易方式等。

般吉姆在人物塑造方面吸收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经验，人物形象具有典型化、类型化特点，如男主人公马杜拉的性格贪婪，拉贾摩汉则是凶狠、邪恶，玛达吉妮是纤弱、善良的女性。同时，般吉姆还结合当时印度社会现状，将人物身份印度化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人物所蕴含的深层意义，让他们象征着殖民统治下经历变化的印度人，小说中男女形象塑造成新、旧两种类型，通过塑造新型“印度人”，以人物明确突出的形象和鲜明的性格来表现印度社会、印度人的变化。

《拉贾摩汉的妻子》中，两位男主人公马德乌、马杜拉分别代表新旧两种印度人（地主）。在“两兄弟”（The Two Cousins）一章中，般吉姆从相貌、穿着、行为举止等方面详细地描写马德乌、马杜拉两人间的差异。马杜拉身材肥胖，衬衫紧绷裹在身上，他浑身戴满金吉祥符、金项链、金纽扣等金质饰物，手指上还戴满戒指，这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印度地主形象。马德乌则相貌英俊，衣着得体却不奢华，只戴了一只戒指，并没有其他饰物。马德乌和马杜拉与祖辈看似一样，都要照料一个大家庭，但“新”“旧”两位地主的家庭氛围却大为不同。小说分别用两章从不同角度描写他们两家的生活情况：马德乌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妻儿，家里还有寡居的婶婶和其他拐弯抹角的亲戚，人多但不杂乱，人人各司其职，家庭事务井然有序；马杜拉家里除了各种亲戚外，还有他的两位妻子，尽管塔拉很贤惠，马杜拉的小妾仍然会找出各种理由挑起明争暗斗，造成家庭矛盾。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新、旧印度大家庭的对比，从侧面展现了印度社会的变化。由于马德乌在加尔各答接受了西式教育，他在那里还有生意。马杜拉认为马德乌说的所谓生意，不过就是骑着新买的马、坐着新马车，在城里到处游荡，和英国朋友喝酒享乐、挥金如土，他认为西式教育、“喝点洋墨水就让兄弟变成热情的老爷（sahib）了。”[4]（P10）“sahib”来自阿拉伯语，在印度的乌尔都语、马拉提语、孟加拉语等地方语种里都有这个词语，它还成为英语外来词，指的就是在印度（英国殖民地）的英国人和欧洲人，后来，它也指那些受过西方教育、在殖民政府工作的印度人。被“老爷”化的马德乌表面看来是被英国教育改变了，实则是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人、印度社会潜移默化改变的具体表现。除外貌上的差别外，马德乌和马杜拉“新”“旧”印度地主在本质上的区别，还体现在两人对待女性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路遇外出取水的玛塔吉妮时，马德乌没有过多打量她，更没对她评头论足，而马杜拉却向他打听玛塔吉妮，还借机向马德乌打听其他女性。同样，马杜拉这样的旧式地主才会为霸占遗产去勾结强盗做出抢劫、绑架的行径。最后，强盗受到法律惩罚，马杜拉自杀了，毫无疑问，他如果不自杀，也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位老式地主用陈旧的方式获取利益的做法失败了，他的结局也表明新制度、新规则已经形成并发挥起作用。如果说马杜拉象征着传统的、父权制的、暴力的旧势力，马德乌则是理性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印度人，这也正是般吉姆所肯定、宣传的新印度人形象。

《拉贾摩汉的妻子》中玛塔吉妮、塔拉等女性形象具有鲜活，同样也象征着“新”“旧”人物类型。在玛塔吉妮身上，“新”（品格）“旧”（外表）兼而有之。玛塔吉妮并不缺乏印度传统女性之美，她在外貌上符合对女性传统的审美标准：脸庞圆润，相貌端庄；她性格温和，恪守妇道，像其他女性一样待在家里，轻易不出院门。但在温顺的外表下，玛塔吉妮却有显示出不屈的个性：她不顾危险，只身深夜报信，还大胆向马德乌直陈爱意；马杜拉囚禁她、不给她食物，她并没屈服，反而将此当作反抗方式。玛达吉妮的行为有着多重意义：第一，维护正义。即使是自己的丈夫做出不法行为，她也大义灭亲，不姑息。这种建立在西方法律意识上的是非观，和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正法”（Dharma）观有类似的地方，玛塔吉妮不唯夫命是从，也维护了印度人所坚持的正法；第二，敢于行动。她为了亲人、爱人的安危，毅然踏出家门，除了显而易见的危险外，她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对丈夫的背叛，她的婚姻、家庭因而岌岌可危；第三，维护女性尊严。她在走投无路之际，既没求助于不敢面对自己感情的马德乌，也不屈从于乘人之危的马杜拉，最终回到父亲家里，独自面对行动

后果。在般吉姆笔下，玛达吉妮是立体的“人”，她不再是印度传统女性悉达、沙恭达罗那样哭啼着向男性求助的女人，在她同样美丽的外表下，蕴含着新女性独立、勇敢和坚强的个性，“在所有印度英语小说中，很少有女性像玛塔吉妮那样打动我们，……她的勇气、独立和热情，不仅是她个人特点，也是形成中的印度民族的特点。”[2]（P100）尽管塔拉的形象着墨不多，但也个性突出。她和玛达吉妮一样，背叛行为不端、不义的丈夫，支持正义。在家庭事务上，面对丈夫宠爱小夫人的做法，她心里失望的同时，却努力维持家庭和睦，不和小夫人发生冲突。面对有家难回的玛塔吉妮，她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被丈夫赶出家门的玛塔吉妮肯定做错了事，她以同情、仁爱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妥善安置玛达吉妮。

般吉姆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新”“旧”两种印度人，既写了像马德乌这样新兴的印度中产阶层，表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现代精神和理性意识。小说也塑造了落后、守旧的地主马杜拉，通过他揭示人性中对财富、美色的贪欲。小说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形象，侧面表现了19世纪印度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人和事，向读者展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的印度。

般吉姆说过：“模仿是进步的法则，没有借鉴，谁也不能取得进步”[2]（P87），可以说，他就是在借鉴、模仿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拉贾摩汉的妻子》。小说从文本结构、叙事元素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英国小说的影响因素，正是般吉姆的尝试才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引入印度文学，促使印度各地方语种的作家纷纷开始小说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小说已经更多地被印度读者所熟悉，印度英语小说（和其他语种小说）担负起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鼓动作用。般吉姆“洋为印用”式的写作态度和写作实践，为其他印度英语作家开拓写作思路、写作技法指出可行之路。今日的读者再次阅读《拉贾摩汉的妻子》时，在感受般吉姆所营造的惊险、浪漫的故事氛围之外，也可以了解印度英语小说的发展、变化的脉络。

参考文献：

[1] Ghosh, Amitav. “The Match of the Novel Through History” [J]. *The Kenyon Review*, Vol.20 No.20（Spring,1998）

[2] Paranjape. *Makarand R.. Making India* [M]. New Delhi: Springer, 2013.

[3] 申丹,韩加明,王丽娅.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Chatterjee. *Bankimchandra. Rajmohan's Wife* [M]. New Delhi: Ravi Daya Publisher, 1996.

[5] 宁晓慧. 英国哥特体小说研究 [D].山东大学,2005.

[6] Priyamvade, Gopal. *The Indian English Novel*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Amigoni, David. *Voctorian literatur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8] Naik, M.K.. *A History of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M].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62.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Elements of British Fiction in *Rajmohan's Wife*

ZHANG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China)

Abstract: *Rajmohan's Wife* is the first Indian novel in English. This novel is published in the way of serialization and borrows Gothic elements to make it attractive. It depicts the new Indian middle class and their real lif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xt components, Indian-Gothic fiction elements and realistic characters in the fiction. It also analyzes the use of British fiction's elements and their function in *Rajmohan's Wife*. It points out that *Rajmohan's Wife* is crea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ritish fiction. By learning and copying the western writing skills, the novel successfully introduces the "fiction" form into Indian literature, which has enlightened the creation of future Indian novels in English.

Key words: *Rajmohan's Wife*; Indian novels in English; novels of the Victorian Age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中的异国形象

张 婧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游记作品，以印度为主的西域各国作为“异国”和“他者”被观察和记录。玄奘对佛教的信念和尊崇决定了他对异国进行观察的角度，更影响了其对异国形象的态度；相应地，异国形象也为玄奘的诉求表达提供了论据支持。另一方面，玄奘先前经由佛教积累的异域认知使其摆脱了传统文化思维的限制；但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玄奘对异国文化一定程度的误读。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玄奘；异国；印度；佛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57-06

《大唐西域记》[①]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名著，它的作者是初唐的三藏法师玄奘。玄奘（600—646）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出生于儒学世家。幼年跟随次兄长捷法师于净土寺学习佛经，隋大业八年（612）正式出家。《全唐文》卷九百六《还至于阗国进表》记载，贞观三年（629年）[②]，玄奘“结侣陈表”未果后，于四月孤身“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玄奘在西行的途中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印度，初于那烂陀从戒贤法师受学，后游学印度各地，与各地、各派学者论辩，名震五天竺。贞观十七年（645）玄奘完成西行壮举回到长安，请回佛像、佛舍利数百件，梵文原典六百五十七部。归国后，应唐太宗之请，玄奘将西行的所见所闻进行口述，由辩机笔录，撰写了十二卷本的《大唐西域记》。在这部十余万字的“奇书”中，玄奘根据自己赴印度求法取经过程中的见闻经历，对广义上被称为西域的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南亚等一百三十八国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实的记录，内容涉及地理气候、宗教政治、农业物产、衣饰饮食、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佛教的圣迹、传说和现状作了详实的观察和记载。《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极为重要的佛教史、民俗史文献，为研究上述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提供了权威可信的史料，其宝贵的精神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就体裁来看，《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游记作品，以印度为主的西域各国自然就作为“异国”和“他者”被观察和记录。按照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描述：“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1]（P155）因此，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并非对西域诸国历史现实的简单复制，西域的信息借由玄奘的主观视野进行选择、加工甚至想象，来作为异国的成分被描述；另一方面，异国形象由于受到集体想象的制约，创作主体所接受的社会历史文化也由此成为这一集体文化想象的投射物。本文拟就《大唐西域记》所创造的西域形象为主要对象，考察《大唐西域记》中的“他者”与“异域”是如何被描述，它们与“自我”和“本土”之间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

一、主观投射与异国形象的“塑形”

隋唐以降，佛教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与儒道二

收稿日期：2018-0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印度文学中国20世纪传播史”（13CWW15）

作者简介：张婧（1988-），女，天津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博士生。

①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②一说贞观元年（627年）。

家一起，共同建构着中国本土的文化形态。然而初唐时期，佛教在经历了隋末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后，其发展受到阻碍，加之李唐一朝宣称乃老子李耳之后代，佛教便在与道教的竞争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早在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的《请除佛疏》请求全面灭佛，开启了唐代抑佛的先河；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渊颁布《沙汰僧道诏》，精简寺院和道观，虽然此举未实施，但唐高祖确曾指出："比年沙门，乃多有愆过，违犯条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国利化，翻乃左道是修。"[2]（P459）贞观初年，朝廷下令"有私度者处以极刑"[3]（P1078）。唐太宗李世民"实不以信佛见称"，其"护持正谛"之举"皆具有政治作用"[4]（P12-14）。可见，唐代初年，佛教并未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已通晓各部、造诣日深的玄奘有感于彼时"名流先达，部执交驰，趋末忘本，摭华捐实，遂有南北异学，是非纠纷"，又担心"传译踳驳，未能筌究"（《大唐西域记》序二），故产生了西行求法之念。玄奘此行不仅从天竺取来了大量"真经"，归来后更"专务翻译，无弃寸阴"[5]（P158），可以揣测，玄奘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弘扬佛法，推动佛教在中土的声望，而客观上他也确实为佛教的发展和佛教地位在中国的提升做了极大贡献。

因而从玄奘此行的目的看，他前往印度求法取经这一初衷本身就决定了《大唐西域记》是以出家人的视角，记录以佛事为主的见闻。同时，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和在中土弘扬正道的源头自然激起玄奘的向往和期待，这也预设了《大唐西域记》对印度相关记载的情感基调是正面、褒扬乃至神往的。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西域大小一百三十八国的记述除了当地的地理地形、气候条件、社会状况、人民性格、风情民俗等方面外，对诸国的观察基本遵循以下模式：（一）记载当地佛教寺庙（包括外道天祠）、佛教徒的数目以及信仰大小乘的情况；（二）对寺庙、佛塔、佛像、佛教遗迹、圣物等外在情况和衍生出的典故加以描绘；（三）追忆古昔，对佛教圣徒的伟大事迹和佛典故事进行阐释；（四）介绍礼佛、事佛、推动佛教发展的国王（包括反对佛教的国王）的事迹和历史传说；（五）记录佛教大事及法事仪式。从玄奘的记载中不难看出，玄奘访印时，佛教已经在走下坡路，印度国内佛教已大小乘并存、部派林立，很多佛迹已经衰败，佛教正在逐渐失去内聚力；相比之下，印度教等"外道"的发展却呈上升势头。而玄奘只把目光聚焦在了佛教及相关的遗迹、人物、历史和现实事件，对佛教以外的内容则采取了"非所详记"的策略，这使得《大唐西域记》本质上是一部对佛教的"巡礼"之作。

玄奘对西域诸国的主观印象还可通过《大唐西域记》诸地人民性格的评价用语窥知一二。玄奘对途经西域各国及其人民的印象分为几个层面：印度以外对佛教信仰较为淡漠的国家，玄奘的评价语均显得十分负面，如"人性犷暴，俗无纲纪，不知罪福，不尚习学"（安呾罗缚国），"风俗犷勇，忍于杀戮，务于盗窃，不知礼仪，不识善恶"（尸弃尼国），"俗无法度，人性暴鄙，多不营福"（屈浪拿国）；对印度以外崇信佛教的国家，玄奘的态度多是批评中带有褒扬，如商弥国人民"俗无礼义，智谋寡狭，伎能浅薄"，却"人性淳质"，揭盘陁国人"俗无礼义，人寡学艺"，"然知淳信，敬崇佛法"。而在印度，玄奘的态度则明显地"中""边"有别，其对中印度人民的直观感受绝大部分采用了如气序和畅，风俗淳质，风俗善顺，笃学好福等美好的词汇，即使是崇信外道或异道杂居的小国，如窣禄勤那国、羯若鞠阇国等，仍旧持欣赏和积极的态度；中印度以外的地区，玄奘的看法有褒有贬，突出了边地人民的地区特色，用语较西域国家总体显得更为宽容一些。玄奘的各类评价当然是根据他与当地居民接触的直观感受写成，但其对中印诸国近乎一致的评价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戒日王统治下的中印度是当时印度的佛教中心，是受佛教影响最直接、最深入的地区，当地人民可以广泛而深入地接受佛教洗礼，因而在玄奘的认知中，自然更相信也更愿意看到当地人民教化良好和性格温和的一面，因为这符合玄奘此前从佛教中获得的对印度的想象。尽管事实是，佛教在中印度已经显出颓相，很多中印小国的外道规模甚至超过了佛教，这在玄奘的记述中亦有体现。另一方面，佛教思想中以"中国"（即中印度）为优，以"边地"为劣[6]，这种偏见在《大唐西域记》中也得到印证："详其文字……中印度特为详正，辞调和雅，与天同音，气韵清亮，为人轨则。邻境异国，习谬成训，竞趋浇俗，莫守淳风。"玄奘对印度之外乃至中印度之外部分地区的态度正与此观念吻合，因为这些地区远离佛教的中心，或其佛教是经由中印度的辐射影响才得以传播和发展，其文明程度当然不可与中印度同日而语，尽管很多国家彼时崇信佛教的程度甚至强于中印度。

可见，玄奘虽然没有完全以佛教美化当地人民并以此判断教化程度，但他所刻画的西域诸国

人民的形象确也受到了其主观的“塑形”。这种塑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了解当地自然环境和历史，对当地人民的看法也有了潜移默化的印象，如北马主以及突厥民族“气序寒烈”“寒劲宜马”，故多“人性犷暴”“风俗猛烈”，这些描述在北印度一些寒冷的地区也可找到。二是玄奘对以中印度为主的佛教圣地或其他虔信佛教的地区，选择的评价用语受到了佛教观念先入为主的影响，因此态度积极正面，较少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如中印度即今印度北方邦等地事实上在夏季气候并不宜人，玄奘却仍将中印度诸国一致地形容为“气序和畅”，其人民“风俗淳质”。这些描绘异域形象的语词如“人性犷暴”“风俗淳质”“气序和畅”等固定而先在地存在于玄奘的文化记忆中，它们相当于形象学中的“套话”，释放出了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了一个基本的、第一和最后的、原始的“形象”[1]（P159）。《大唐西域记》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是，玄奘对各国的印象虽随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很多词语却给人雷同之感，很可能的创作情况是，玄奘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特色，透过其视界中的“镜像”而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套话”，作为对特定地区和当地人民的描述。

总的来看，玄奘对西域诸国没有进行整体地、不加区别地考察，也没有对印度进行一味地歌颂，这体现了玄奘记录的客观性，然而几类“套话”的运用和组合确也透露出玄奘对于西域诸国印象“观念先行”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佛教大大衰落的情况下，以中印度为主的地区仍寄托了玄奘真挚的宗教理想，不管这份记录是否真实、客观，至少它与玄奘对印度佛教的期待相重合。这样，以中印度等为代表的地区经由玄奘这一“自我”的投射，变为了符合玄奘先有概念的“他者”。

二、主观意图与异国形象的变形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结束了西域之行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同年二月，玄奘谒见唐太宗。简单寒暄后，唐太宗“广问彼事”，将“自雪岭已西，印度之境，玉烛和气，物产风俗，八王故迹，四佛遗踪，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的这些西域诸事一一问予玄奘，玄奘“记忆无遗，随问酬对，皆有条理”。随后，玄宗即提出“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5]（P129）一年后，《大唐西域记》完成。玄奘深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7]（P178），由此《大唐西域记》除了以“礼佛”为主，其写作与构思也彰显了玄奘对统治者政治意图的洞察及对唐王朝意识形态的把握。

《大唐西域记》开篇的《序论》中，玄奘即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纪，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玄化滂流，祥风遐扇，同乾坤之覆载，齐风雨之鼓润。与夫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玄奘进而表明，自己虽然游历西域各地，但各地皆沐浴于朝廷的教化之中：“越自天府，暨诸天国，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此部作品正是根据自己的见闻，弥补之前文献的空白，以载述“化洽”的具体体现。

玄奘的上述表白阐明了自己臣服于李唐王朝并愿意为之服务的政治立场。由于《大唐西域记》最终要呈给玄宗，因而其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也须投合统治者的心意。初唐时期，李唐王朝与突厥之间矛盾不断。突厥自隋代起分为东、西两部分。贞观三年，东突厥为唐朝所灭，而西突厥从原来与唐一道共同对抗东突厥的盟友转而成了唐最大的威胁。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传》记载，彼时“勇而有谋，善攻战”的统叶护可汗怀有统一漠北和西域的雄心，在其领导下西突厥已“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西戎之盛，未之有也。”然而解除北方的威胁，统一西域亦是唐王朝的政治目标，因此贞观十三年（629），唐王朝和突厥爆发了高昌之战，随后的焉耆、处月争夺战拉开了唐、厥战争的序幕。贞观二十二年（648），李唐王朝获得胜利，占领了西突厥，建立安西都护府及安西四镇，按东、西突厥固有的两厢分治格局下设昆陵、濛池二都府，皆臣于安西都护府，使其内属于唐朝统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奘的西行之举在唐玄宗看来，为唐朝对战西突厥提供了一手的战略资料，而玄奘也深谙玄宗欲从其西域之行中获得的信息，因而《大唐西域记》诸国无一例外地记载了所到之国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农业作物乃至政治环境等信息。如玄奘称焉耆（阿耆尼国）“四面据山，道险易守”，龟兹（屈支国）“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飒秣建国“凡属诸国，此为其中，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强马盛，多诸赭羯”，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情报。同时，玄奘将从属于突厥的国家以及有无国王的情况特别标明，如素叶水城“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

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睹货逻国故地“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皆有利于朝廷在与突厥的争夺中获取主动地位。不仅如此，《大唐西域记》中所载西域诸国包括语言文字、民风民情、农业作物等详实的信息更为唐帝国战胜后治理该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玄奘的总体记述绝不仅仅是服从政治需要，其最终目的仍旧是弘扬佛法。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着重记载了阿育王（无忧王）、戒日王的伟大圣明，尤其是他们对佛教的尊崇、支持和推广。玄奘将距当时近一千年的阿育王和当时统一北印的君主戒日王挑选出来加以特别介绍，将其塑造为虔诚敬佛的君王形象。特别是在与戒日王有了亲身、直观的交往体验后，玄奘的记述显得更加令人信服，戒日王在其描述下成了一位理想、完美且对佛教事业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君主。玄奘写道，还未登基的戒日王在臣子极力推举，仍深感无力承担王位的重任后，“即至菩萨像前断食祈请”，菩萨“感其诚心”，告曰：“汝于先身，在此林中为练若苾刍，而精勤不懈。承兹福力，得此王子。……尔绍王位，宜重兴隆，慈悲为志，伤愍居怀，不久当王五印度境。”在玄奘的笔下，戒日王不仅前世生为比丘，今生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佛法，由此得以征服全印度。而事实上，受家族影响，戒日王早年是一个印度教徒，虔诚地信仰湿婆，至其统治后期才转而皈依佛教。且戒日王在任内效法了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宽容的宗教政策，将佛教和印度教并举，并非独尊佛教。玄奘的记录写道，戒日王“每于行宫日修珍馔，饭诸异学，僧众一千，婆罗门五百”，可见其在行宫中同样宴请婆罗门，只是对于佛教徒更加偏重而已。戒日王对佛教的扶持尽管有个人信仰的因素，更多的却是通过佛教推进、契合其政治上的统治策略，而玄奘却将戒日王对于佛教的推崇进行了美化，夸大了其由于重视佛教所获得的“光环”。相对应地，玄奘在谒见戒日王时，着重称颂了唐玄宗的丰功伟绩，随后指出玄宗“爱育四生，尊崇三宝”而使得唐土“国用有余，氓俗无究，风猷大化”。玄奘将对实际上并不重视佛教的玄宗也比作了礼佛、事佛的一代贤君，将其与戒日王互加关照，从而突显了推行、支持佛教对于国家统治和人民教化的重要意义。玄奘将戒日王的贤德程度与玄宗并举，以及将戒日王直接统治的国土描绘为近乎乌托邦的面貌也是向玄宗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希望佛教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在中国本土发扬光大。可见，《大唐西域记》所描绘的西域形象遵从了“政治先行”的写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异国的元素被用来支撑与宣扬玄奘希望弘扬佛法的用意。

三、文化观念与异国形象的误读

《大唐西域记》中提到，印度自古认为赡部洲有四主：南象主、西宝主、北马主和东人主，其中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人主之地“风俗机慧，仁义昭明”，三主之俗，以东方为上。但崇信佛法的玄奘在肯定东方人主之国即中土在文化上的优势后，又进一步指出：“人主之地，南面为尊”，进而客观地分析中国和印度在文化上各自为尊的理由：“至于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规之仪，人主之地无以加也。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象主之国其理优矣。”自周代起，华夷观念就已产生；春秋时期，华夷有别、华尊夷卑的思想渐入人心；至李唐一朝华夷有别的观念仍自上而下地被继承下来。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作为创造异国形象的“自我”一方，肯定“本土”中华文明的地位和进步程度似无可厚非，但在他看来，印度和华夏文明同样出色，只不过形态有异。值得注意的是，从玄奘上述的描述中，他头脑中的中国并非居于中央，而是位于赡部洲以东，这就大大有别于中国人有关“中华”与“四夷”的集体认知。诚然，这体现了佛教对玄奘思想的影响，但玄奘没有以“华”的身份和大国心态去“俯视”西域诸国，而是深入各地，客观记录，因而《大唐西域记》的价值也体现在，玄奘的记载是基于一个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跳脱出中华文化传统形塑下带有集体文化认知偏见的“自我”对西域各国的观察。

然而，玄奘既生长于中土，自幼又深受儒、道文化熏陶，因而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本土文化思维方式的制约。《大唐西域记》卷二起首的“印度总述”中，玄奘对印度这样介绍道：“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之名，来自 Sindhu 一词，Sindhu 本义是河流，特指印度河。“‘印度’（Hindu）不是一个本地的词汇，而是来自‘河流’（Sindhu）一词，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波斯人（公元前四世纪）以及阿拉伯人（八世纪）用它指曾经居住于次大陆西北部那条大河附近的所有人，这条河流现在在当地还以‘信度

河'(Sindhu)闻名,欧洲称为印度河(Indus)。"[8](P30)可见,"印度"是外来词汇,同样也是来自"他者"的命名,而非本地人"语其所美"的称谓。对于中国来说,滥觞于两汉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以及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得以认识印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人员往来密切,高僧法显在印度北部、中部、东部,最后一直南下直通斯里兰卡(狮子国)的天竺之旅更拓宽了中国对印度国土的认识。可以说,至玄奘时,他对印度的认识超越了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人乃至后世8世纪的阿拉伯人对印度即为印度河流域的认识,由于佛教在当时的广泛传播,他脑海中的印度已经与现今南亚次大陆的版图相差无几。

与中国不同,印度在历史上往往分大于合,七世纪以前,只有阿育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戒日王朝和前代的笈多王朝一样,仅仅称霸于德干高原以北以恒河流域为核心的现今北印度地区,且戒日王治内的国家很大一部分并未被归并,只是臣属于戒日帝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戒日王的帝国是由几个强有力的独立君主组合而成,出于对戒日王个人的崇拜,他们才承认戒日王的宗主权,对帝国表示服从。"[9](P97)《大唐西域记》中玄奘所看到的印度小国林立,北印、中印、东印、南印、西印度分裂得十分细碎,玄奘也明确指出了印度"随地称国,殊方异俗"的现象。然而,在玄奘的理解中,印度虽然文化上并非铁板一块,但在领土上却是一个整体,全印被分为五个区域,内部共有七十多个国家。在写到戒日王时,玄奘称其"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断生命,有诛无赦。""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可见,在玄奘看来,五印度全境即为戒日王所统治,尽管诸小国各自为王,但中央政权仍由戒日王把握,各小国向其称臣。

与"五印度"的概念相对应,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礼记·王制》中就有"五方之民"的说法:"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按先秦时期的划分,"中国"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但这种"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观念对后世华、夷的划分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其具体所指不同的朝代有所不同,而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和由东南西北的各边疆民族组成的五个区域的概念却延续了下来[10]。至唐朝时期,随着疆域的发展和扩大,对周围的边疆民族或采取"羁縻政策",或使之接受唐朝册封,与之保持臣属关系,这二者构成了以中原地区受唐朝直接统治为第一层次之外,唐朝疆域统治策略的第二和第三个层次[11](P119-122)。自唐朝开始,中国与夷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中国,天下本根,四夷尤枝叶也"[12](P3911-3912)的状态。由此,"五印度"似乎与中国的"五方之国"在玄奘那里得到了奇妙的对应。正如玄奘在序中所说,唐玄宗"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以致"幽荒异俗,绝殊异邦,咸乘正朔,俱沾声教",周边的国家都对其称臣;而作为"南象主"的国君,戒日王的统治模式则在《大唐西域记》中表现为与玄宗类似,即以中印度为核心,其统治也辐射了"五印度"各地,且其治下的中印度由于佛教的影响,文明程度最高,这恰与玄奘对玄宗的描述一致。

秦汉建立统一帝国后,"中国"用来命名一个政治实体,指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权力所及的整个区域。虽然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但"中国"不会随王朝而结束,它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的形式延续下去[13]。玄奘与戒日王的对话颇能窥知玄奘对此问题的看法。戒日王在得知玄奘来自的大唐国即为"摩诃至那国"后问道:"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大唐国者,岂此是邪?"玄奘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印度自古将中国称为摩诃至那或至那,从上述的对话中,戒日王没有分清"秦王天子""秦王""大唐国者"和"至那国王"的区别和联系,并不知道唐太宗继位前被称为"秦王","至那国王"只是其脑海中对中国皇帝的一个笼统的称谓。"至那"一词源自梵文cina,依照玄奘的理解,"至那"与汉语的"秦"是对等的,即指秦朝。因而玄奘解释道,玄宗"御极则天,乘时握纪",做了现任君主;而戒日王口中的"至那"是前王秦始皇的国号,但前王仅是中国的前任统治者而已,玄宗顺应了天道,接过了中国的统治权,中国的政治实体没有变,只是国号改为了大唐而已。以这样的思路推演,玄奘眼中的戒日王也是接过了前朝君主的统治权,继续对他所理解的"印度"这一个地理和政治的实体进行治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大唐西域记》卷第四中,玄奘游历北印度境的磔伽国后写道:"数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逻矩罗。都治此城,王诸印度。"其"宣令五印度,继是佛法并皆毁灭,僧徒斥逐,无复孑遗"。据考证,此摩醯逻矩罗之父为白匈奴的首领,曾率白匈奴人从旁遮普进军,征服了包括今拉贾斯坦邦、部分中央邦、北方邦以及克什米尔等印

度北部、西北部地区。显然，按照玄奘的说法，摩醯逻矩罗与戒日王一样，曾“王诸印度”，即与戒日王一样是五印度的君主。按照传统中国的国族意识，戒日王是前者在五印度的继任者。然而，印度并无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这种内在的传承逻辑，且不说摩醯逻矩罗与戒日王的统辖范围并不重合，他们本身其实只是成功进入印度北方平原并实行统治的不同民族的其中两个首领，更不用说他们同时都是“五印度”的统治者了。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观念中，王朝国家认同占据了绝对地位，政治认同大于其他任何形式的认同，因而印度突出的族裔差异也只得到了“殊方异俗”的解释而没有引起玄奘的怀疑和警觉。如此说来，正是中华传统中大一统的文化观念造成了玄奘对印度总体上由戒日王继承和控制的误读和想象，玄奘对异国印度的认识也通过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成为了中国中央集权政治认同的投射物。

和多数外国游记一样，玄奘西域之行中所描绘出的异国形象呈现出“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互相关照、互相映射的形态。玄奘对佛教的信念和尊崇决定了他对异国进行观察的角度，更影响了其对异国形象的态度；相应地，异国形象也为玄奘的诉求表达提供了论据支持。另一方面，玄奘先前经由佛教积累的异域认知使其摆脱了传统文化思维的限制；而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玄奘对异国文化的简单对应和一定程度的误读。从这个角度看，《大唐西域记》作为一部游记作品，对异国尤其是印度文化的观察、解读乃至误读仍可作为玄奘所推动的中印文化交流乃至当今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后世了解历史、认识西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彦琮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上卷）[A].高丽大藏经67[M].北京:线装书局,2004.

[3] 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5] 慧立,彦悰撰.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 王邦维.佛教观念中的“众生”与“民族”[J].法音,2009,（9）.

[7]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8] Wendy Doniger, *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9] 潘尼伽.印度简史[M].简宁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10] 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

[11] 李大龙.都户制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

[12]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 姚大力.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国家观念史的研究述评[J].原道,2010,（00）.

责任编辑：冯济平

Xuan Zang and the Exotic Images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ZHANG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s a book of travel notes where the western region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as "foreign lands" and "others". It was the fervent belief in Buddhism that determined Xuan Zang's perspectives on observing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m. Correspondingly, the exotic images also supported his expression of appe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vious recognition of the western land from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helped him break through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thinking; but the latter did lead to Xuan Zang'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xotic culture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Xuan Zang; foreign land; India; Buddhism

和刻本《事林广记》整理札记

闫 艳 齐佳垚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事林广记》是宋末元初陈元靓编纂的一部大型民间日用类书。其内容博赡庞杂，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它不同于传统的类书，其内容屡经增删抽换，故不同版本之间均有差异。现今常见的几种版本的《事林广记》均为影印本，且或多或少都有所残缺。因此，整理出一本适合学界使用的《事林广记》很有必要。然而民间日用类书的整理无先例可循，故依据当代古籍整理基本规范，结合古籍整理的实践，对和刻本《事林广记》的整理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事林广记》；古籍整理；版本；校勘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63-05

作为一部民间日用类书，《事林广记》有不同于其他类书的特点。胡道静先生说“它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包含着较多的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的资料，二是开拓了类书附载插图的途径。”[1]（P83）此外，《事林广记》本身收录的内容也具有重要的校勘学价值，对于校正传本古籍的讹误及脱漏意义重大。

《事林广记》一书的现存版本大约20种，主要包括元明刻本、各类抄本及和刻本[2]。现在我们通常只能看到少数本子的影印本，给阅读者与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对其中重要版本进行点校整理，为学界提供一部可资研究的本子。2011年，《〈事林广记〉整理》获得了全国高校古委会的立项资助，在点校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对该书的内容及特点逐渐形成了一些更直观的认识，下面以和刻本《事林广记》的《甲集》为例详细论述之。

一、底本及通校本之选择

以刊刻时间而论，《事林广记》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元至顺年间（1330—1332）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及西园精舍刻本，次为元后至元六年（1340）郑氏积诚堂刻本。现存明代的各种刻本、抄本，内容体例大体承袭元刻本，仅在具体的内容上有所增删。比较特殊的是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的元泰定本，即本文所称的和刻本。该本的类目和编排与目前所见的元刻本出入较大，非常引人瞩目。下表即以和刻本《甲集》的类目为纲，与三种元刻本进行对比：

和刻本	椿庄书院本	西园精舍本	郑氏积诚堂本
甲1 天文图说门	前1 天文类	前1 天文类	甲上 天文类
甲2 地理经国门	前3 地舆类 前12 农桑类 后7 文籍类	前3 地舆类 前12 农桑类 后7 文籍类	甲下 农桑类 己上 文籍类 癸上 地舆类

收稿日期：2017-12-19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高等校院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事林广记》整理”（1047）

作者简介：闫艳（1970-），女，陕西神木人，文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齐佳垚（1992-），男，河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续表

和刻本	椿庄书院本	西园精舍本	郑氏积诚堂本
甲 3 节令载记门上	前 2 节序类	前 2 节序类	甲上 节序类
甲 4 节令载记门下			
甲 5 律历气数门	前 2 历候类	前 2 历候类	甲上 历候类
甲 6 历代提纲门上	后 1 帝系类	后 1 帝系类	丙上 帝系类
甲 7 历代提纲门中			
甲 8 历代提纲门下			
甲 9 正统年运门	后 2 纪年类	后 2 纪年类	丙上 纪年类
甲 10 宋朝世系门	无	无	无
甲 11 京都城阙门	后 6 宫室类	后 6 宫室类	无
甲 12 挈壶昼夜门	前 2 历候类	前 2 历候类	甲上 历候类

说明：1. 和刻本以天干分为十集，每集卷数多少不一，共九十四卷；2. 椿庄书院本分为《前集》十三卷、《后集》十三卷、《续集》八卷、《别集》八卷，共四十二卷，部分内容有阙；3. 西园精舍本分为《前集》十三卷、《后集》十三卷、《续集》十三卷、《别集》十一卷，共五十卷，其中《续集》卷五——卷九阙，实存四十五卷；4. 积诚堂本以天干分为十集，每集分上下卷，共二十卷。5. 表中的“甲”“前”即诸本的集名，阿拉伯数字为卷数。

由类目表可以看出，和刻本与三种元刻本比较，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和刻本与元刻本类目分合差别较大：如和刻本“地理经国门”的内容在元刻本中分属“地舆、农桑、文籍”三类的类目，而“节令载记门”（上、下）两个类目内容在元刻本中则归并为“节序类”一个类目，“历代提纲门”（上、中、下）三个类目的内容也在元刻本中统一归并到“帝系类”之下。

2. 有些类目和刻本有，但元刻本无：如《甲集》卷十“宋朝世系门”。

3. 三种元刻本之间类目相似度高，尤其以椿庄书院本和西园精舍本最为接近。积诚堂本在类目上无“宫室类”。

4. 从编排体例上，和刻本与积诚堂本类目数量相同，均为十集，且以天干为名，二者之间的版本关系值得追溯。

以上仅仅从类目比较而言，具体到书中的内容，和刻本与元刻本之间的相异之处更多，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择要举例：

1. 和刻本内容多于元刻本：如和刻本《乙集》卷一“燕京图志”、卷二“朝京驿程”，元刻本均无；

2. 和刻本内容少于元刻本：椿庄书院本、西园精舍本《别集》卷一、二，积诚堂本《戊集》卷上“官制类”，和刻本无；椿庄书院本《别集》卷五、积诚堂本《戊集》卷上“货宝类”，和刻本、西园精舍本无；元刻本的“节序类”“帝系类”等部分类目对和刻本相应内容有所增补和调整；

3. 和刻本与元刻本在相同类目下记载内容迥异：如和刻本《乙集》卷三“江北郡县”、卷四“江南郡县”分别记载了原金国和南宋的政区建置，椿庄书院本、西园精舍本《前集》卷四、积诚堂本《癸集》卷上“郡邑类”则记载了“至元二十年至大德初年的政区概况”[3]。

由是观之，诸版本《事林广记》的内容与编排不尽相同，概因在不断地刊刻和流布中，书坊根据其民间日用类书的性质，不断调整或增删抽换内容所致。其中和刻本刊刻时间虽晚，但其翻刻自元泰定本，保留了较多宋代的内容，因此它可能更加接近陈元靓原本的面貌。

综上，虽然和刻本与其他三种元刻本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从版本源流和内容归属的时间段方面而言，以和刻本为底本，三种元刻本作为通校本较为合适，通过版本对校以及利用史源文献进行他校，我们有可能发现《事林广记》版本演变的轨迹。

二、点校举隅

在《事林广记》的点校整理过程中，我们认为，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各版本异同流变，仅限于对和刻本的正讹补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将元刻本的

内容尽可能完整地补充进去，使之最大限度地便利学界使用和研究。因此本次点校整理，以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和刻本为底本，以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本（简称椿庄书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2005年影印北大图书馆藏元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本（简称积诚堂本）、日本内阁文库藏西园精舍本（简称西园精舍本）为通校本，将和刻本所无之内容依据三种元刻本补入，同时参校引文的史源文献正讹补阙。下文拟分四个方面提出本书的校勘原则，以求教于方家：

（一）凡和刻本相应类目所无之内容，悉依元刻本补入校勘记

如和刻本《甲集》卷一“太极图”之后：

> 《周子通书》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4]（P264）

椿庄书院本、积诚堂本与西园精舍本三种元刻本对此部分内容皆有所增补，且三种元刻本中以西园精舍本印刷质量最佳，故依据西园精舍本之将和刻本所缺内容依次补入校勘记，如：

> 未有天地之时，混沌如鸡子，溟涬始牙，鸿蒙滋萌。——《三五历纪》
>
> 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前律历志》
>
> 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沌而为一，是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即此太极也。——《易系疏》
>
> 太极，极尽之称。——《纪瞻传》
>
>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系》
>
> 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
>
> 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则天地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便是性，动静阴阳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义、礼、智、信，化生万物是万事。——《文公语录》①

（二）无论和刻本正文，还是补入元刻本之内容，在版本对校的基础上查考其史源文献并作为参校

如前文所举和刻本所引之《周子通书》，引自元代保八所撰的《周子通书训义》。今将和刻本与元刻本、《周子通书训义》相比勘，不难发现和刻本引文并不完整，其“四时行焉”后亦有遗漏文句，兹据元刻本、《周子通书训义》补入校勘记，如：

>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5]（P127）

又如前据元刻本补入《庄子》之句“在太极之下不为深”，“太极”，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大字本《庄子》、王先谦《庄子集解》均作“六极”，此处以按语的形式说明，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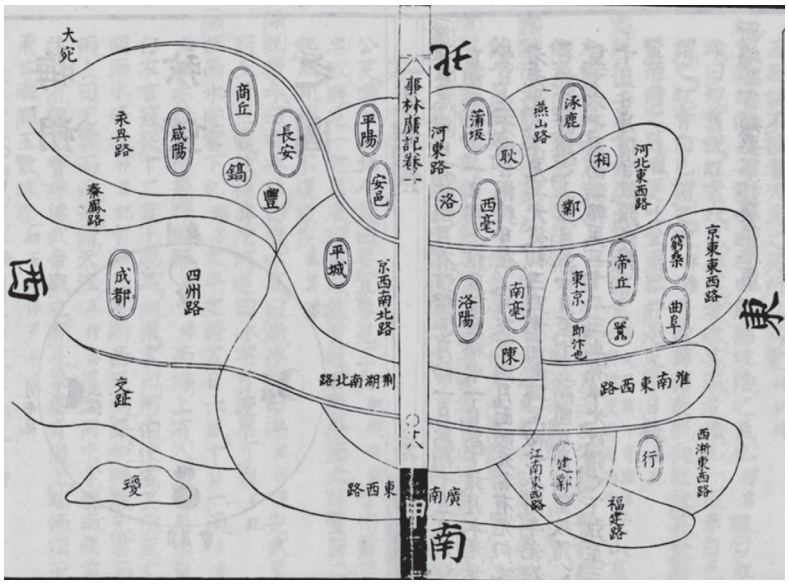
> 按：“在太极之下不为深”之“太极”，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大字本《庄子》卷三、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均作“六极”，则此处当作“六极”。

（三）对于书中图表的使用，以西园精舍本优先

《事林广记》诸本的图表存在差异。就印刷质量而言，元刻本中以西园精舍本最为清晰整洁，积诚堂本次之，椿庄书院本漫漶模糊之处较多。就相似度而言，西园精舍本和椿庄书院本最为接近。因此，笔者在校补的过程中，优先使用西园精舍本的图表，当西园精舍本与椿庄书院本、积诚堂本存在差异或内容缺失时，再以椿庄书院本、积诚堂本之图补入。如下图一为和刻本《甲集》卷二的“历代国都图”[4]（P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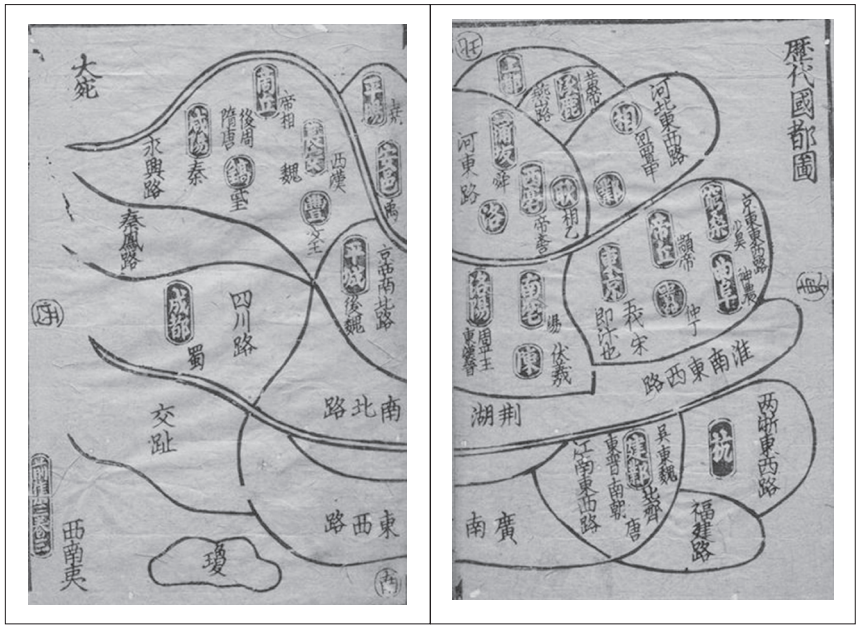
---

①引文详见［宋］陈元靓编：《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一“太极图说”，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本第一册、日本内阁文库藏西园精舍本第一册；［宋］陈元靓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甲集》卷上“太极图说”，中华再造善本2005年影印元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本第一册；等。



图一　和刻本《甲集》卷二的“历代国都图”

元刻本与此图略有不同，但三个版本基本上一致，故据西园精舍本补入，如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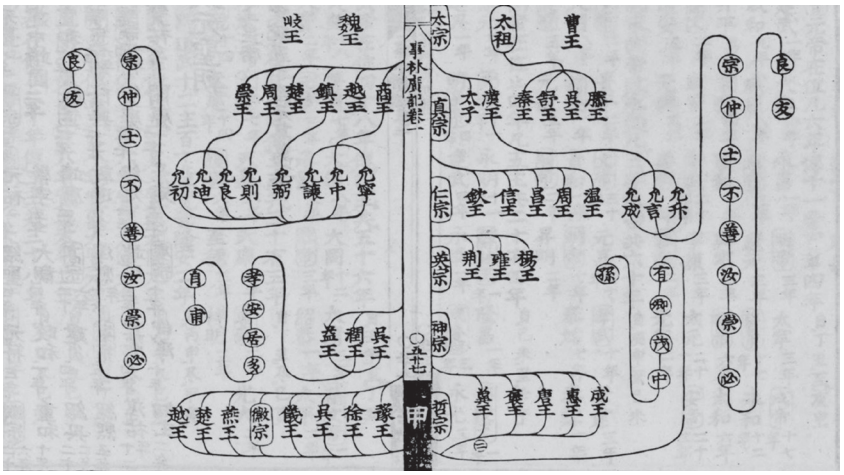
图二　西园精舍本的“历代国都图”

又如《甲集》卷六“历代门”有“历代图”，元刻本均无，但有“历代帝王传授正统之图”，实为“历代帝王表”，涵盖了从三皇五帝至宋恭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不包括辽、西夏和金）。由于此表篇幅较大，置于校勘记内会使校记冗长无比，故笔者将其附于校勘记之后，在此不再缀附。

（四）对于和刻本独有而史源难定的内容，依据相关史料文献参校

如和刻本《甲集》卷十“宋朝世系门”，收录的内容很多，包括宋代宗室的排行字辈、太祖至理宗“列圣纪年”、僖祖至孝宗“诸陵寝名”以及“皇帝御宝”（印玺）等。这些内容多与皇室有关。因此在整理的过程中，需广泛查考《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准确梳理其脉络。如下图三为“宋朝世系图”（局部）[4]（P292）：

此图涵盖了宋太宗至宋哲宗历代谱系及用字，然有误标之处：太宗之子，真宗之弟，楚、周、崇三王之子顺序误置。《宋史》卷二百二十四《宗



图三　宋朝世系图(局部)

室世系第十》记载:“太宗九子：长汉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次商王元份,次越王元杰,次镇王元偓,次楚王元偁,次周王元俨,次崇王元亿世绝。”[6](P6517)据此,则崇王绝嗣,不当有子。

又如,《宋史》卷二百三十三《宗室世系第十九》,楚王元偁有子二人：允庄、允则,周王元俨有子四人：允熙、允良、允迪、允初。[6](P7666-7714)故允则当连楚王,允良、允迪、允初当连周王。

以上是我们整理和刻本《事林广记》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与方法,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古代民间日用类书的整理研究成果仍然较少,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祈方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 胡道静.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解题[A].胡道静文集・古籍整理研究[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王珂.《事林广记》版本考略[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2).

[3] 刘兴亮:《事林广记》载元代西南地区政区资料探析[J]. 三峡论坛,2015,(6).

[4] 陈元靓编. 事林广记・甲集[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和刻本),1999.

[5] 保八.周子通书训义[M]. 续修四库全书:第93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脱脱等.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潘文竹

Notes on Collating *Shi Lin Guang Ji* of the Japan Block-printed Edition

YAN Yan　QI Jia-yao

(School of Art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Shi Lin Guang Ji* is a book recording daily folk life compiled by Chen Yuanliang in the late Song Dynasty and early Yuan Dynasty. It covers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t that time, and has very important value as historical data. Becaus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ype of books, its contents have been added, deleted and changed repeatedly, henc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Several of the most common versions of the book are photocopied and thus more or less mutila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a version suitable for academic use. There is no predecessor guiding the sorting of books on folk daily life, so in light of the basic norms of sorting out ancient books on the basis of contemporary norm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sorting out ancient book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bout collating the Japan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Shi Lin Guang Ji*.

Key words: *Shi Lin Guang Ji*; sorting out ancient books; edition; collating

《楚辞章句补注》引《尔雅》考论

窦秀艳 张 雨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洪兴祖在补注《楚辞章句》时，明引《尔雅》94例，其中13例与《楚辞》经、王逸注文字不同，此13例异文间大致可分为古今、假借、异体三种关系。通过对此13例异文与《楚辞》《尔雅》诸版本的历时性比较研究发现，《诗经》《楚辞》等先秦经典与《尔雅》渊源有自而又各有变化、互相影响，关系复杂。因此，可以说对诸《尔雅》传本中与《楚辞》征引文字异同的探析，同时也是探讨《尔雅》传本异文类型问题。对不同时期存世史料征引《尔雅》的全面深入考察，不仅有利于《尔雅》传本的异文研究，也将促进《尔雅》与先秦经典文字关系研究，为各时期汉语史词汇研究提供动态语料。

关键词： 楚辞补注；尔雅；古今字；正借字；异体字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8）03-0068-08

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号练塘，镇江丹阳（古称曲阿）人，《宋史》有传。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召试，授秘书省正字，负责南宋重建后的图书搜集、校勘工作，后为太常博士，掌定礼仪及教育，又担任驾部郎官、江东刑狱、真州知州等，廉能，有政绩，卒赠敷文阁学士。洪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著述甚丰，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续史馆故事录》《韩子年谱》《杜诗辨证》《论语说》《楚辞补注》《楚辞考异》约20种，大多散佚不存，仅《楚辞补注》（以下简称《补注》）传于世。

在洪氏《补注》之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简称《章句》）是《楚辞》注释研究史上最早、最完整、最重要的著作。魏晋以降，《楚辞》研究名家辈出，学骚、拟骚、注骚之作众多，楚辞学成为显学。然千余年来，学界对《楚辞》的内容歧解纷呈，各以为是。同样，受语言文字发展、刊刻流传、训诂征引等影响，《楚辞》经注文字也是异文纷呈，多有不同。南宋洪兴祖研治《楚辞》，作《补注》，首先正版本文字，对《楚辞》传本异文做了一番溯本清源的工作。据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楚辞考异》记载：“兴祖少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楚辞》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书成，又得姚廷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其末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于关子东、叶少协，校正以补《考异》之遗。洪于是书用力亦以勤矣。”[1]（P434）由陈氏《解题》可知，洪氏在校勘《楚辞章句》版本时，搜集《楚辞》版本近20种，又辑集诸本异文，撰成《楚辞考异》，该书保存了王逸以后至洪兴祖时代有关《楚辞》的大量异文与异说。《考异》一卷，最初与《补注》并行，后散逸不存，其部分成果散入《补注》之中，大致位于王注之后，洪氏“补曰”之前，约1700余例，以“A，一本B”的形式，表明《楚辞》传本文字的不同。由此可见，《补注》是在洪氏对两汉至南宋各种《楚辞》传本文字异同的严格考订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是立足于接近版本原貌又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原则上而做的严谨、科学的训诂工作。因此，《补注》成为宋以后研究《楚辞》文本最为珍贵的史料，最主

收稿日期： 2017-11-25

作者简介： 窦秀艳（1968-），女，吉林白城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雨（1994-），女，山东济宁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要的追溯《楚辞》版本文字异同的渊薮。

《补注》在厘清《章句》版本文字之后，广泛征引前人和当时人的研究成果，从文字、声韵、训诂、名物、史实等多方面对《章句》作了补充和笺正，可以说，文献征引是其注释的重要手段，所补注的内容都是以征引文献为依据来完成的。洪氏《补注》引用材料200余种，特别重视字典辞书的权威作用，征引《尔雅》《说文》《集韵》最多，有300余处，其中多半是引《尔雅》及郭注邢疏。

《尔雅》训释先秦经典词语，其中也收了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词语，并为之训释。王逸注《楚辞》，明引《尔雅》5例，用《雅》训260余例。郭璞注《尔雅》《楚辞》，多骚、雅互证。南宋郑樵据《离骚》"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2](P68)及《尔雅·释天》有"暴雨谓之涷"等语，不但认为"《尔雅》在《离骚》后，不在《离骚》前"，而且认为《尔雅》"专为《离骚》释"。①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更是广引《楚辞》经、注证《尔雅》之文。洪兴祖生活在庆历之后、南宋义理之学尚未风靡朝野之际，洪氏继承汉唐经学之遗风，重名物训诂，重视《尔雅》，以《尔雅》补释《章句》，揭示《章句》与《尔雅》的渊源关系。

洪兴祖《补注》②明引《尔雅》94例，引郭璞《尔雅注》近40例，引邢昺《尔雅疏》8例。《补注》引《尔雅》多直接征引，间或以"见《尔雅》""出《尔雅》"等形式表明王注用《雅》训。通过对《补注》所引《尔雅》94例文字与《楚辞》《尔雅》等古今传本的比较研究，我们从中提炼出13组比较有代表性的异文，并大致划分三类分别进行深入探讨，以祈求正于方家。

一、洪氏引《尔雅》与《章句》经注之文为古今字

此《章句》经注即指《补注》所用《楚辞》的经文和王逸的注文。所谓古今字关系，或是《尔雅》用古字，或是《章句》经注文用今字，反之亦然。

1. 罗 萝

屈原《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带女罗"，王注："女罗，兔丝也。"《补注》："罗，一作萝。补曰：《尔雅》云：'唐蒙，女萝' '女萝，兔丝'。"[2](P79)王注用《尔雅》、《诗》毛传训，《章句》经注皆作"女罗"，别本又作"萝"，洪氏引《尔雅》作"女萝"。

《诗·小雅·頍弁》："莵与女萝，施于松柏。"毛传："女萝，菟丝，松萝也。"孔颖达正义："《释草》云：'唐蒙，女萝；女萝，菟丝。'毛意以菟丝为松萝，故言松萝也。"[3](P481下)《诗》、毛传、正义及两宋《诗》学著作及其征引《尔雅》基本上都作"萝"，与《章句》不同。宋初徐锴《说文系传通释·草部》（述古堂景宋写本）作"罗"："莵，寄生也。从艸鸟声。诗曰：'莵与女罗。'"[4](卷二)道光十九年祁嵩藻据此本重刻，校改作"女萝"，当据通行本改；元杨桓的《六书统》、杨慎的《古音余》引《诗》，皆作"女罗"。可见，《诗》本有作"女罗"者。

《释文》、唐石经、《校勘记》、邵郝本、《校笺》皆作"萝"。③按，宋司马光《类篇》："蘿，艸名。《尔雅》：'蘿蒙，女罗。'"[5](P23下)明初宋濂等撰《洪武正韵·十四歌》："萝，莪也。又女萝，《尔雅》'女罗，兔丝'，字不从艸，俗加之。"[6](P113上)可见《尔雅》本又作"罗"。

"罗"，《说文》："以丝罟鸟也。从网、从维。"本义捕鸟的器具，作为艸名"萝"，借字为用，"萝"当为后起今字、本字。《章句》引《诗》、毛传、《尔雅》等，多迁就《楚辞》经文，改《诗》《尔雅》以从《楚辞》，洪氏以《尔雅》补充《章句》，不屈从辄改，从音义同的视角透过形体的藩篱，使《章句》与《尔雅》的训释相得益彰。

2. 夫芙 符苻 离篱蓠

刘向《九叹·愍命》"莞芎弃于泽洲兮"，王注："莞，夫离也。"《补注》："夫离，一作符篱。补曰：《尔雅》'莞，芙蓠'，注云'蒲也'。"[2](P304)王注用《雅》训，其经注皆作"夫离"，《楚辞》别本又作"符篱"，洪氏引《尔雅》作"芙蓠"。

今唐石经、单疏本、雪窗本、邵郝本、《校笺》皆作"莞，苻蓠"，无作"夫离""芙蓠"者。《校勘记》："苻蓠，按《玉篇》蔮下引《尔雅》曰：'蔮，夫蓠，其上蒿。'与《说文》同，知古本《尔雅》作夫，不作苻也。盖经作夫，注作苻，故郭云今江东之苻蓠。《释文》及今本经作苻，盖误。"[7](P410下)今《说文》："蔮，夫离也。"许慎用《雅》训，段注："见《释艸》。'蔮'，《释艸》亦作'莞'，'夫'作'苻'。"又，"蒿，夫离上也。"

①详见宋郑樵《尔雅注后序》："《尔雅》所释尽本《诗》《书》，见《尔雅》，自可见，不待言也。《离骚》云：'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故释风雨云：'暴雨谓之涷。'此句专为《离骚》释，知《尔雅》在《离骚》后，不在《离骚》前。"

②洪兴祖《楚辞章句补注》以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出版的汲古阁本最善，本文以此为工作本，并参以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楚辞章句疏证》、光绪三年崇文书局本《楚辞集注》。

③《释文》是陆德明《尔雅释文》的简称，唐石经指唐石经本《尔雅》，《校勘记》是阮元《尔雅校勘记》的简称，邵郝本是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的简称，《校笺》是周祖谟《尔雅校笺》的简称。

皆作“夫离”。段注:“蒘,见《释艸》。按,前既有‘莞’艸‘可以作席’之文,复出‘蒘’字,则《尔雅》‘蒘,苻离’,非可以作席之‘莞’也。”[8](P138)《尔雅匡名》:“莞当作蒘。《释文》‘蒘’字即‘蒘’之讹。元照案:《集韵》二十一‘混’引作‘蒘’。”[9](P300下)又,《尔雅匡名》:“苻,当从《说文》作‘夫’,《集韵》引作‘芙’,传讹加艸。《释文》云‘蔓本或作离’,案‘离’,省文。”[9](P300下)据阮元、严元照引《说文》《释文》《玉篇》《集韵》等考证,《尔雅》本作“蒘,夫离”。由此可见,许慎、王逸用《雅》训,《尔雅》古本当作“夫离”。至《释文》时代,《尔雅》之“夫离”字已经加形符“艸”或“竹”,成为表意明确的今字。

洪氏云《楚辞》一本作“符篱”、引《尔雅》又作“芙蔓”,今《尔雅》传本皆未见。“夫离”,一名莞,草名,是双音节单纯词,是不可分释的联绵词。而“符篱”“芙蔓”“苻蔓”“夫蔓”“芙离”等异文,都是在最初借字“夫离”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音义同而形体不同的联绵字,这反映了古代用字不固定、尤其联绵字形经常被同音字词替换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楚辞》中较常见,如“蔓衍”和“漫衍”、“寂漠”和“寂默”、“委蛇”和“委移”、“威夷”和“逶移”,等等。

3. 麋 蘼

屈原《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补注》:“麋,一作蘼。补曰:《尔雅》曰:‘蕲茝,蘼芜。’郭璞云:‘香草,叶小如蒌状。《山海经》云臭如蘼芜。’”[2](P71)《章句》经作“麋”,别本又作“蘼”,洪氏引《尔雅》作“蘼”。

两汉以来经史子集四部典籍有关“蘼芜”和“麋芜”字,大多引自《楚辞》,皆“麋”“蘼”两存,洪所见《尔雅》本虽与《章句》经字不同,而与《楚辞》别本同。《校勘记》:“蘼,唐石经、单疏本、雪窗本同。”邵郝本亦作“蘼”,与洪氏所见本同。按,《释文》:“麋,本今作蘼。”[10](P899上)则陆氏所见《尔雅》本亦有两异文。“麋”与“蘼”关系如何?《说文》:“麋,鹿属。”“蘼,靡芜也。从草、麋声。”从二字本义、构造看,“麋”为鹿的一种,“蘼”为草名。以“麋”代指草,古人借字为用;“蘼”从艸,以“麋”为声符,是为“麋”的艸义项造了本字,因此“麋”与“蘼”成了古今字关系。严元照《匡名》揭明了二字的古今关系:“《释文》云:‘麋,本今作蘼。’石经、单疏本作蘼。案《说文·艸部》:‘蘼,蘼芜也。从艸、麋声。’古字省偏旁,故作麋,后世又造‘蘼’①字为之。”[9](P299)

4. 虡 簴

屈原《九歌·东君》“缊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补注:“簴,其吕切。《尔雅》:‘木谓之虡。’(郭注)‘县钟磬之木也’。瑶簴,以美玉为饰也。”[2](P75)《章句》经作“簴”,洪氏引《尔雅》作“虡”。

今《释文》、唐石经、邵郝本、《校笺》等皆作“虡”。按,《太平御览》卷五八二“筍簴”条《尔雅》曰:‘木谓之簴。’郭璞注曰:‘悬磬之木曰簴。’《方言》:‘凡其高者谓之筍。’郭璞注曰:‘筍,簴也。’”[11](P2626下)《古今韵会举要·语韵》:“虡,或作簴,《尔雅》‘木谓之簴’,所以挂钟磬。”[12](P19-20)《洪武正韵·四语》:“虡,钟鼓栒,亦作簴、鏞。《说文》‘虡饰为猛兽’,又飞虡,天上神兽,鹿头龙身,凡钟鼓之栒饰为此兽,故谓栒为虡。《尔雅》‘木谓之簴’,所以持钟磬也。”[6](P170下)可见,《尔雅》有两异文,其一与《楚辞》同。

按,《说文》:“虡,钟鼓之栒也,饰为猛兽。从虍,異象其下足。虡,篆文虡省。”“虡”为象形字,本义为悬挂钟磬架子、两旁饰作猛兽的柱子,后因其质料为竹木,俗加“竹”,造了今字“簴”。故《广韵·语韵》:“虡,俗作簴。”《章句》用今字,洪氏引《尔雅》为古字。从理论上讲,《章句》应有作“虡”之文,宋吴棫《韵补·八语》引《楚辞》正作“虡”:“竽,美皃。屈原《九歌》:‘缊瑟兮交鼓,箫钟兮瑶虡……’”[13](P553下)

二、洪氏引《尔雅》之文与《章句》为正借字

5. 谇 讯

屈原《离骚》“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王注:“谇,谏也。《诗》曰:‘谇予不顾。’替,废也。故朝谏謇謇于君,夕暮而身废弃也。”补注:“谇,音遂,又音信。今《诗》作‘讯’。‘讯,告也。’”[2](P14)“讯,告也”,②今《释诂》文,洪氏用《雅》训。《章句》经注及引《诗》作“谇”,洪引《尔雅》作“讯”。

按,戴震《毛郑诗考正》:“歌以讯之、讯予不顾,传‘讯,告也’。震按:‘讯’乃‘谇’字转写之讹。③

①原文作“蘼”,写刻讹误,据文意,当作“麋”。

②《说文》:“谇,让也。”“讯,问也。”皆与《尔雅》不同。《诗经》“讯予以不顾”,笺云:“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顾念我。”毛传未释,郑释“讯”为“告”,用《雅》训。

③《说文》:“谇,让也。从言、卒声。《国语》曰:‘谇申胥。’”段玉裁注:“《吴语》文。韦曰:‘谇,告让也。’今《国语》《毛诗》《尔雅》及他书,‘谇’皆讹‘誶’,皆由转写形近而误。”据段氏意,“誶”与“訊”右半相似而讹。

《毛诗》云‘告也’、《韩诗》云‘谏也’，皆当为‘谇’。谇音碎，故与‘萃’韵；讯音信，问也，于《诗》义及音韵咸扞格矣。屈原赋《离骚》篇‘謇朝谇而夕替’，王逸注引《诗》‘谇予不顾’，又《尔雅》‘谇，告也’，《释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则郭本‘谇’不作‘讯’明矣。今转写亦讹。张衡《思元赋》注引《尔雅》仍作‘谇’。《释文》于此《诗》云‘本又作谇，音信，徐息悴反’，盖于‘谇’‘讯’二字未能决定也。”[14](P567-568)戴震从词义、用韵及王逸引《诗》《尔雅》《诗释文》等多方面考证，得出“讯”是“谇”字转写致讹的结论。此说源于他的老师江永，①其弟子段玉裁亦承之。

由此可见，魏晋隋唐时期，《诗》通行之本已经作“讯”，作“谇”之本罕见；至两宋皆作“讯”了。《尔雅》本作“谇”，或因《诗》作“讯”，而改从“讯”。《释文》：“谇，沈音粹，郭音碎。本作讯，音信。”陆氏所见沈璇、郭璞等通行本皆作“谇”，他本间有作“讯”者；唐石经以郭璞本为底本，已经改从“讯”字了。两宋刻本皆从石经而讹。王逸引《诗》保留了《诗经》古本真貌，也证明了《尔雅》古本与《诗》同，亦作“谇”。

江永、戴震、段玉裁认为“谇”与“讯”形近而讹，而清郝懿行认为二字混用的真正原因是由音近假借。如郝懿行曰：“谇者，《释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告也’，又云‘本又作讯，音信’；《文选·思玄赋》及《幽通赋》注并引《尔雅》作‘讯，告也’。《后汉书·张衡传》注引作‘谇，告也’。‘谇’‘讯’二字，经典多通，故《离骚》注引《诗》‘谇予不顾’、《广韵》引《诗》‘歌以谇止’，今作‘歌以讯之’。‘讯予不顾’，毛传‘讯，告也’；又‘莫肯用讯’，郑笺‘讯，告也’。此二《诗》之‘讯’依字皆当作‘谇’。……盖‘谇’‘讯’二字声相转，古多通用，今日戴氏震《毛郑诗考正》及钱氏大昕《养新录》皆有辨证，王引之《经义述闻》又谓二字古音同，今依用其说也。”[15](P71-72)按，“誶”“讯”皆为心母，韵部微、真旁对转，二字声近而通，当以郝说为是。可见，《楚辞》《释文》作“谇”者为正字，《诗》《尔雅》作“讯”者为借字。

由上述考辨可知，《诗》《尔雅》古本皆作“谇”，至魏晋以后《诗》通行传本逐渐讹作“讯”；受《诗经》传本、经典地位的影响，盖治《雅》者因《诗》改《雅》，亦作“讯”。清邵氏《正义》、郝氏《义疏》从古本作“谇”，与唐石经、宋椠本不同。

6. 霓 蜺

屈原《离骚》“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王注：“云霓，恶气，以喻佞人。御，迎也。”补注：“霓，通作蜺。《尔雅》：‘蜺为挈贰。’”[2](P29)《章句》经注皆作“霓”，光绪三年崇文书局刊朱熹《楚辞集注》本又作“蜺”，与洪氏引《尔雅》同。

《释文》：“霓，本或作蜺。”[10](P880上)《校勘记》“霓，唐石经、雪窗本、单疏本同”[7](P381下)，邵郝本皆作“蜺”。从《楚辞》《尔雅》及其传本看，两汉以来，本或作“霓”，亦或作“蜺”，正借难辨。按，《说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阴气也。从雨、兒声。”[8](P137-138)“蜺，寒蜩也。从虫、兒声。”[8](P232下)“霓”“蜺”各有本义，就《尔雅》看，当以“霓”为正字，“蜺”为借字。颜元孙《干禄字书》：“蜺霓，上俗下正。”[16](P588)则唐时，“霓”字俗多用“蜺”，“蜺”成了“霓”的俗异体字。《楚辞》最初借“蜺”为之，还是用本字“霓”，不得而知；同样，《尔雅》先有“霓”，还是“蜺”，遽难断定。洪氏引《尔雅》之文与《离骚》异，明《尔雅》与《楚辞》相通，因此郝懿行《义疏》云：“蜺者，霓之假借。”

7. 渚 陼

屈原《离骚》“夕弭节兮北渚”，王注：“渚，水涯也。”洪注：“渚，沚也。《尔雅》‘小洲曰陼’。”[2](P63)《章句》经注作“渚”，洪氏引《尔雅》作“陼”。

今唐石经、邵郝本、《校笺》等皆作“小洲曰陼”，与洪氏引同。《尔雅》“陼”为水中小岛，王逸注“渚”为水边。洪氏引《尔雅》表明对王注的释义看法不同，以及“渚”“陼”有密切关系。按，《说文·水部》引作：“渚，《尔雅》曰：‘小洲曰渚。’”唐宋《诗经》训诂之作引《尔雅》多与《说文》同。作“陼”，盖始于陆氏《尔雅释文》：“小洲曰陼，本或直云‘小洲曰渚’。”[10](P891)陆氏所用本与《尔雅》其他传本不同。自陆氏后，受其影响，《尔雅》重要传本皆作“陼”。

“渚”与“陼”本义不同。《说文》：“渚，水。在常山中丘逢山，东入湡。从水、者声。《尔雅》曰：‘小洲曰渚。’”[8](24册，P104下)则“渚”为水名，从许慎引《尔雅》，或表明“渚”又有水中洲岛之义：“陼，如渚者陼丘，水中高者也。从阜、者声。”则“陼”本义为水中高地。“如渚者陼丘”，《尔雅·释丘》之文，许慎用《雅》训。段注“陼”：“《释水》曰：‘水中可

①江永《群经补义》：“‘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凡百君子，莫肯用讯’，以韵读之，讯皆当为谇，字相似而讹也。《说文》‘讯，问也’‘谇，告也’，于义皆当为告，不当为问。《离骚》‘謇朝谇而夕替’，王逸注引《诗》‘谇予不顾’可证也。”详见文渊阁《四库全书·五经总义类》。

居者曰州，小州曰渚。’《释丘》曰：‘如渚者陼丘。’谓在水中高而平，如水中小州然也，许慎本之为说。今《尔雅》作‘小洲曰陼’‘如陼者陼丘’，溷淆通用。”[8]（24册，P299下）据段氏意，“渚”为水中洲岛，“陼”为似小洲之水中高地，今本“小洲曰陼”“如陼者陼丘”是溷淆了“渚”“陼”之不同。从《说文》《补注》所引及古籍征引看，“渚”“陼”通用，《楚辞》《尔雅》本义本字当作“渚”，“陼”为借字。

8. 蔹 茨

屈原《离骚》“蔹蓉蒻以盈室兮”，王注：“蔹，蒺藜也。蓉，王刍也。”补注：“今《诗》蔹作茨，《尔雅》亦作茨。（郭注）‘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角，刺人。”[2]（P19）《章句》经注皆作“蔹”，洪引《诗》《尔雅》作“茨”。

朱熹《楚辞集注》云：“蔹，自资反，亦作茨。”则《楚辞》有两异文。按，今《尔雅》唐石经、单疏本、《校勘记》、邵郝本、《校笺》皆作“茨”，《释文》：“茨，或作蔹，同。”黄焯汇校：“茨，《一切经音义》十、十二、又十六引作蔹。”[10]（P900上）则《尔雅》传本亦有两异文。至于“茨”与“蔹”的关系，严元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茨，蒺藜。《诗·墙有茨》‘楚楚者茨’，毛、郑皆以为蒺藜，用雅训也。案，《说文·艸部》：‘茅，疾黎也。从艸齐省。《诗》曰墙有茅。’《礼记·玉藻》‘趋以采齐’，注云‘齐，读楚茅之茅’，则是《诗》古本皆作‘茅’，许、郑同也。今作‘茨’者，盖古者‘次’‘齐’偏旁通借，如斋或作粢餈、或作餈糍、或作蔸齑、或作资，乃其例也。《说文》‘茨’，以茅覆屋，从艸、次省，与此无涉；其或作蔹者，后世增益之字，犹蛈之作蟘也，与《说文》‘蔹’训草多皃者别。”[9]（P299下）严氏认为，“蒺藜”义本字当为“茅”；“茨”“蔹”，据《说文》，各有本义，只因为“次”“齐”偏旁通借混用而成，“蔹”是后世“增益”衍生而成，非《说文》“蔹训草多皃”之字。“蔹”被借作“蒺藜”义，出现较早，《玉篇·艸部》：“蔹，疾兹切，蒺藜也，三角刺人。”可见，该义魏晋六朝时已经被收入字典辞书。

由上可见，《楚辞》与《尔雅》之“蔹”“茨”均为假借字，本字作“茅”，至于何时借用，或是在《诗经》《楚辞》《尔雅》之前，或是后世流传征引写刻而致，难以确定。

9. 歧 枳

《天问》“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注：“牧，草名也，有突。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洪氏补曰：“《尔雅》曰：‘中有枳首蛇焉。’‘枳首，歧头蛇也。’”[2]（P116）《楚辞》注作“歧”，洪氏引《尔雅》作“枳”。

《玉篇》卷十四：“穊，《尔雅》有枳首蛇，两头也。又曲支果，今作枳。”[17]（P221下）顾氏引《尔雅》，明“穊”与“枳”异字同词。“穊”，《说文·禾部》：“多小意而止也。从禾、从支，只声。一曰木也。”本义是草木屈曲枝节不伸的样子。“枳”，《说文》“木似橘”，本义木名。则“穊”为本字，“枳”为借字。按，阮元《校勘记》：“中有枳首蛇焉，唐石经、单疏本同。《释文》：‘枳，本或作穊。’《石经考文提要》引至善堂九经本亦作‘枳’，雪窗本、注疏本作‘軹’。案，‘枳’之正字当作岐、作枝，凡作枳、作軹、作穊，并同音假借字也。”[7]（P389上）阮氏之论，极富启发，《楚辞》《尔雅》本当作“穊”“岐”“歧”“枝”，四字都有分枝、歧出之意，皆为本字，因此典籍征引《楚辞》《尔雅》皆混用之。又据顾野王《玉篇》、陆德明《释文》，六朝隋唐之际，《尔雅》传本已经借作“枳”了，或许最初就是借“枳”为之。从王逸注“言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看，王注用《雅》训，“歧”为本字，因此郭璞引之以释《尔雅》。

三、洪氏引《尔雅》之文与《章句》为异体字

10. 帔 袚

屈原《离骚》“苏粪壤以充帔兮”，王注：“帔谓之膊。膊，香囊也。”补注曰：“《尔雅》云：‘妇人之袚谓之褵。’注云‘即今之香缨也。袚，邪交落带系于体，因名为袚。’”[2]（P36）《章句》经注作“帔”，洪氏引《尔雅》作“袚”。

《校勘记》：“袚，唐石经、单疏本、雪窗本同。《释文》‘帔，本或作袚，又作徽同。’按，《说文》‘袚，蔽膝也’‘帔，囊也’。孙炎注以袚为帨巾，郭注以为香缨，义并当从巾。李善注《文选·思元赋》云‘《尔雅》曰妇人之帔谓之缡。今之香囊，在男曰帔，在女曰缡’，与陆本正合。知旧本《尔雅》从巾，不从衣也。《思元赋》注又引《尔雅》‘妇人之徽谓之缡’，与陆云‘又作’本合。”[7]（P371下）据阮氏校文，《尔雅》旧本从巾作“帔”（囊也），不从衣。对此周祖谟《尔雅校笺》认为：“案：原本《玉篇》徽下引作‘徽’，縭下引作‘袚’，《文选·思玄赋》注引作‘帔’，是旧本传写各有不同。《校勘记》云：‘《说文》袚，蔽膝也；帔，囊也。孙炎注以袚为帨巾，郭注以为香缨，义并当从巾。’案：从巾、从衣，义实相通，帔或作袚，犹幨或作襜，阮氏但凭《说文》，未免拘泥。”[18]（P217）周祖谟不否认阮氏“香囊”之说，但强调“帔”与“袚”二字，是“义实相通”的异体字。严元照《匡名》云：“《释文》云：‘帔本或作袚’，……石经、单疏本作‘袚’，《诗正义·豳风·东山》引作

‘袘’,《文选注》十五引‘妇人之袘谓之縭’,……《说文·巾部》:‘帠,囊也。从巾韦声。’又《衣部》:‘袘,蔽膝也。从衣韦声。’郭训‘帠’为香缨,则从巾者为正,衣、巾偏旁通借,故又作‘袘’耳。”[9](P63上)

据《尔雅》传本、诸家考证可知,“帠”与“袘”是形符不同的异体字,其义非孙炎注之“帨巾”,当以李善注“香囊”为是。因此,《楚辞》王逸注“香囊”,洪氏深以为然。

又,洪氏引《尔雅》“縭”作“褵”,《释文》:“縭,本或作褵。”今《尔雅》本多作“縭”,此二字亦为音义同的异体字,唐宋《诗经》《尔雅》传本混用不别。《集韵·支韵》:“褵,《尔雅》‘妇人之袘也’,即今香缨,通作縭。”[19](P178上)

11. 突 窈

《招魂》“冬有突厦,夏室寒些”,王注:“突,复室也。厦,大屋也。”《补注》:“五臣云:‘突厦,重屋。’补曰:突,深也,隐暗处。《尔雅》:‘东南隅谓之窈。’突、窈,并于斗切。”[2](P203)《章句》经注皆作“突”,洪氏引《尔雅》作“窈”。

今《尔雅》传本异文有二:唐石经、《校勘记》、邵氏正义、《校笺》作窈,郝懿行《义疏》作窔。按,《释文》:“窈,乌叫反,《字林》同,郭又音杳,《说文》云深貌。本或作窅,又作窔①。”[10](P868上)则又有作“窅”之本。黄焯汇校云:“卢(文弨)云:《说文·穴部》‘窅,冥也’‘窔,户枢声,室之东南隅’,则此正文当作窔,从宀、不从穴;作窅、窔,陆皆失之。……知此处正文本作窈,注文窅、窔则窔实之误。卢据讹文而妄訾陆氏。”[10](P868下)卢文弨据《说文》,定《尔雅》本作“窔”,黄焯定《释文》本作“窈”。《说文》段注:“窔,户枢声,室之东南隅,二句一义。古者户东牖西,故以户枢声名东南隅也。《释宫》曰:‘东南隅谓之窔。’按《释名》曰:‘窈,幽也。’非许意,许窔、窅义殊。《尔雅释文》引《说文》‘窅,深皃’,误以窅为窔也。礼经及他书作窈,亦作突。”[8](P448上)段氏引《尔雅》作“窔”,与卢意正合。清严元照亦赞同卢氏之说,并进一步考证:“《玉篇·宀部》引作‘窔’,云本亦作‘窈’,《五经文字·宀部》云窔、窈二同。元照案,《说文·宀部》无‘窈’字,《汉书注》一百上应劭引‘东南隅谓之突’,师古曰:‘突音,乌了反,其字从穴、夭声也。’案,《说文·穴部》无‘突’字。”[9](P248)严氏又引《玉篇》《五经文字》,明“窈”为“窔”的异体字;对于应劭注引之“突”、《释文》之“窈”“窅”等,未进一步说明。

周祖谟《校笺》:“窈,《汉书·叙传》应劭注引作突。《汉书·扬雄传》残卷中,日人引姚察《训纂》所引《尔雅》亦作突,……《释文》字作‘窈’……本或窅,又作窈,同。《营造法式》卷一引此文即从‘穴’作‘窈’。案:依音,此字当从穴、从夭。”[18](P229)《汉书·叙传》“守突奥之荧烛”,颜师古注:“应劭曰:‘《尔雅》东南隅谓之突,西南隅谓之奥。’师古曰:‘突、奥,室中之二隅也。突音乌了反,其字从穴夭声也。”[20](P4227—4228)可见,周祖谟认为《尔雅》作“突”者,实据应劭注、姚察《汉书训纂》而定。按,李善《文选·甘泉赋》注“雷郁律于岩窈兮”,作“窈”,善曰“《释名》曰‘窈,幽也。’窈,一吊切。”[21](P113上)六臣本作“雷郁律于岩突”,云“突,乌叫反,善作窈”,与姚察本不同。

据上述考证可知,《说文》“窅,室东南隅”,许慎用《雅》训,许氏所见本《尔雅》当作“窅”,至汉末魏晋六朝,《尔雅》已是“突”与“窈”混用不别了。按,“窅”“窅”、“突”“实”、“窈”“窈”,从宀、从穴,皆有“幽冥”义,互为异体字。这些异文,皆为古籍流传过程中,正俗、假借、形近而混用不别。

12. 龤 篪

屈原《九歌·东君》“箫钟兮瑶簴,鸣龤兮吹竽”,《补注》“龤一作篪。补曰:‘篪與龤同,并音池。《尔雅注》云: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广雅》云八孔。’”[2](P75)《章句》经作“龤”,洪氏引《尔雅》作“篪”。

按,《校勘记》“篪,唐石经、单疏本、雪窗本同。《释文》、注疏本‘篪’作‘篪’,注及疏准此。按作‘篪’是也。”[2](P376下)《校勘记》等作“篪”,邵郝本作“篪”,邵晋涵、郝懿行、严元照本经文多取《释文》,往往与唐石经、宋椠本不同,但邵、郝未对“篪”与“篪”二异文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严元照《匡名》:“篪,石经、单疏本、雪囱本皆从‘虎’,讹体。”[9](P263上)严氏认为“篪”作“篪”是传写讹误。

周祖谟《校笺》:“篪,《释文》作‘篪’,是也。《释文》云:‘篪,字又作龤。沂,或作𩠐。’原本《玉篇》龠部‘𩠐’下引此文作‘大龤谓之𩠐’,与《释文》所说别本同。”[18](P248)周氏与阮氏意同,认为《尔雅》不作“篪”,当作“篪”,周氏为《释文》“字又作龤”寻找了证据,即《原本玉篇》引《尔雅》作“龤”。《说文》:“龤,管乐也。篪,龤或从竹。”[8](23册,P195下)则“龤”与“篪”为异体字。从洪氏引文可知,洪氏所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宋元递修本作“实”。

见《尔雅》本作“篆”，与《楚辞》之“鱽”为音义同的异体字。

13. 橢 椭

《天问》“南北顺橢，其衍几何”，洪补曰：“《尔雅》云：‘蜎小而橢。’橢音妥，又徒禾切。（郭注）‘狭而长也’。橢与椭同。”[2]（P92）《章句》经作“橢”，洪氏引《尔雅》作“椭”。

《释文》、唐石经、《校勘记》《校笺》等传本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埤雅》引《尔雅》皆作“椭”，明梅膺祚《字汇·木部》：“橢，同椭，狭而长。”则“橢”与“椭”为异体字。

另外，洪氏引《尔雅》尚有两处未涉及《章句》经注，然而与《尔雅》传本文字不同。

《离骚》“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补注：“《尔雅》：‘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邠，《说文》作汃，‘西极之水也’。”[2]（P32）

“汃”，《说文·水部》：“西极之水也。从水、八声。《尔雅》曰：‘西至汃国谓之四极。’”段注：“《释地》‘东至于太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释文》‘邠，本或作豳，《说文》作汃同，彼贫反’。案，‘汃’之作‘豳’，声之误也，作‘邠’则更俗矣，而可证唐以前早有以‘邠’代‘豳’者。许意西极汃国必以汃水得名，言水必先汃，与邑部言地先鄯善，皆自西而东，如《禹贡》之先弱水、黑水也。”[8]（24册，P80上）段氏之意，《释地》“邠国”当依《说文》作“汃国”，是名因汃水而得，作“豳”是音同而讹，唐以前俗有以“邠”代“豳”者，即“汃”“豳”“邠”三异文混用。

在“邠”字下，段氏又作了详细的考证。《说文》：“邠，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从邑、分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段注：“豳者，公刘之国……盖古地名作‘邠’，山名作‘豳’，而地名因于山名，同音通用，如岐之比。是以《周礼·籥师》经文作‘豳’，注作‘邠’。汉人于地名用‘邠’，不用‘豳’，许氏原书当是豳，‘岐’本在山部，而后人移之，并古今字，为一字，抑或许书之变例有然，未能定也。经典多作‘豳’，惟《孟子》作‘邠’，唐开元十三年始改豳州为邠州，见《通典》《元和郡县志》。郭忠恕云因似幽而易，误也。”[8]（23册，P395下）段氏揭明，“豳”作“邠”，是“同音通用”；并明汉人用“邠”，经典用“豳”之例，唐人又改“豳州”为“邠州”。由此可见，汃水、豳山指代国，皆假借；“邠”从“邑”，为本字、正字，汉唐汃、豳、邠混用，至唐以“邠”为正，因此《尔雅释文》、唐石经、宋椠本遂皆作“邠”。

屈原《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洪注：“《尔雅》‘枫，摄摄’，注云：‘似白杨，叶圆而歧，有脂而香。’”[2]（P215）《释文》、唐石经、邵郝本、《校笺》皆作“枫，橵橵”。按，严元照《匡名》：“橵当作。《史记索隐·司马相如传》曰‘《尔雅》云一名摄’，字误。《说文·木部》‘枫，木也，厚叶弱枝善摇，一名’，又‘，木叶摇白也’，疑《尔雅》衍一‘橵’字。”[9]（P313）据严氏所论，《尔雅》本作“橵”；“橵橵”，枫树枝叶摇摆貌。司马贞、洪兴祖引作“摄”，则因“扌”与“木”相似而讹。可见，唐宋时期《尔雅》本有作“摄摄”者。

通过以上对《楚辞》与《尔雅》13组不同文字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楚辞》与《尔雅》13组文字字形虽然不同，但是“音义”是相同的。北宋初邢昺为《尔雅》作义疏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尔雅》文字与经典文字的不同，并以“音义同”揭明《尔雅》与经典文字之间的密切关系，近80例。这些不同的文字关系有古今字、假借字、异体字、正俗字、同义词、异字同词、讹误字等七八种，它们因为表意相同、读音相同而通用并行。洪氏所引《尔雅》与《章句》经文也是有着“音义同”的共性，也存在古今、假借、异体等关系。但从二书版本流传的历史看，又都是它们各自版本系统文字的不同，即《尔雅》《楚辞》文本均有此两异文。因此可以说，本文的研究也是对《尔雅》自身传本异文类型的研究。

2.《尔雅》《楚辞》不同的文字，孰古孰今、孰正孰借，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从二书产生时间看，屈原《离骚》、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早于《尔雅》，《尔雅》收入了这些作品中的词语，《楚辞》是源；但是从先秦时期学术口耳相传、简帛等经典载体流传书写不易等方面看，典籍传本异文早已有之，可以说《尔雅》在编纂之初就已经搅入原典异文的是是非非之中，二书异文孰先孰后，复杂难明，正如清陈玉澍在《尔雅释例》“经有异文而《尔雅》并释例”条所云：“六经之有异文，匪始于秦汉以后也。古人经皆口授，往往传闻异辞，左邱明、公羊高、谷梁俶同时传《春秋》，而三家异文以数百计，岂得谓作《尔雅》时，经尚未有异文哉？”[22]（P570下）以古今字例，即使《楚辞》用今字，是产生之初就有，还是后世流传过程中改易？《尔雅》用古字，是编纂之初就有，还是后世流传学者据经典改易？这些问题皆疑不能明。虽然如此，洪氏征引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南宋初期其所见的《楚辞》《尔雅》

版本的真实样貌，对《尔雅》流传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3.《尔雅》主要是训释先秦经典词语，两汉以来征引不断，搜集引用资料，即使一鳞一爪，皆可宝贵，因此，对不同时期存世史料征引《尔雅》排列比勘，分类条析，追本溯源，是厘清《尔雅》版本文字及《尔雅》与先秦经典文字关系的重要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四部丛刊本（涵芬楼影印述古堂景宋写本）.

[5] 司马光.类篇[M].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2册[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 宋濂撰,杨时伟补牋.洪武正韵[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207册[M]. 济南:齐鲁书社,1997.

[7] 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M].续修四库全书:第18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23册[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9] 严元照.尔雅匡名[M].续修四库全书:第18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 黄公绍等.古今韵会举要[M].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61册[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3] 吴棫.韵补[M].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59册[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4] 戴震. 毛郑诗考正[M].续修四库全书:第6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 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2.

[16] 颜元孙.干禄字书[M] .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11册[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7] 顾野王.玉篇[M]. 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1册[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18] 周祖谟.尔雅校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19] 丁度.集韵[M]. 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59册[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0]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22] 陈玉澍.尔雅释例[M].续修四库全书:第18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潘文竹

Quotations of *Erya* in *Added Notes on the Annotated Songs of the Chu State*

DOU Xiu-yan　ZHANG Y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In adding notes to the *Annotated Songs of the Chu State*, Hong Xingzu cited sources from *Erya* for 94 times. Studies on these citations show that the pre-Qin classics are interwoven and connected with *Ery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used in the various versions of *Erya* and *The Songs of the Chu State*, discovery can be made of the types of variant characters in *Erya*. Such analysis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studies on variant characters of *Erya*, but also promotes th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ya* and pre-Qin classics, thus providing dynamic corpus fo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Added Notes on the Songs of the Chu State*; *Erya*; character with ancient and modern forms; borrowed character; variant character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编辑出版类型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之别集

徐 鹏 绪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发达，使中国现代文学别集在种类上较中国古代文学更为丰富。中国古代文学别集，一般是指收集作家一生全部著作的文集，类型比较单一。现代印刷条件大大改善；版税制度的建立，又促成了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现代教育使文化普及的程度大为提高，形成了规模日益壮大的稳定的读者群，遂使印刷出版业与商业紧密结合。中国现代文学文集的出版形式，日益丰富。就别集而言，除了收入一个作家全部著作的全集之外，还产生了选集和文集。选集、文集和全集，可以说是“别集”这种编辑出版类型的三种“亚类型”。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编辑；出版；选集；文集；全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76-11

一、中国古代文学别集概述

别集，是汇集一家作品的著作集，是四部分类法中“集部”的主干。多数别集以文学作品为主体，亦兼收奏议、论说、书信、语录等。《隋书·经籍志》别集类序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叙》称：“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均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这就是说，别集的编辑起源于汉代，其目的在于窥见某一作家作品的全貌，以便“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结合作者的个性，知人论世，深入研究其诗文的文体和风格。其编辑体例，有按时期分为前后集者，有按作者官职的升降分期编选一官一集者；有按诗或文等不同文体进行编辑者；也有以收罗的多寡和完备与否分为“集”“小集”及全集和选集者。还有编成文集之后，另将佚文辑录为“逸集”者。

从流传情况来看，别集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收录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相当于现代的作家全集；一种是选录一个作家部分作品的，相当于现代的作家选集。作者生前自编或由他人编成的文集，只能是不完备的文集或选集。作者自编的文集，如《武夷新集》20卷，乃宋代杨亿自编诗文集。编文集时，作者往往有意删汰一些作品或有意选择某一时期的作品编辑成集。如《皮子文薮》，系皮日休于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自行编成的。但皮日休卒于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所以此书所收不可能是皮日休的全部作品。但也往往精选部分作品编为选集，以便于阅读和流传。作者生前除自编比较完备的文集之外，也会自编精选部分作品的选集。

集部所收之别集，大都为作者的全集。全集的编者，或为亲属，如元代袁泰编《静春堂集》4

收稿日期：2017-10-22

作者简介：徐鹏绪（1945-），男，山东胶南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卷，载其父袁易诗作；或为他人所编，如明代左赞编《旰江集》41卷，载宋代李觏诗文。有些别集编纂者则不止一人，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有人参与文集的编辑活动，或增加一些原书遗漏的内容，或在编辑体例上使之更加条理，故其集名和卷数便不完全相同，如柳宗元的《柳河东集》现存的宋人注本，就有影印南宋童宗说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唐柳先生文集》43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

从所收内容的范围上来看，别集中的全集，收录编者所能见到的某一作者所著全部诗文、杂著与专书。如明代郑朴所编《扬子云集》6卷，收录当时所能见到的汉代扬雄的全部著作，包括《法言》《太玄经》《方言》三部专书和诗文、杂著。作者自编的文集，除少数对自己的诗文有所删汰外，也大都收录自己的全部著作。编排方法均采取诗文与专书合编的方式。有的先列专书，后列诗文，如郑朴所编《扬子云集》6卷，前3卷收录《法言》《太玄经》等专书；后3卷收录诗文、杂著，按文体排列。有的先列诗文，后列专书，如四库本《文山集》21卷，载宋代文天祥论著。前17卷分类排列诗文，后4卷收载专书《指南录》与《纪年录》。有的则诗文与专书相间排列，如四库本《鹤山集》109卷，载宋代魏了翁论著，卷一至卷一百零三列诗文；卷一百零四至一百零七列《周礼折衷》，为专书；末二卷列杂录。别集的正文，除正集外，有的还收有“外集”“集外”等内容，如阮元《揅经室集》后面所附《揅经室外集》5卷（《四库未收书提要》），是阮元与鲍廷博、何元锡等共同撰定的，由于“半不出于己笔”，即一篇之中，“创改亦复居半，文不必存而书应存”，故题为《外集》。“集外”是指初刻时没有收入而重刻时收入别集的部分。由于不少别集为作者生前亲自编定，或因悔其少作，或为避免于政治、人事有碍，或因文稿暂缺，遗漏删汰了一些作品。后人重刻别集时，又不愿破坏作者生前编订的文集面貌，于是将正集未收诗文编为“集外文”“集外诗”或“补遗”等，附正集以行。如戴钧衡刻《望溪先生文集》18卷，为方苞生前选定，《望溪先生集外文》10卷、《集外文补遗》2卷，则是正集未收之文。

带有全集性质的别集，编者大都照录原文，但也有的编者外加一些说明正文的短注。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身世及与作品相关的情况，别集于正文之外，还附载序跋、目录、传记、年谱、墓碑、墓志铭等。有的附件甚至超过正文，如周与爵辑《宋濂溪周元公集》，《四库提要》称之为“虽以集为名，实则周子手著仅五之一”，传记资料大大超过正文，因而被《四库提要》收入史部传记类。但这类集子实际上已收入了作者的全部诗文，虽外围资料与正文比例失调，但只是编辑方法的不同，故仍应属于别集。

在别集中，除了将作者的全部诗文创作和专书合编的全集之外，还有按文体编成的诗集、文集等。诗集单收作者的全部或部分诗歌创作，包括诗、词、曲（主要是指小令和套数）。文集单收作者的全部或部分文章，既包括文学性，也包括应用性和学术性文章。有的别集诗文兼收，往往称为文集。

从别集正文的编辑体例来看，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 按作品体裁分类编排。有的标明类目，如《李太白集》为宋人所编，凡30卷，卷一为古赋，卷二为古风，卷三至卷六是乐府，卷七至卷二十五是古体诗和近体诗，另有文4卷，诗文拾遗1卷。有的不标明类目，阴按文体分类排列，如宋本《方泉诗集》4卷，载宋周文璞诗赋，不标类目，阴按先赋后诗之序排列。

2. 按作品创作的时间先后编排。如《杜少陵集》，将杜甫的创作按“安史之乱”以前、“安史之乱”时期、赴四川途中、定居成都、离成都沿江东下五个时期编年排列。

3. 按内容和主题编排。如《文山先生集》，分为《文集》和《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纪年录》，以及传纪、祭文等拾遗、附录。其中《指南录》和《指南后录》是文天祥出使元营及逃回南方时的作品；《吟啸集》是文天祥自被俘至燕京时的作品；《集杜诗》是文天祥在狱中用杜甫诗句所作的集句诗；《纪年录》是文天祥在狱中所写自己生平事迹的纪要，各集反映的都是作者当时的亲身经历。有的别集主要按内容和主题编排，但往往杂有按文体所编的类目，如宋代宋敏求编《孟东野诗集》10卷，分为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纪赠、怀寄、酬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联句等14类，依次标目排列。乐府、联句显然是诗体，中间12类则均按内容和主题编排。

4. 分集编排。有些著者的诗文先已分集行世，具有专书性质，编者分集收入。如宋代周必大编《文忠集》，便将欧阳修晚年自编分类列其诗文的《居士集》，原封不动地编入该书卷一至卷五十。在具体做法上，也有的先分类，再分集。宋代杨

长儒编《诚斋集》132卷,将其父杨万里的诗文先按文体分为26类,其中诗类42卷,又依次分为《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退休集》等9集。

5. 先分集,再按文体分类,文体内部再编年。如《山谷全集》,分《内集》《外集》和《别集》。《内集》为诗,编年自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至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外集》第一部分为赋,第二部分为诗,诗编年自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至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别集》收录的都是诗,不编年。

从别集的命名情况看,有的以作者本名命名,如《骆宾王文集》《孟浩然集》;有的以作者字、号、别名命名,如《李义山集》(李商隐字"义山")、《遗山先生文集》(元好问号"遗山")、《陶渊明集》(陶潜别名"渊明");有的以作者斋室命名,如汤显祖的《玉茗堂全集》(汤显祖家有玉茗堂);有的以作者官街、封号、谥号命名,如《阮步兵集》(阮籍曾官"步兵校尉")、《诚意伯文集》(刘基封"诚意伯")、《范文正公集》(范仲淹谥号"文正");有的以作者籍贯、居住地、别墅命名,如《广陵集》(王令系广陵人)、《昌黎先生集》(韩愈自谓郡望为昌黎)、《樊川文集》(杜牧在樊川有别墅);有的以作者撰作、编集的年代命名,如《白氏长庆集》(唐穆宗长庆年间编集)等。

别集较为系统、完备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全部著作(或大部分著作),通过它可以"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是研究该作者生平事迹和创作风格的基本文献。同时,别集是编辑总集不可或缺的依据和基础。

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别集的类型:选集、文集和全集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中,阿英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的"创作总目"中,使用了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总集""别集",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关文献进行了分类,分为诗歌总集、诗歌别集、小说总集、小说别集、戏剧总集、戏剧集、散文集。在小说别集中,将单行本的长篇小说,如王统照《一叶》、杨振声《玉君》、张资平《冲积期化石》;单行本的中篇小说,如蒋光慈《少年漂泊者》、许钦文《回家》、王新命《狗史》等,均视为别集。"戏剧总集"类只收戏剧协社编《剧本汇刊》(一)(二),其它个人的剧本集和戏剧单行本,均列入"戏剧集",而不以"别集"称。大概是当时多人合集的散文总集不多见,故"散文集"类中未进行总集与别集的划分。该创作总目中,共收诗歌总集8种,诗歌别集74种;小说总集7种,小说别集98种;戏剧总集2种,戏剧别集19种;散文集42种,其中《三叶集》为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人合集,《纪念碑》为蒋光慈、宋若瑜合集,《剑鞘》为叶绍钧、俞平伯合集,《龙山梦痕》为王世颖、徐蔚南合集,《游记》第一、二辑为晨报社所编游记体散文集,应属散文总集类。

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发达,使中国现代文学别集在种类上较古代文学更为丰富。由于古代刻版印刷技术的落后,许多中国古代作家的文集,只有在故去后,才有可能印行。因而,古代文学别集,一般是指收集作家一生全部著作的文集,类型比较单一。现代印刷条件大大改善;版税制度的建立,又促成了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现代教育使文化普及的程度大为提高,形成了规模日益壮大的稳定读者群,遂使印刷出版业与商业紧密结合。中国现代文学文集的出版形式,日益丰富。就别集而言,除了收入一个作家全部著作的全集之外,还产生了选集和文集。选集、文集和全集,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别集"这种编辑出版类型的三种"亚类型"。

(一)选集

这是一种古代文学文献中所没有的别集类型。它是从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或编选当时所有的作品中精选出来,能够反映该作家一生或截止到编选当时以前创作成就的代表作品的结集。选集与单行本的区别在于,单行本是某一较短时段内该作家某种文体全部作品的结集,而选集却是从该作家一生或编选当时的所有作品中精选出来的。选集中固然不乏一种文体的选本,但典型意义上的选集,大都是包含作家各种文体代表作的综合性选集。但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情况比较复杂,按编选者的身份,可以分为自编选集和他编选集。

1. 自编选集

由作家自编的选集,虽然其中大部分作品曾发表于报刊或曾被收入单行本,因而,作家编选时会受到读者、批评家和出版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总的说来,自编的选集能够选出作家自认为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在他为选集所写的前言、后记中,可以了解作者当时对入选作品和自己全部创作的真实想法,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如果作家年寿较高,

他在早期所编的自选集，只能反映其早期的创作概貌。而且有一些自选集，是作家为了敷衍出版商，而编选的塞责之作。这类自选集，就很难保证质量。所以，自选集编得越晚，则越能反映该作家的整体风貌。有一些作家是1949年以后仍然健在的跨代作家，他们在建国后所编的自选集，往往更能够反映本人作为现代作家的创作成就。但是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影响或压力，在编选中也往往故意不选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或对原作进行较大的删改，这样，也会影响编选的质量。如：

《鲁迅自选集》1933年3月，天马书店初版。鲁迅应天马书店约请所编的自选集，包括小说、散文22篇，并有1932年12月14日作者所撰《自序》一篇。《野草》中选《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选《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选《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选《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选《狗·猫·鼠》《无常》《范爱农》等。有作者照片及影印手稿。1936年10月，天马书店又出版过普及本。这部自选集是作者去世前三年所编，而且所选仅限于著作五种。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所以，这是一部能够准确反映鲁迅创作成就的自选集。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回顾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和自己的创作道路。这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鲁迅和新文学运动，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因此，《鲁迅自选集》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自选集这一文献类型的典范。

《沫若自选集》1934年1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初版，为"自选集丛书"之一。书前除自序外，有作者及其家属照片1帧，手稿1页。入选作品有散文《鸡》《无抵抗主义者》《马氏进文庙》；剧本《湘累》《广寒宫》《王昭君》《聂嫈》；小说《鹓鶵》《函谷关》《歧路》《行路难》《湖心亭》。除《序》和《鸡》写于1933年外，其余都是1920年至1925年间的作品。所以，这只是一部反映作者早期诗歌以外的创作面貌的自选集。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单行文献特别是单行本，也可以被视为"别集"的一种新类型。单行本一般都是作者编定，所以也属于自编"别集"。

2. 他编选集

他编选集，由于编选者的身份比较复杂，编辑目的不同，带有较明显的主观色彩，所反映的只能是编选者自己的眼光和水平。鲁迅曾反复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的浩劫'。"对编辑选本的编选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在作家过世以后，他的创作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文学史现象，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由高水平的出版社和编辑进行编选，并制订出科学的编选原则和编辑体例，那么这样的选本，便会使一般读者用较少的时间在较短的篇幅内窥见其创作的全豹，把握作者创作的总体风貌。如建国后，开明书店曾经出版过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的几乎囊括了现代文学主要作家的选集，就具有较高的质量。

下列各种选集大体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编选集的编辑体例。

《鲁迅杂感选集》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局初版。本书是1933年3月瞿秋白在上海东照里选编的鲁迅杂文集，编选者署名何凝。收入鲁迅1918—1932年的杂文76篇，其中选自《热风》9篇，《坟》9篇，《华盖集》9篇，《华盖集续编》11篇，《而已集》13篇，《三闲集》11篇，《二心集》10篇，并按时间先后排列。卷首有1928年司徒乔作鲁迅画像及何凝作《序言》，文末署"1933.4.8北平"。这篇《序言》，是瞿秋白阅读了鲁迅的大量杂文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写成，极其精辟地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和战斗传统，并首次对鲁迅杂文的社会意义、艺术特质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评价。这部杂感选集，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编辑出版类型中，收作家单一创作文体的选本的典型。瞿秋白的《序言》，也是中国现代杂文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鲁迅选集》1936年4月，上海万象书屋初版。本书由徐沉泗、叶忘忧编选，列为"现代创作文库"第1辑。收小说6篇、散文16篇（实际是杂文）、新旧诗7首。另有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卷首有编者写的《现代创作文库·序》和《题记》。"现代创作文库"共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田汉、巴金、沈从文、丁玲等作家作品选集20辑。

《鲁迅选集》1952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新文学选集"第1辑。分三册：上册收小说27篇，前有《编辑凡例》和冯雪峰作《代序——鲁迅生平及他思想发展的梗概》，后有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写的《后记》。中

册收鲁迅杂文 70 篇，其中《随感录》题为 6 篇。另有瞿秋白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列正文之首。下册，收鲁迅杂文 52 篇，另有致孙伏园、台静农、韦素园等 11 人的书信 13 封。新文学选集第 1 辑另有：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殷夫选集。

按所选内容来分，选集可以分为应用类选集、文学创作类选集和综合性选集。应用类选集包括日记、书信、演讲选集三类。如《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选集》《鲁迅讲演集》等。文学创作类选集按文学体裁划分，又可分为单一文学体裁的选集和多种文学体裁选集。前者如《鲁迅小说选集》《鲁迅杂感选集》，后者如《鲁迅杰作选》《鲁迅杰作集》等，分别收小说、论文、杂文、散文等不同文体的作品。综合性选集是指选集中既有应用文章又有多种文体的文学创作。如上海文林书局 1936 年版《鲁迅近作精选》，辑鲁迅论文、书信、小说共 25 篇。开明书店 1952 年版《鲁迅选集》收小说、杂文、书信，分三册出版。

以附件构成而论，有的选集没有注释；而有的选集，不仅有注释，还有讲解、评析等内容。前者多为解放前出版，如大连大众书店 1946 年版《鲁迅论文集》，1947 年东北书店版《鲁迅小说集》等。后者多是为了向一般读者普及而编选，实际上起到了教材的作用。如 1976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杂文选读》，收鲁迅杂文 36 篇，篇末附注释、历史背景和学习体会等。1973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杂文选》，每篇之后也有注释、试解等内容。

以选集的命名情况而论，多数选集以所选作品的体裁命名，尤其是单一文学体裁的作品集。如 1942 年朝花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短篇小说集》，收鲁迅短篇小说 11 篇。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收三种体裁的创作 33 篇。苏联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0 年版《鲁迅小说与论文集》收小说 5 篇，论文 18 篇。但有些选集，尤其是多种体裁选集的名称，往往和内容不甚相符。如 1931 年上海仙岛书店初版的《鲁迅小说全集》中，除小说外，还收有论文和散文，1971 年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中短篇小说集》中也收有散文诗。有些选集以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为选集命名。如 1944 年延安印工合作社出版的《一件小事》，内收《阿 Q 正传》《一件小事》《故乡》《孔乙己》《祝福》5 篇小说。1981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菲利普·小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写于深夜里》，内收鲁迅小说 11 篇，散文诗 6 篇，书信 10 封，日记 25 则，《写于深夜里》等杂文 15 篇。日译本的选集也多以这种方式命名。如东京青木书店出版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其它五十二篇》《随感录·北京通信·其它三十七篇》《革命时代的文学·其它三十八篇》《阿 Q 正传·狂人日记·外十四篇》等等。综合性选集的命名多为《鲁迅选集》《鲁迅文集》《鲁迅杰作选》《鲁迅代表作选》《鲁迅近作精选》《鲁迅文选》之类，比较容易识别。

（二）文集

作家文集是向全集过渡的一种文献类型。一般是在作家在世，或虽过世，但没有条件或不便于出全集时编辑出版的。它囊括了该作家几乎所有的创作和杂著。它和全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有的全集也称为文集。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相比较而言，全集比较“全”，编辑时锐意穷搜，力求无所遗漏。而文集则可以略去那些不重要或不便于收录的内容。有些作家在许多领域内均有不凡建树，如果编全集就应该包括他在各个领域中的著作；而编文集则可以将范围限制在文学领域。如：

《鲁迅三十年集》1941 年 10 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本书收鲁迅先生从 1906 年起至 1936 年间的一切著述。编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中的创作、论著、辑录和考证部分，计 29 种 30 册。编辑出版《三十年集》，是鲁迅先生的夙愿。他说：“回忆《坟》的第一篇，是 1907 年做，到今年足足 30 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 200 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 10 本），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1]（P305）1936 年初夏，鲁迅又说：“只是著述方面，已有 250 余万言，拟将截止最近的辑成十大本，作一纪念，名曰《三十年集》。”[2] 在鲁迅遗稿中，还保存着鲁迅手定的书目两种。但鲁迅生前没能印成。后由许广平编校出版，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依照著作先后次序排列，与鲁迅手定的《三十年集》书目有所不同，增加了《会稽郡故书杂集》《汉文学史纲要》《嵇康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的内容也得到充实。《三十年集》有蔡元培作《鲁迅先生全集·序》和《鲁迅三十年集总书目》。最后一册有景宋作的《〈鲁迅三十年集〉·印行经过》。

《沫若文集》1957 年 3 月至 1963 年 2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出版，共 17 卷，分精装平装两种。每卷前均有作者照片、手稿插页及编

辑说明。按照诗、戏剧、小说、自传、散文、文艺及学术论文等体裁和著作年代编次。其考古研究著作和翻译的外国作品，不收在内。《文集》的全部作品绝大部分是根据已出版的单行本收录。

《沫若文集》在编辑体例上，略同于《鲁迅三十年集》，即收入文集的几乎全部是已经出版的单行本和专著，按文体和著作的类型以时间为序排列。但在编入《文集》时，在篇目上有一些调整。《文集》虽在名义上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辑，但因为作者健在，所以不仅在入选的原则和篇目的调整上有作者的参与，而且作者还对原著进行订正修改。凡是由现代跨入当代的作家，在建国后重版旧作，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对原著加以修改。这种修改大都是为了使作品内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保持一致，很少有为了作品艺术上的提高而进行的修改。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在这方面，郭沫若表现得更为突出，因而他的《文集》可以成为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标本。

从建国后出版的众多的作家文集来看，在编辑体例方面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将原有的单行本分体裁，按写作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列组合而成；一种是将中长篇小说、多幕剧和专著以外的短篇创作和文章归类分辑，以时序排列。由于现代作家都有随时出版单行本的条件，因此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和文章，没有经过作家自己整理结集成单行本的很少。所以，建国后按第一种编辑类型出版文集的占绝大多数。

（三）全集

1. 中国现代文学全集概说

全集是收录作家一生全部著述的结集。全集的编辑出版，是文献整理和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其编辑目的一是为积累文献；一是为了供该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之用。因此全集的编辑，应力求其“全”。不仅应包括作家的全部文学创作，而且也包括他在其它领域的著述。片言只字，无所遗漏。但从建国以后已经出版的作家全集来看，全集的所谓“全”，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即如鲁迅和郭沫若这两位大师的全集，也并没有将他们一生的著译全部收罗在内。在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整理编辑中，集部中除少部分“总集”之前冠以“全”字（如《全唐诗》《全宋词》等）外，“别集”一般不称全集。所以，全集之称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别集的编辑出版中才普遍使用的。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中，将单行本和选集统统列入别集。实际上文学文献的单行本和选集，是现代印刷出版业发达之后，作家个人文集编辑印行的新形式。只有作家“文集”和“全集”才与古代文学别集的形式相当。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别集中多了译文、译著等内容。

从编辑体例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别集，有以上介绍过的选收一人部分作品的选集、收录作家一生主要著述的文集、收录作家全部著述的全集。文集和全集一般都是兼收作家各种文体创作和著述的综合性别集。只有单行本和选集，才收一种文体的创作。近年来，有人将作家的一种文体的全部创作汇为一编，称为某作家某种文体创作的“全编”，如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精编书系”中的《鲁迅杂文全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等，只不过是单行本和选集的变体，虽称全编，但不应列入全集之类。

从编辑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别集中的文集和全集，除少数由作者自编，或参与编辑外，大都是他编。

在内部编排上，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的种类要比中国古代文学别集复杂得多。有的全集按不同学科进行编排，如《瞿秋白文集》分为“政治理论编”八卷和“文学编”六卷，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家分工出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全集作者在多个学科领域内均有不凡建树，但其与文学无涉的部分仍被视为作者的文字资料而加以收录。有的全集按作品体裁分类编排，一般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艺理论、其它几类。有的全集按创作、学术、译介进行分类成集。如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一至七卷为鲁迅的文学创作，第八至十卷为学术著作，第十一至二十卷为译介之作。有的全集以创作时间为序进行年编。如王世家、止庵所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更多的全集兼采以上各种编辑体例之长，先以体裁类分，每种体裁下又以创作时间为序进行编排；出过单行本的，则尽量保持单行本的完整性，一般不打乱重组。事实上，许多作家全集都是这样处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巴金全集》的出版说明中也交待过这种编选原则。当然，也有例外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58年版《鲁迅全集》就将新搜集到的鲁迅佚文编入《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之中，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恢复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作为单行本的原貌，将1956—1958年版加入这两集中的文章与那时以来历年所收集到的佚文55篇，辑为《集外集拾遗补编》，编为第八卷。

从内容构成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全集除正集外，还有“外集”“集外”、独立著作（专书）、附件等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外集”是指所收作品不确定或不独为别集作者所作。而中国现代文学距今时间较近，虽有伪作，但比较容易辨别，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全集中的“外集”一般指全集作者与人合作的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全集中，此部分通常不像古代文学别集一样，独立出来。编者通常采取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合作双方的别集中都收录此部分，如《两地书》为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鲁迅全集》和《许广平文集》中均收录之。二是仅主要作者的全集中收录。如鲁迅、瞿秋白合作译校的十幕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由瞿秋白译，鲁迅校，收入《瞿秋白文集》，而《鲁迅全集》未收。

“集外”是现代文学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古代文学别集中的集外相比，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一是集外的数量非常大。中国现代作家将作品首先发表于报刊之上，由于现代中国社会急剧的政治变动和频繁的战争，不少作品在发表之后就亡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位中国现代作家都有“佚文”，这就使集外的绝对数量非常大。其二，中国古代文学别集中的“集外”一般是后人编入的，而现代不少作家自己编“集外”。如鲁迅不仅指导杨霁云编了《集外集》，而且自己也着手编了《集外集拾遗》。其三，中国现代文学全集中的“集外”，其中作品不仅曾单篇发表于公开的报刊，而且《集外集》最初编成后亦曾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过后才进入全集，这与中国古代文学别集中的“集外”不同。如前所述的《集外集》，早在1935年就曾由群言出版社出版，后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

中国古代文学别集中独具系统的专集（专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单行本相类。在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类型中，带有独立性质的专集被视为别集变体。但到了现代，这种编辑方式反而成为正体。几乎每位作家的全集中都收有单行本，有的全集甚至全由单行本集纳而成。其实，在古代，这种编辑方式已经存在，只是这些专集没有经过公开出版成为单行本而已。如明毛氏汲古阁刻《陆放翁全集》一百五十七卷，包括《渭南文集》五十卷、《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放翁逸稿》二卷、《南唐书》十八卷、《家世旧闻》一卷、《斋居纪事》一卷。此外，《王渔洋遗书》也收专集十余种，其内容构成与《陆放翁全集》类似，都是由独立的专集编辑而成。

在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的构成中，附件成为非常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部分。现代文学全集中的附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出版说明或编选说明、前言、后记等，一般为编者所写，交待编辑体例、编选背景、出版过程等；二是注释，注释一般放在每篇之后，但也有置于每卷之后的，如1956—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有作者自注和全集编辑者的注释两种；三是作者的年谱、传记、著译年表等生平资料和索引等。如1938年版《鲁迅全集》附录中就收有鲁迅先生自传、许寿裳编《鲁迅先生年谱》及《鲁迅著译书目续编》《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等。

2.《鲁迅全集》——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的经典文献

《鲁迅全集》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最早的全集，也是版本最多的全集。经过众多编辑者的不断努力日趋完善，成为现代作家全集的典范。200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版18卷《鲁迅全集》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现将《鲁迅全集》的主要版本介绍如下：

《鲁迅全集》（20卷本）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社普及本初版；1938年8月1日，复社纪念本初版。这是第一部《鲁迅全集》，20册，600余万字，是鲁迅著译作品的汇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用同一纸型，两种名义出版，分普及本和纪念本两种。普及本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纪念本又分甲、乙两种，由复社出版。《全集》白文无注释，前有1938年6月1日蔡元培作的《鲁迅先生全集·序》和《鲁迅全集总目》《卷首插图总目》。每卷卷首均有鲁迅各时期的照片和墨迹的影印照。第20卷末，附有《自传》《鲁迅先生年谱》（许寿裳编）、《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以及许广平于1938年7月7日作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以后所出各种20卷本，虽装帧有异，但均用同一纸型。1946年10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再版。1973年12月，为适应国内外读者需要，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据1938年版《鲁迅全集》重排出版，分甲乙两种。1938年版《鲁迅全集》有鲁迅全集出版社版、复社版（纪念本甲乙两种）、光华书店东北版、作家书屋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本。

《鲁迅全集》（10卷本）1956年10月至1958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卷出版。这是第一部有注释的《鲁迅全集》，注释附于各卷卷末，共5800余条。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以及

部分书信；翻译和编校作品另行出版；每卷文集的排列次序较1938年版《鲁迅全集》略作调整。

第一卷卷首有1930年鲁迅像和1956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主要说明十卷本与1938年版的不同；指出本版所收的全部作品，都经过校勘。凡在过去各版中印错的字或标点，已发现的，都做了校正。每卷卷首，另有对各卷的说明和各时期鲁迅照片及有关墨迹。著名书法家、鲁迅友人沈尹默先生题签。每卷前有统一形式的扉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了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内容和注释均与十卷本全集相同。该书10卷，每卷1函，每函7册至11册不等，全书88册。2号仿宋体印，直排，篇末附注释。第一卷第一分册卷首的《出版说明》，内容与注释本全集基本相同，但有一些改动：如“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改为“已经搜集到的书信的一部分”；“这次新加的一些注释附在各卷的后面”，改为“这次新加的一些注释附在各篇的后面”。

《鲁迅全集》（16卷本）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内容比10卷本新增各种文章205篇。恢复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两书的初版原貌，将10卷本加入这两集中的文章抽出，与从那时以来历年所收集到的佚文55篇辑为《集外集拾遗补编》，编为第8卷；将译文中鲁迅作的序跋和鲁迅辑校古籍时所作的序跋全部抽出，汇集成《译文序跋集》和《古籍序跋集》，编为第10卷。收录已搜集到的鲁迅书信1450余封，比10卷本增加了1100余封，编为第11、12、13卷。收录《鲁迅日记》，编为第14、15卷。16卷为附集，收《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和《全集注释索引》。本版对10卷本的注释作了修订和增补。原来未加注释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都加了注。《集外集拾遗补编》《译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和书信、日记也全都加了简要的注释。新的注释条目计23000余条，达190余万字，比原有注释增加了近4倍。《全集》第一卷卷首，有鲁迅像、《自传》手迹等图片6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以及《总目》和《插图目录》。各卷有统一格式的扉页。

《鲁迅全集》（18卷本）200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集》以1981年版为基础进行修订，根据增补不足，修正错讹的原则，补入迄今搜集到并经确认的佚文佚信，收入《两地书》的鲁迅原信和《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对原有注释作了增补和修改，所收著作又据作者生前审定（或写定）的文本作了校核。《鲁迅全集》共18卷，吸纳了迄今鲁迅研究的新成果，是目前最为完备的《鲁迅全集》的新版本。

《鲁迅全集》（单行本）1938年至1941年，鲁迅全集出版社将《鲁迅全集》（20卷本）所收的著述29种和翻译31种，分别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第一册《坟》的卷首，有1938年6月1日蔡元培作《鲁迅先生全集·序》。书脊、扉页、版权页均是同一版式。单行本有鲁迅全集出版社版、作家书屋版、峨嵋出版社版、北新书局蓉版、复兴书局蓉版、雅典书局版等。1956年，10卷本《鲁迅全集》出版的同时出版了注释单行本。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1938年版《鲁迅全集》单行本改排出版。1981年，《鲁迅全集》新注释本问世，同时出版了新注释的单行本。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7月第一版。本书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纵向阅读”鲁迅的文本，收录迄今所发现的鲁迅全部作品，含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鲁迅生前编入自己文集而确系他人所作或由他人代笔者，列为附录，其余他人之作，包括鲁迅编集时文后所附“备考”，概不收入。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著译作品先小说，后散文、诗歌。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写作时间未明，则系以初次发表时间。全集共分20卷，20卷末附有《篇目索引》。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按照不同的目的和要求，编辑出版了众多版本的《鲁迅全集》，但是直到最新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8卷本《鲁迅全集》的面世，这些全集都不能称为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版全集的《出版说明》中说：“作者翻译的外国作品和校辑的中国文史古籍，以及早期编著的《中国矿产志》（与顾琅合编）和生理课程讲义《人生象敦》等，分别编为《鲁迅译文集》（10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4卷）和《鲁迅自然科学论著》（1卷），另行出版。”显然，上述内容是《鲁迅全集》不可缺少的部分，既然没包括在全集之中，便说明这部18卷本依然是不全的。

关于《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许多鲁迅研究专家对《鲁迅全集》的编纂，有着种种不同的构想。早在1926年6月10日，许广平（署名景宋）在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

著作》[3]（P121-122）中，开列了一个题为《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分撰著、翻译、纂辑、校订四类。收录了1926年前她所见到或知道的鲁迅著译辑校情况。

1932年4月29日，鲁迅自己曾开列过一个《鲁迅译著书目》[4]（P635-643），以编年的方式登录了1921年至1930年的译著27种，译著之外又有所校勘者、所纂辑者、所编辑者、所选定校字者、所校订校字者、所校订者、所印行者等数项。

在《译著书目》后，鲁迅写道：

> 我所译著的书，景宋曾经给我开过一个目录，载在《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里，但是并不完全的。这回因为开手编集杂感，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就顺便另抄一张书目，如上。
>
> 我还要将这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4]（P643）

1937年，许广平又开列了一个《鲁迅译著书目续编》[4]（P635-643），亦按编年体登录了《鲁迅译著书目》之后1932年至1937年出版的鲁迅译著20种。另有：

《鲁迅自选集》《门外文谈》《鲁迅杂感选集》《阿Q正传》（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集外集》《会稽郡故书杂集》《六朝造象目录》《六朝墓志目录》《古代汉文学史纲要》《集外集拾遗》《山民牧唱》《书简集》《日记》《汉画像》《汉碑帖》。

鲁迅逝世前不久，他准备把1907年至1936年的著述编为《三十年集》，但因逝世未能出版。

在鲁迅逝世后的遗稿中，还保存着他手定的两份著述目录[4]（P647-649）：

1951年2月10日，冯雪峰拟定的《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5]（P561-562），设想了鲁迅著作出版发行的三种方案：

甲、最完整的全集本——即把鲁迅的全部文学工作可以收印的东西都编进去。编法以现在的全集（指1938年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引者注）为底子，而加进全部书简、全部日记、编选的画集和其它著作与翻译的译文。此种全集本，主要的是为了保存和供研究之用，印数不要多，只够全国图书馆、大学和高等学校及个人研究者具备就是了，但印刷装帧和校对都必须讲究，以便保存长久并能作为查考之根据。至于是否要把注释作为附录，则再作决定。"

其它两种为"乙、注释单行本"和"丙、注释选集本"，则是为着向广大读者进行普及工作而出版的。这是他当时对于编辑和出版鲁迅著作的设想。

王士菁在《〈鲁迅全集〉拟目》[6]中认为：

作为鲁迅文学遗产，包括他的文学创作、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辑录的古籍等几个方面，或排印，或影印，都已陆续出版了。据广泛征集和多方调查，到目前为止，明显遗漏的为数极少，即使今后可能偶有发现，为数将不会很多，不可能改变鲁迅著作的全貌。除此而外，和鲁迅文学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鲁迅曾经倾注过巨大心血的几种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的画集，在当时印数甚少，发行范围有限，仅个别的后来偶有重印。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为了保存和供研究者之用"，似有重印的必要。因此，雪峰同志提出"最完整的全集本"的《鲁迅全集》似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鲁迅的全部文学工作"，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他的文学创作、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辑录的古籍和编选的画集，在这四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内部联系。

他根据已经出版的三种版本，拟订了一个27卷本的全集目录和鲁迅所编选的画集目录，并附新编《〈鲁迅全集〉总目提要》，为拟收入全集的每一本书都写了提要。

朱金顺在《对〈鲁迅全集拟目〉的一些看法》[7]中，就王士菁的《拟目》发表了自己对《鲁迅全集》编辑的意见。他认为：

首先，王先生的编目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拟目"，但这个"拟目"基本上是1938年20卷本《鲁迅全集》的扩编，在思路与编法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用另一种编排法，可以编辑出更科学、更完善的《鲁迅全集》。比如，用严格的编年体，就可以编出一部新的"全集"。又比如，按文本分类，以鲁迅自编的集子为单位，再打乱《集外集拾遗》《译丛补》中的文章，作为"集外"放入相关卷内，也可编出一部全集。

其次，王先生的"拟目"，是除艺术图册外，将《鲁迅全集》编为27卷，比20卷又多了7卷，这样卷帙太大了。在这一点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分

类成卷，相对独立又成“全集”的做法，有它的发行优势。如果保持原来的《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再加上“古籍汇编”和“艺术图录汇编”，也是一部完整的全集，而且读者也可根据需求购买其不同的部分。

最后，他给“拟目”和“提要”提了几条具体建议：

第一，已被公认为鲁迅的著译，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进入或没进入三种“全集”之中，这次没在“拟目”和“提要”中反映出来，不知打算编入否？比如，曾被唐弢先生编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的《人生象敦》和《小说备校》，拟收入“全集”吗？翻译的《药用植物》，鲁迅先生开列的《鲁迅译著书目》中，都没有忘记它，20卷《鲁迅全集》，做为“附录”收入在第14卷，《鲁迅译文集》以其为科学译品而不收，那么“拟目”收它吗？

鲁迅编有《俟堂专文杂集》，其《题记》收在16卷本《鲁迅全集》中，这册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3月影印出版，它的价值恐不在《汉画像》之下。“拟目”之“编选的画集”部分，没有此书；“提要”部分，也没有提到它，不知是遗漏了，还是认为不该编入呢？此为鲁迅先生遗编，且编辑工作已接近完成，漏掉它是不妥的。

第二，《两地书》与《鲁迅景宋通信集》并收于第9卷，我认为欠妥，值得进一步考虑。《两地书》为鲁迅编定，并公开出版的书，当然要收入《鲁迅全集》。《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以其为《两地书》原信，有极高史料价值，受到欢迎。《两地书真迹》199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它影印了《两地书》原信和《两地书》手稿，也受到了研究界欢迎。这和出版鲁迅先生其它手稿一样，文献、文物价值极高。但是，在新编的《鲁迅全集》中，若将《两地书》和《鲁迅景宋通信集》一同排印出来，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二者只是同一部书的两个版本，尽管做为《两地书》出版时，鲁迅先生对原信有所增删，但毕竟绝大多数文字是相同的。这恐怕不能做为两部书收在同一部全集中。编辑全集似无此例。如果《两地书》如此处理，那么存有两种或更多版本的鲁迅旧体诗，是否也打算一同收入“全集”呢？把《两地书》原信的面貌保留在“全集”中，是很好的，也是广大读者欢迎的。但我认为可用另一种办法处理，例如，可以在改动处加注释，说明没改前的情况；或者于每封信后，附录校勘记的办法；或者用其它办法。这样，既可减少“全集”篇幅，又对读者更有用一些。在一卷书中印出《两地书》的两种版本，极不便读者翻检，重复印刷也不必要。请慎重考虑才好！至于没有收入《两地书》的少数通信，或者附在《两地书》后，或者编入《书信集》卷中，就可以了。

第三，“提要”部分，要注意与新编全集的吻合。王先生的新编“总目提要”，有些文字忘了做相应变化，是欠妥的。例如，第二十七卷关于《译丛补》的提要，文字过于陈旧了。仅仅照《鲁迅译文集》第10卷统计各类作品数是不对的，在“曾编入《鲁迅译文集》第10卷”之后，要加入新增译品的文字才对。《鲁迅译文集》第10卷出版于1958年12月，至今已过了40年，鲁迅翻译作品的佚文，也发现了一些，似都该补入。我记得的，就有熊融同志发现的《造人术》（刘易斯托仑作）和《哀尘》（嚣俄作），不是该补入吗？其它可能还不少。还有过去不便收入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篇，新编“全集”也应当补入了。唐弢在《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编校后记》中说：“找到而未予收入的，有《亚历山大·勃洛克》译文一篇，因为这是反革命者托罗兹基的原著。”因为时代的原因，20卷“全集”和“译文集”的《译丛补》中，均不收此文，唐弢先生的“补遗”也不收。现在似乎不再需要避讳了吧！又如，第十卷、第十一卷的“提要”中，在“1981年出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编入第11、12、13卷”之后，也应当说明这十多年来又发现了多少，这些书信一并编入本卷中。新编《鲁迅全集》要注意吸收鲁研界的新成果，我想，“总目提要”中也应及时反映出来。

从最初许广平开列的著译书目，到鲁迅对该书目的补充和自拟的书目，再到冯雪峰等研究者编纂《鲁迅全集》的种种设想来看，确实是在朝着编辑“最完整的全集本——即把鲁迅的全部文学工作可以收印的东西都编进去”的目标靠拢。但是，直到最新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八卷本《鲁迅全集》问世，这个目标也没有达到。因而，《鲁迅全集》至今终非完璧。从编辑体例来看，以后陆续出版的《鲁迅全集》都基本沿用了1938年版20卷本的模式而稍有变通，或将著译分编，或在内容上有所增减。但从鲁迅自拟的书目来看，他本人对文集的编辑就有两种思路：一是按内容和体裁分类，再以写作出版时间编排；二是纯用编年体。但以前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全集在编辑上都采用第一种体例。直到王世家、止庵所纂《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不仅在内容上更趋完备，而且开创了一种与

鲁迅后一种思路相吻合的编辑体例。

3. 其他现代文学全集如：

《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曹禺全集》《冰心全集》等，中国现代作家几乎大都出版了文集或全集，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兹不一一列举。从总的情况来看，除创作数量不多和涉及学科领域较少的作家外，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在许多学科都有重要建树的大家，由于政治和出版条件等种种限制，他们的全集大都是不“全”的。从编辑体例来看，明按体裁和学科分类，同一体裁和学科内部又阴按时间编排，是采用最多的编辑方法；编年体的全集，虽以时间为经，但在同一时间内，又阴按体裁划分。这是全集编辑最常见的两种基本类型。另外，大部分全集都原封不动地收录了早已刊行的单行本。这一现象，是与现代印刷出版条件的进步相联系的，在古代是做不到的。这可以说是现代别集编辑出版的一大特点。

参考文献：

[1] 鲁迅.致曹靖华[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A].鲁迅全集:第20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M].北京:未名社出版,1926.

[4] 鲁迅.鲁迅全集:第20卷[M].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

[5] 冯雪峰.雪峰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王士菁.《鲁迅全集》拟目[J].鲁迅研究月刊,1998,(7).

[7] 朱金顺.对《鲁迅全集拟目》的一些看法[J].鲁迅研究月刊,1998,(12).

责任编辑：冯济平

Research on Types of Documentary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dividual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XU Peng-x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mak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re abundant tha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nres. The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refers to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n author, which is monotonous in types. Modern printing conditions have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oyalty system ha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writers. Modern education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popularity of culture and formed a stable readership that is growing in scale so that the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are closely combined with business. The col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bundant in types. Apart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a writer's entire works, an anthology also refers to selected works and collected works. Selected works, collected works and complete works are three subtypes of th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ypes of an anthology.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ocument; edit; publish; selected works; collected works; complete works

阿英对新文学史料构建的开创之功

——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的编撰

赵连昌[1] 李 广[2]

(1.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省济宁市信访局，山东 济宁 272100)

摘 要：阿英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奠基之作。它无论在确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构建该学科的研究框架、确定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方面,都起到了发凡起例的先导作用。

关键词：阿英；编辑出版；新文学史料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87-08

阿英既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收藏家,又是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各卷的编选,有赖于他提供的丰富坚实的史料文献的支撑。因而,阿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以下简称《史料·索引》)卷编辑的最佳人选。

在编辑《大系》的过程中,阿英是尽了很大努力的。由于社会动乱,战火频仍,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损毁比较严重；有些出版物阅读范围小,发行量少,不易找到；更有的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典籍不如古籍那么有收藏价值。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流失。在赵家璧发起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后,连那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如鲁迅、茅盾、郑振铎等人都感到原始材料难觅。他们在应约的同时几乎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的要求——由赵家璧或良友公司提供材料。鲁迅先生在接受邀请时表示:"假如真找不到别人,就由我来担任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许多刊物如《新潮》和《新青年》等手头都没有,必须由良友公司负责供应。"[1](P227)茅盾也是要求提供编选材料,他说:"因为文学研究会名下的作品登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刊》上的,我手头有,而散见于各分会办的刊物上或其他非文学研究会办的报刊上的,我没有。"[2]周作人没有直接和赵家璧面谈,但为编选《大系》与赵家璧有两封通信。其中一封说:"从郑先生转来合同,今仍将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规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有许多材料不能找到,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3](P60)阿英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中也记录了新文学的材料的缺失:

> 虽只是短短的一十五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所以,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干部之一的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引里,就如此的记着:"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而当他和当时的另一位干部(陈衡哲)说到要印这部书的时候,她的回答是:"那已经是三代以上的事

收稿日期：2018-02-12

作者简介：赵连昌(1972-),男,山东章丘人,文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广(1981-),男,山东嘉祥人,济宁市信访局主任。

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当时的一些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4]（P1-2）

文献资料问题成了编选《大系》的首要问题。赵家璧在此前的准备工作中，曾经数次到上海有名的几所大图书馆熟悉编选对象，但它们的藏书也不完整。阿英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帮助，答应无条件为其编选工作提供材料支持。正是有了阿英的藏书作为后盾，赵家璧才敢答应为各位编选者提供资料。阿英的新文学藏书以其丰富珍贵闻名于当时与后世。赵家璧在参观时看到：“上海各大图书馆所没有的书，他大部分都有，而且以初版本居多，有的还是作者签名赠送本。大量文学期刊几乎是整套的。……我第一次感到，我为编这套大书所首要解决的资料来源问题，已找到了一个大宝库。因为向图书馆借书有种种限制，现在有了阿英藏书作靠山，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可以起步了！”[1]（P165-166）事实证明，阿英的藏书确为编选《大系》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支撑。

当郑振铎得知阿英已向赵家璧表示愿意支援《大系》的资料供应工作后，极为兴奋。他对赵家璧说：“你有了阿英的支援，就事半功倍了。”[1]（P174）后来郑振铎在《文学论争集》导言中说：“最后应该谢谢阿英先生，本集里有许多材料都是他供给我的。没有他的帮助，这一集也许要编不成。”[5]鲁迅为了寻求编辑小说集的选材，除向赵家璧借书外，也曾直接和阿英通信。1935年2月12日《鲁迅日记》上记有：“得钱杏邨信并借《新青年》《新潮》等一包，即复。”[6]（P941）

阿英不仅为编选者无条件地提供材料支持，而且亲自担任了《史料·索引》卷的编选工作，并对赵家璧最初的编辑思路进行修正。此前经过郑伯奇的介绍，阿英已有两本著作——《创作与生活》和《灰色之家》，编在《一角丛书》中出版。他经常来良友公司找郑伯奇谈工作，那时他们两人和夏衍已参加了明星影片公司。据于伶的回忆，经瞿秋白指示，由阿英、夏衍与郑伯奇三人，用三个假名，秘密受聘为该公司剧本顾问，由夏衍负责组成电影小组。[7]“阿英为人坦率豪爽、和善可亲，有事找他，他都热诚相待。对良友的文艺出版工作关怀备至，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更奖掖有加。”[1]（P164）当赵家璧把拟编一套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丛书的初步想法与他商谈时，他表示绝对赞成，并鼓励说，这样一套书，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也还有久远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要加紧进行。后来，阿英虽然差点被捕，但仍克服困难交了书稿。

《史料·索引》卷在《大系》各卷中篇幅最大。计分：一、总史；二、会社史料；三、作家小传；四、史料特辑；五、创作编目；六、翻译编目；七、杂志编目；八、中国人名索引；九、日本人名索引；十、外国人名索引；十一、社团索引等十一个部分。八、九、十、十一是本卷的索引，合起来与以上七部分并列，在编辑上更为合理。

目录之后，正文之前，有阿英所写《序例》一篇，对《史料·索引》卷的编制经过和有关情况（主要是史料取舍的情况）作了详细地说明。

（一）关于“总史”部分的编制

这部分选录了周作人、胡适、陈子展三人著作中的段落，用以描述文学革命运动的过程。阿英在《序例》中交代了设立和编选这一部分的目的和学术背景。除了说明为什么要选录这三个人的论述之外，又提供了因种种原因未能选录的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资料线索，对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创刊，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虽是很短也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很遗憾的，我们竟还不能有一部较好的《中国新文学史》。能以找到的，不过是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九三三），和拙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一九三四）而已。这两部书，后者只是史料的辑集，前者事实上是不能使人认为满意的史书。此外，则不过只是些发表在杂志上的，和附在总史里的一些章节的短篇。这里，可以举出下列的若干种：

《文学革命运动》（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末节，一九二三）

《文学革命运动》（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二）

《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一九三三）

《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文艺讲座》，一九三〇）

《中国新文艺运动》（华汉《文艺讲座》，一九三〇）

《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高滔《文学》，

一九三四）

《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郑振铎《民众教育》，一九三二）

《中国新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阿英《文学》，一九三五）

总结中国新文学的短篇文字，事实上是不止于这几篇，不过就我所见到的，当以这几篇较多史的成分。其余可考的还有不少，就中华图书馆协会刊行的《文学论文索引》三本所载，就有三十多篇。然而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这些零星的散作而已。至于可以作为这一时期文学历史意义研究的，也很有几篇，如杂志《文学》关于本题的讨论（一卷一期），如隋洛文的《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理论与创作》），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一九三一年《文学导报》（左联机关志）所刊关于五四文学讨论的文字，和胡适后来发表的《逼上梁山》（一九三四《东方》一号），也都是可以作为“史料”的。

原先的计划，在总史的编选上，这两方面的都预备顾到的。可是在篇幅上，竟不能如愿的做，加以一部分很好的，在客观的条件上又无法选用，如郭沫若诸先生的著作，故只能选这里所收的三篇。胡适，周作人，是五四期新文学运动的干部，所说的经过，自然更为亲切，陈子展的一篇，则于史实的提供，颇是丰富。[8]（P1）

关于“总史”部分，阿英最初的设想，除总述文学革命运动过程的内容之外，尚有“《各论》的准备，就是接着再选一些关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方面的史料”，但因篇幅的限制只好放弃。这些内容虽在《大系》的《文学论争集》和《建设理论集》中选录了一部分，弥补了阿英的遗憾，但如果把《史料·索引》卷当作一部独立的新文学史料学的著作来看，那么，除总论外，再有关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史料，则会使这部分的内容更为充实完整。因而，我们通过《序例》的说明了解了阿英的最初构想，对将来新文学史料学的构建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二）关于“会社史料”的编制

这部分辑录有关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社团流派的史料，诸如社团成立的缘起、章程，机关刊物的发刊词、停刊复刊终刊词或宣言，以及有关的回忆说明性文字计 54 篇。阿英在《序例》中说明编选情况时，顺便对某些社团和刊物进行介绍和评价，并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史料线索，颇有参考价值：

史料的第二部分是“会社史料”，在这一部分所深认为遗憾的，是关于少年中国学会材料的独缺。《少年中国》二十多册虽全在手边，但既没有社章，宣言，也没有“发刊词”之类的作品。后来从一九二六年印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上见到有《少年中国运动》小册子，于是急急的去托友人设法。他访问了许多朋友，总算找到《少年中国学会》干部某先生家藏有此册，内收学会会章和宣言。但直到全书付印，某先生始终没有时间将此册寻出借抄。

少年中国学会和新青年新潮社一样，不是纯粹的文学社团，是一般文化的组织。与新潮社可说是一个弟兄团体。机关志有《少年中国》（亚东），后来又刊行《少年世界》（亚东）。主要的人物为王光祈，恽代英，左舜生，曾琦等。创造社作家如郭沫若，郑伯奇，南国社田汉，最初也都是这里面的社员。后来因为宗教问题，引起了思想的分化，学会遂解散，恽代英一行成了共产主义者，曾琦等组成了国家主义的《醒狮》派。

新青年社本来就没有正式的组织，基本干部的结合，完全由于思想意志的相同，后来的分化，其因也在此。我们只要顺序的一读《新青年》的编目，就可看出在几年之间，是在怎样的激急发展，又是怎样的在和恶劣的环境奋斗。它支配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坛，更发动了后十年的新的文学运动。《新潮》与《少年中国》，不过是它的辅助刊物而已。经过了这运动的第一期，然后才有纯粹的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出现，才有支配着全般文学运动的刊物《小说月报》和《创造》。

这两个会社的史料，搜辑的是相当的不少，文学研究会且收了茅盾的一篇《关于文学研究会》，是更有系统的说明。创造社方面也想找到一篇，无如张资平的《曙新期的创造社》（《现代》），王独清的一篇关于创造社的谈话，都不免于有所失，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叙述既尚未全，也无从节录。本册收发刊诗三首，《创造者》，《我们的花园》，是为《季刊》一二卷首期作的，《创造工程之第七日》是序

《周刊》,同样的是可以看出创刊的态度来的。光华书局曾刊有《创造社论》一书,虽未可作为信史,然未始不可作为研究创造社时之参考资料也。

纯粹的登载杂文的主要刊物,自《语丝》始。《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和《北京大学国学的周刊》,《国学季刊》,那是当时所谓"以科学的方法,从事于国故的整理"的刊物,在旧的文学整理方面,是有着它存在的重要意义的。《诗刊》《剧刊》附载在北京《晨报》上,当时并没有怎样特殊的影响。但后来的《新月》诗派,在此时期已经逐渐形成,是在不断的谋着发展,是可以见到的。沉钟社已经有了陈翔鹤的一篇《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遗憾是未名社,没有找到足以说明这个组织的文字。去年,曾设法请该社干部李霁野写一篇以补阙典,因值华北事变发生未成。这个组织,虽说人数很少,只有李霁野,曹靖华,韦氏兄弟几位,对于中国的翻译文学,特殊是关于俄国的,如果戈里,妥斯托耶夫斯基,以及《新俄》文学的介绍,是有着很重大的贡献的,如沉钟社之于德国文学一样。狂飙社也是有相当影响的组织。主要干部是高长虹,向培良,这里选录了一则宣言。

戏剧方面的组织很有几个,影响最大的,初期只有民众戏剧社,后期当是南国社。田汉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凡十数万言,是一篇极好的社史。为着篇幅的关系,只节取了其间的重要部分。而有此一篇,已经是很够说明,故除社章而外,不再增益什么。其余如《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每周评论》,《世界日报附刊》,及无从抄录创刊词的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虽非纯粹的文学刊物,在文学方面,是尽了很多力量的。联合改造社虽曾经存在,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成就可言。

说到新文学的反动,在初期是林纾一班人,林纾的一信两小说,在本书《理论》与《论争》两集中已经刊载。故此册只收第二期胡先驌梅光迪领导的《学衡杂志弁言》,和第三期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刊》的发刊词。[8](P2-4)

(三)关于"作家小传"的编写

这部分收录了阿英撰写的从新文学运动头十年即开始创作活动的作家142人的小传。但传记内容不限于1927年以前,其下限止于作传的当时。小传以史家之笔,撰写得短小精悍,简明准确,体例严整。兹录二传以见其概貌:

> 丁西林　戏剧家。原名燮林。字巽甫,其处女作为《酒后》,系就凌叔华小说《酒后》改编。一九二五年,出版戏曲集《一只蚂蜂》,系合《酒后》,《亲爱的丈夫》,《一只蚂蜂》三剧而成。后又增益新作,成《西林独幕剧集》一种,书前有序,可作传记资料。[8](P209)
>
> 郁达夫　小说作者。浙江富阳人。创造社干部作家。曾主编创造社诸刊物。最初作品为《沉沦》,出版后,惹起文坛极大争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有《沉沦》一文,为论争中最重要文字。后续出《茑萝集》。一九二七,并收他作,改编成全集五卷:《寒灰》,《鸡肋》,《过去》,《奇零》,《敝帚》。以后又续出六集《薇蕨》,七集《断残》,及不列集之《忏余》。又出版有长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日记《日记九种》,游记《屐痕处处》,及翻译多种。编著书有《小说论》,《戏剧论》。传记资料有现代版《郁达夫论》与北新版《郁达夫论》。[8](P215)

小传开头先以传主的主要著译成就,冠以诗人、小说作者(或小说家)、戏剧作者(或戏剧家)、散文作者(或散文家)、文学翻译者(或翻译家)、文艺理论者(或文艺批评家)等头衔。"作者"和"家"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如郁达夫被称为"小说作者",沈从文被称为"小说家";胡适、沈雁冰被称为"理论者"和"文艺理论者",向培良被称为"批评家"等,显然"家"和"者"是同一头衔的不同称谓,撰写者以行文的方便随意选用。之后介绍作者籍贯、所属的文学社团流派与报刊的关系,以及所处的地位。有的还简单地介绍主要经历。小传的主干部分是对传主著作、翻译和编辑活动与成就的叙述,对选本、文集与单篇作品的关系的介绍,其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为弥补小传由于受篇幅限制所造成的过于简略的缺陷,作者总是在最后提供传主的有关传记资料的线索,供读者进一步研究时查阅。如关于丁西林,小传指出《西林独幕剧集》"书前有序,可做传记资料"。对郁达夫,传末指出了"传记资料有《现代》版《郁达夫论》与《北新》版《郁达夫论》"两种。这种体例,大大增强了小传的史料价值。

对于小传的编写，阿英当初有比这更好的构想，他在《序例》中说："作家小传，本来是预备分请各家亲写的，信件印成，华北事件发生，不得不中止"。[8](P4)倘使阿英这一设想得以实现，便会留下这一百四十二位作家的第一手传记资料。阿英的现代作家小传的撰写与构想，影响了此后新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后来产生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无非是自传与他传两种类型。

（四）关于"史料特辑"

这部分选录了胡适等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和《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胡适、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各一篇；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篇；阮无名《关于新文学初期的禁书》一篇。"史料特辑"中的文献，似可归入《文学论争集》，在阿英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料学的整体构想中，似乎也不是必有的构件，至少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故冠以"特辑"名称。对这部分阿英在《序例》中有一简略的说明：

> 《特辑》卷里，所以特地选用陈独秀胡适两篇《科学与人生观序》，是因为这一论战，对于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学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初期的禁书》，自非当时完备的禁书记载，然即此也足以想见一班了。[8](P4)

（五）关于"创作编目"的编制

这一部分由创作总目、专著（包括文学史、文艺思潮、文学原理、批评研究）、论文集、创作（总）集（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著）的目录所构成。它与"翻译编目""杂志编目"一起，同为《史料·索引》卷的"重头戏"，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主干。

其中"专著"部分录文学史著24种，文艺思潮类2种，文学原理19种，批评研究类16种，其他2种；"论文集"部分录24种；"创作总集"部分录各种文体合编的文学创作总集（即选集）13种，诗歌总集8种，诗歌别集74种（其中《志摩的诗》初版本、改版本算2种，《尝试集》初版本、改版本算2种），小说总集7种，小说别集100种，戏剧总集2种，戏剧集19种（因有的集子是一种戏的单行本，并非全是个人的剧本选集或全集，故不称"戏剧别集"而称"戏剧集"），散文集42种，杂著12种。总目列出后，又分别对每部专著的出版年代出版单位和基本情况作简要介绍。论文集、创作总集、诗歌（总集、别集）、小说（总集、别集）、戏剧、散文等集，并详列书中篇目。值得注意的是，阿英编制《创作总目》时，使用了中国传统文献学中"总集"和"别集"的名称，流露出接续传统文学文献学的意向，并以此来规范新文学史料的编辑并使之经典化的心态。但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此后便少见以总集、别集之名来指称新文学的选集和新文学作家个人文集者。

"专著"中五类著作，除少数几种外，大部分都不属于新文学和有关新文学研究的专著，像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和文艺思潮史、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文学理论等，应该是新文学以外的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最后的"杂著"类中的著作，更属于哲学、政治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范围。这些都一概编入《创作总目》显然有分类不清之嫌。

阿英《创作总目》的编制，对此后的新文学史料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便不断有内部的和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目。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类书籍陆续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郭志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小说卷），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特别是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这些著作所收书目，严格限制在现代文学创作的范围之内，摒除一切非文学的学术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书目。

（六）关于"翻译编目"的编制

这一部分的编制体例略同于"创作编目"。分"理论"和"作品"两大类，先列总目，再按两大类次序对所收书目逐一加以简要说明，介绍著作者、译者及翻译出版年代和出版单位。理论部分只对《过去的幽灵》一书详列书中各篇细目，作品部分对每部书均列细目。

理论部分收理论译作计25种，（其中《苦闷的象征》有鲁迅、丰子恺两种译本）；作品部分中总集收13种，日本作品12种，波斯作品1种，印度作品14种，犹太作品1种，俄罗斯作品65种，波兰作品3种，瑞典作品1种，挪威作品3种，丹麦作品4种，德国作品24种，匈牙利作品1种，意大利作品2种，法国作品31种，荷兰作品1种，比利时作品2种，英国作品21种，南非作品1种。

阿英在《序例》中特别声明："翻译部分，虚白、蒲梢的辑本是很有用的，没有这本编目，我想翻译部分是不会有这样的成就。"[8](P6)他所谓"编目"是指虚白、蒲梢所编《汉译东西洋作品编目》（1929

年)。阿英的编目,对于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的编写,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七)关于“杂志编目”的编制

这一部分有《杂志总目》收录新文学头十年刊行的杂志计285种,以笔画为序编排,有的只标出刊物出版地名,有的还标出杂志编辑社名、编者名、创刊年份。

《杂志总目》之后又有《主要杂志详目》,收总目所列杂志中之主要者计11种。对每种杂志先做简要的总体性介绍,包括杂志名称(及其变更),出版周期(月刊、季刊、周刊、日刊),主编者,发行者,杂志社的变更情况,杂志的性质(政治性刊物、文学性刊物)等。兹录有关《新青年》的简介一则,以见其概貌:

> 新青年 陈独秀主编。月刊。一卷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二卷改名“新青年”。上海群益书社发行。六卷改组为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八卷起,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编辑。十卷改为季刊,为纯粹的政治刊物。故本目录,录至九卷六号止。[8](P391)

概述之后,即详列该杂志每卷每期之细目。对于阅读者的检索极为便当。

另有《特刊专号》一项,对于当时刊物所出的重要《特刊专号》34种共53期(有的专号分上、中、下,有的分若干期,有的分若干集)列细目介绍,并说明特刊专号之名称,出版单位与年份,刊物的卷号序数等。

对于杂志的编目,阿英在《序例》中有一段说明文字:

> 现在说到杂志的编目。关于这一部分的存在,曾经有过很长时期的考虑,就是有没有总目的必要。自然,只为着检查的便利,有着索引已够,不必再来一个编目。就史的意义上讲,却又觉得不可少。因为这些支配着当时运动的典籍,现在已不大容易找到。即从已辑集的单本或索引里可以看见标题,对于这文字所以写作的动机,和在发表时间上的重要,还是不大免于有些茫然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编目,再加有出版期的注明,则一路看来,使从题目上也可见当时文运是在如何的向前发展,好像是再读一部有系统的文学史书。若是在论战期内,更可连同对方杂志编目互看,看双方如何的在刀枪相敌,各文来路极明。要考察作品在史的时间意义上,编目是非常重要,而况这些杂志已难于寻觅?[8](P4)

1988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沅、韩之友、封世辉、舒欣、孙庆升、顾盈丰编制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此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之一出版。编者们都是对中国新文学史料有专门研究和长期积累的学者,编制体例精严细密。天津人民出版社又不惜工本,其责任编辑李福田先生,乃是当今屈指可数的极有眼光的编辑家,能够在经济大潮严重冲击学术的形势下推出这么一部大部头的书,实在是有赖于李先生的识见、胆量与气魄。全书分上下两巨册,16开咖啡色漆布面硬皮精装,配以烫金书名,庄重典雅,古朴大方,令人爱不释手。在笔者见到的中国新文学文献研究的众多书籍中,无论从书籍内容之厚重坚实,还是从书籍装潢之精美大气,都是首屈一指的。此书注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上传之永久的经典之作。

很显然,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期刊目录汇编》的编制,是直接受到阿英“杂志编目”的启发和影响的。特别是对每种杂志的概述和详列每种杂志各卷号之细目的编制体例,是直接取法阿英《主要杂志详目》的。当然《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编制,更为细致周详,便于使用者检索,对阿英的编制方法有了诸多补充和发展。但阿英的开创之功是不能埋没的。

(八)关于四种“索引”的编制

《史料·索引》卷的八、九、十、十一是《中国人名索引》《日本人名索引》《外国人名索引》《社团索引》。这是为便于查阅本书所编制的一组索引。阿英在《序例》中有一段关于索引编制经过的说明文字:

> 起始预备就编目全部索引,数量上又不可能,不得不将单行本诗集的细目除去,只存各册的总题。继而又不得不删去与文学无关的题目。最后更放弃了诗集以外的单本子目。篇名索引自然是更说不上。一删再删的结果,现在印出的全书,实际上不过是原稿二分之一,然已超过预定的份量不少。[8](P6)

“索引”编制体例如下：

一　本书的编目部分分量过巨，故索引只以文学作品，及其有关之杂文为限。其在本范围外者，可查编目。

二　本书索引在每一人名下，包含在刊物上所发表之篇名及单独出版之书名。刊物之篇名用新五号字排印；书名用老五号字排印，题前并冠＋号，以期醒目，而便检查。

三　单行本之内容细目，因节省篇幅，未便全列，读者检查某人之短篇作品而未见于刊物篇名索引者，可根据单行本之页码，检查其单行本详目。

四　本索引分三部。中国人名索引，以笔划多少分；翻译作品，根据原作者之人名分：日本根据首字笔划，外国根据英文字母，后附文艺团体索引，亦以笔画之多寡为次序。[8](P1)

阿英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便是该学科的奠基之作和示范之作。随着学科的发展，一代代学者从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编辑方面，在各种目录、索引的编制方面，不断推出更高水平的新成果，把现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但阿英在该学科的开辟、首创之功，是值得后学者永远纪念的。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日益意识到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阿英作为第一代现代文学文献收藏家和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家，他对新文学史料学构建的奠基性意义和拓荒性贡献逐渐得以呈现并被更多的研究者所认可。

阿英有着清醒的史料收藏与研究意识，这在他同时代的作家和研究家中是极为难得的。早在赵家璧构想编辑《大系》之前的1934年，阿英就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的出版，对于史料收集的繁难有所感慨：“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当时的一些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4](P1-2)正是由于勤勉的收藏与积累，当赵家璧编辑《大系》时，阿英才得以大显身手，不仅为其他各卷的编选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而且毫无疑义的成为《史料·索引》卷的当然编选人。该卷的成功编选，也让阿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史料学的奠基者与开创者。对此，有研究者给于了中肯的评价：“实际上，搜集、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工作，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便已有规模的展开。这个‘大系’，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一部很有分量的文学总集，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之重大甚至不亚于《昭明文选》之于中国古代文学。……全书由蔡元培撰写总序，而且第十卷便是由阿英所编之《史料·索引》卷。从文献学角度看，这是一次十分规范的文献整理的大行动”。[9](P7)

阿英的《史料·索引》卷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典范和奠基之作，被认为是“十分规范的文献整理”活动，是因为他在构建该学科的研究框架、确定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方面，都起到了发凡起例的先导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现代文学的原始文献，包括现代文学创作和与创作相关的文献；其次是由对现代文学原始文献进行整理、研究而衍生的二级文献。[9](P12)原始文献中除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按小说、诗歌、散文、戏曲四种体裁各自编集，与创作相关的文献，诸如作家的生平史料、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料、文学运动、现代文学报刊史料及出版史料都被纳入《史料·索引》卷的收集范围，由此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后人的史料学研究大都围绕这些展开。比如阿英的中国现代作家小传的撰写与构想，就影响了此后新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

目录和索引是《史料·索引》卷的又一显著特色，既体现着阿英对中国传统学术优良传统的继承，又展现出他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开放胸襟和远见卓识。该卷中的《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是早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一项重要收获，在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学中具有开创之功和发凡起例的示范作用。创作总目按四种体裁对新文学创作进行分类，与《大系》的编选体例一致，对后来新文学史的撰述、文学作品的选辑以及现代文学目录的编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编目》和《杂志编目》的创制，则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包容了欧风东渐影响下不断产生的新文献类型，反映出新文学研究界和阿英自己对新文学与翻译文学以及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之间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对后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史著都对此列有专章。索引部分以实用为目的，有人名和社团两部分，人

名又有中国、日本、外国之分，虽然分类以今天的标准看存在问题，但反应了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是第一部新文学索引，影响深远。

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卷，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新文学史料学的构建具有导夫先路的开拓之功。他的贡献将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入而带给研究界更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赵家璧.编辑忆旧[M].北京:三联书店,1984.

[2] 茅盾.回忆录18[J].新文学史料,1983,（1）.

[3] 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4] 钱杏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M].上海:光明书局,1934.

[5]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 鲁迅.鲁迅日记: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7] 于伶.先驱者战斗的一生——缅怀郑伯奇同志[A].党的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 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9] 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冯济平

Ah Ying'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to the Collection of New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ilation of *Index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New Chinese Literature* (1917–1927)

ZHAO Lian-chang[1]　LI Guang[2]

(1.College of Art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66071, China;

2. Bureau for Letters and Calls, Ji Ning 272100, China)

Abstract: *Index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New Chinese Literature* (1917-1927), compiled by Ah Ying, has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foundation wor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hilology, it has played a pioneering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hilology and in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ary research framework and determining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Ah Ying; editing and publishing; stud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new literature

左翼乡土小说的鲁迅基因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内在关联

田 丰[1,2]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 要：为数众多的左翼乡土小说家是在鲁迅的直接影响和大力扶持下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也正因此左翼乡土小说携带有明显的鲁迅基因。在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的示范带动下，左翼乡土小说家并未因致力于反映现实和表现时代而全然忽视风情画、风俗画和风景画的呈现，在注重政治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忽略乡土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审美特征。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在作家群体构成、创作理念以及叙事模式等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显现出两者之间颇为紧密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鲁迅；五四；左翼；乡土小说；关联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95-06

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支脉，左翼乡土小说在注重政治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忽略乡土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审美特征。在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的示范带动下，左翼乡土小说家并未因致力于反映现实和表现时代而全然忽视风情画、风俗画和风景画的呈现，并非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毫无美感可言，在帮助读者认清当时农村社会现状的同时也能够让读者获得审美愉悦和美感体验。

一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正是他荦路蓝缕、披荆斩棘方才开发出乡土小说这块值得深入垦殖的文学沃土，之后的左翼乡土小说家正是在以他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的影响和启示下从事乡土小说创作的，因此在这两者之间自然而然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受过五四的洗礼和熏陶，与五四乡土小说家有着极为相似的情绪感触和人生体验，因而双方从心理上和情感上并没有太大的隔阂，极易产生共鸣。为数众多的左翼青年乡土小说家是在鲁迅的直接影响和大力扶持下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对此蹇先艾就曾说过："事实告诉我们：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者，尤其是北京的青年们，多数是在鲁迅的扶植下，或者受了他的小说的熏陶才从事写作的"[1]（P64）。也正因此左翼乡土小说携带有明显的鲁迅基因，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左翼乡土小说中"茅盾模式显然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不能忽略的是，仍有相当多的作家继续着'五四'的反封建和进行思想启蒙的命题，继承着鲁迅乡土小说的模式"[2]（P115-116）。其实就连身为左翼乡土小说重镇的茅盾本人也深受鲁迅的影响和熏陶，早在五四时期他便对鲁迅称赞不已，曾经明确说过："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3]，并且还号召作家们要以鲁迅为榜样切切实实地描写农村。当年鲁迅的《呐喊》结集出版后社会评价不一，茅盾敏锐地认识到《呐喊》所蕴藏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而给与了充分肯定，

收稿日期：2018-01-2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左翼文学的本土化转向及文本形态研究"（HB17ZW015）

作者简介：田丰（1981-），男，河南新乡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认为《呐喊》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的五四精神，而且还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4](P398)，将其作品视为五四新文学仅有的收获。另一重要代表作家吴组缃的乡土小说在创作技巧和表现内容方面也深受鲁迅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与他仔细研读鲁迅的作品并从中获取借鉴是分不开的。吴组缃在尚未成年时便阅读过鲁迅的大量作品，对于其中的许多言论警句都能达到背诵的程度，逐渐引发他产生许多联想，教他关心现实和热爱生活，正是在鲁迅启发下他开始关注现实，“进而探索自然与人生，一直归总到对国情，对社会的缕心忧念”[5](P263-264)。

身为左翼领袖的鲁迅对于左翼青年乡土小说家的发掘和培养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力，这单从他对萧军、萧红、叶紫、柔石、蒋牧良和艾芜、沙汀等青年作家的扶持与帮助上便可以见出。叶紫在周扬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在谈话中鲁迅鼓励他要将苏区的真实情况描绘出来。叶紫的短篇小说《电网外》就是应鲁迅的要求创作而成的，在经鲁迅审阅后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检查改名为《王伯伯》公开发表，之后鲁迅又将这篇小说推荐到《国际文学》上发表，使得叶紫在左翼文坛刚刚崭露头角便有了国际读者。萧红、萧军刚到上海时人地生疏，鲁迅特地在梁园豫菜馆请客将他们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等人关照他们，还特别委托叶紫做二萧的“监护人”和“向导”，在生活上指导他们。为了帮助萧军和萧红在文坛立足，鲁迅利用自己在上海出版界的朋友关系极力推荐他们的稿件，萧红到上海不久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小六》《饿》和《三个无聊的人》等作品得以顺利在《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刊出，从而很快便崭露头角。鲁迅 1934 年 10 月 9 日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就文艺创作方向及题材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指导萧军“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6](P224)，这对正在着手创作的萧军而言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从而坚定了他的创作信心。有一次叶紫和萧军为了《八月的乡村》的插图事宜一块去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访问版画家黄新波，在离开宿舍的时候萧军不仅向黄新波宣布了自己的住址，而且还邀请另外几个青年有功夫到他家里来玩，叶紫出了宿舍后责备萧军不应该暴露自己的住址，并让他赶紧搬家。鲁迅听了二萧报告事情的经过之后，在称赞“叶这人是很好的”[7](P356)同时又专门写信提醒二萧“以后关于不知道其底细的人，可以问问叶他们，比较的便当”[8](P408)。叶紫、萧军与萧红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等左翼乡土小说经典著作不仅全都经过鲁迅的认真审阅及修改，而且也都是在鲁迅一手策划和资助下才得以面世的，为了帮助这些作品打开销路他还一一亲自写了序文。在叶紫的《丰收》出版之后，鲁迅还特意邀请文界和出版界的朋友撰写批评推介文章以广为宣传，由此使得叶紫很快便引起文坛瞩目。萧军和萧红也因《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及时出版不仅迅速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而且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少的新奇与惊动”，成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9](P188)。设若没有得到鲁迅的提携和帮助，叶紫、萧军和萧红的作品在当时的特定情形下要么很可能永远埋没下去，要么也极有可能遭遇出版延宕而无法及时发挥作用。

1925 年柔石在北京大学曾经旁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1928 年他来到上海后不仅经常陪伴在鲁迅左右，而且还在鲁迅家搭伙吃饭，成为鲁迅唯一敢于托付私事的人。在生活中如此亲密，在文学创作上柔石也深受鲁迅的熏陶和影响。在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下柔石创作完成了《疯人》；他的《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的主题思想也与鲁迅一脉相承，人鬼原本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他却反过来欺压更为弱小的妻儿；《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单从篇名便不难见出受到鲁迅《祥林嫂》影响的痕迹，小说中以乞讨为生的老妇人和祥林嫂一样想向人们倾诉自己的苦难，但却得不到人们哪怕一丝的同情；《死猫》里的木匠文土颇有几分阿 Q 相，整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发财以及发财后该如何摆阔气。不仅如此，柔石也得到了鲁迅的大力提携，参与了由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的编辑工作，他的名作《为奴隶的母亲》最初就发表在该刊上。蒋牧良的处女作《高定祥》1933 年在《现代》上刊发后引起了鲁迅的关注，专门询问作者是否还有其他新作，正是在鲁迅的关心和肯定下蒋牧良方才坚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辞去职务专心从事写作，接连创作出《当家师爷》《懒捐》和《赈米》等乡土小说力作。

虽然丁玲早年在给鲁迅写信时因受到误会而未能得到回信，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在文学创作上接受鲁迅的启发和引导，她在《鲁迅先生于我》中说过：“我把他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写作的途程中，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10](P248)，由此方才逐渐从表现女性自我的小圈子走向广阔的天地。不仅如

此，丁玲还从鲁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中汲取营养，从而有助于她理性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丁玲的《水》刊发后深得鲁迅的赞许，他曾特意向丁玲索要了十余册分送给中外朋友以便向中外文坛介绍推广。

彭柏山在创作上也得到过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他的《崖山》创作完成后先是交由周扬审阅，但周扬并未予以推荐，之后他又通过胡风转交给鲁迅审阅，鲁迅看过之后推荐给杨骚方才得以在《作品》创刊号上刊出，后鲁迅又嘱托胡风将该小说推荐到日本《改造》月刊发表。

周文也是在鲁迅的直接扶持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在创作之初由于参加实际革命活动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之左联初期内部一直有着创作影响革命的声音，周文曾一度想要放弃写作，鲁迅惜其文才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验和经历现身说法，耐心开导他“创作，应该是艰苦的，不断的，坚韧做去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攘得太厉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竟转过身去用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11]（P170-171）周文在鲁迅的开导下茅塞顿开，不仅重新执笔创作，而且还始终牢记着鲁迅的教诲坚持描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其乡土小说作品从世态描写、地方色彩呈现以及深沉的文化心理关照等多个层面都“无疑受鲁迅的《呐喊》《彷徨》的影响更甚”[12]（P496）。此外，众所周知，艾芜和沙汀两人是在鲁迅的指导下完成创作转向的，这早已传为文坛佳话，鲁迅回信中“选材要严，开掘要深”[13]的敦敦教诲被二人奉为圭臬，为深陷迷津中的他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当然，受过鲁迅提携和教诲的左翼青年乡土小说家还远不止以上这些，但由此便不难见出鲁迅对于左翼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之深。与此同时，左翼青年乡土小说家在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家优良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扬，从而使得“左翼乡土文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整体超越，就更加突出”[14]（P213）。不仅如此，左翼乡土小说家与五四乡土小说家在人员构成上也有一定的交集。王统照、王鲁彦、许杰、王任叔、魏金枝和彭家煌等都是横跨五四和左翼两个时期的乡土小说家，其中王任叔、魏金枝和彭家煌还是左联成员，王统照则是左联的重点联系对象，许杰虽未正式加入但从内心里也“自认为是左联的一个成员或者是一个同志”[15]。总之，他们都经历了从启蒙到革命的思想转变，从而起到了沟通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左翼乡土小说家沿着由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创作道路继续推进，方才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左翼十年乡土小说创作风潮。

二

左翼乡土小说家大都经受过五四的洗礼和熏陶，与五四乡土小说家有着十分相似的情绪感触和人生体验，因而双方不仅在心理和情感上没有太大的隔阂，而且在作家群体构成、创作理念以及叙事模式等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显现出两者之间颇为紧密的内在关联，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作家群体的主体构成来看，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一样大都是经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他们的作品也基本上都是在城市完成的。这是由于长久生活在某一地域内的人们对于本地风物事相早已习惯成自然，反倒不大可能发觉其新奇独特之处，只有到了异地尤其是城市之后才能通过对比和回忆重组体认到故乡农村所特具的地方色彩与乡土风味，从而行诸笔端创作而成乡土小说。此外，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大部分作家都和土地以及农民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单从出生于城镇的鲁迅、茅盾等人的现实状况即可见出。鲁迅虽然出生于绍兴城里的官宦人家，但其母亲的娘家却是在农村，他小时便时常跟随母亲住到外婆家，稍大时又因家庭罹难在舅父家寄居过，因而逐渐知道农民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不一样了”[16]（P411）。同时由于家道中落，他对于农民的苦难遭际也更能引起同情和共鸣。茅盾的祖母的母家也是在农村，而且他家里几代的“丫姑爷”都是农村人，时常往来走动，并不把他当外人，因而能够听到他们的真心话，间接了解到一般农民的生活情形和思想状况。

其次，左翼乡土小说和五四乡土小说在创作理念和叙事模式上也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左翼乡土小说家为革命、为社会的创作宗旨与五四乡土小说家所秉承的“为人生而艺术”等创作理念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也都关心民瘼疾苦，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相较于推崇“为艺术的艺术”的创造社而言，聚集了大量五四乡土小说家的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为人生”和“血

和泪”的文学主张更容易与革命文学衔接起来，而且这些主张在当时即已得到鲁迅的认可和支持。

究其本质而言，五四乡土小说家是以从西方文化中习得的现代意识来认识和剖析中国农村及农民的，在揭示出农民凄惨处境和悲剧命运的同时也着重表现了农民身上所常见的性格愚懦和灵魂麻木。左翼乡土小说家也大体如此，他们也在作品中揭示了农民乃至革命农民身上所存在的精神弱点和思想弊病，只不过在对本土文化进行反思时选取的参照系有所不同，他们更加注重从苏俄和日本文论资源中汲取养分。同时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小说家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家也都自觉否弃了只见自然美而不见农家苦的传统文人乡村叙事的常见套路，将单纯描摹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和恬静悠闲的农家生活的作品排拒在外，而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家反倒自觉地接续起这一传统，因而呈现出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风貌。鲁迅之所以将目光转向农村也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其中主要缘于他通过切身体验深刻地认识到潜藏在农民身上的国民性弱点，以及十分理性地把握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能带来农村的大变动。因而，鲁迅一方面试图通过乡土小说创作揭示出“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16](P411)，以此唤起人们对于农村和农民所存在的思想局限的认识和关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以其作品警示革命者必须汲取辛亥革命的教训，唤醒广大农民参与到革命进程中来，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左翼乡土小说家正是延续着以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的创作路径继续前进的，不仅在表现底层人民苦难遭际和悲惨命运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而且他们所着重表现的正是鲁迅所热切期盼的农村大变动时期到来时的情形，热切呼唤和引导农民起来革命。

左翼乡土小说家与五四乡土小说家在人性、人伦和人道等的表现上也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揭示出中国国民人性麻木与冷漠的弊病，对于封建伦理制度摧残人性的本质也都有所批判。

最后，左翼乡土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有着相似之处，显现出一定的关联性。鲁迅在《阿Q正传》中成功塑造的阿Q形象对于左翼乡土小说家有着极其强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类似于阿Q的人物形象系列，对此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大量专门论述，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与此同时，左翼乡土小说家还在鲁迅的影响和启示下塑造了一大批的看客形象。柔石《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的人鬼妻之所以会走向绝路就与看客的恶意嘲讽有关。人鬼对于妻子不管不顾，邻居天赐出于好心不但时常接济她，而且还由他出面从人鬼每次殓葬的收入中截留一部分充作人鬼妻的生活费，但却由此遭到看客的讥笑和嘲讽，并且还说人鬼的儿子是天赐的野种，最终导致儿子遭人鬼毒打和惊吓身亡，人鬼妻在万念俱灰之下上吊自尽。端木蕻良《大地的海》中的逃荒老人为了活命想要卖出女儿，却遭到村里看客们的肆意奚落，他们学着老人的山东调辱骂着父女俩，毫无同情心地任由老人一家挣扎在死亡线上。周文《投水》里的陈么嫂遭到松寿奶奶逼债和丈夫毒打后投水自尽，而在这一过程中同为高利贷受害者的孙二嫂和水生嫂却始终充当着无情的看客，借着对陈么嫂的谩骂和讽刺来取媚松寿奶奶，最终陈么嫂不堪其辱而寻了短见。此外，在王统照的《父子》等其他左翼乡土小说中也有着与鲁迅作品中颇为相似的看客形象。

三

在乡土小说仆一问世时地方色彩之于乡土小说的重要性便引起格外关注，鲁迅、周作人和茅盾等都对此展开过论述。鲁迅不仅在私人通信中特意强调“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17](P5)，而且在他本人的乡土小说中也确然呈现出江南水乡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在鲁迅的引领带动下地方色彩俨然成为乡土小说的重要标识，“表现‘地方色彩’（local color）变成新文学界口头禅，乡土文学家也彬彬辈出”[18]。事实也的确如此，许钦文、王鲁彦和许杰等人的乡土小说展现了浙东的自然景物和优美风光，彭家煌的小说则有着浓郁的湖南乡土气息，蹇先艾也描绘出老远的贵州那奇异的风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茅盾为首的左翼乡土小说家不仅极为重视以进步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来认识和反映农村社会现实，同时也在延续五四乡土小说家重视地方色彩描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地域表现范围。从作家的地域分布来看，五四乡土小说家除了来自山东的王统照和河南的徐玉诺、尚钺外基本上都是来自南方省份，其中鲁迅、王鲁彦、许钦文和许杰等来自浙东，而彭家煌、黎锦明等来自湖南，废名来自湖北，蹇先艾来自贵州，台静农来自安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来源却更为广泛，其中仍以南方省份的作家为主，比如浙江的茅盾和柔石等，以及湖南

的叶紫、丁玲、蒋牧良、彭柏山等，湖北的吴奚如、聂绀弩等，还有来自安徽的吴组缃，来自四川的艾芜、沙汀、周文和罗淑等，云南的马子华等，广东的丘东平等，此外，还有来自黑龙江的萧红，辽宁的萧军和端木蕻良，等等……不仅南方省份有所扩大，而且东北籍作家的异军突起在扩大了乡土小说地域表现范围的同时也带来了粗犷、硬朗、剽悍而又朴实的北方原野之气。与此同时，来自山东的王统照在左翼时期也写出了长篇代表作《山雨》，引起文坛注目，茅盾曾撰文评价道："全书大半部的北方农村描写是应得赞美的"[19](P199)。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加之农民们囿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限制而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因而"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20](P5)。由此便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殊景观，因此作家只要写到农村和农民便不可避免地要描写与展现他们所赖以生活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以及民风民俗。

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高举科学和民主这两大旗帜，对中国传统社会乡土民俗信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中国农村的传统乡风习俗往往被视为野蛮的和残忍的，甚至充满着血腥味，除了桎梏乡民们的精神和灵魂外别无价值。因而，五四乡土小说家一方面在小说文本中表露出对于乡村淳朴民风和童年美好印象的深刻怀念，另一方面也对乡土民俗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从而展现出封建习俗文化给农民所带来的沉重灾难和酿成的人生悲剧，有力地揭示和控诉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并藉此反映出农民身上所存在的国民性弱点。左翼乡土小说家秉承五四乡土小说家的遗绪，同样极其重视揭示带有封建迷信意味的恶风陋俗给农民造成的深重苦难。

首先，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一样都在小说文本中描绘过典妻、卖妻等独特的婚恋习俗，呈现出颇为相近的格调与风貌。五四乡土小说家描绘过各式各样的婚恋奇观，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典妻""卖妻"，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的《负伤者》和《蚯蚓们》等都揭示过此类婚俗事相。除此之外，还有"强迫寡妇改嫁"（鲁迅《祥林嫂》和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冥婚"（王鲁彦《菊英的出嫁》）等等不一而足。许钦文的《老泪》更是通过女主人公彩云的奇特经历将"借种""入赘"和"招补床老"等婚俗和生育奇观一一做了展示。对于由典卖妻子的婚恋习俗所引发的悲剧在左翼乡土小说家柔石和罗淑笔下得以延续，他们各自创作完成了经典之作《为奴隶的母亲》和《生人妻》。

其次，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五四乡土小说家都在科学与民主思想引导下揭示和批判了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地方习俗。

五四乡土小说家在科学、民主思想影响下否定和批判了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传统民俗文化。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绘过许多浙东一带有着封建迷信意味的恶风陋俗，比如《祝福》中祥林嫂在柳妈劝告下想要通过捐门槛的方式来赎罪，以避免到了阴间被两个丈夫劈为两半。民间自古就有相信巫医的陋俗，农民们在患病时常常宁愿求神也不相信科学，以致延误病情，付出惨重的代价。鲁迅《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在孩子染上重病后不去求医问药，而是求何小仙施法用阴阳五行来治病，结果因贻误病情致使孩子不治身亡。在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菊英在走亲戚后不幸感染白喉，不过由于发现及时，通过西医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但笃信菩萨的菊英母亲却不愿带女儿到医院看病，而是虔诚地到庙里去求香灰，结果贻误病情导致女儿病死。王鲁彦《河边》中的明达婆婆也是如此，她并非无钱到医院医治，而是根本不相信医院能够医好她的病，宁愿拖着病体冒雨前往关帝庙求神保佑。许钦文《老泪》中的明霞得了热病，其母亲彩云也是不愿去请医生，一大早就到庙里求菩萨，抽到了上上签后不禁喜出望外，以为女儿会受菩萨保佑转危为安的，却不料明霞在吃了香灰做成的所谓仙丹后很快死去。

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也大量描绘了此种带有迷信意味的传统民俗，并且对此也做了必要的合理的批判，从而指示出其骗人的本质。

王统照《山雨》中的奚大有在生病时先请巫医写就一张纸符，之后将这张纸符烧成灰，用白水冲开后口服。但王统照并未在小说文本中对此进行批判，而是仅限于展示此种迷信习俗。魏金枝在《做肚仙的人》中则揭示了所谓"肚仙"的虚妄性和欺骗性。洪焕叔发现稻田遭了虫灾面临绝收后想到了一条妙计，那便是装成"肚仙"欺骗别人来换取生活费用。他在装作"肚仙"给人看病时也会开出所谓的神药，但实际上却是将藿香丸捻成粉末后放在烟灰里做成的，只能治疗轻微一些的肚痛头痛。吴组缃《黄昏》中桂花嫂子家的七只鸡被人偷去后，她用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砍刀板咒"来发泄内心的怨愤。三太太的孙子福宝子一连病了十多天也不见好转，绝望之下三太太想要通过"喊魂"来使孙子转危为安，最终却仍未能挽留住孙子的性命。吴组缃《天

下太平》中的丰坦村由于所处位置等客观原因侥幸躲过了许多次的兵燹人祸，也没有遭遇过大的天灾，因而能够独处一方悠然自得地过着太平日子，但村民们却将此完全归功于神庙的护佑，尤其是庙顶上的“一瓶三戟”更是被视为神物，受到全村人的顶礼膜拜。然而，丰坦村最终还是未能躲过破产的命运，在外面商铺里做店员的村民们被辞退之后纷纷回到村里。朝奉王小福在走投无路之际打起了宝瓶的主意，却在即将得手时因精神恍惚连同宝瓶一起从屋脊上跌落致死。透过丰坦村的最终破产以及王小福的悲惨遭遇足以说明所谓神灵信仰只不过是封建迷信罢了，除了麻痹村民们的精神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保障。

参考文献：

[1] 蹇先艾.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A].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2] 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1999.

[3] 郎损（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J].小说月报,1921,12（8）.

[4] 茅盾.读《呐喊》[A].茅盾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5] 吴组缃.感激和怀念——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A].拾荒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8.

[6] 鲁迅.341009致萧军[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鲁迅.350121致萧军、萧红[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鲁迅.350313致萧军、萧红[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许广平.追忆萧红[A].许广平文集:第1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10] 丁玲.鲁迅先生于我[A].丁玲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09.

[11] 周文.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A].周文纪念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1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J].十字街头,1932,（3）.

[14]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 许杰.我与左联[J].新文学史料,1980,（1）.

[16] 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5.

[17] 鲁迅.340108致何白涛[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5.

[18] 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J].国闻周报,1934,11（44）.

[19] 东方未明（茅盾）.王统照的《山雨》[A].王统照研究资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1983.

[20]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3.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Lu Xun Gene in the Left-wing Native Novels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y 4th Native Novels

TIAN Feng[1,2]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2.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left-wing native novelists are engaged in the creation of native novels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May 4th native novelists led by Lu Xun, so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 large number of left-wing native novelists are engaged in literary creation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and vigorous support of Lu Xun, so they are also carrying the obvious gene of Lu Xun in the left-wing local novels. The left native novelists do not completely ignore the graffiti, genre painting and landscape painting because they aim to reflect the reality.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political narrative, they not entirely ignore the nature of literary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Left-wing native novels and the May 4th native novels have similaritie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show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very close groups of writers, the creative ideas and narrative patterns.

Key words: Left-wing native novel; Lu Xun; May 4th native novel; connection

台湾士人与清代台湾地方志之修撰

杨齐福 吴敏霞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众所周知，清代台湾方志数量众多，且特色鲜明，影响深远。而清代台湾科举考试造就了大批士人。他们不仅保存地方文献，而且积极推动并亲身参与台湾地方志的编修，同时还创新台湾地方志的修撰体例，从而使得清代台湾地方志在中国地方志中独占一席之地。

关键词：清代；台湾士人；台湾地方志；编修；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101-05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后便举行科举考试，其中童试在台湾举行，乡试在福州举行，会试则在京城举行，清代台湾产生了33名进士、305名举人和成千上万名生员。这些人构成了清代台湾士人群体的骨干。

地方志是地方的百科全书，不但包含历史地理，而且还涉及风俗习惯与诗文掌故等。清初“台湾草昧初开，无文献之征”[1](P82)。因此，台湾地方官立即着手编修地方志，一批水平高、质量好的方志纷纷问世，如《台湾府志》《诸罗县志》《凤山县志》《台湾县志》等。学者认为“虽然台湾地处边陲，但台湾在文化上并不多落后，有些成就以后凌驾闽南各府之势，甚至比全国泰半的府要强得多，譬如在地方志编修方面。”[2](P21)清代台湾地方志数量众多，种类繁多，可与内地相匹敌。清代台湾士人群体在台湾地方志编修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产生怎样影响？这一切皆有必要值得深入探究。

一

地方志既是前人留给后人的文化瑰宝，也是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佐治手段，因而颇为地方官员所重视。

清代台湾地方官对地方志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如诸罗知县季麒光指出：“志书之作，所以纪风土、山川、人民、物类以备考证也。故在国为史，在郡邑为志；史举其纲，志详其目；史则纪事以文，志则行文以事。疆域由此而定焉，形胜由此而明焉，高卑燥湿肥脊刚柔由此而辩焉，民情之聚散忧乐由此而周知焉，物力之丰啬盈亏由此而调剂焉，政令教化之从违得失由此而准焉，人才之盛衰、风俗之臧否由此而劝惩焉，是郡邑之不可无志，犹国之不可无史。史者权也，志则物之有轻重而受其衡者也；史者度也，志则物之有长短而受其准者也。故史废则无文，志废则无事，历代以来所务重焉。”[1](P83-84)他通过方志与国史的详细比较，突出其“衡”与“准”之独特效用，强调“郡邑之不可无志，犹国之不可无史”，指出“广见闻而资考证者，莫重于郡邑之志。”[1](P81)澎湖通判蒋镛认为“志书之作，原为显微阐幽、信今传后，必有裨于地方风化，以待輶轩之采。”[3](P7)他充分阐发方志的功能为“显微阐幽、信今传后”，进而凸显方志的价值为“有裨于地方风化，以待輶轩之采”。于是，

收稿日期：2018-04-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举考试与东亚社会”（17BZS025）

作者简介：杨齐福（1967-），男，浙江临海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吴敏霞，女，浙江海宁人，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他们时常参阅地方志来理政。如凤山知县宋永清在任时，“簿书之暇，索志披阅；见夫封域有书、秩官有书、武备赋役有书、风土人物有书，规模次第，了如指掌。”[4](P5)他们还对地方志编撰各抒己见。如巡台御史金溶指出，“史则善恶俱载，褒贬予夺，字字霜严；志则稽古证今，忠孝节义，千秋永鉴”[5](P6)，突出写史与修志之迥异。巡台御史立柱则强调“非博采广闻、熟悉者久，不敢志，亦不能志”[5](P1)。嘉义县学教谕谢金銮认为“志书之作，如记述事实则必宗史、汉，议论则必仿韩、欧，纪山水则必律诸禹贡、水经，书物产则必铅诸尔雅传疏；至于杂采论述，则间取乎说部之体”[6](P12)。

二

因为台湾“地方新入版图，以往并无方志，所以修志便为当时地方官视为最迫切的工作。”[7](P634)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知府蒋毓英纂修《台湾府志》，“以事为质，以文为辅，包括琐碎，挈提要领，本史法而为志，诚良志矣。”[1](P83)因台地政权初设，规制未备，该志内容比较简单。康熙三十三年（1694）台厦道高拱乾编修《台湾府志》，内容更丰富，条目更完善，“分野画疆，辨若指掌；文事武备，灿焉毕具。既详于政治、风俗、奢俭、缓急之故，复究于形势、阨塞、封疆、壶柝之计；而且田赋、坟垆、龟鱼、筱簜以及山薮、川浸、男女、畜扰，罔有或遗。”[8](P6)他在自序中交代了修志的背景，“夫有疆土，必有风俗；有制度，必有沿革。海外兵燹之余，人心甫定、耳目未开，不为搜罗废坠、纂辑典故，使天下观者如身履其地而习其俗，无以彰圣天子一德同风之盛、广久道化成之治，则亦守土者之过也。……矧台疆初辟，百度草创，遗编故老湮没无闻；即欲成书而无征不信，又孰从而志之？”因此，他在政事之余，“与父老子弟咨询采揽；凡山川之险易、水土之美恶、物产之有无、风气之同异、习俗之淳薄，远自生番殊俗，下及闾阎纤悉，每闻见有得，辄心识而手编之。……纲举目张，巨细必载，有功必录，有美必书，公诸众心，以观厥成。”他还直言其编志之目的在于“倘圣天子轸轩下采，询及海隅，斯志遂得入奏以附大一统之末，为三代以来未有之盛事。”[8](P7-8)台湾知府周元文称赞高拱乾编修《台湾府志》，“凡山川、形势、风土、人物、户口之所登、田赋之所入，大而官常建置，细而草木昆虫，与夫灾祥节义、骚人逸士之类，靡不毕集”[4](P3)。因历年久远，台湾“利弊之兴革、禄秩之升迁、庙学之兴建、多士之蔚起，与夫土田之垦辟几何、生齿之繁殖几何”渐渐模糊，倘若台湾地方志“不为蒐辑而增修之，致令前有可传、后无可征，一切盛衰得失之故、兴废沿革之由，尽湮没而莫稽”[4](P5-6)。为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台湾知府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其条目大都沿袭高拱乾修的《台湾府志》，其内容仅为增补“高志”修后之事，因此有重修之名而无重修之实。他在序言中阐述其重修台湾府志的原因，“垂十七年矣，慨未有增而辑之者，……是用忘其固陋，修而辑之。其中或因于昔、或创自今，有者仍之、阙者补之。”[4](P3)雍正、乾隆年间台湾行政区划不断完善，文化教育发展迅速，而“台湾旧有郡志，其中建置、沿革、人物、风土，一时草创，未能详备；而忠孝、节烈、文人、奇士，又或传闻之未真。”[9](P5)乾隆三年（1738）台湾道尹士俍编纂《台湾志略》，因私人修志，仅就其“所见所闻，聊缀数言”，故较为简略。[10](P2)因“旧志规模虽具，详略弗称”，乾隆五年（1740）刘良璧重修《台湾府志》，“芜者芟之、阙者补之”[9](P7)，“沿革损益，文简而事备；风土人物，焕然一新。”[9](P5)乾隆二十五年（1760）余文仪深感以前所修府志“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乃“集新旧志而增损之”[11](P3)，续作《台湾府志》，“备兰台之储、輶轩之采，且使守兹土者有所奉以咨览”[11](P5)。

虽然清廷收复台湾后立即设府立县，但首批县志直到康熙末年才出现，主要有陈梦林纂修的《诸罗县志》、陈文达纂修的《凤山县志》和《台湾县志》。康熙五十五年（1716）陈梦林纂修的《诸罗县志》为台湾县志中图例最完备、语言最精练、史料最丰富的志书，成为台湾县志的“模范志书”。[12]史载“台郡之有邑志，创始于诸罗令周宣子；其时主纂者，则漳浦陈少林也。二公学问经济，冠绝一时；其所作志书，朴实老当。所诸罗为初辟弇陋之地，故每事必示以原本；至其议论，则长才远识，情见乎辞。”[6](P11)雍正元年彰化设县后，“草昧既开，文明渐启”，“以煌煌大邑，前未经名人之游览，后未闻学士之品题，百余年来，无有为之撰述而编辑之者；欲征文无文之可征，欲考献无献之可考”，况且“台郡四县，台邑有志，凤邑有志，嘉邑虽无志，然从前诸罗旧志犹有存者，亦尚可考；独彰邑缺如，岂不亦海外巨区一大遗憾乎”，知县周玺遂在当地士人的协助下纂遂修《彰化县志》，“广搜博采，远引旁稽”[13](P3)，“凡有裨于政治者则书之，有关于风化者则书之，有以资他日之掌故者

则书之。”[13](P1)

然而这些县志“于古无稽、于今未备”，随着“时移物换，踵事增华，因革损益，日异月新”[5](P5-6)，重修县志大势所趋。乾隆十七年(1752)鲁鼎梅以“經制之源委、閭閻之利弊、地勢之扼險設要、民俗之厚薄淳漓，雖耳濡而目染之，而撮其要不能記其詳，舉其大而或遺其細”为由重修《台湾县志》。[5](P13)嘉庆十四年谢金銮、郑兼才“以旧志简略，久未续修为憾”，又重修《台湾县志》，较鲁修县志“增辑过半，美备有加”[6](P7)。乾隆二十九年(1737)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体例精严、叙次简核”[14](P1)。噶玛兰厅“开辟未久，文献无征”，咸丰二年(1852)陈淑均修《噶玛兰厅志》，“从此可以周知生齿之登耗、财用之繁殖、赋役之重轻、人物风会之盛衰以及天文星野灾祥之异、地利险要扼塞之防、历来政教文章之治；上以验朝廷休养生息之隆，下可为闾阎风俗之助。是固司牧者之考镜，而亦史家文士之鸿裁也。”[15](P5)鹿港同知陈盛韶称“此书之作，尤综核名实，纲举目张，可谓精矣。”[15](P3)淡水厅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但“厅志向无成书。”道光年间郑用锡撰修《淡水厅志》初稿四卷，同治六年(1867)淡水厅同知严金清聘请林豪编修《淡水厅志》续志稿十四卷，“皆大路椎轮，未及刊刻”[16](P9)。同治八年(1868)陈培桂修《淡水厅志》，“事求其实，政不厌详；浮文缛节，概从芟薙”[16](P5)。但林豪指责陈培桂修《淡水厅志》“或前后易置、或改换门目、或增损字句，究不能出原稿范围；而又有心立异，遂使颠倒错乱，以讹传讹，不类不伦，自相枘凿”[16](P464)。雍正五年(1727)澎湖设厅，“一切土俗、民风、山海、物产、学校、吏治，皆缺略未有成书”[3](P3)。乾隆二十四年(1759)胡建伟编《澎湖纪略》，“分十二纪；一事之微，详载原委，不屑其词之委琐繁重者，以澎地初辟，书籍无闻，藉为士民教也。”[3](P1)道光九年(1829)蒋镛纂《澎湖续编》，“俾海山之盛、井里之美、民俗之醇、物产之异，披阅一过，了然于指掌之间”[3](P3)。光绪十八年(1892)林豪修《澎湖厅志》，“阙者补之、冗者删之”[17](P3)。光绪十八年(1892)屠继善编《恒春县志》，“可以知一邑之规模，可以备百世之考核”[18](P6)。光绪十九年(1893)沈茂荫修《苗栗县志》，“惜书成而中日战争爆发，遂不及付梨枣”[19](P1)。

此外，光绪年间台湾建省后，设局修志，编采访册，《台湾采访册》《凤山县采访册》《云林县采访册》《新竹县采访册》《台东州采访册》《嘉义管内采访册》等纷纷问世。

综观清代台湾地方志，数量众多；种类繁多，府志、县志、采访册；重修频繁，官私修兼有。学者尹章义认为台湾地方志的编纂在某种意义上说已达到浪费的地步，但是若以梁启超衡量方志的标准来看，则台湾方志无不精美。[2](P21)台湾地方官热衷于编修地方志的动机，“在情趣上，是新奇于海外一隅特殊的风土物产；在政治考虑上，则是急于收录台湾人事活动等，以收速速娴悉之效”[20]，如恒春初设县时，“典籍无征，缙绅罔考”，地方士绅认为“县志即国史也。国无大小，不可无史；县无繁简，不可无志”，遂急忙修志。[18](P6)台湾学者陈汉光认为，“是时治台各官，施政及各项参考，苦无志书；而台地的‘异方’‘殊物’也引起了不少的好奇推动力”，因此公私修志相继而起。[21]

三

清代台湾各地方志编修大多由官员发起，但台地科举人士在修撰过程中积极承担具体事务。“郡邑之有志，比国之有史。非优于职守之贤有司无暇议及、非留心掌故兼才学识三长者不能纂修之任”[16](P419)。方豪曾指出，“在台湾早期的几部方志中担任实际工作的人，几乎全部是本地人，并且是当时在本地最优秀的人士。”这是“由于当地人不能在当地做官的限制，……因为他们或迁台已久，或在台出生，地方情形较为熟悉，所以最重要、最切实的工作，很自然落在他们身上。”[7](P622)

台湾士人积极倡修地方志并为之作准备。如举人王璋在“台湾初启，府志未修”时，“豫求文献藏诸家”，“台湾文献之存，璋有功焉。”[22](P508)贡生王喜“尝自撰台湾志，勤于搜集”，高拱乾编修的《台湾府志》“据以为蓝本”[5](378)。台湾回归后，“或增设厅县，以壮金汤；或加添汛防，用资保障；或官秩科目之殊轨，或山川风物之异观；或文治武功，堪铭彝鼎；或含贞履素，应列青编。轶事既已日多，郡志于焉久阙。 盖自康熙丙子之岁至乾隆庚申之年，梨枣堙沉，简编殊失，已四十余年矣。此日不为重修，将来奚由考据？”“职方有掌舆图，纤悉匪遗；列国有书风土，异同可考。故信今以传后，郡邑之纪载必详；而乘时有增修，文献之搜罗宜备。”[9](P19)乾隆五年(1740)台湾举人陈邦杰、石国球、陈辉、贡生黄名臣、施士安、杨清时、监生陈天栋、王绍堂、陈廷魁、生员范学洙、方达圣、黄得文、吴金等人上书台湾道刘良璧要求重

修台湾府志，他们还表示愿意捐献资金作为“校雠工费”[9](P19-20)。

此外，台湾士人还积极参修地方志。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纂修《台湾府志》，举人王璋、贡生王弼、陈逸、黄巍、马廷对、监生冯士骁、生员张佺、陈文达、郑萼达、金继美、张绍茂、柯廷对、张倦客、卢贤、洪成度等人担任分订工作。[8](P13)康熙五十一年(1712)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贡生张缵绪、郭必捷、陈文达、林中桂、生员李钦文、张云抗、卢芳型、蔡梦弼、金继美、刘荣、石钟英、洪成度等承担分订工作。[4](P7)康熙五十六年(1717)周钟瑄主修《诸罗县志》，生员李钦文参与编纂，贡生林中桂参与编次。[23](P11)康熙五十八年(1719)李丕煜主修《凤山县志》，贡生陈文达、生员李钦文、生员陈慧参与编纂，贡生陈逸参与编次。[24](P13)康熙五十九年(1720)王礼主修《台湾县志》，貢生陳文达、林中桂、生員李欽文、張士箱参与编纂。[25](P13)乾隆五年(1740)刘良璧重修《台湾府志》，“择绅士中有齿德而能文者掌其事；旁搜远采，校订分修”，举人陈辉、陈邦杰、恩贡张从政、拔贡黄佺、岁贡范学洙任各卷分辑，贡生施士安、生员翁昌龄则任监刻。[9](P23)乾隆十七年(1752)鲁鼎梅重修《台湾县志》，举人陈辉、廪生方达圣、生员卢九围任编纂，岁贡生郭朝宗、拔贡生蔡开春、岁贡生金鸣凤、生员龚帝臣、监生方达义任分辑，生员侯世辉任分理。[5](P15)乾隆二十五年(1760)台湾知府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生员张源仪任校对。[11](P7)乾隆二十八年(1763)台湾道余文仪重修《凤山县志》时，举人卓肇昌任参阅，贡生柯廷第、生员林梦麟、生员张源义任校对。[11](P11)嘉庆十二年(1807)薛志亮续修《台湾县志》，举人洪禧、潘振甲、郭绍芳、贡生黄汝济、韩必昌任分纂，其中李思敏之传为潘振甲所撰，奇宠格、万钟杰、朱景英和刘应罴之传为洪禧所撰，穆和蔺之传为洪禧与郭绍芳合撰，张钰和庄敬夫之传皆由洪禧所记录。[26](P9)道光十年(1830)陈淑均修《噶玛兰厅志》，举人黄缵绪、贡生黄学海、生员张四维、廪生蒋常昭、廪生李际春、生员林瑞圭、廪生朱长城、生员黄肇昂任汇校，贡生卢永昌、林逢春、监生潘廷勋、杨德昭、蔡长青任采访，举人李春华、林维让、贡生黄锜、潘永清任续校，监生林瑞远、卢本立、林国翰、林华簪任检案，生员李祺生任续辑。[15](P15-16)道光年间周玺主持《彰化县志》编修，举人林廷璋、贡生廖春波、曾拔萃、戴天定、赖占梅、纪梦熊、杨廷琛、监生洪对扬、曾廷纪、廪生杨占鳌、陈仁世、增生杨奎、生员李凤翔、张襄、庄日跻等参与修纂。[13](P27)同治九年(1870)陈培桂修《淡水厅志》，“事求其实，政不厌详；浮文缛节，概从芟薙。”[16](P5)举人吴子光、陈霞林、苏袞荣、李腾芳、廪生陈经、黄中理、生员苏章荣、陈鸾升、傅以扬、潘永清、监生高廷琛皆在厅志编修中担任采访。[16](P7)光绪十八年(1892)沈茂荫修《苗栗县志》时，举人谢锡光、谢维岳任采访；林豪修《澎湖厅志》时，举人郭鄂翔、增广生陈维新、廪生薛元英、生员徐癸山任采访总校，廪生陈雁标、许芬、洪朝阳、生员洪捷元等任采访分校。[27](P127)台湾建省后，台北知府陈文騄等提议纂修《台湾通志》，光绪十九年(1893)获准后乃设通志总局，举人陈日翔被聘为修志委员。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许南英受聘入“台湾通志局”下辖的“台南采访局”，凡台南府属的沿革、风物大多经他汇纂而成。[22](P518)尔后，举人蔡国琳纂修《安平县采访册》，此前还曾受命纂修《台南府志》；廪生卢德嘉、进士杨士芳、举人李望洋、贡生李绍宗、生员张镜光、张清源等纂修《宜兰县采访册》；生员王廷楷主修《埔里社厅采访册》；生员汪金明主修《恒春县采访册》；举人陈日翔、卢德祥、生员周熙清、王春华等纂修《凤山县采访册》，“记载赅备”而被人称之为善本。”[27](P291)

四

“台志之要，在明因革，著治乱。”[28](P85)因此，“志书之作，所以纪其地之山川、人物，使后人有藉以考稽；既非以耀词华、夸藻丽，而又恶夫庸陋肤浅、泛填习套，于真迹无所征实、于要义伦理无所发明，未可信今而传后。”[6](P11)这对台湾地方志编修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陈培桂在编修《淡水厅志》时曾强调修志者“非才学识兼长与其人心术品行粹然无倾险侧媚之习者，不足以膺厥任”。[30](P116)

台湾士人参与方志的编修不仅提高了台湾地方志的质量，而且也使台湾地方志的特色更鲜明。如淡水厅向无专志，郑用锡“集弟友纂稿藏为后法，俾典章文物昭昭可考，为功独伟。”[29](P87)郑用锡在撰修《淡水厅志稿》时，“敢不其难其慎，小心搜访。第一人之精神有限，自乾隆二十九年之前，或仍府志旧文，或重加考订；自二十九年以后，除林逆之变案牍无存外，其余或得诸案牍之考据，或得诸同人之见闻，按照宪颁格式条目，胪列增修。其间信者录之，疑者阙之，不敢乱为摭拾”，“山必载明来自何脉，迤入何处，水必载明出自何源，流达何处，至某口某港某澳某屿同归海，以清

眉目。街庄依保订正，田赋按照旧额新升，分别详列。叛产、屯田，系乾隆二十九年以后增设，并详于后。祥异易涉荒唐，今则采其确有可据者，略记数条，不敢滥载。人物列女，载诸志书，原以鼓励风俗。淡厅开有历年，此二者非无可采。然访诸舆情，窃恐见闻之未真；稽诸案牍，又觉报旌之罕见。兹篇未及多载，非敢昧善善之心，惟以避嫌疑之论。”[16]（P418–419）这为台湾方志的编撰开创了新的生命力，“淡水志型”也成为台湾方志四大类型之一，“其开辟榛芜，功甚不少。”[16]（P419）后来林豪编纂《淡水厅续志稿》和陈培桂编修《淡水厅志》皆以郑用锡的《淡水厅志稿》为蓝本。吴子光曾独撰《淡水厅志拟稿》，分为职官、典礼、名宦、艺文、孝友、节烈、学校、乡贤、屯政、物产、仙释、方技、兵燹、御番、设隘、番族、社学、义民、海防、佛寺、道教、多男、人伦盛事、师巫、男女、犵狫客民、民籍、台俗。学者称“此后苟有长吏可语史学者，当抱此册出为印证，任海内外具千手眼人辩之。”[31]（P79）

总之，台湾士人在清代台湾地方志的编修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地方文献的保存者，又是地方志编修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还是地方志修撰的创新者。这使得清代台湾方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季麒光.蓉洲诗文稿选辑[Z].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5.

[2] 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M].台北:自立晚报社,1986.

[3] 蒋镛.澎湖续编[Z].台湾文献丛刊第115种.

[4] 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66种.

[5] 鲁鼎梅.重修台湾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13种.

[6] 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

[7]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Z].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8] 高拱乾.台湾府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65种.

[9] 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74种.

[10] 尹士俍.台湾志略[Z].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11] 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21种.

[12] 柳浪.清代台湾地方建置与方志编纂研究[J].中国地方志,2004,（3）.

[13] 周玺.彰化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56种.

[14] 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46种.

[15] 陈淑均.噶玛兰厅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60种.

[16] 陈培桂.淡水厅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

[17] 林豪.澎湖厅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64种.

[18] 屠继善.恒春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75种.

[19] 沈茂荫.苗栗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59种.

[20] 王月华.清代宦台谢金銮的史学与文学作品[J].台湾文献,56:3.

[21] 陈汉光.清初台湾府志纂修史略[J].台北文物,2:2.

[22] 连横.台湾通史[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3] 周钟瑄.诸罗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

[24] 李丕煜.凤山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24种.

[25] 王礼.台湾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

[26] 薛志亮.续修台湾县志[Z]. 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

[27] 黄纯青、林熊祥.台湾省通志稿卷七人物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28] 蒋师辙.台游日记[Z]. 台湾文献丛刊第6种.

[29] 郑用锡.北郭园诗钞[Z]. 台湾文献丛刊第41种.

[30] 吴子光.台湾纪事[Z]. 台湾文献丛刊第36种.

[31] 吕欣芸.清代客家文人的人际网络——以吴子光为中心[D].台湾:中央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2012.

责任编辑：侯德彤

Taiwan Scholar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YANG Qi-fu　WU Min-x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s we know, local chronicles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numerou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Howev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aiwan in Qing dynasty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They not only saved local literature, but also promo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aiwan local chronicles. They also innovated the drafting system of local chronicles of Taiwan, thus making local chronicles of Taiwan in Qing dynasty occupy an exclusive place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China.

Key words: Qing Dynasty; Taiwan scholars; local chronicles of Taiwan; effect

国际联盟失败原因新探

——基于威尔逊个人性格因素的视角

王 青[1] 季乃礼[2]

（1.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2.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有关威尔逊国联问题失败的原因，国内学者多归于理念。我们试图结合西方的研究成果，从威尔逊心理的角度探讨“国联问题”的失败，可分为四种观点：内在导向性格、自卑、中风，以及认同基础上产生的自恋和强迫症。产生这种争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心理学理论发展的结论，也有资料不足的原因。但总体来说，这些讨论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威尔逊的心理，更好地理解威尔逊国联问题的失败。

关键词：威尔逊；国联；心理

中图分类号：K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106-06

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外交思想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一战后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非常遗憾的是，尽管他首先提出了建立国联的想法，但是却没有加入国联。关于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失败的原因，中国学者通常持两种观点：其一，威尔逊与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洛奇（Lodge）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为两种思潮之争。代兵认为威尔逊代表的是进步国际主义思潮，而洛奇所代表的保守国际主义思潮。[1]与前者论证的角度有所不同，韩莉认为，威尔逊派与洛奇派的争论在于，前者认为没有保留的盟约可以保证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后者则要求明确的保留以使美国有决定自己政策的绝对自由。表面上双方的对立不可调和，实际上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即美国如何利用国联达到让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对世界的控制的目的。[2]其二，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吴小安认为，威尔逊的失败，并不在于威尔逊派与洛奇派的冲突，而是国联的作用和影响是否符合威尔逊理想主义成份中所设想的程度。或者说，已成立的国联是否是威尔逊指望中由美国操纵的国联。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威尔逊并不是在参议院没有批准案约时才失败的。早在欧洲时，他就失败了。[3]

两者的角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归结为理念的原因。只是第一种观点归为两种观念的冲突，后者归为威尔逊的理念与现实的冲突。这两种解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就第一种解释来说，不可否认，“国联问题”的失败是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参议院被否决为标志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威尔逊派与洛奇派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是否完全体现为理念冲突？如韩莉所论，两者的理念并无本质的区别，那么为何还会有冲突？第二种解释也有点牵强。如果威尔逊的理想与现实有冲突，在提交国会之前自己就应该自我否决，为何会提交到国会进行表决？

因此，完全依靠理念解读威尔逊在“国联问

收稿日期：2018-03-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2YJA710068）

作者简介：王青（1966-），男，山东高青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季乃礼（1970-），男，山东高青人，政治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题”的失败是不完整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本文试图结合西方的研究成果，从威尔逊心理的角度探讨“国联问题”的失败。

一、以内在导向性格为基础的道德说教者

1950年，美国的学者理斯曼（Riesman）发表了《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在书中他提出，威尔逊生活的时代是人口过渡增长的时期，产生了内在导向的社会性格，这种性格的人在政治上表现为道德说教者，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的失败恰恰在于其内在导向的性格。理斯曼依据人口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将社会分为三种不同性格的社会。“人口高增长潜力”社会，社会成员的顺承性来源于遵循传统的内在倾向，因此他们是“传统导向”性格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依赖传统导向的社会。人口过渡增长时期的社会，社会成员的顺承性来源于早年生活的内心目标，因此他们是“内在导向”性格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依赖内在导向的社会。在“初期人口减少”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顺承性来源于对他人期望和喜爱的敏感，因此他们是“他人导向”性格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他人导向的社会。[4]（P8）

根据这种人格理论，理斯曼将政治人划分为三种：传统导向性格的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倾向，表现为政治冷漠者，内在导向性格的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倾向表现为“道德说教者”，他人导向的性格的人在政治态度的倾向表现为“内幕消息预测专家”。政治冷漠者应该是那些有资格进入权力体系之中，但是却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内在导向的人把所有的情感和才能投入到工作中，以这种方式看待政治的人就是道德说教者。内幕消息预测者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非常渴望成为政治圈子的人，加入政治组织或创立政治组织；而另外一类人则是把探听到政治内幕新闻作为最高目的。[4]（P167-183）

道德说教者一个显著的风格是“将自我完善的性格倾向投射到政治生活中；他想改进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制度。”威尔逊就是一个以内在导向性格为基础的道德说教者，这种性格导致了他在许多政治事件上的失败。具体到国联问题来说，理斯曼说：“威尔逊是一个十足的道德说教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能使他的朋友，他的政敌，甚至他自己明白政策该如何实施和操作。”[4]（P174）

总之，理斯曼认为“初期人口减少”的时期，社会成员就会形成“他人导向”的性格，从而决定了他们是道德说教者。威尔逊处于这个时期，自然也是一个道德说教者。时代决定了威尔逊的社会性格，威尔逊的社会性格决定了他在国联问题上的失败。

探讨一个领导人的政治人格必须与时代相结合，但是理斯曼的论证却明显存在如下问题：其一，论证过于简单，注重社会性格的普遍性的同时，却忽略了领导性格的特殊性。即使在同一时代，不同的领导人的性格也会有所不同，譬如有的领导可能是理想主义者，而有的领导可能就是现实主义者。其二，国联问题也不是理斯曼探讨的核心问题，只是在论述“他人导向”性格时才有所论述。因此，对于威尔逊的性格与“国联问题”的失败之间的论述并不充分。其三，就适用的理论而言，理斯曼所运用的心理理论并没有与当时的心理理论有所呼应，并无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虽然原创性较强，但理论的深度明显不足，而且他的有关性格的理论是来自于对社会发展的总结，并无大量的临床或实验的证据相支撑。

二、与父亲打交道中产生的自卑

尝试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对威尔逊的心理进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Freud），他和布吕特（W.C.Bullitt）一起合写了《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威尔逊的心理研究》（*Thomas Woodrow Wilson：Twenty-Eighth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A Psychological Study*），这本书完成于1938年，但直到1967才得以出版。在这本书中，他们尝试用童年的威尔逊与父亲的关系，解读以后的一些行为。譬如，父亲对威尔逊的过高期望，导致了他对父亲的敌意，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把对父亲的敌意投射到政敌身上，譬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韦斯特（West）。这本书是第一本系统性地研究领导的心理学著作，但是此书对于后世的影响却非常有限。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此书尽管写作较早，但出版较晚。第二，理论的陈旧。他们运用的理论仍然是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以及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之后的政治心理学虽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把精神分析学引入政治学时，都做了修正。以拉斯韦尔（H.D.Lasswell）为例，在分析政治人物的心理时，也注意分析他们早年与父亲的关系，但着重分析他们的自卑，认为一些政治人物来自于自卑的环境。[5]（P54-56）而自卑理论主要是由阿德勒提出的。可以说政治学者并不是单纯地抄袭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综合了弗洛伊德和其他学者的理论。第三，由于此书系弗洛伊德的晚年之作，当时他已经没有精力写作，

主要的工作由布吕特来完成，理论的运用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导致这本书质量不高。艾里克森（Erikson）甚至怀疑这本书不是弗洛伊德所写，只是布吕特冒用弗洛伊德之名而做。[6] 当然，这本书对威尔逊的一些重要的政治行为也没有用心理学的理论做出解释，譬如对威尔逊有关国联问题。

1956 年，A.L. 乔治（A.L.George）和 J.L. 乔治（J.L.George）发表了《伍德罗·威尔逊与豪斯上校》（*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在书中，他们沿用了拉斯韦尔的分析方式，结合了弗洛伊德对亲子关系的关注以及阿德勒的自卑理论，提出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的失败源于早年对父亲的敌意产生的自卑，对父亲的敌意转移到与洛奇的斗争。

他们探讨了威尔逊与父母的关系，尤其是父亲对他的人格的形成的影响。威尔逊的父母都是新教徒，在这种家庭中，威尔逊逐渐接受了把道德放在首要的地位，并不觊觎财富。威尔逊的父亲是一位严厉的加尔文教徒，对威尔逊从小就严加管束。父亲让他追求完美，威尔逊一有错误，他的父亲就挖苦讽刺，使威尔逊感觉到自己愚蠢的、丑陋的、没有价值的和不值得爱的，使他形成了低自尊。父亲的指责使他形成对父亲的仇恨。但是威尔逊又不敢公开表达这种仇恨，只能压抑下来，之后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一，面对父亲的要求产生逆反心理。威尔逊直到 9 岁才会写字母，直到 11 岁才会读书。A.L. 乔治和 J.L. 乔治认为这是对父亲的仇恨在行为上表现。其二，童年形成的自卑导致了以后对权力的追求。其三，把对父亲的仇恨移植到其他对象身上。譬如，从政之后，他不容许他人对他的批评，无法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权威。从那些批评、指责的人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形象，从而把对父亲的仇恨转移到这些人身上。[7]（P3-13）

两位作者研究发现，威尔逊追求权力始于儿童时期内心的不足，权力是为补偿自尊。威尔逊拥有权力之后，当个人情感没有卷入时，能够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但在涉及到一些问题时，这些问题又与他对自尊的维护密切相关时，就会出现固执、教条化的一面。这时，他人对他的指责，只会强化他的焦虑，把对方形象化为他的父亲，从而导致对原有主张的坚守。[7]（P115-118）

威尔逊与洛奇的冲突恰恰是这方面的反映。1918 年，国会落入了共和党之后，洛奇担任外事委员会主席。作为共和党的政治领导人，洛奇想竞选下一届总统，能够迫使傲慢的威尔逊低头，对于将来的竞选无疑是有好处的。因此，当威尔逊向国会提交十四点计划时，洛奇就已经准备了扼杀十四点计划的方法。其一，对威尔逊的个人攻击以激怒他。譬如，对于威尔逊以教授的身份从政，宣扬威尔逊根本就不是学者。对威尔逊引以为豪的从小接受父亲严格训练的写作水平，洛奇说他的写作水平并不高。针对威尔逊害怕别人指责他起草十四点计划有私心，批评威尔逊说自私自利、毫无道德原则、心胸狭隘、蛊惑人心等等。这种指责激进了威尔逊被压抑的愤怒，他想起了童年时期对其备加指责的父亲。因此，威尔逊对洛奇非常憎恨。其二，当时的美国公众以及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前美国总统塔夫脱都支持加入国联。洛奇反对威尔逊，同时又不想失去公众的支持。由此，他提出对国联的章程做出稍微的改变。洛奇的此计划是建立在威尔逊不会同意接受参议院的保留意见。洛奇敏锐地意识到，威尔逊因为憎恨自己而不可能做出妥协。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国会内温和的共和党人同意只要对国联做出稍微的改变即可与民主党人一致联手通过，英国和法国也表示同意洛奇提出的修改意见，但威尔逊仍然不愿意做出妥协。“理性告诉他必须留在华盛顿，做出妥协，才能拯救国联。情感却禁止他这样做。情感强迫他去伤害他热爱的国联。”威尔逊的密友豪斯在日记中写道，过去他一直以为洛奇是国联最坏的敌人，现在不得不承认首要的敌人是威尔逊。[7]（P268-311）

总之，两位作者认为，威尔逊“国联问题”的失败源于其人格，而这种人格是由童年的与父亲的关系所决定。而洛奇又很好地利用了威尔逊的人格，从而导致了威尔逊在与洛奇的冲突中，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自尊，而不是国家。情感妨碍了他的理性做出正确的判断。

《威尔逊与豪斯上校》一书，既注重了对资料的搜集，运用大量的威尔逊和豪斯的档案材料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论证，同时也注重对当时的心理理论的吸取。因此，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卢念（W.M.Runyan）称赞此书是政治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心理传记。[8] 弗雷德曼（W.Fredman）认为此书是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经典。[8] 但是此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没有注意到威尔逊的母亲对他的人格的影响。温斯顿（E. A. Weinstein）等在研究中发现，威尔逊的母亲对他过于保护，母子情感的相互依赖，使他威尔逊的情感和对异性的情感发育成熟较晚。母亲的溺爱使

他觉得不仅在智力上，而且在道德上都优于他人。母亲的长期拥有对于威尔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后来威尔逊生病之后所产生的抑郁明显受母亲的影响。[9] 其二，理论的局限。他们之所以没有关注到母亲对威尔逊的影响，除了史料的局限外，很重要的在于理论的局限。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以性本能立论的，按照这种理论的解释，只有父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才能因性而产生的冲突，相反，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是相互爱恋的，不会有冲突。尽管后来的阿德勒、拉斯韦尔的理论有所发展，但视角并无多大改变。理论的局限性使他们只关注到了父子关系的影响。姑且不论母子（父女）关系有无冲突，其实母子（父女）关系的爱恋也会对子女的人格产生影响。譬如男孩自恋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母亲的过度保护的影响。以威尔逊为例，母亲对他的影响，使之产生自恋，影响了他以后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待国联问题。

三、中风影响威尔逊的心理

温斯顿等除了批评两位乔治没有注意到母亲对威尔逊的影响之外，他们还反对两位学者得出的威尔逊低自尊导致政治参与的结论。他们认为，自尊并不是一体的，威尔逊虽对自己身体自卑，但对自己和智力和领导能力很少怀疑，把不安全归为追求政治权力是过于简单的解释。[9] 然后，他们从病理的角度对威尔逊的心理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威尔逊的许多的问题可以病理的角度做出解释，早年患有诵读困难症，中年之后患中风，使他的人格异常，导致了在国联问题上的失败。

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威尔逊直到 9 岁才会写字，11 岁学习读书，并不是源于对父亲的仇恨而产生的逆反心理，而是因为威尔逊患有一种病——诵读困难症。他们用大量的证据试图证明威尔逊与其父亲的关系很好，并没有对父亲的敌意。

他们认为，威尔逊很早就患有神经系统的疾病。自 1906 年开始，威尔逊就出现中风的症状，患有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这种疾病使他缺少同情心、更加固执，过于泛泛概括问题，并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到解决问题之中。同时，因患有疾病使得他变得没有耐心，本来长期应该完成的事件，急于要在短期完成。其中他与韦斯特的争论即是这方面的体现。

之后，温斯顿又单独撰文详细列出了威尔逊所患的病症。1896 年右手无力，1906 年血管受损和高血压导致左眼失明。1918 年脑血管的疾病使威尔逊变得更加冲动和多疑。1919 在巴黎得的流感涉及到大脑和心脏，使得他的人格异常，改变了以前的信仰。最显著的就是对德国从容忍到惩罚态度的转变。另一个影响是他与议会的关系，国联问题的失败。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没有机体的打击，许多妥协将达成，国联问题最终将通过。[10]

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波斯特（J. M. Post）认为动脉硬化和其他脑类疾病会导致如下问题：思想的僵化、智力和判断受影响、情感的易变、早期的人格反应夸大化（由怀疑变成公开妄想，不和我站在一边就是反对我）、好的和坏的日子、对无能的拒绝。威尔逊提供了这样的例子。[11]

温斯顿等的医学专长使他们在分析威尔逊的人格有新的发现。[12] 但是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们的解释出现了两种混淆：一是中风与其他病症混淆。波斯特指出，他们把威尔逊所患的病症归为中风（Stroke），但眼底充血并不能称之为中风，血管的凝结也不应该是中风的一种，譬如脚底充血肯定就不是中风，按照波斯特的理解，中风应该是脑血管的凝结。[13] 其二，心理与生理的混淆。究竟哪些政治行为是由生理引起，或者心理引起的？哪些政治行为是以心理为主，还是生理为主？温斯顿等没有很好的辨析出来。如马莫（M.Marmor）在研究威尔逊的心理时所说，弥散性的血管疾病和年老都可能强化人们原有的信念和人格特征，但是一些疾病并不能够解释人们的情感或心理的反应。[14] 以国联问题为例，疾病究竟起多大作用，在促使威尔逊的心理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还是威尔逊原有的心理起主导作用，作者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四、认同于父母导致的自恋、追求完美

如何能够确立一种理论，对父亲的敌意和母亲的爱恋同时融入其中，对这两方面同时做出解释。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波斯特提出了从认同理论的角度对威尔逊的人格进行解读。

波斯特认为父母对威尔逊的影响都很重要，他提出了认同理论对威尔逊的人格重新做出解读。认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我理想的认同（Ego Ideal Identification），发生在父母与子女是一种明确的肯定的关系中，父母的肯定、赞扬导致子女把父母理想化，之后自我崇拜，即自恋。一种是对攻击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Aggressor）。这种发生在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时，子女对父母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需求父

母的爱，但另一方面又无法满足。父母是他们焦虑之源，根除这种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父母的特质吸收到自己的人格中，变得像父母。具体到威尔逊来说，两种认同方式对他都有影响，母亲对他的肯定属于第一种方式，而父亲对他的严厉属于第二种。母亲对他的过于保护、不断的肯定使他形成了自恋的人格。而父亲的严格训练使他重视规则、秩序，追求完美，从而具有了强迫的特征。威尔逊以下人格表现明显受父母的影响：过分关注于自我和自身的健康，需要得到他人对自己的不断的肯定，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会郁闷，对批评敏感，把批评外化并归为他人的问题，抬高自我、贬低他人，高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人，追求完美，难于妥协等等。[15] 具体到国联问题上，他需要别人像母亲那样不断肯定自己，讨厌像父亲那样的人，如洛奇指责自己，把自己和国联都看得过于完美，不允许他人对他和国联进行任何的批评，不愿意与别人妥协。

与波斯特相同，雷森（S.Renshon）也把威尔逊的人格归为自恋，但与之不同的是，他认为自恋来自于童年时间的梦想和抱负，是与梦想的认同。他想成为一位政治家，一位法律的制定者。一般来说，童年的梦想在青年时期会逐渐膨胀。但一旦走向现实，梦想就要接受现实的检验，这时梦想就会逐渐调整甚至是放弃。而威尔逊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对于他来说，妥协就意味着扼杀自己的梦想，扼杀了他对自我在世界中的理想设计。这种理想的自我和总统的位置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威尔逊来说，国联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政治遗产，通过它把威尔逊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威尔逊的自我得到了延伸。可以说，威尔逊的价值、信仰和希望均寄托于此，他希望当自己即使不在时，国联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威尔逊对章程的细节固执已见。[16]（P226-229）

五、结语与启示

那么，人们针对威尔逊的心理研究为何会产生争论？这种争论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心理理论的不断发展。可以说，这些争论有许多方面是与心理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的。A.L. 乔治和 J.L. 乔治对威尔逊的心理研究，吸取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阿德勒的自卑理论，沿用的还是传统的性本能的设定。但是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性本能理论的解释，相继提出了认同理论，自恋理论等等。可以说，有关威尔逊心理的争论也是心理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二，资料的缺失。譬如弗洛伊德和布吕特对威尔逊研究水平的不高，A.L. 乔治和 J.L. 乔治之所以没有关注到威尔逊的母亲对他的心理的影响，既有理论的局限，很重要的也在于资料的不足导致。

尽管学者们对此问题争论较多，但其中的许多理论看似矛盾，其实是可以融合的。譬如，理斯曼的内在人格理论的提出，提醒我们从大的时代背景着眼，关注个体的人格。A.L. 乔治和 J.L. 乔治的理论提醒我们从父亲的角度，而温斯顿等是从病理的角度，波斯特和雷森所提出的认同理论让我们关注父母的角度，以及梦想。可以说，这些不同结论的得出是因不同的视角所致，这对我们综合地理解威尔逊的人格是很有帮助的。

上述学者从威尔逊的心理对国联问题的探讨，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H.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17] 也就是说，理性必须与心理结合，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但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佐证。

参考文献：

[1] 代兵.威尔逊与洛奇的对立：美国外交思潮的分化与交锋[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4）.

[2] 韩莉.美国控制世界还是国联控制美国—评威尔逊与洛奇的国联盟约之争[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 吴小安.论国际联盟的诞生与威尔逊的失败[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2）.

[4] 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M].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H.D.Las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6] E.H.Erikson.Review: Thomas Woodrow Wilson: Twenty-Eighth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A Psychological Study: By Sigmund Freud and William C. Bullit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48, 1967.

[7] A.L.George & J. L. 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Motivation Reconsidered: The Concept of Competence—A Personality Study[M].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4.

[8] W.Fredman.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J].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5, No.1, 1994.

[9] E.A. Weinstein et al. Woodrow Wilson's Political Personality: A Reappraisal[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4, 1978–1979.

[10] E. A. Weinstein, Comments on "Woodrow Wilson Re–examined: The Mind–Body Controversy Redux and Other Disputations[J].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4, No.2, 1983.

[11] J. M. Post.The Seasons of a Leader's Life: Influence of the Life Cycle on Political Behavior[J].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 No.2, No. 3/4, 1980.

[12] D. Ross.Review: Woodrow Wilson and the Case for Psychohistory[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9, No.3, 1982.

[13] J. M. Post. Reply to the Three Comments on "Woodrow Wilson Re–Examined: The Mind–Body Controversy Redux and Other Disputations" [J].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4, No.2, 1983.

[14] M. Marmor. Comments on "Woodrow Wilson Re–examined: The Mind–Body Controversy Redux and Other Disputations" [J].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4, No.2, 1983.

[15] J.M.Post.Woodrow Wilson Re–Examined: The Mind–Body Controversy Redux and Other Disputations[J].Political Psychology, Vol.4, No.2, 1983.

[16] S. Renshon,.*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ories of Adult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Leaders*, R. S. Sigel ed., *Political Leaning in Adulthood*[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7] H. A.Simon.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No. 2, 1985.

责任编辑：侯德彤

Interpreting Wilson's Failure in the Issues of League of Nation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WANG Qing　JI Nai-li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71, China)

Abstract: Most Chinese scholars contribute Wilson's failure in the issues of League of Nations to the ideas he held. Introducing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findings, we try to analyz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ere are four opinions as follows: inner-directed character, low self-esteem, stroke and narcissistic and obsessive personality based on identification. Many reasons result in these opinion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and lack of enough materials. Above all, such studies help us know more about Wilson's mind, and understand his failure in the issues of League of Nations.

Key words: Wilson; League of Nations; psychology

论1894－1897年张之洞的外交观

孙 昉[1] 刘 平[2]

（1.商务印书馆，北京 100710；2.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摘 要：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曾建议“并联英俄”，以摆脱清廷外交孤立的窘境。《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提出“联俄拒日”的主张。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张之洞又转向“联日拒俄”，并和日本政府进行了极为有限的接触。张之洞的外交言论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幅度的跳跃式变化，缺乏运转自如的灵活性，与其对晚清外交危机的焦虑，以及对国际局势变化和列强意图缺乏充分了解，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张之洞；外交；言论；跳跃式变化；焦虑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112-08

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的四年中，身为地方督抚代表人物的张之洞就朝廷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问题屡屡建言，其外交言论表现出明显的跳跃式变化。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建议“并联英俄”，以摆脱清廷外交孤立的窘境。《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提出“毁约再战”，进而形成“联俄拒日”的主张。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张之洞又转向“联日拒俄”，并和日本政府有所接触。当他洞察觉日本政府有染指湖北的意图时，又中止与日方的接触。

张之洞在甲午战争期间属于比较坚定的主战派。甲午之后，他希望朝廷能迅速摆脱失败阴影，重振国力，避免列强瓜分，表现出一个地方督抚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焦虑。同时也要看到，正是这种对国难形势的焦虑，加上对国际局势变化和列强意图缺乏充分了解，使得张之洞本人的外交主张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幅度的跳跃式变化，缺乏运转自如的灵活性，明显带有临阵磨枪的色彩。造成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张之洞本人闻风奏事的清流作风有关，也与其他督抚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僚如郑孝胥的影响有关，还有日本政府对华工作的影响。尽管如此，张之洞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地方督抚所惯有的本位意识观念的束缚，为后来的“东南互保”设下了明显伏笔。而且，张之洞有意识地抵制日本政府对湖北的觊觎也是值得肯定的。本文立足于既往研究成果①，对张之洞在1894年至1897年的外交言论跳跃式变化梳理探究，以此敬向学界方家求教。

收稿日期：2018-04-11

作者简介：孙昉（1973-），男，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辑；刘平（1962-），男，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学界有关张之洞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1）邱裕荣：《张之洞“亲日外交”刍议》（《华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该文认为，主张“兴亚”的日本人士的积极作用是促成张之洞亲日倾向的重要成因。（2）郝满祥：《论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主张》（《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该文认为，张之洞积极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间，提出“赂日阻俄”主张，在甲午战争清廷战败赔款前后则主张“联俄抗日”；在德国抢占青岛、俄国强租旅大时又提出“结日阻俄”；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主张经历了三个阶段，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理念。（3）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该文认为，戊戌前后，张之洞与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团体建立起多种联系。庚子事变发生后，张氏动用既有渠道，为实现东南互保、战时交涉，积极借助日援。

其他类似论文亦有多篇，限于篇幅，从略。这些论文都注意到张之洞联俄与联日等外交主张，但是对其外交思想变化的过程缺乏清晰的叙述，特别是对其在形成上述外交主张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不成熟，但未付诸实践的部分，以及他在联日外交活动中对日本的戒备之心等方面缺乏论述。

一、甲午战争期间的“并联英俄”

甲午战争期间，战火从朝鲜半岛延烧至辽东和山东。两江总督刘坤一率领湘军开赴辽东前线，清廷下旨由张之洞署理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在主战的同时，也试图寻求其他列强的支援，在各主战督抚中，他是“乞援强国”论最积极的倡导者。[1]（P114-142）张之洞对英国的干预寄予厚望，曾向驻英使臣龚照瑗提出“借强援”的设想：

> 倭患日深，辽沈危，京畿急，非借强援不可。上等借船助战，次等武断胁和，如前数年英有在中国开煤矿之请，祈密属（嘱）马格里向英外部委婉探察，必如何而后肯助中国。……如其欲尚不甚谬，其事尚有几分可行，再当斟酌电奏，以待朝廷裁度。[2]（P589-590）

该电中所提到的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系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曾协助李鸿章创办洋务，1875年因大沽炮台大炮试放事故而被撤职。此时，张之洞并未考虑到马格里与清廷的关系现状，却对其抱有厚望，表明张之洞的联英设想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

张之洞还向正逗留于南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征询中英联络之事。李氏直言不讳：“须多与英国商务利益，如准英商在中国开铁路、开矿与各项化学工作、制造等，此皆于中国大有利益。”[3]（P2039-2040）张之洞颇重视这一建议，向总理衙门提议以台湾为担保，向英国借款，并许以在台湾开矿的利益，从而争取英国对台湾的保护。[3]（P2041-2042）不难看出，张之洞提出的联英设想是希望通过大量出让利权来换取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从而使清廷摆脱外交孤立的窘境。

威海卫失陷后，刘坤一率军在辽东前线反攻迭遭失败，清廷已经无力扭转败局。在美国斡旋下，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进行谈判。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廷屈辱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由于正式换约尚需时日，俄国策动德、法两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放弃割取辽东半岛，即所谓“三国干涉换辽”。清廷希望重演二十年前曾纪泽修改崇厚所订之约的历史，御史易俊上奏称：“援从前与俄讲和之例，重议条约，苟无伤大体，不妨曲从其请，藉息争端。否则，即作罢论。”[4]（P127）学习学正刘钜通过翁同龢上书，推荐张之洞赴日改约，称“南洋大臣张之洞，历任海疆，熟悉夷务，现于南洋海防已有布置。应请皇上改派张之洞为全权大臣，即由南洋赴日，较李鸿章原约必能有所挽回，以全国体。”[4]（P146）

张之洞在南京一直密切关注朝廷的外交动向，并与幕僚频繁讨论时局。这段时间里，张之洞的外交言行与其身边的幕僚班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幕僚汪乔年在天津曾经多次向张之洞密报李鸿章的行踪及中日议和动态。郑孝胥称，汪乔年“乃南洋派在北洋坐探之员”。[5]（P483）

郑孝胥曾于1891年至1894年出使日本，类似郑孝胥这样有过外交工作经验的幕僚，在张之洞的幕僚群体中是少有的。郑孝胥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建议张之洞密与英国协议，挽救危局：

> 窃以比年中国不自修备而颇亲于俄，实则中之于俄虽亲无益，适足以启英人之怒而已。英素有结中国以拒俄之心，视中国不足恃，则其谋亦变。……今中国方为日本所逼胁，各国环视，各思其利，岂肯相助？计惟有迁都毁约，亟伸天下之气，遴派公正通达之大臣，速赴英国订立密约，与之同利害，图富强，而以直省兴造铁路为先务，以赂日者赂英，则英必从。[5]（P485）

细察郑孝胥的主张，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清廷必须注意，由于中俄接近而引起的英国对华极为不利的外交反应；其二，中英关系在清廷与列强的多边关系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廷应当使之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4月23日夜，张之洞召集幕僚就如何应对三国干涉还辽之事进行讨论。此前，叶临恭曾建议张之洞与各省督抚以合纵连横之势说服朝廷。[5]（P485）在这次讨论中，叶临恭又重申其主张，张之洞认为其见“迂而不达”。其他幕僚也是意见不一，有的建议张之洞与太监总管李莲英“私结以动太后”，有的建议张之洞妥善处理与帝党首领翁同龢和后党首领孙毓汶的关系，防止二人从中掣肘。这些建议都未被张之洞采纳。显然，这些幕僚大多是在揣测他的真实意图，并非由衷而言。最后，张之洞向幕僚们提出“并联英俄”的设想，并建议朝廷分别将西藏和新疆割让给英、俄两国，如此则战事可息。[5]（P486）不难看出，张之洞的“并联英俄”是在吸收郑孝胥和李提摩太的联英主张并结合三国干涉还辽这一动向的基础上形成的。

对于张之洞“并联英俄”的设想，郑孝胥持有异议，指出此设想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未

能说服张之洞。郑在当天日记中以不满的笔调写道："南皮颇护己说，盖各国之情事故不能谙悉也。"[5](P486)但不久之后，郑也转而赞成并联英俄，指出："此次换约，可以合俄问罪于日本。"郑判断朝廷"颇厌各国及诸臣之阻和，特颇于公义，不得不虚作委蛇耳。设伊东（即伊东佑亨）不肯即换，必反以为大戚也。"张之洞表示赞同此说。[5](P491)

张之洞很快把"并联英俄"设想上奏朝廷：

> 惟有恳请敕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并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新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

张之洞这样解释对放弃西藏和新疆领土以换取并联英俄的主张："同一弃地，而捐荒远之西域，可保紧要之威、旅，全膏腴之台湾，且可尽废一切毒害中华之约，权其轻重利害显然。"[3](P2061)可以看出，张之洞并没有了解当时英国拒绝参加对日共同干涉之事，也未及时察觉当时清廷对英国的不满，只是在自己主观设想的基础上提出并联英俄的主张。

二、弃英联俄

英国并未如张之洞所判断的那样，加入"三国干涉还辽"，而是继续保持"中立"。张之洞担心并联英俄难以奏效，但郑孝胥仍然认为英国有助华可能，他向张之洞分析道：

> 英以利为主，若和约不成，则二万万之借款亦罢，于彼非利故耳。今宜明告英：中国自借二万万为造铁路、练海军、开各矿之用，且许以内地通商利益，令出为排解，英宜必从。[5](P489)

张之洞对郑的分析甚是赞同。然而当他明悉英国继续保持中立的事实以及察觉到朝廷有亲俄疏英的倾向后，改变自己所主张的并联英俄之策，开始专提联俄之事。当刘坤一上奏朝廷力请联俄后不久，张之洞也上《密陈结援要策片》，表示支持联俄，并对英国加以贬抑：

> （俄）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倭人凶锋藉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以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一切视其所资于我者量为协济。面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并与议定若何报酬之法。[6](P1002-1003)

虽然郑孝胥对张之洞联俄再无明显异议，但对其完全倾向联俄仍不以为然。当张派人向郑征求刚刚起草的《密陈结援要策片》的意见时。郑"以为不便"，认为就当时经贸状况而言，中俄经贸关系远不如中英密切，而且俄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行动受到英国的牵制，能否有效援助中国都是极大问题。郑在日记中这样表达自己的疑虑：

> 夫订密约者，盖欲其有无相通，缓急相助耳。相通，相助者有三，人才也、器械也、兵力也，三者俄人皆力不能及。今日雇用西人，购造船械，悉出于英、德，亲俄则英、德必忌之，而俄实无人才、器械可资中国者。一旦有事，英遏地中海而俄师不能出，岂能远救中国哉？必至铁路相通，假俄以东三省之地而后中、俄合，然则并吞中国尚何悻哉！如此吴、晋之交，至越灭吴，晋但谢以力不能及而已。[5](P503-504)

不难看出，郑孝胥结合自己的外交经验，看到俄国在地中海受阻于英国，其驻扎欧洲部分的海军无法迅速支援远东的事实，因而对俄国能否以实力助华提出质疑。张之洞曾约郑孝胥等人谈论中俄缔约事，郑主张"宜结与英、德"，张之洞对此"颔之"。[5](P507)显然，张之洞对能否在短时间内即实现联俄拒日也缺乏足够信心，但他仍然以朝廷动向为基准，并未改变支持联俄拒日的表态，

当然，"联俄拒日"是清廷内部为防止日本再次侵华的高度共识，不止张之洞一人持这一外交思路。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清廷于1896年派李鸿章出使俄国，以允准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为代价，与俄方签订了《中俄密约》。

三、密联英日

1897年冬，德国侵占胶州湾，制造胶州湾事件。俄国利用调停中德冲突之机，迫使清廷同意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从而在事实上宣告清

廷“联俄拒日”的失败。张之洞面对这一危局，又迅速放弃“联俄拒日”，转而提出“密联英日”的主张。张之洞这一外交言论的转变，与日本政府的对华工作有密切关系。

正当总理衙门就胶州湾事件展开对德、俄两国外交之际，日本政府派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来华。神尾抵达上海后，即与日驻沪总领事向上海道蔡钧声称欲溯江赴鄂面见张之洞。张之洞接到蔡钧来电后，将此事急电告知总理衙门：

> 上海道蔡钧电，倭总领事告，倭副将一员，都司一员，来鄂见洞面议要事，已自沪启行，一二日即到。蔡又电：“闻英、倭有合保东南商务之说”等语。久闻英有图占长江之谋，又闻倭已定煤三十万吨，此次遣武员来鄂，必非议商务租界可知。然则所谓保商务者，恐是英、倭合谋借口，欲以兵力踞长江险要耳。总之，德事若不速了，德大队兵船一到，各国纷纷效尤，大局将不可问，危险之至。德欲甚奢，甚难就范，但恐愈迟则愈难矣。俟倭将到后，情形如何，当即电达。[3]（P7438-7439）

这样，另一场外交接触在南方督抚中秘密展开，与正在进行中的中俄、中德交涉共同构成了1897年和1898年之交的中国外交景象。

日本即将派员赴鄂一事很快引起清廷的高度关注。12月，盛宣怀致电刘坤一和王文韶称：

> 德事如何定议，胶澳如不收回，俄、法亦必动手，后事不可问。英、倭有合保东方商务之说。季帅（“季”系“香”字之误）云：倭副将两员，日内来鄂，面商要事，伊两国欲想藉此守长江炮台等语。但望德案早结，以免群雄顾盼。[7]（P311）

盛还向张荫桓告知日人即将赴鄂之事，但语气略带怀疑成分，称“倭将来鄂，形迹可疑”。[7]（P312）盛的疑惑表明清廷官员对日本调整对华政策的试探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这种疑惑在张之洞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2月，神尾来到武昌，张之洞以奉旨赴京山县查勘堤工为由离开武昌。此时并非汛期，张之洞急忙视察堤工，其回避之意隐然可见。神尾遂与张之洞的代表江汉关道蔡锡勇和武昌知府钱恂会谈。神尾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深愿与中国联络，而日本愿联英以助中。”[3]（P2113）会谈结束后，神尾即乘船回国。

就在张之洞就是否与日本进一步接触而举棋不定的同时，刘坤一向张之洞通报了英国派员试探中英联交的消息。当时停泊于吴淞口的英舰派军官和吴淞道沈敦和进行会谈，据沈敦和报告，该英国军官表达了中、英、日三国联合的意向：

> 俄、德、法恃兵为国，前岁联盟，俄侵朝鲜、东三省，德据山左，法图南省，奸谋毕露。英恃商为国，今见南北商权顿失，岂能隐忍，倘中、英、日亦联盟，中、日保疆土，英保东方商务，惜华计不出此，英惟有力保长江商务，断不扰乱如海寇。[8]（P7441）

细察刘电所述之事，有两处疑点：第一，这个英国军官面见沈敦和究竟系个人行为还是奉政府指令？从沈敦和的转述来看，该军官所言更像是私人意见。更重要的是，这个英国军官的姓名、职位以及所在的军舰名称也没有交代。显然，其人身份和资质能否和神尾一样承担此重任是难以解释的问题。第二，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史料能证实英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一样，派遣某人赴华去作中国地方官的工作。退一步说，即使此种说法成立，何以不见有英国驻沪总领事来进一步证实沈敦和所述之事，而该军官又何以不再继续展开联络工作。总之，刘坤一所获取的情报需要进一步得到其他方面特别是伦敦方面的证实。尽管疑点重重，但是清廷对刘坤一所报告的消息甚为重视，总理衙门给刘坤一、张之洞和王文韶三人转来谕旨称：

> 英将之言虽未可尽信，然联盟分占之说，朝廷亦早有所闻。此时机括全在胶澳，胶澳不退，则各国蜂起，现在只可稳住各国，虚与委蛇，俟海靖回电到后再与商办。若能将胶澳开作通商口岸，而令给澳中租界为德国屯煤泊船之所，或可暂息纷争；若仅联一二国，此轻彼重，适启争局，恐非长策。著该督等从长计较，各抒所见，切实电奏，以备采择。[3]（P2109）

张之洞接电旨后，很快把神尾在武昌的言行与这个来历不明的英国军官联系起来，希望上海方面进一步确认神尾之言的可靠性。为此张致电刘坤一称：

昨奉电旨内有言及尊处英将云云，因有英将之言未可尽信之谕，究竟英将何言，能测知其底蕴否？祈速电告。倭将神尾来鄂，弟适出省，关道接见。伊谆谆以派员往倭观操及派学生往学武备为请，以为此联交入手处。余无他语。[8]（P7441）

刘很快复电证实，并告知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他本人已经在南京与神尾会见，而且神尾所言“与在鄂语略同”。[8]（P7441）

张之洞试图进一步了解英国意向。他在与刘坤一交换看法的同时，还致电蔡钧、沈敦和询问有关情况：“不知联英如何办法，英将想必谈及。此时英将在何处，能再详细之否？希即电复。”[8]（P7442）蔡钧复电称：

电谕敬悉，当已传谕沈道。英忌德弁，因前英领事密谈，以德人违法踞胶，形同强盗，吴淞德弁似宜分散他处，免生变端。日前倭将神尾君光臣及倭领事亦谈及，此时如中、英、倭联盟，东方大局可挽，英因保商务恐失藩篱，迫得合谋抗德，且嘱似宜密联之，缓急有待。钧与沪上各领事尚投洽，佥以联英、倭为中救援急务云。[8]（P7442）

紧接着，沈敦和也复电禀告与英国军官会谈的更多细节：

英将言胶事：“德于索还辽日，早与俄、法密议，俄蚕食蒙古、东三省，德据山左，法亦必自越南蚕食南省，凡此皆困英东方商权。华欲救危，与英、日三国连横，共拒德、法、俄，可保疆土，胶事亦可望挽回。如华不欲联英，或转与俄权，英恃商立国，惟有将长江一带，上至四川自行保护，不许他国侵犯，亦自不肯扰乱在华商务。”[8]（P7442-7443）

根据蔡钧与沈敦和来电提供的消息，张重新思考神尾所陈之语。张一改回避态度，致函神尾云：

台驾来鄂，适先期奏明出省堤工，仅派江汉关道及知府钱守接待，深以为怅。回省后该两员禀告阁下来意，极为欣悦。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他国方能联为一气。现在亟愿面商一切切实详细办法，但中国制度督抚不能出所辖省分（份），而此等事非面谈不可，可否请台驾重来鄂省，俾得面罄敝国真意，是东方大关系事。不胜盼企之至。[8]（P7446-7447）

但此时神尾已经离开湖北，身处长江客轮，无法收到电报。为此蔡钧特意将张之洞电报转发苏州、杭州和宁波的日本领事馆，希冀此电能送到神尾手中。最后确知无法与神尾取得联系，只得请日本驻沪领事转发东京。[8]（P7447）

此时盛宣怀也极力向刘、张陈述联合英日之必要性，并且提出更为详细的办法。12月30日，盛宣怀致电刘坤一称：“今若联日，空言则彼不信，实做则先失俄欢，英亦不肯为我得罪于德。盖利可同沾，地可分割，则牵制之法不行。”在盛宣怀看来，欲使英国尽力助华，应该在商贸上最大限度地满足英国利益需要，把中英利益合为一体。他进一步指出：“现惟就商务结英，抵借国债，造路开矿，并求其加税。须速派人与沙侯（即当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商办。”[7]（P315-316）显然，盛宣怀希望加速中英高层的相互沟通，借助英国援助来抵制俄、德的入侵。

盛宣怀的主张得到了张之洞的赞同，他再次向刘坤一征求意见：“昨由盛京卿转示尊电，嘱弟助联英、倭之说，具仰荩筹虚衷。惟尊意拟如何联法，外国联盟必有实际，断非空言所能联络也，彼两国语意曾露如何办法否？祈速示。”[8]（P7448）显然张之洞也意识到，必须用出让利益方能换取中英关系的接近。

正当盛、张二人已经形成共识之时，刘坤一却对联合日英之议改变了态度：“英、倭将领亦只纵论大势，及彼国愿联之意，未能道其实在办法。我宜如何联法，权操于内，枢纽又在使述之相机斟事，非外间所能悬拟，公谓何如？”[8]（P7449）刘坤一何以有此突然变化？从电文语气来看，可以看出刘坤一已经认为朝廷对联英主张并不热心，同时，英、日两国所派人员只是就大体问题陈述意见，并未涉及到实质性的操作问题。因而他变得消极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张之洞仍然对朝廷采纳他们的意见抱有希望。1898年1月2日，张之洞一天中接连三次致电总理衙门，建议联合日英，他在第一封电报中称：“今日急著，……首在迅速兼联英、倭，英既联，则倭附之。”[3]（P2111）在第二封电报中，他表达了对神尾主张的赞同，并对局势作出如是判断：

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踵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皆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而图自保。彼既愿助我，落得用之。盖倭不能抗俄、德，英水师则能之。联倭者，所以为联英之枢纽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借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将附英，以窥长江矣。[3]（P2113）

其第三封电报则陈述与日本参谋宇都宫一郎面谈的情况："日本参谋宇都宫今晚又密告伊此来实系奉其内旨而来密商联交之事，语尤切实，且劝我联英，力谏联英之利，不联英之害，颇有办法。察其语气，似英人阴谋，倭已全知。"[3]（P2113）

总理衙门显然还在犹豫，对张之洞的建议没有立即做出答复。翁同龢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记述："张复昨旨，鄂督联英、倭，极长。"[9]（P3076）直到1月4日总理衙门才复电称："张之洞三电均悉。中日修好之后，本无不洽，若遽连横，恐北方之患必起，倭将所请，断勿轻允，是为至要。"[3]（P2113）但张之洞仍不罢休，于12日致电总理衙门，再次建议联络日本：

连横为患，诚为可虑，中国此时岂能遽以力争？且各国作用虽殊，皆是乘机谋我，岂敢深信？所谓联者，不过设法羁縻，免多树敌耳。所谓藉联倭以联英者，恐英要求太横，可托倭居间婉商，减其食欲凶焰，倭实有唇齿之忧，深恐中危西强，彼必不保，情词惶急。我若托之，彼当肯助力劝解，非为我，乃自为也。且彼力言不索酬谢，语甚坚明，可否由总署往晤日本公使，察其意指，以备英人发难时居间排解之用？似乎有益无损。倭将所有深谈，乃向委员密语，洞晤时但以冠冕语答之，丝毫未及他事，断不致上劳宸廑。[3]（P2117）

张之洞甚至提议缓付对日赔款，延长日军占领威海卫的时限。他这样陈述缓付赔款的理由：

原议所以急欲付清者，欲令早撤威海之兵也，然今昔情形大有不同，德已踞胶，何在威海日本一军耶？且俄、德南北夹驻，日军间隔其中，俄、德恶倭，倭忌俄、德，三国正可彼此牵制。[3]（P2115）

在没有得到朝廷支持的情况下，张之洞打算直接派人与日方联络，其所中意的人选是郑孝胥。还在向朝廷陈述联合日英之议之前，张之洞与盛宣怀就以"有重大紧要事奉商为由"，电催正在上海的郑孝胥赶赴武昌。[10]（P635）1月7日，郑孝胥乘轮抵达汉口。次日张之洞与郑交谈。据郑在日记中云：

南皮欲余偕日人川上者赴日一行，而电奏尚未奉旨。余曰："日人既有此意，胡不言之于总署？宜令彼公使自言，而我公助之者乃可尔。"南皮曰："此事宜熟计。有日本小松王子所遣人于正月初六可到，子明日来吾署中，以便商酌此事。"[10]（P636）

郑孝胥未在日记中叙述此后二人商谈内容。但可以肯定，张之洞对说服朝廷采纳联日建议是相当投入的。盛宣怀也与张之洞一样，极力推动朝廷采纳联合日英，他在致电王文韶时表达了自己的设想：

……闻德案已定，胶、澳租借有年限否？南皮密示真电，兼联英、日，与江、鄂、湘三帅，不约而同，惟不触不背，止可从商务入手。借债造路、开矿，加税练兵，须派商务大员为专使，与沙侯筹议，不着痕迹。[7]（P317）

面对张之洞一再提出的联日要求，清廷仍持谨慎态度。1月21日，总署复电张之洞，陈述未采纳联合日英之议的缘由：

中国受害之深，实缘日本。近以德事，各国环伺，机局危迫，东方太平之局，几不可保。日、英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中外事事隔阂，难为密谋，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统俟筹定，请旨遵行。[3]（P2123）

细察总理衙门来电，可以看出清廷对日本助华之议甚为怀疑，担心落入日方彀中，因而对联合日英之议持婉拒态度。

在总理衙门答复张之洞后不久，张也突然停止联日之议，这一变化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奏报有关。就在神尾到鄂后不久，陈宝箴也上奏报告

日本派人在汉口活动情况，并建议朝廷“责成张之洞速即派人往日游历，面见日政府，确询联英事实”。[11]（卷128，P19）清廷下达谕旨：“张之洞、陈宝箴所陈颇有可采。现在英欲借款，俄欲借湾，正在未定之际。已饬总署从长与之计议矣。”[11]（卷128，P19）张之洞立即向总理衙门否认将派遣郑孝胥、乔树枏和姚锡光等三人赴日询问联英之事，称：

> 查联英一说，虽电奏，但系请总署向赫德或饬罗使商外部，或暂联日以联英，不过拟议备采。既奉旨，断勿轻允。岂有径派人往东洋之理。郑孝胥一员系因日本人力劝华人赴彼学习，明春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因郑曾到东洋，故与之谈及。拟令带往，此乃从容缓着。与联英事无涉。陈电系远道讹传误听，恐钧署悬系，谨声明。[11]（卷128，P22）

不仅如此，张之洞还放弃联英的主张，致电总理衙门，要求早日筹划抵制英国索求之法。他判断英国可能提出四种要求：其一为借款，其二为“索香港对岸之深水埠及舟山”，其三为索粤汉铁路修筑权，其四派军舰入长江，并在南京和镇江驻军。他特别强调：“粤汉铁路万不可许。”他提议“准英借款修山西、陕西铁路，即以此路作抵……并准英与华人合开山西煤铁矿，余利与我均分。”张之洞认为，“山陕之路与我芦汉干路接，不通海口，尚无大患，彼图矿利，当易商允。”[3]（P2115-2116）张之洞还反对接受英国借款，称：“盖英款借，则长江失，腹心既溃，此即所谓瓜分之局，无所谓东方太平之局矣。必须先将借英款一事决议谢绝，再徐筹抵此次英索之策。”他建议，若“英必强我借”，就采用出让山陕路矿利益的办法。对于中俄交涉，张之洞认为，“俄踞大连，最为祸本，英必不甘，法必效尤，然俄防英之隐衷，必有以慰之”，建议将大连湾“暗借俄为兵埠，许各国为商埠”，中国向俄国借款修筑吉林至大连湾铁路。[3]（P2119）不言而喻，张之洞企图以出让秦晋两省的路矿利权和旅大主权来保全长江流域的利益。

张之洞在短时间内何以有如此急剧的变化？我们认为，这需要从张本人的心态来分析。身在长沙的陈宝箴向朝廷奏报自己在武昌与日本人接触一事，有向朝廷秘报张之洞举动的嫌疑，由此牵涉到清代所惯有的总督和巡抚之间的矛盾，张之洞自然对陈宝箴之举十分忌讳。张担心自己主张的联合日英之议将来对自己不利，故张在这个问题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同时，张对日本加紧联络地方督抚工作的真实动机充满怀疑，担心日本将利用派遣军事顾问的机也会直接控制湖北军政权力。曾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军事的姚锡光就这样陈述：

> 呜呼！自蒙胶祸以来，未及半载，……海权尽失，军港沦胥，……我不自忧，而日人为我忧之。日人之为我谋，盖亦其自为谋也。至其待我之殷，勖我之切，尤其用心之深，布局之远，远识者自默察之，无待赘言。[12]

这种顾虑自然妨碍张之洞与日本的进一步接近。

对俄国的顾忌则是清廷在联合日英问题上表现极为谨慎的直接原因。此可得证于盛宣怀给陈宝箴的电报：

> 时局从胶州坏起，曾力请当轴勿允德所要索，断不致开衅，及以胶予德，以而各国诧然，群起效尤矣。之所以急于下手者，肇于俄约，胶案初起而犹与俄解纷，岂不愚哉。新宁、南皮创联英之议，署虑激俄怒，而英亦以中国为不足助。助华拒俄，事之难者，踵俄法而索华利益，事之易者，度亦为其易而不为其难矣。[13]（P64-65）

由此，联合日英之议也就一时低落下来。清廷仍然以与德、俄交涉为主要途径解决已经发生在胶州湾和大连湾的棘手事件，最终不得不接受列强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夺取租借地的恶果。但是，张之洞和刘坤一各自与英、日两国的秘密接触，反映了这两位总督在外交上已经具有某种相对主动性，从中可以看到“东南互保”的预演。

结语

张之洞就战后外交问题所提出的主张经历了大幅度急剧变化，但毕竟是当时清廷上下急于摆脱战败危局的共同心态所驱动使然。因而张之洞的外交言论对甲午后清廷外交政策的形成和调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张之洞强力主张的联俄拒日是清廷在甲午战后初期的外交应对，其目的是在俄国策动三国干涉还辽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俄国的外交关系，进一步实施对日本的报复，同时也是对英国拒绝参加对日干涉的回应。当然这种报复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而是通过外交手段。但是，张之洞和其他朝

廷重臣一样，未能细察一向与中国不和的俄国何以在此时以助华排日的面目出现，换言之，俄国策动三国干涉还辽的真实动机和下一步行动都是张之洞联俄拒日主张的盲点。当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张之洞又顺势提出联合日本的主张，同样缺乏深度分析，未能通盘考虑，仅仅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自然也不可能为清廷摆脱列强瓜分狂潮提供有效对策。但是，从张之洞与刘坤一外交主张及其外交活动中，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动性，为不久之后策划“东南互保”设下了伏笔。

张之洞曾经是清流派干将，虽然在出任地方督抚后与清流派在政治上逐渐拉开距离，积极推行洋务事业，但其为政仍然有清流作风，常以言辞之雄壮来博取朝野的注意。张之洞先是主张并联英俄，又改而专提联俄，再到密联英日，均是尚未细致论证即匆忙表态，从中可以看出清流作风在其外交言论中的影响

我们不会忽视这样一种现象——张之洞曾提出割让新疆、西藏以换取俄、英支持的错误主张，但是这种主张属于朝廷和地方督抚高层内部的意见交换，张之洞本人也未曾将这种有害主权的主张予以公开。平允而论，张之洞割让疆藏的意见仅仅是其外交主张中极不成熟的一部分。换言之，这种剜肉补疮的对策在张之洞的外交言论跳跃式变化中仅是一瞬而过。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张之洞在具体外交事务中，仍然保持对列强侵权意图的戒备。张之洞在与神尾光臣的接触中，就对日本对华意图有所戒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允准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代价换取日本财政支持，引起公众舆论不满。其后日本屡屡染指汉冶萍公司利权。这些事实证明张之洞生前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参考文献:

[1] 贾小叶.试论督抚与《马关条约》签定后的换约问题[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戚其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 [Z].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3]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 张之洞全集（第三册） [Z].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4] 戚其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6.

[5] 劳祖德. 郑孝胥日记（第一册） [Z].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6]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 [Z].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7] 吴伦霓霞,王尔敏. 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Z].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8]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 张之洞全集（第九册） [Z].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9] 陈义杰.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劳祖德. 郑孝胥日记（第二册） [Z].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11] 王彦威,王亮. 清季外交史料[Z].北平: 故宫博物院,1933.

[12] 姚锡光. 东瀛学校举概·序[A]. 十洲古籍书画社.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13] 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 盛宣怀未刊信稿[Z]. 北京:中华书局,1960.

责任编辑：侯德彤

Changes in Zhang Zhidong's View about Diplomacy from 1894 to 1897

SUN Fang　LIU Ping

(1.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100710, China;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Zhang Zhidong advised uniting Britain and Russia to get out of the isolated situation in diplomac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Whe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was signed, Zhang proposed uniting Russia to resist Japan. He turned to uniting Japan to resist Russia after the Jiaozhou Bay Incident happened in 1897. There was such rapid change in Zhang's view on diplomacy in a short time because he was anxious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knew littl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true intention of the powers.

Key words: Zhang Zhidong; diplomacy; view; rapid change; anxiety

头部移植的伦理反思

——从儒家的视角看

刘 涛

（广州医科大学 卫生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1436）

摘 要：儒家认为头部比其他身体部位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经过头部移植而合成的人应该被认定为是头部被移植的那个人，其所生育的后代也应被视为原头部所有者的后代。头部移植中提供自己身体的一方，必须是自愿的且经过其家庭成员同意的。头部移植中提供自己头部的一方，只有在其头部以外的躯体整体丧失功能而影响生命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儒家伦理的支持进行手术。从儒家的伦理视角来评估，在目前技术风险过大的情况下开展头部移植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头部移植；儒家伦理；身份；技术风险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120-04

“头部移植”是随着临床医学移植技术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项新的医学挑战，它的学名叫“异体头身重建”，即“将两个无关联的身体和头互换位置，A的头与B的身体合而为一，组成新的个体继续存活”[1]。如果从受体是身体的一方来说，其移植的是别人的头部，因此称为“头部移植”。当然，如果从受体是头部的一方来说，受体移植的是别人的身体，因此又可称作“身体移植”。国内媒体多以“换头术”称之，实则是站在“头部移植”的角度而言。目前，意大利的塞尔吉奥·卡纳维洛医生正准备为一位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的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进行头部移植术，同时他也想邀请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任晓平医生参与其中。鉴于头部移植的新颖性及其存在的诸多未知性，中外的医学伦理学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往往仅止于单纯地赞同或批判，而并未对头部移植所涉及的复杂伦理问题展开深刻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家面对这一医学界的新问题时缺乏可供参考的伦理范式，或者说，基于现有的西方生命伦理学的视角无法对头部移植带来的伦理困境进行有力回应。为此，借鉴麦金泰尔提出的由传统构成的视角来切入道德反思的思路[2]，通过发掘中国传统的核心伦理资源即从儒家伦理的视角展开辨析，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身份界定的伦理反思

头部移植面临的首要伦理问题是：为一个身体移植了新的头部，或为一个头部移植了新的身体，那么，移植之后的这个人是谁，其身份如何界定？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学者的回答有两种。其一，认为“经过头部移植而合成的人将是一个既不同于头部被移植的那个人，也不同于其身体被新的头附着的那个人”[3]。也就是说，经过头部移植的人与移植前的供体和受体都不相同，应该被视为一个全新的人。其二，认为移植后的这个人的身份是由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4]。对于这两种回答，如果将移植后的这个人视为一个全新身份的人，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个全新身份的人该如何界定与之前的供体和受体的关系，以及他如何与之前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进行相处？如果他是全新身份的人，那么之前的供体与受体双方的父母都不能再被视为他的父母，他将成

收稿日期：2018-03-12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2017GZQN06）

作者简介：刘涛（1982-），男，安徽霍邱人，哲学博士，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

为一个比克隆人更难确定社会关系的彻底的“孤儿”。因此,第一种回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无解。第二种回答主要阐明了文化对身份界定的影响,但却未就具体的文化环境给出相关分析,这同样令我们无从解惑。

儒家对于身体有着深刻的理解,就头部与其他身体部位之间的关系做出过相关阐释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他曾将身体与天地类比:“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人的身体符合天地之数,许多构造特征都可以视为对天地的模拟。董仲舒进一步指出:“人之身,首坌而员,象天容也。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阳,天气也;阴,地气也。”[5](P355)人的身体,头大而圆,像上天的容貌。头颈以上,精神威严端庄,显示出和天相类的情况;而头颈以下的身体部分,丰满厚实,比头的位置低下,可以和在天之下的土壤类比。董仲舒将头部类比于上天,认为头部体现的是天之阳气;将头部以下的身体类比于大地,认为其体现的是地之阴气。所以,头部和头部以下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天与地、阳与阴的关系。对于阴阳之间的关系,董仲舒云:“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5](P324)阳尊阴卑,阳贵阴贱,因此人的头部是最贵重的,相较而言,头部以下身体的重要性则不及头部。这当然不是说头部之外的身体构成就是不重要的,董仲舒说:“故阴阳之动,使人足病,喉痹起,则地气上为云雨,而象亦应之也。”[5](P356)阴阳二气的不调和可以通过足底向上传导,最终引起头部器官的不适,这表明董仲舒也强调了头部以下身体的重要性及其对头部的影响。但若不得不将两者作一个价值上的先后排序,无疑头部更为优先。由此可以推论,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头部在移植了新的身体之后,其所形成的新的身体构造系统中,头部仍然具有比其他身体部位更为优先的价值定位。因此,在确定这一新个体的身份时,头部应该被视为主要依据,经过头部移植而合成的人应该被认定为是头部被移植的那个人,而移植了别人头部的原来的身体,则应视为新移植来的头部所有者的身体。

接下来的问题是,进行过头部移植的人所生育的后代的身份该如何确定。按照现代生物学的理论,生殖器官产生生殖细胞,生殖细胞决定了后代的基因。如果按这一理论,那么进行过头部移植的这个人所生育的后代应该被视为原身体所有者的后代而非头部所有者的。可如果从儒家的视角来看,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上述已说明,儒家主张以头部所有者的身份来确定新的身体的身份归属。既然经过移植之后的身体被视为原头部所有者的新身体,那么原有身体所有者的身份就不应再对新身体的身份构成影响。新身体的主人是头部所有者,由该新身体所繁衍的后代也应该被视为头部所有者的后代,而非原身体所有者的。此外,儒家强调身体的政治化、社会化和家庭化的功能,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6](P167),将天下的治理层层安置在国、家、身之上;在另一篇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的八条目,也将修身作为核心,并向外层层扩充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身体与家庭是首要的互联对象,身体的安置必须要维持家庭的和睦,然后才能有和谐的社会环境。从儒家的伦理观来考量,经过头部移植的新身体所构建的社会关系应该被视为头部所有者的社会关系,其结成的新的家庭关系也应被确定为头部所有者原来拥有的家庭关系,那么其生育的后代的身份也理所当然地要被放置在这一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中去确定。

二、供体来源的伦理反思

这里的“供体”是指头部移植手术中提供自己身体的一方。据了解,目前准备开展的移植手术中,俄罗斯的斯皮里多诺夫因患有肌萎缩症而必须移植新的身体,而这个新身体的提供方即供体方是一位脑死亡但其他部位健康的捐献者。那么,什么人可以在伦理上被允许成为供体呢?以儒家伦理为依据,可遵循下列若干伦理原则。

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强调自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不应强加给别人。将自我的身体从头部分离而提供给另一个头部使用,在正常情况下,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情愿的。基于普通人大多不愿意作为头部移植的供体这一显在事实存在,儒家就不会将这种不情愿硬性强加给其他人。所以,供体必须是自愿的,而非他者强迫。即使对于已死之人,也要其在生前留有明确的、有效的预嘱,方可将其纳入到供体的考虑范围。

第二,恻隐之心,仁者爱人。《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7](P131)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也。”[6](P259)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儒家向来不忍心让别人受到伤害。不忍人之心就是爱人之心,就是对他人生命的真诚呵护,是成为一位仁者必备的素养。联系到头部移植,如果在手术中供体要承受极端痛苦的过程,或这种过程将会给新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那么根据儒家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念,我们就不适合将其作为供体。

第三,受之父母,敬身爱亲。儒家认为,“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8](P87)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必须谨慎地对待身体,因为这是我们爱亲、敬亲、孝亲的根本。很显然,儒家是将身体牢牢地镶嵌在家庭关系中去维系的,对身体的使用同样关乎孝敬亲人的大义。正如范瑞平指出的:“儒家是伦理上的家庭主义,个人的存在

及繁荣依赖于家庭的完整、连续及兴旺。”[9](P91)特别是在头部移植中，供体除头部外的整个身体都将转移，且转移后的身体会成为另一个头部所有者的新身体而存在，这就意味着，供体的原有身体不再具有属于供体的身份定位，经过移植后的供体身体将会与其原有的家庭关系彻底“诀别”。这与普通的器官移植是不同的，普通的器官移植并不影响整个身体的身份定位，也不会造成供体身体与家庭关系的整体诀别。因此，儒家一定会要求供体在做出决定时，充分考虑其家庭成员的意见，如果不能获得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配偶的理解和同意，那么其也就不适合成为供体。更深一层来看，假使第三原则与上述第一原则冲突，一方面是本人执意自愿作为供体，另一方面是其家庭成员不同意其作为供体，两相权衡，儒家仍然会以身体的家庭属性为主要考虑因素。因为自愿原则如果带来的是整个家庭关系的颠覆，为了维系家庭乃至社会的整体和谐，自愿原则的实现必须要以安顿好家庭关系为前提。

三、受体资格的伦理反思

这里的“受体”指的是头部移植手术中提供自己头部来接受新身体的一方。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成为受体呢？有报道显示，有些人为了获得一个美丽的躯体而想成为头部移植的受体，还有的人想通过不断移植新身体来达到长生不死。这些试图成为头部移植受体的想法能否获得儒家的伦理支持呢？

首先，为了改变体貌而想移植新身体，这无法得到儒家伦理的辩护。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10](P221)，这一方面指出了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保持身体自然属性的必要。此外，儒家认为形貌的美丑妍媸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在品质，相对于道德人品而言，形貌是微不足道的。《史记》中记载郑人将孔子形容为体貌丑陋的丧家狗，孔子听后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11](P1548)由此可见孔子对外貌的不计较。这些都说明儒家并不支持为了改变体貌而擅自移植新身体的做法。

其次，为了长生不死而试图移植新身体，亦不能得到儒家的支持。其理由有三：其一，儒家将生死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P92)朱熹解释为：“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12](P145)时间就像滚滚向前的河水一样奔流不息，没有人能够跳出时间的洪流之外而不接受生死的约束。其二，儒家从不将长生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7](P37)；“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7](P89)。对道德的追求和弘扬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对这一使命的坚守远远超出了对长生的渴求。其三，儒家认为人的寿命与道德相关联，所谓“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12](P33)。儒家认可的延年益寿的方法是不断增强自我的道德修养，因此，以不断更换新身体的方式来求得长生的想法，只会被儒家视为误入歧路的贪婪，无从得到儒家伦理的认可。

以上分析了两种不能成为受体的情况。从儒家的视域来看，要取得受体的资格，除了必须排除以上情况外，还应符合如下条件：其头部以外的躯体整体丧失功能而影响生命与生活质量。如果病痛是由于部分器官功能丧失而导致的，那么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器官移植，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进行整个身体移植，与儒家伦理不符。孟子云：“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6](P268)身体的各个器官之间有贵贱大小之分，一根手指的重要性无疑不及肩膀脊背。因此，依据儒家的教导，我们对器官的救治力度必须与其重要程度相符合，为了更换某一个器官而移植整个身体的做法，儒家不会支持。只有在其躯体整体丧失功能的情况下，才能被视为头部移植的受体。

四、技术风险的伦理反思

技术发展追求的是突破与创新，而伦理规范则强调道德与尊重。一旦医学科技的发展，冲击或打破了技术追求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动态平衡，伦理疑难或冲突就应运而生[13]。头部移植涉及的是临床医学研究与应用的前沿领域，就人类目前的医学发展水平来看，进行头部移植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为了推动医学技术的进步，能否冒着风险进行头部移植？技术发展与道德规范之间该怎样取舍？这也是开展头部移植需要回应的问题。

儒家强调中庸的价值取向，不主张铤而走险。《中庸》载：“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12](P36)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有充分的准备，这样才能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不至于造成让人后悔的结果。从头部移植术的操作过程来看，要先将受体、供体的头部与原身体分离，再将受体的头部移植到供体的身体上，最后缝合肌肉和血管。整个手术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受体的头与供体身体重新有机地连接起来。目前的同类技术在动物实验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人体的脊髓连接方面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本次卡纳维洛医生所要进行的头部移植手术毋宁说就是一次风险极大的人体实验。在没有获得确切的理论与实践依据的情况下，贸然开展这种风险性极大的手术，很大程度上将会以一个失败的结局告终。因此，从儒家的伦理视角来评估，在目前技术水平达不到的情况下开展头部移植是不恰当的。

然而，面对医学专家对头部移植手术的伦理质疑，俄罗斯志愿者斯皮里多诺夫说：“如果换做你是我，从一

出生就忍受肌肉萎缩的痛苦，你会怎么选择？”[14]一个新的伦理难题出现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了解除患者的痛苦而允许其尝试一项风险极大的、技术条件极不成熟的手术呢？儒家是提倡仁爱精神的，孟子也主张发扬恻隐之心，面对患者的无助与痛苦，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儒家的伦理观念中找到支持其进行头部移植的依据。可是，当两种伦理依据相互冲突时该如何取舍，这是令人棘手的伦理难题。为了解除患者痛苦，当然应该支持其进行头部移植术；但现在的技术水平基本上不可能使手术成功，所以另一方面又应该禁止此手术。为解决这一伦理难题，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如下推理：假如同意该患者进行头部移植术，那么大概率的结果可预判为失败，这说明开展手术无助于改善患者的痛苦。既然手术并不能解决患者的问题，那么其获得儒家仁爱伦理支持的程度就会相对减弱。因此，从儒家伦理的诸多方面来权衡，在目前的技术风险下开展头部移植是得不到有力的伦理支持的。

综上所论，对头部移植的伦理考察需要多重的文化视角，就中华文化而言，儒家伦理则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反思路径。本文由儒家的身体观念、仁爱原则、家庭主义等伦理思想为切入点，从四方面审视了当下社会热切关注的“换头术”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首先，从儒家的身体伦理来看，头部比身体其他部位有着更重要的属性，经过头部移植而成的新的身体应视为接受身体的头部所有者的身体；根据儒家的家庭主义特征，由新身体参与孕育的后代也应视为原头部所有者的后代。其次，以儒家的仁爱忠恕原则、孝亲观念而论，“换头术”中的身体提供方必须自愿且同时应取得其家庭成员的认可，并有足够的理由保证不会给手术后的新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再次，儒家的形体观、人生观认为，形体的重要性弱于道德，而道德又与寿命正相关，因此，为了获取美貌和长生试图移植别人的身体，不具有伦理正当性。只有在其躯体整体丧失功能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伦理上正当的头部移植受体。最后，鉴于现阶段人体头部移植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与存在的极端风险，儒家的中庸价值取向并不支持在极不成熟的技术环境中开展头部移植术。

参考文献：

[1] 李华虹,孙瑜淼.“异体头身重建”面面观[J].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15,（8）.

[2] ALASDAIR C M. 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0.

[3] ASSYA P, MARIO P, JAMES G. Head Transplants, Personal Identity and Neuroethics [J].Neuroethics,2016,9（1）:15-22.

[4] G. Mori. Head Transplants and Personal Identity: A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Survey [J]. Cns Neuroscience & Therapeutics,2016,22（4）:275.

[5] 钟哲.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黄怀信. 大戴礼记汇校集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9] 范瑞平.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 礼记 孝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3] 储静丘子. 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伦理疑难及其解决[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2）.

[14] 李丽云,乔蕤琳.“换头术”:突破还是噱头[J]. 今日科苑,2015,（9）.

责任编辑：潘文竹

Ethical Reflections on Head Transpl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LIU Tao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436,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cians believe that the hea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st of the body. The person who has undergone a head transplant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the man with the original head. His offspring should also be regarded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original owner of the head. In head transplanting, the person who provides his or her head must be voluntary and approved by other members of his or her family. The person who provides his or her head can obtain the support of Confucian ethics for surgery only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head has lost its function and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ethics,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carry out head transplants at the present time when technology risk is too high.

Key words: head transplant; Confucian ethic; identity; technique risk

论墨学的圣俗二重性

黄 庆 丽

（青岛大学 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是否存在纯粹的宗教，学界向来聚讼不已。墨学表述了天与鬼的宗教省思，蕴涵着丰富的神道设教思想。相较于先秦其他诸子学说，墨学因拥有天志、明鬼等神圣观念而表现得更为富于宗教性。不过其哲学观念又倡导天人二分，实践强为、力行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使得墨学具有圣俗二重性的特质，其主旨在于在超验的神圣世界中建立天志统治的合法性，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建成利益均分的美好社会。

关键词：墨学；宗教；世俗；圣俗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124-06

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是中国的宗教，是儒家建立的以道为中心的世俗伦理宗教。可通观人文精神和超验神学的比重，墨学应当比儒学更富有宗教性。在先秦诸子的形上之思中，墨家全面阐释了神圣性的终极实体“天志”，系统论证了由“天志”引申而来的价值体系“义”，因而更具有宗教意味。墨学作为宗教既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肯认，也遭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和反对，这其实是由墨学的圣俗二重性决定的。无可否认的是，墨学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非命”对不可知命运的反抗，“兼爱”对人内在人性的尊重，“交利”对社会的自觉改造，是其离开宗教而走进人文的根由。

一 天志、明鬼：墨学的宗教表征

墨家对天志和明鬼展开了详实的论证，这既是其推论和立论的基本前提，又是遍行天下以施行教化的有力手段，更是全面改造社会的思想利器。墨家的社会治理和政治教化充满了宗教色彩，借助超验神圣力量来规范国家政治和社会美德，是墨家神道设教的意图所在。

（一）天与鬼的宗教省思

晚周时期的文化生活整体上表现出注重现实世界的世俗情怀。经过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人文启蒙，以及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有力辩驳，人们对神秘鬼神和不可知世界存而不论。对彼岸来世生命的忽略，对此岸现世生活的向往，是中国传统思想实用理性的体现。“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1]（P190）墨学浸润了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品质，却又独辟蹊径地推崇天志、敬畏鬼神，以宗教思想为言行的准绳。目睹社会价值系统的崩解、国家混战不休的失序、战争频仍带来的苦痛和财富积累造成的不公，墨家设计的社会重建方案是，以宗教为手段拉开全面改造社会和整治价值秩序的序幕，建设和平、友爱、公正、互助的良序社会。

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2]（P1267），把视野投向辽远的上古社会，远离周礼而亲近夏礼，以为民治水而辛劳奔走的禹为精神偶像，远古时代鬼神与民杂居的信仰生活图景对其更具吸引力。对治水英雄的敬仰，融合了为民谋利的激情，转化为墨家神学政治的理性筹划与制度设计。为推行正义、

收稿日期：2018-04-15

基金项目：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黄庆丽（1979-），女，安徽定远人，教育学博士，青岛大学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讲师。

共利、友爱的社会制度，在政治上，墨家反对周朝依托于血亲宗法制度而建立的尊尊亲亲格局；在文化上，极力疏远维护等级统治的礼乐典章。对世俗人性的背离，对宗教神性的张扬，使墨家借助鬼神的神秘力量来管理人间事务。“宗教的本质正是试图拥有绝对和唯一的话语权力，因此，宗教从来都是政治性的。”[3]（P25）墨家的天志、鬼神同样是为政治服务。

（二）天志是统治合法性的根源

墨家崇仰的天拥有坚不可摧之意志，天志包含天理、天意和天谴等多重意义。它演化为“兼爱、交利”的美德体系，是判定政治优良与否的标准。“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4]（P222）相对于人性的卑微和拙劣，天志至尊至贵又全知全能，义自天出，权力亦从天出，即使贵为天子者也需仰仗天佑。天志掌握着绝对权力，是政治统治、社会秩序与人间祸福的绝对主宰。它被奉行为“天下之明法”，既可用来坚实政治权力的神性基础，亦可用来否决其他各派学说的存在合法性。“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详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4]（P221）天志学说成为衡量政治及言论的尺度，符合则正当，不然则不正当，这有效地排除了异己之见。将神圣权力、世俗政治和言论控制统一起来，墨家营造起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及稳固的政治生态，这可能造成思想的同质，使社会缺乏适度活力。

墨家的等级政治不同于血亲宗法制度的阶级差异，而是指向了神与人的绝对差距。君王只有执行天志代表的圣王之道、圣王之事，才能得到绵长福佑并处事顺遂。“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4]（P227）天志和鬼神是政治权力的神圣起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其最终目的。政治事务的根据在天志和鬼神，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作为天之子民，皆应效法其精神品质。“墨家有其托始于‘天’的终极眷注，这眷注在于‘兼相爱，交相利’的价值取向及其‘兼爱，交利’所可能达到的某种极致状态。”[5]（P36）天志具有超验能力，处于权力等级和权威结构的顶端，直接干预人间事务，最终裁决是非善恶。它给人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楷模，墨家依此注重成善成圣的品格，墨子及弟子的言行皆表现出胸怀天下、不为时势所困的超拔精神，这不能不说是效法天志的结果。

（三）天志是裁定善恶的标准

天之本性是“兼爱”，人也应形成“兼爱”的品性。“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4]（P219）天的兼爱是通过对人的抚养和明察表达出来的，上帝①给人供应丰富的衣食之源，人以祭祀来敬奉鬼神，可见天与人的心志是共通的。“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4]（P215）天和人都赞同仁义而反对不仁义，因此带领百姓行仁义之事，上天也会满足他的心愿，这种对等交换原则是墨家规训人们兼爱、互利的出发点。天正是有“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明久而不衰”[4]（P22）的完美性、博爱性、崇高性和永恒性，才成为善恶的衡量标准，才成为人在尘世谋划统治、追求福乐与成就事功的皈依。

兼爱、交利是上天本性的自然流露，也是社会运行必须服从的支配法则。上天显露出博爱与公正，人类的义务则是对之有所领悟并在公共事务中主动运用。“当自然界之秩序与社会界之秩序被认为是神祇的创造物，而非超越他们的存在，那么，神祇理所当然会保护他所创造的秩序不受任何侵犯。”[6]（P48）墨家成为天志的代言人，充任为天传道的宣道者角色。“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4]（P220）其于无形中感染到这种非人格化力量，以刚强、团结、敢于牺牲奉献的团体意志而著称于世，反对无情压迫的暴政，支持和平、友爱和利他的善政。认为在国家和人群中作为强盛方的聪明尊贵者，不应欺压和劫掠弱势者，“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上之强听治，下之强从事”。[4]（P225）这是上利于天、中利于鬼神、下利于人的事，“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4]（P220）。

在天志的感召下，墨家获得了规定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力，充当绝对价值的担纲者身份。其宣

①此处的上帝并非是对西方基督教上帝名称的借用。中国商代对超验的神圣不可知者多称为“天”，而在周代多称为“帝”或“上帝”，详可参见聂培德《从〈尚书〉看周代思想中的天与王朝更迭》（载《求是学刊》2009年第2期）。墨家在《墨子》一书中，有时称天，有时称为上帝，如在《天志上》中“上帝鬼神”并称，墨家的天应当是包括“上帝鬼神”在内的至高至大至善者。

称掌握度量一切事物的准则，上可触及刑法政治，下则延至文学言辞，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天志的名义来建设和平的国际关系与和睦的社群生活，不把弱势者和弱小国家排除在共享发展成果之外，让每个国家及其人民公正地享受免除匮乏的自由，使其远离生存权和发展权遭受威胁的恐惧。其既反对儒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神圣感受，又利用天鬼的威慑力量来获取民众认同，从而排斥其他诸子学说。墨家因而获得了积极行动的力量，满怀信心地去改造社会、去征服命运。

二　强为、非命：墨学宗教性的自我平衡

墨家使用善恶相分的二分法思维方式，确立了天志的正当性，以之为仁义的本源，为之树立了奖善惩恶的公正形象。其把天志设立为“法仪”，即顺从上天的旨意以尊崇道义而使百姓得利。为克服“天志”造成的命定论所导致的固步自封，墨家以“非命”和“强为”作为平衡机制。

（一）天志的困境与超越

图腾、禁忌和自然神崇拜是原始族群在群居生活中自发产生的，而经过理性系统加工的理论性宗教却为文明人积极利用。“神秘观念并不具有原始的起源，也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正是人类本身，亲手塑造了神秘观念以及与此相反的观念。”[7]（P34）墨家高举“天志”来阐释一切事物，却给学说的后续发展设置了难以跨越的障碍。其对“天志”的真实存在及功能言之凿凿，宣扬世人只要服从，则能带来社会良序和人心安定，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文化潮流相违背。“宗教用神圣的帷幕遮盖住制度秩序的一切人造的特征，把它们来自虚无基地的标记撤下，使它们变成某种在时间的开端就已存在着的东西。宗教正是通过这种赋予社会制度秩序以终极有效的本位论地位的手段，把经验社会不稳定的实在与终极实在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合理性。”[8]（P11）墨家渴望救赎的急迫心态和当时“民散久矣”的社会生活相一致，不过完善的理论设想需要付诸实施才可被证实，而兼爱、交利的思想学说在当时受到了普遍质疑。

墨家不得不采取折衷路线——既坚守热忱的宗教信仰，又不屈从无情命运的肆意摆弄，因而成了有信仰的非宿命论者。墨家非难天命说，反对命定论。“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谇也。说百姓之谇者，是灭天下之人也。”[4]（P288）有命论颠覆了天下的道义，是百姓的忧患所在，会让仁义之人走向消亡。原因在于，“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4]（P293）物质决定意识，若是被动等待命运之神显灵，百姓的饥寒冻馁之忧立即来临，国君的懈怠也会招致亡国之祸。有命论造成了物质贫乏，使君王缺乏祭祀之物。这将造成鬼神不悦、社会动乱和人民匮乏，人伦孝悌等价值体系将丧失殆尽，民众也会因缺乏教诲而失去智慧。

“历史地看来，墨家的宗教有神论有其积极意义，其所培养的那种献身精神和认真的性格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9]（P64）墨家用实际行动证实了为民众的利益而劳苦的奉献精神是卓有成效的，墨子以一己雄辩之力和团体的精诚协作，成功阻止了强大楚国吞并弱小宋国的计划。“墨子及其门徒‘摩顶放踵’地苦而为义，以实际行动论证了兼爱的可行性。墨家‘兼爱’的理论与行动即是建立在‘天’兼爱世人，人人平等的宗教信仰上的。”[10]（P26）忠诚于信仰推动墨家去实现天意，以苦行精神参与对社会的全面改造，这感动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尤其当社会处于深重危机和重大转型时，拥有侠义精神的济世人格者会放弃一己之私心欲念而投身于为天下苍生谋福，这是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的根源之一。

（二）强为和力行的进取精神

“强为、力行”是墨家宗教思想的有益补充，天志要求人们齐心协力地强力而为。它规定了不可违抗的“兼爱、交利”之绝对命令，又给予人意志自由以增强行动能力，去实现“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针对“上所听治，下所从事”的社会分工，天志希望人们积极履行义务，忠诚行使职责。为弥补天赋差异、财富差距与权力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病症，墨家用人的积极作为来弥补社会的先天不足，以期建成冲突消解的公正社会。对不可知命运的抵制和批判，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以进取的姿态改革弊政，创造并共享物质财富。这种不依附于命运、不向现实妥协的气质，激发了墨家领袖和弟子们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为坚守道义而鞠躬尽瘁。“这不同于儒家的‘有进有退’和道家的‘以退为进’，墨家的人生态度是‘有进无退’。”[11]（P37）如此激越的奋发开拓精神，既是墨家在科学技术、防御工事、形式逻辑和政治活动中取得卓著成就的动因，也是其宏大抱负因不合人情

而受到持续批评的原由。

在宗教献身精神的激励下，墨家既推崇天志又强调人力，在驳斥“有命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言行仁义与否的三条标准。“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4](P286)墨家开创性地探索言论的标准及规则法度，追寻事物背后的恒定规律。“‘三表法’，乃取法往圣先贤的行为事迹、注重现实的经验与实施成效。它是三条证明的程序或方法，也是人在行义、为政或立论时所依循的三条原理，墨学十论俱依此而成立，乃前期墨家最具代表性之论证法则。”[12](P101)注重经验和强调实效的“三表法”，看似和天志、明鬼等有神论观念存在抵牾，可它们是内在相通的。因为墨家也是用经验法来证实鬼神的存在，以典籍记载的对鬼神的耳目之见为证据，并且两者都统一于墨学核心“百姓人民之利”，服务于“利民”主张。无论是宗教观念，还是世俗学说，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心，可见其在神本主义思想中孕育着人文主义的稚芽。

三　赖力而生：墨学旨在建成美好社会

墨学的圣俗二重性，使墨家反复申诉功利、利益，诸子百家无人能出其右。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百姓的赋税也较为沉重。从事货币经济的商业者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专业官僚聚居而出现了城市，专门供应贵族阶层享用的奢侈品进入了消费渠道并普遍流通。“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①物质产品的丰富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形成反差，阶层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这引发墨家激烈地批判社会现实，提出了进行公正分配的改良方案。

（一）墨家将劳动赋予人的本质

当物质生活富足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②生活的忧患减轻，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参与生产劳动不仅体现对天意的顺从，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保障。墨家以人和动物作对比，动物可凭借先天本能和自然优势存活，而人则迥然不同。“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4](P279)其把劳动上升到生存本位的高度，看作是人生存的本义和充要条件。墨家肯定人的劳动本质，“节葬”“非礼乐”正是基于对此的自觉认识。为死去的人无谓浪费资财，或因豪华仪式、文化消费而消耗社会财富，都是不赖其力而生的证明。

墨家以生产劳动、物质利益来权衡天人关系和社会关系。当时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初见端倪，尊重职业伦理、尽心尽意完成本职工作是个体的基本职责。物质财富的丰足和合理分配，是上天愉悦、政治稳定、人伦和谐和个人获取社会成就的标志。“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若国家治，财用足，则内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环璧珠玉，以聘挠四邻。诸侯之冤不兴矣，边境兵甲不作矣。内有以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则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唯毋明乎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4](P229)在墨家看来，若国家掌握了足够的财产，便可结交四邻，有效地防止战争。从国君到平民各个阶层竭力做事并恪守职业伦理，生产和积累物质财富，既实现了“天志”象征的仁义，也是消解战争劫掠、百姓争夺和国家冲突的基本手段。

（二）墨家的分配正义方案

墨家关注人的生产性，强调劳动是人的基本职责，认可人的物质需求，生存需要被放在分配正义的首位，对生命的保全足以安抚民心。“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4](P72)物质和人口的生产、生命及种族的延续是人的第一需要，有道义的国家、运行良好的社会和有德性的君子都应当尊重人民的生存权利，并尽己所能地满足其基本物质需求和生命安全需要。“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13](P72)可是“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4](P275)，生存时常受到威胁。墨家清醒地觉察到在战争的非正常状况下，底层民众对饮食、衣物和休养生息的渴求。

墨家要建成的理想社会是“必使饥者得食，寒

①参见《诗经·小雅》。这首诗表现了平民与贵族对立的生活场景，为思想家分析社会矛盾提供了参照。

②参见《管子·牧民》，该文表达了物质生活的丰足对精神生活富有的基础性关系；但是孔子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样的论述，进一步表达了分配上的公正性要求，以及精神生活优先于物质生活的洒脱。

者得衣，劳者得息”[4](P304)。平民阶层没有能力反抗兵役、徭役和力役等无偿劳动的无情压迫，需要有贤能之士来为他们争取利益。“为贤之道将奈何？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4](P79)从根本上解决分配正义问题，寄托于个体的能力和抱负，以此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及人对人的压迫关系。墨家认为，社会最终的理想形态是“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4](P141)在衡量生活幸福和社会进步时，墨家把生命需求的满足摆在首位的分配正义方案，看似接近西方功利主义“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墨学常被定性为功利主义。[14](P76)墨家为大多数人谋取基本生活权益的手段是个体的分享精神，而非国家承担为公共福利再次分配国民财富的责任，这是墨家朴素共享主义和西方功利主义的根本差异。惠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基本物质需求，足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平等与满足。墨家团体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目的在此，这也是墨学演化成侠义精神的必然。

（三）交相利的限度与突破

墨家之利有三层利益关系。第一层是社会交往时“不亏人以自利”，引申为不倚强凌弱、不以诈欺愚、不凭贵辱贱，个体之间不欺诈、不凌辱、不强夺。第二层是群体和国家的“交相为利”，打破家庭、族群、国家的界限，实施兄弟般的博爱主义情谊，互相分享、共同使用财富，最大程度消灭私心贪欲，最大限度共享劳动成果并为他人谋求福利。第三层是放眼天下的“兴天下之利”，庄子形容墨家“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为响应“天志”的要求，形成上天般的无私胸怀，为天下人的利益奔走。墨家三“利”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作为提升伦理水平的阶梯，是个体从自我关怀走向关怀世界的必经之路。

人有与生俱来的自利本性，墨家“交相利”有一定的伦理乌托邦色彩，这种美丽的社会景象带有可望而不可求的空想性质。“现在的问题是，对等互利能否作为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为大家所共同遵循。不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墨子的兼爱论总会遇到类似的质疑。”[15](P42)从墨家“义自天出”和“义者，利也”的内在逻辑看，把上天代表的爱利天下的宇宙论过渡到世俗生活的伦理观，这种舍弃自我、天下为公的宗教献身精神，富有超越性的革命色彩。“墨子的这种‘天志’（the will of heaven）思想与韦伯所讲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中的‘天职’（the calling）观念颇为相近，它赋予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以一种超利益的价值，这样既保障了‘义’的崇高地位不受损害，又使得‘利’的实现总能获得一种伦理道德的支援。”[16](P139)“义”“利”“爱”“天”四者合一是俗常之人难以接受的伦理挑战，可对有宗教般救世情怀的人来说，却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四）兼相爱的理想及不足

“兼”是天的本性，“别”却是人之本质。墨家的爱无差等，要人们不分彼此地无私相爱，打破我－他界限来共享一切。做到这一点，“兼爱”社会的实现指日可待，天的意志会在尘世畅行无阻。“中国古代思想中有较近似于西方宗教者如墨子。天志要人爱，人不该不爱。天志要人兼爱，要人爱无差等，人便该兼爱，便该无分别无差等地爱。宇宙中究有此天，天究有此志否，此属理智问题。须向外寻觅，向外探讨。在中国思想界反对墨子，则直接从情上反对。人既不是天，人心亦究不是天志，强要把天志来压迫人心，人心不堪。……天爱仅可谓是一种理之爱，而非人情之爱，将仍为人情所不堪。”[17](P5)爱无差等最终会演化成止于美好设想的思想方案，却无法拓展为可行的生活常识和可欲的生活方式。

如何把上天代表的博爱社会建立于尘世，是宗教探讨的基本命题。墨家宗教社会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人相爱，其整个团体心系于此，为之抛弃了个人欲望、放弃了家庭生活、舍弃了家国情怀。为实现美好新世界而生活的这群人，没有家庭归属、族群认同和政治依附，生存的使命即为帮助弱者和弱国，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世界主义者。追求爱无差等的墨家弟子放弃了尘世一切可能的归属后，所盼望的乐土是否会眷顾他们，这被历史发展中“侠以武犯禁”①的政治禁忌所否定。墨家的身份认同是“为天行义”，付出的牺牲和一般宗教信徒毫无二致，表现出“言必信、行必果”的卓绝精神。“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4](P402)墨家反对言行无常、言行不一，是用生命在践行兼爱真理。

①参见《韩非子·五蠹》。虽然这一点也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墨学中绝的原因之一，但是韩非所说的“儒以文乱法”的儒家却没有遭受类似的命运。这在儒墨比较研究中，可作为深入探讨的主题内容之一。

墨家终极性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案虽然激动人心，可对身处有限性中的人类而言，极有可能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社会冲突是表达诉求、寻求共识和营造公共政治空间的必要手段，对存有差异性的人来说，社会冲突并非根本的恶；希望经由总体性方案一劳永逸地解除冲突，却有可能制造出不该有的人性悲剧。作为有限存在的人类，对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只能采用渐进改善的方式来逐步达到优化均衡；通过消除差异来终止历史的运行，曾经让人类付出过惨重的代价。社会是有机体，会按照自发秩序原理和固有节奏逐步前进。“有限的、相对的问题能够解决；无限的绝对的问题无法解决。换句话说，人类永远不能创造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18]（P326）墨家的爱无差等消解了社会冲突，却可能带来政治行动的终结，它在理论体系中可欲，在现实世界中却极易酿造悲剧，此为墨学圣俗二重性最为发人深思之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陈广忠.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 方勇译注.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黄克剑.先秦“形而上”之思探要[J].哲学研究,2015,（4）.

[6]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M].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 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M].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9] 杨玉昌.从儒墨之争看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J].天津社会科学,1999,（4）.

[10] 高深.从孔子、墨子宗教信仰看儒墨学说的区别[J].齐鲁学刊,2011,（3）.

[11] 杨玉昌.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现代性”[J].天津社会科学,2007,（4）.

[12] 汤智君.前期墨家论证法则之形式、蕴义与影响[J].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07,（3）.

[13] 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15] 张永义.墨子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16] 胡忠雄.墨子义利观新论[J].中州学刊,2003,（2）.

[17] 钱穆.中国思想史（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8] 刘小枫.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潘文竹

On the Dualism of Sacredness and Secularity of Mohism

HUANG Qing-li

(Qingdao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Whe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tains pure religion has always been disputed. Compared with other thinkers, Mohists seem to be more religious with sacred ideas like the Will of Heaven and the Existence of Ghosts. However, Mohism advocates the division between man and Heaven and practices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vigorous action. Mohists aim to establish the legitimacy of the Heaven's kingdom in the secular world and a better society of shared interests in the divine world.

Key words: Mohism; religion; secular; the Dualism of Sacredness and Secularity